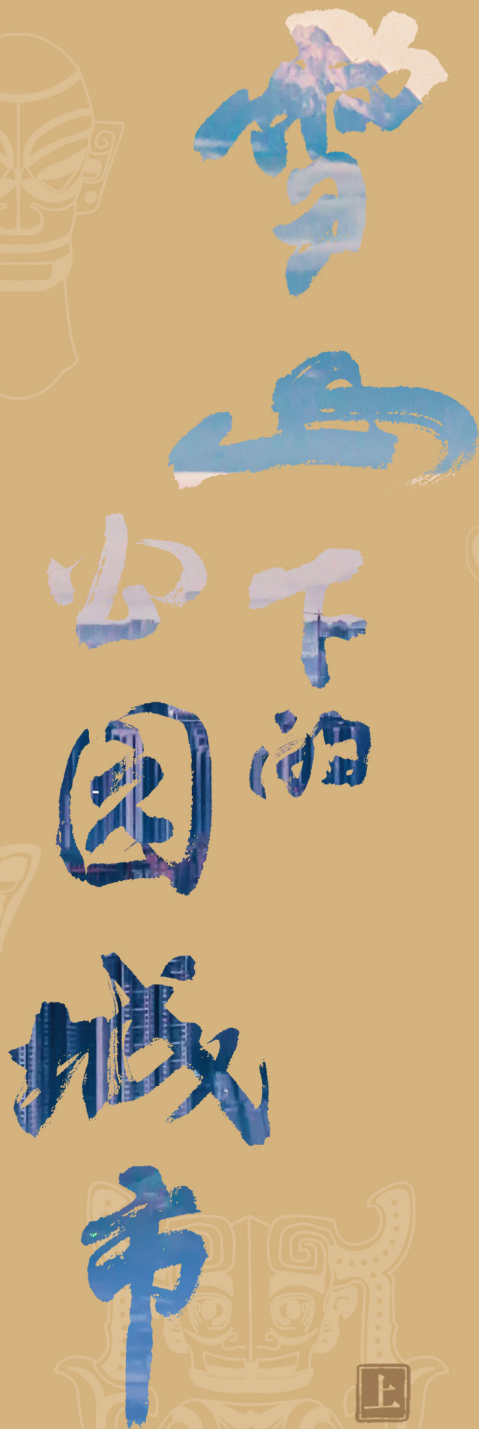


提炼古蜀文化中的四川新闻
和成都故事

挖掘成都城的根
成都人的魂

立体展现天府文化的
深度与广度


蜀山
山下的
城市



易旭东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蜀山
下的
公园
城市

成都卷
上

易旭东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易旭东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2.3

ISBN 978-7-5504-5101-8

I. ①成… II. ①易…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09628号

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

Chengdu Zhuan:Xueshan xia de Gongyuan Chengshi;Shang,Xia

易旭东 著

总策划:冯卫东
策划编辑:何春梅
责任编辑:廖 韧
责任校对:植 苗
封面题字:刘 光
装帧设计:张赟成
朗诵配音:唐 鑫 张欣宇
责任印制:朱曼丽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cbs.swufe.edu.cn
电子邮件	bookcj@swufe.edu.cn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印 刷	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40
插 页	14 页
字 数	631 千字
版 次	202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5101-8
定 价	168.00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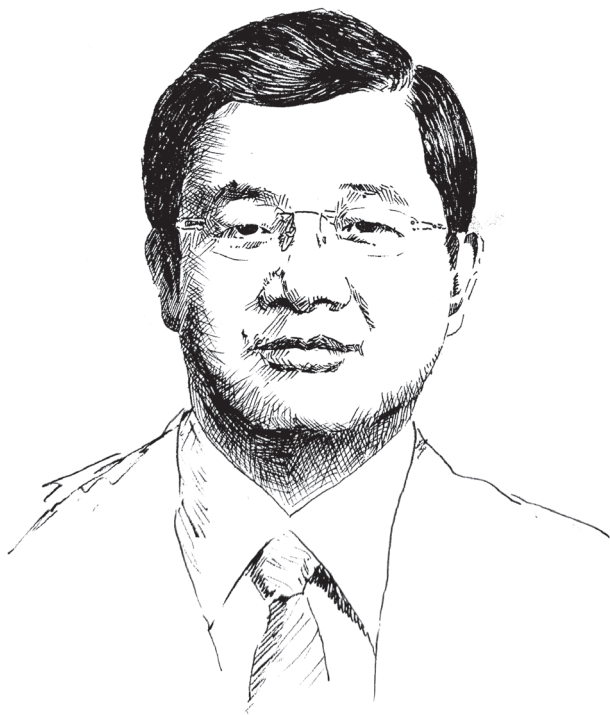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序言

FOREWORD

雪山雪 成都成

汤继强



城市究竟是什么，这是长期吸引我的问题。

半个世纪的学习、认知、游历、体悟，让我慢慢对她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

我老家在新都区与彭州市交界的汤家埂子，到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直线距

离二十多公里，成都市第二绕城高速从旁边经过。

在儿时，大城市成都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传说，遥不可及。记得14岁那年，家父带我第一次上成都，我们各自骑一辆自行车，从家里骑到成都，半天工夫。我由于个子尚小，来回一趟把屁股都磨破了。这是我年少时对大城市的痛苦记忆。现在交通方便了，开车约半小时，就能够从成都回到那个曾经的乡下。

城市在变大，城乡边界渐次模糊或者清晰，城市发展水平成为一个区域文明程度的标志。

昔日成都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小桥流水，千百年来发展缓慢，真正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及其之后的一系列城建计划，“府南河工程”“五路一桥工程”以及高新区、天府新区、东部新区等开发区建设。成都搭上了时代发展

的高速列车。

近年来，成都持续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原因很多：人口突破两千万，“新一线城市”排头兵，中国十大经济强市、世界城市排名Beta+，入围各种各样的优秀榜单的喜讯纷至沓来，但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公园城市”。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在成都天府新区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自此，世界城市建设的理论框架中，多了“公园城市”这一全新的概念，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都，幸运地成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

“公园城市”的“公”为全民共享，“园”为生态多样，“城”为生态宜居，“市”为创新生产。“公园城市”是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是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城市建设领域的重要表达，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此背景下，建设公园城市是贯彻国家大政方针的必然选择。

古往今来，人们探索城市发展规律的努力从未停止，城市发展的理念

“公园城市”的“公”为全民共享，
“园”为生态多样，“城”为生态宜居，
“市”为创新生产。

始终在与时俱进。城市是流动性的空间，这种“流动性”不能被汽车、工厂和“功能分区”所区隔，它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态和谐共生，是应有之义。在此背景下，公园城市逐渐成为世界先进城市的集体共识。

从历史观察的维度

成都，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她端坐于盆地中央，千里沃野、千年繁华。外揽山水之幽、内得人文之胜。青城山、西岭雪山像她的围墙，龙泉山、龙门山逶迤绵延，守护着各种生物世代繁衍生息的绿色家园；都江堰的分水工程赐予她灵动，沱江、岷江“两江环绕”，沱江连着远处的长江，顿时有了通江达海的宽广气韵，浸润了城市发展跃进的繁华；广袤平原“沃野千里”，构成了天府城乡融合的最美底色；川西林盘“星罗棋布”，记载了成都历史变迁的乡愁记忆。

公元前256年，李冰修筑都江堰，

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成就“天府之国”的美誉。有学者认为，成都由此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城市”。五代后蜀主孟昶，曾经在城墙上遍植芙蓉，人夸“四十里为锦绣”，这种城墙上大面积种花卉的现象，在中国建城史上绝无仅有。成都因之成为中华文明中第一个“花园城市”。“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官到浣花溪”描绘出一幅幅令人心驰神往的大美画卷。这既是成都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又是传承千年的独特印记，也是成都走向未来的历史积淀、迈向世界的鲜明标志。

从“公园城市”到“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探索了三年，但古蜀人对雪山的崇拜更可追溯到四千年前。王羲之《遗谢安书》表达赴蜀登临雪山之愿；陆游《登灌口庙东大楼观岷江雪山》感慨“千年雪岭阑边出，万里云涛坐上浮”；杜甫因被贬流落成都时，发现雪山在阳光照射下，洁白晶莹，银光灿烂，秀美壮观，于是便留下了千古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成都与雪山，由是有了某种独特的关系和默契，也成为成都传承千年的文化印记。

从历史上的生态城市、花园城市再

到今天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浣花成都，到登高西眺、雪山重现的当代现实图景，成都，向世界完美演绎着“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气的幸福成都”。

从空间地理的维度

如果从空中俯瞰成都，成都的地形西有龙门山，东有龙泉山，这两条山脉像是张开的双臂，共同守护着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受地理环境影响，成都发展主阵地一直集中在龙泉山西侧。龙泉山脉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呈南北走向，是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的自然分界线。而随着近年来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多，2017年，成都提出“东进”战略，开启了“千年古都”的格局之变：成都坚持了3000年的“两山夹一城”旧图景也变为“一山连两翼”新格局。

随着成都布局的转变，“一山连两翼”的关键区域“一山”（龙泉山）的总体定位也由原来的生态屏障升级为“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心，国际化的城市会客厅”，正逐步转变为天府之国的“中央花园”。未来，成都将以龙泉山为界，西

成都，自古便有
「天府之国」的美誉。
她端坐于盆地中央，
千里沃野、千年繁华。

侧是老城区和高新区，东侧是东部新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将衔接中心城区与东部新区两大核心区域，与天府国际空港新城、简州新城、淮州新城、简阳城区“四城一园”共同构建一个“新成都”。

依托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这座天然生态屏障，成都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正加快建设脚步，这里也逐渐成为成都面向世界展示公园城市形象气质的一张闪亮名片。

从国际视域的维度

纵观国际城市与公园发展先例，美国“中央公园”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美国人眼中“失去纽约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国，失去中央公园的纽约将不再是纽约”。纽约官方称“中央公园成就了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完整性”。

19世纪50年代，美国城市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从1821年到1855年，纽约人口翻了四倍。经济优先的发展理念，让城市格局的弊端暴露无遗，“城市病”层出不穷。1854年，奥姆斯特德开始着手设计一座公园，试图在繁华市中心创造一种特殊气氛，给城市人提供一个有着乡村般景致的休闲去处。这座公园落成后，房地产商因地价升值而掀起开发热潮，政府拿着房地产税投入

市政建设。时至今日，房子能否看到中央公园，仍然是影响纽约房价高低的重要指标。

中央公园一举开了城市公园之先河。著名建筑评论家戈德伯格感慨：

“中央公园虽不是一栋建筑物，却是纽约最伟大的建筑。”而如今的成都，正在探索现代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的科学之道。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竞争力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数年，遍观西方学界对于城市发展的研究，虽然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如何建设生态城市并未达成共识，但背后的理念及目标是一致的，即城市建设最终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而公园与绿地在缓解当前城市的环境问题和保护城市生态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纽约的人口不过800万，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样本城市——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人口仅67万。实际管理人口超200万甚至更多的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修几座城市公园就完事了，而是要用城在园中的生态价值，激活城市经济价值与生活价值。跨过龙泉山，曾经城市的东部屏障变成远超中央公园的巨大生态空间，川西林盘、龙泉山公园为成都公园城市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成都这座城市的品质由广大的农村决定，由成都的历史、文化、生活气息、

推窗见绿等来决定。

成都正在进行的公园城市建设实践，突出以生态文明引领的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以构筑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实现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已经超过了斯德哥尔摩皇家海港城，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中国样板，已经成为未来城市的最高级形态。简言之，在公园城市里，把绿色作为发展底色，全面充分体现生态价值，诗和远方在这里深情相拥。

从环境气候的维度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成都不仅完成了生态性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初步性探索，也成为全球唯一能够遥望5 000米以上雪山的千万级人口特大城市。2021年上半年成都在中国美好生活城市（2020—2021）上获得“十大美好生活城市——大美之城”和“十大美好生活城市——向往之城”两大重磅荣誉。2020年，在成都全年遥望雪山达70次，比2019年多了5次。现在在成都看雪山，不仅是看的天数多，看的个数多，看得更清晰，而且全域都可以看到雪山。

2021年8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

国”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引用杜甫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来描绘成都。同时，还用数据反映了成都大气环境治理的成效——这五年，成都市PM2.5浓度下降了约36%。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黄润秋部长举了6个例子来诠释当下生态环境的改善情况。被点赞的背后，是成都为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久久为功的努力。来自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2020年成都市PM2.5年均浓度为41 $\mu\text{g}/\text{m}^3$ ，由2015年“6”字头持续下降，连下三个台阶，降至“4”字头时代，较2015年累计下降36%，超额完成了“十三五”四川省下达的约束性指标（较2015年下降22.9%）。

在《2020中国大陆城建100强城市排行榜》中，城市建设的各项指标综合排名第一的城市为深圳，成都排名第五。该评价体系使用了六个指标，从各细分指标的得分情况来看，成都的“绿化和自然景观”一项得分是满分20，“市内交通”得分为17，“大型场馆”得分为16。

作为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一个缩影，位于都江堰水系府河左岸支流的兴隆湖作为集防洪、灌溉、生态、景观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生态治理项目，是天府新区内规划建设的一座“生态之肾”。这里曾是滞洪区，通过邻水营城、兴利除

害、蓄水成湖，如今已形成3平方公里的水面，水质达“欧洲蓝”标准，被称为天府新区的“城市绿心”。在这里共记录到野生鸟类50多种，包括红嘴鸥、花脸鸭、红胸秋沙鸭，以及全球仅存500只的青头潜鸭，鸟类总数超过3万只。

从产业发展的维度

“公园”不仅仅是生活的需要，也是经济建设的需要。生态本身就是先进生产力，也可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场景。美好的生态环境，能够营造出一种吸引高端产业的磁场力。放眼全球，新兴产业、高新产业普遍青睐生态优美的城市。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硅谷），很多大的科技公司就坐落在一个个风景优美的山谷里，而不在人口稠密的旧金山市区。

成都，从一个传统的消费型城市，到如今致力于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间先后实施“府南河改造工程”“五路一桥工程”建设，引进3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打造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一路摸索，折射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硬道理——产业发展推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城市强、产业好则城市美。近年来，

成都始终把贯彻“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发展之纲，打破城市功能的僵化分割，通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实现了产城融合（打造了15条产业生态链和66个产业功能区）；构建产业与金融良性互动的生态圈，实现金融与产业的良好融合，在这里诞生了大批上市公司和新型“独角兽”企业，为推动成都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内生增长动能。

2020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为17 716.7亿元，居2020年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百强城市第7位，占四川省总产值的36.5%左右。2021年，有望实现2万亿元的目标。

2021年2月20日，成都市发改委发布了成都市2021年重点项目计划，2021年成都市将聚焦建好示范区，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面梳理动力支撑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经济循环体系、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生态惠民体系、智慧安全韧性体系六大体系功能重点项目1 060个，总投资31 587.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 058.7亿元。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国家战略赋能，未来成都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引用杜甫诗句「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
里船」来描绘成都。

“公园城市”的成都示范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成都提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成都一举成为我国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受中央嘱托,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的道路上勇当先行者,并迅速获得认可。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从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到“示范区”,成都用时不及两年。

从2021年开始,距离“示范区”概念的提出才一年多时间,上海、青岛、长沙、绵阳、陇南等多个城市,派出多批党政代表团到成都考察,借鉴成都经验。来访的党政代表团,有一个共同的考察主题,那就是“公园城市”。这说明成都的“示范效应”已初步显现。

在探索公园城市建设的方式方法上,成都一直在创新,最新的抓手是:公园社区。

以片区综合开发和未来社区营造为重要抓手,让城市自然有序生长,加快呈现公园城市的美好图景。推进片区综合开发和未来社区建设,是一场营城理念和方式的全方位创新……成都将“东进”区域作为片区综合开发的“试验场”,将环城生态公园作为未来社区建设的“主纽带”……从根本上改变城市

未来形态和营城模式。

社区是城市的微观基础,是人们心灵栖息的港湾,是市民安身立命之所,是城市活力秩序的生命线。片区综合开发的生命力,就在于有机植入高契合度的未来社区。要遵循“人城产”逻辑……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又买得起房、消费体验好的理想家园。

成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在全市建设200个未来公园社区,其中环城生态公园区域范围内建设100个。2021年全市启动未来公园社区建设25个,其中环城生态公园区域11个。

在具体推进上,成都按照三大社区类型(城镇社区、产业社区、乡村社区)和两种建设方式(规划新建、更新改造)进行设置,以七大场景(未来生态融合场景、未来健康医养场景、未来人文教育场景、未来绿色出行场景、未来休闲消费场景、未来创新创业场景、未来共建共治共享场景)为一级指标,构建可量化可考核的控制性和引导性指标体系。

过去城市是公园的载体,公园是城市的盆景。今天公园已从城市的点缀变为城市的生命,成为城市的“四梁八柱”,是城市内在肌理,是一个有机的生命载体,是最适宜人们的生活状态,是最优化的服务人类的机制,是最高级的城市形态,是在可持续发展城市、宜居城市等城市发展样板上的

现代化升级。

2000年前，罗马给世界贡献了第一个下水道；1860年，英国在伦敦帕丁顿的法灵顿街和毕晓普路之间建造的第一条长6公里的地铁开工，1863年1月10日全线通车，这就是世界上首条地下铁路系统——伦敦大都会铁路。160年以后，截至2020年年底，成都地铁通车运营里程已达到518公里，比伦敦还长116公里。设置站点332个，比伦敦多62个。100年前，纽约给世界贡献了一张电网；70多年前，费城给世界贡献了第一台电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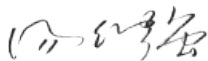
“纽约定义城市公园，成都建设公园城市。”成都通过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公园建设，使城市未来既充满智慧，又兼具文化与生态。以这种方式来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为全国城市发展提供最新、最强动能。未来，成都必将给世界贡献出第一个完美的“公园城市”样本。

此次，西财智库特聘资深研究员易旭东先生，穷经皓首、埋首书堆，深挖浅刨，反复在成都平原上来回往返，多次在岷江上游的“松茂古道”上考勘，在从“宝墩文化”到“良渚文明”的路上漂泊，再在从“武担山”到“番禺山”行程中徘徊，为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辛勤地找寻与探索，意在唤起人们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追问和反思，对千年古都与现代化城市顺利交融的鼓掌与欢呼，

对世界城市发展多样性的深情问候与致敬。“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千年成都从雪山走来；千里沃野、天府之国，公园城市向未来走去。

中国西部，可以骄傲地向世界说一声：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我来了。

是为序。



辛丑年仲秋

让“成都牛”耕出绚丽“中国红”

易旭东



记叙“微观化”的主动介入

接近、亲密。

中国与世界、成都与世界的凝望、对视、互动。

“谋赛、营城、兴业、惠民”。

从5 000年以前的古蜀文明开始，优先、富庶、巴适、安逸的成都生活

就已成习惯。1 000年的时间做探索，2 000年的时间打基础，2 000年的时间做传承，历史的沧桑，仍旧焕发着迷人的魅力。

“天下之中”的“大运之城”。

中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最美之处在于21世纪的成都人。

“用成都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眼光看成都”。

天府新区的迷蒙细雨中的氤氲。

浣花溪畔的万朵金桂香的飘荡。

两个平行世界构成，三环路内的中心老城、三环路外的国际新城。

同一城市，两种生活方式。

太古里的美女，似乎根本不用上班，软件园的帅哥，好像永远不用下班；人民公园里的人，爱喝盖碗茶，环球中心的人，更爱喝星巴克；水碾河路南的人吃饭，在老小区楼下苍蝇馆子，铁像寺水街的人吃麻辣烫，要开车去老城街

边；东城根街，几乎正宗的成都话，天府三街，疑似标准的普通话；住九里堤的人，穿着拖鞋遛狗散步，住金融城的人，穿着“阿玛尼”发微信。

西住百花潭的人说，每走一步，都是成都的历史；东居龙泉驿的人说，每加一升油，都是成都的明天；城北的人，认为安逸巴适才是生活的意义；城南的人，觉得努力奋斗才是生命的真谛。

龙之梦酒店就能坐高铁，离世界更近。

到杜甫草堂需要一刻钟，离成都更近。

二元状态。城市个性与消费状态，看似矛盾，却又统一。

危乎高哉的雪山，遮蔽不住声色容颜、色香韵味，在川西坝子的丰土中酝酿，从浣花溪畔的千朵万朵花儿中飘荡，在宽窄巷子的舌尖温情中洋溢，让“诗和远方”成为人们魂萦梦牵的向往。

时间上的瞬时即达，空间上的同步共享，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常规模式。无论五千年前的过去，还是万里之外的异域，甚至是完全不存在的景象，通过信息的处理，都会形成高度仿真的“拟像化”现实。

处在这种裂变之中的人们，面对信息化、虚拟化所形成的仿真文化，重建一种被遮蔽的真实信念，可能正是“非虚构”写作追求的伦理，也是读者高度

关注这类作品的内在缘由之一。

把2 000年以前的史志，拉近到当下的城市与人。

传世文献，考古、科研成果，难以支撑一本全面而完整的“成都传”。

揭示出这种重返历史现场的艰难与必要。

一个记述四川盆地远古、成都平原史前的史志作品，未必或措意去勾连相关的“诗词歌赋”。但是，“古成都人”并非生活在孤立的时空，无论是4 200年以前的大禹，还是2 500年以前的“五丁”，也与我们一样，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生活”，要不断与所处的时代进行“互动”。理想的“非虚构”记叙，要能让读者感受到处在“历史语境”中，而不仅仅是“公园城市”的历史背书。

“史志真实”，既是真相揭示、事实还原，又体现田野勘探、史料考证的特质。写作伦理，一面指向信息时代的仿真化、符号化的文化趣味，一面针对庸常化、表象化的文坛现状。

从“史志旧闻”到“新闻特写”，不是放弃传统史志研修而“另起炉灶”，而是超越单一学科，实现“跨学科融合”，充当史志的搜编人、甄别者，通过记叙本身，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感体验、内心感悟、历史质询与真相推断，使作品体现出一种严谨又开放的审美特征。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证性记叙，传达史志在审美之外的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

学价值。

记叙古成都、古成都人，要出成果、达新境，难上加难，现在仅“诗文中的成都”“书画中的古成都人”，仍然还有激烈争论，还有成百作家、成千专家，还在发表主题专著、学术论文。

“写实”“求真”，与史学家注重学术性不同，也与作家偏向文学性不同，更愿将“史志旧闻”当成“新闻特写”来写，类似于“元叙述”。研究、观察、缅想、喟叹、思考，不断构建平行记叙，明确彰显主体意识，在记叙中“微观化”的主动介入，现场直击式，不是经验转述式，忠实史志的真实、鲜活，呈现给读者更客观、更生活化的历史场面。

更愿做“公园城市”的拾麦穗者

文字生于书页，也死于书页。

从80后这代人开始，历史教育基本来自教科书，甚至电影、电视。历史现实生活的尴尬，一面被艺术作品篡改得面目全非，一面被当成学问留在学者们的圈里，真实的历史与大众距离甚远。

社会转型期，学者大都关注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现实问题与群体的微妙情绪。

“泛娱乐”向历史宣战。一面是数千万的“创意者”，亟须得到丰富传统文化的滋养；一面却是大量文化资源在沉睡，比如数以亿计的文物得不到展示，

“展出率”仅仅只有2.8%。

不断动摇人们有关真实的信念。

渗透了“历史虚无主义”逻辑。借助多媒体技术的支撑，电子媒介已是一个巨大的仿真化机器：拟像、符号、复制、数字处理……几乎所有信息制造，都是为了建构一种现代仿真文化。

千年不变的假貌，掉进“以今释古”的陷阱。

在共享大数据、泛新闻化的情势下，寂寞的史志考研正在被集约化的经验取消，如何记叙“中国故事”、讲好“成都故事”已然成为共同的命题，新奇的现实与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非虚构记叙的催化剂。

古蜀史牵涉许多重要问题，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否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准则？文化的先进或落后，是否就是以武器、技术、生产力，甚至军事胜败来判定？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在何处？大禹究竟伟大在哪里？何以是千年以降的“成都模式”？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历史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功力，真正沉淀成型，发自内心地认可，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广大读者。

2 0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四川、成都，熟悉、陌生，遥远的时代间隔和模糊记忆、神话传说，给城市与人的记载添上一层神秘面纱。能够在杂芜丛脞之中，拈得些许或有趣、或悲痛的新鲜的史志细节，也是一种快乐与成就。自己既

想追求宏大叙事与史诗感，更愿做一个“公园城市”的“拾麦穗者”，真诚、客观地讲述2 000多年以前的中国故事、成都记忆。

学院派的历史教育，普遍轻视讲故事的能力。学术水平颇高的史学论著，不太在意故事的可读性。在学术作品中，出彩的记叙与吸引大众读者，相辅相成，能不能做到？

“比较史学”。与记叙通史、断代史不同，在连续叙述人类的发展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像历史哲学家一般，在寻求全面的总体模式中获取历史的意义，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一直在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本书侧重探讨“公园城市”与“成都城”“成都人”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特殊性，以阐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异同。

本书将古今中外的诸种重大历史现象，即处于大致相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制度、事件、人物进行纵向或横向、宏观或微观、类型或源流的比较考证研究，尝试把5 000多年来中国的重大人物、事件和制度，放在世界大棋局中审视、记叙，为中华复兴伟业，探寻更广阔的参照坐标；以“成都城”“成都人”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冰山激流、越过沉船暗礁，进行一次令人深思浩叹的文化探险。

严肃的史志写作，应该有助于在全

球化背景下，发掘重建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

那些城市与人的焦灼与悲欢、智慧与迷茫、勇敢与无奈，无不体现出时代的侧影。

无论是回巡历史，还是直面现实，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记叙姿态，强调记叙主体的在场性、亲历性，验证式的记者记叙，实现“非虚构”的内在目标。

不断考勘，不断思考，不断还原到一个历史断面里，最后，将史志事实与考据事实“融合”，构成了永远只存在于现实和史志之间的一个世界——那是对过往永不消解的情怀、乡愁。

历史语境的逻辑。“非虚构”史志记叙，不同于学术专著，更不同于通俗历史故事。一面要以精致、优美的叙事，尽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面又要充分吸取学术成果，来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将艰涩抽象的学术概念，揉碎了融进城市与人的具体、细微的记叙，降低阅读门槛，也让更多普通读者看到时代汪洋背后的传统文化基因。

假如史志记叙失却或淡化自身的社会性、批判性与强烈的公众意识，那就等于丢弃灵魂，成为一种过眼云烟似的“无骨状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与貌似严谨高深的“考古游戏”。

诚实、克制，记叙出色，努力形成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不仅有关怀、情怀，

还要在细微之处精雕细琢，任何细节的失真，都会让读者瞬间出戏。

在“古成都人”里透视“千年中国”

人类出现之前的历史，统统归为自然史，由大及小、由远及近：宇宙史、地球史、矿物史、生物史、动物史等。发展连贯，即使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并不连贯，时间上仍然连绵不绝。

知史著文，均知先秦时期的研究是“坐冷板凳”。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史料生涩，文献稀缺，甚而各家各地各说，研究不好做，文章不好写。写先秦史、特别写先秦的地方史“尴尬”，写深，会有争议；写浅，被骂“脑残”；不深不浅，如同白开水，与现在很多无下限的“民粹史志”的“戏说”，“精英史志”的“正说”，“新媒体”的“乱说”，“自媒体”的“自说”出现无关，与自己的能力、功底有关。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也是古代史研究的难点。神话、传说、典故、纪闻……文字记录偏偏过少，如《山海经》《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寥寥数种，研究、突破依赖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解读。

正确的史志观，历史背景、事件缘由、影响、评价，既要符合历史，还要忠

于立场，坚持个性。不能为表达立场观点，而违背史志真实。更不能因为“泛娱乐化”，放弃立场、原则。

志在探秘、解谜“公园城市”的“历史文图”。意在探索、释读“古成都人”的“精神史诗”。破解、剖析镶嵌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成都“文化密码”。

需要对中国历史的走势了如指掌，对成都历史产生的原因非常清晰，严谨地把握史志的真实，理性地审视史志提供的异常开阔的视野，也让考证研究“公园城市”的前世今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首先是记叙时空，而不是所描述的时空；记叙需要以“研探”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文献史料价值、考古科研成果，对城市与人现场的历史重构中，反复沉思、缅想，传达出独特思考。

显现感性。在全球化的话语系统下，“地域特色”的天府文化的异质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风向标，内容需要丰富性、差异性，将使记叙具有更多拓展、生长的可能性。

“公园城市”是“天府文化”地域元素的物化形态。凝练、抽象、概括、集中、浓缩了诸多“成都人”的精神元素，挪用、重构，以媒介技术手段再配置、制定、抒写，一种当代观念。有的艺术家，喜爱用广义上的“中国元素”进行艺术创作；有的艺术家，则热衷于用具有地域特征的“成都符号”进行创作。天府

文化的独特内在脉络运用当代的方式重建,生成了新的意义。

“天府文化”中,人文精神是一个重要场域。

“精神气候”,不仅是时代精神,也包括地域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文化自信的本源。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刷屏、微粉的眼球经济、新媒体批评和“大众评审”,对“史志真实”的评鹭指手画脚,甚至有些有恃无恐。“大众”和公共媒体,更多所关注的不是“史志真实”的成色、艺术水准,而是将城市与人“泛娱乐化”的“戏说”,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集体热议的社会事件——即便热度只有一秒钟、仅仅圈刷一个微粉。

既不回避主观意图,亦不掩饰现场感受、体验,甚至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做的判断、取舍。古蜀史、中国史与世界史三位一体的史志观,已不能满足城市与人的纯粹记叙,本书更愿意积极地沉入历史内部,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伦理秩序,彰显史志的“精神气候”,也为人们了解“公园城市”的前世今生,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提供独特的审美载体、历史背书。

“跳出成都写成都”,以开放格局、国际视野,审视成都历史的“趋势”与“气场”,“成都人”与“家国”的流变,以虔诚的心、真挚的情,采用现代传媒的

平视眼光,从“家国背景”“乡愁底板”,以“记者视角”文化切入,面对面进行史志“采访”,将新闻手法、电影手段引入记叙结构,跨文体全景展示,让“历史”承担文学的功能,让“文学”再现鲜活的历史,还原“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历史的真实,尽可能“重现”没有经过PS的原生态场景……

为“中国安全第一极”提供史志地理支撑。

为“中国经济第四极”提供历史人文背书。

为成为“公园城市”示范提供丰富的文化底板。

世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从古蜀文化中挖掘“四川新闻”“成都故事”,在“古成都人”里透视“千年中国”,力图从历史的异同现象中,去揭示“公园城市”的历史规律。

文化符号。定胜灵魂的砥砺、精神的升华与凡身的沐浴。

今天的“新闻” 明天的“史志”

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也是史学强国。

古代四川是史学大省,成都也是强都。

历史越古老,文献与考古材料就越少。

“非虚构”史志记叙,没有任何虚

构空间。

史志无穷事，化为笔下的记叙，需要表达和理解。

不仅着意描画历史跌宕、沉浮，注重以史志为切入点，一本关于成都历史地理人文的“大特写”“深度新闻报道”，还要深入城市与人的层面，关注内在的精神状态、时代命运。

用“当局者”的角度感受，以“旁观者”的视野记叙，笔者期望通过自己对每一段历史的独立思考，对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独到观察，提供一种新的读史路径，摸索一种新的记志手法，用理性精神、国际视野建构现代公民价值观。

古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长江、黄河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共同构成的“阴阳”“太极结构”密不可分。

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成都城市与人的历史的连续性，又为中国史学的连续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丰厚内容。从“营盘山文化”到“宝墩文化”，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见证，滋养一代代成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府文化延绵发展，始终充满活力。

充满智慧的“成都人”，创造了璀璨的历史文明。

异彩纷呈的天府文化，树立了大美

成都。

重塑了成都人的精神面貌，滋润了和美的生活方式。

对史志中人文精神的发现与再认识，不是简单再述，而是凸显在现代意义上进行注释，成都历史延伸了城市与人的内涵，将“公园城市”前世今生上升至家、国、天下的文化集成符号之中。

“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

不忘初心。本书是我为那些生活、工作于成都且关心、热爱成都的人而写。

“戴着脚镣跳舞”。一面是慎密的历史的记叙，一面是“读者看得懂”的通俗写作。不仅是史志罗列、考据，也不单是立个“成都城传”“成都人史”，需要让人“愿意读”的文学性、新闻性在里面。

读者也是写作者，受众也是传播者。

添加各种技巧、虚构的文艺作品，固然是对时代的一种记录；将“史志旧闻”当成“新闻特写”来记叙，是一种更直接的记录，能让人窥见厚重的历史背后，身边的那些被人遗忘的新鲜角落。

试图传达成都人原本的生存质地，期许保存一份真切的人类经验。

抵制遗忘。“古成都人”的生活，同样经历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不仅为了“古成都人”的人生，也为了现代人对自

我生命的理解。回避、漠视史志的经验，也就不能真实地面对自我。

时代聚光灯下，每一段历史，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情，都有震撼心灵的精神力量。

现在，“汤继强线”柔性突破“胡焕庸线”。

“机遇之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到“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进入国家战略规划实施，赋予成都率先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路的时代使命，意味着成都要为当今世界提供“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的文明生活典范。

成都与成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深深扎根于5 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传承中的升华，开放中的飞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阔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世界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兴都深刻、伟大；顺乎历史潮流，合乎发展规律，为成都成为世界“公园城市”的“示范区”做出贡献，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跨越都如梦如幻、近在咫尺。

引领世界城市3.0时代的一次重要机遇。

“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千年变局下的新征程，让“成都牛”耕出绚丽“中国红”。我们念兹在兹的心灵归宿、守望相护的“公园城市”，苍

冥浩瀚、正气如虹，情怀不老、岁月如歌，“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史志”。当“像成都人一样幸福生活”，正在成为更多人向往的流行时尚，每一颗滚烫的灵魂，都是行走的史书；每一回史家的记叙，都是大写的风骨。

稽古振今。在历史的节点，着眼未来。回看历史，更知“公园城市”的博大精深。

仰望星空时，你我皆是星辰。写《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是与“成都根与魂”的交谈、致敬建设成都的“古今成都人”，企图把历史创造的精神财富“占为己有”“传播普及”，既无意加入“笔头去取千万端”的争论，也不对纷纭评议的结论做是非判断。

没有妄想写出史家绝唱。

更不会故作高深，装作深不可测。

仅仅就是家国情怀、英雄情结、现实思考太多。

易旭东

二〇二一年九月于成都

内容概要

SYNOPSIS

古蜀文化，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

成都平原，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古蜀史、中国史与世界史三位一体的史志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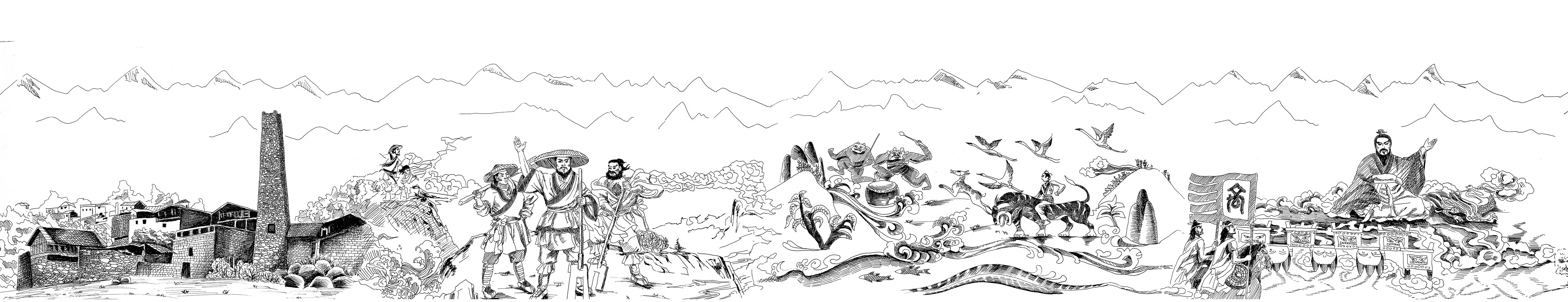
本书以传统史志研修的比较法、统计法、计量法为基础，综合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城市学等研究方法，导入“地理阶梯”“胡焕庸线”“童恩正线”“汤继强线”进行分析，跨界研究古蜀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在最新的科研成果上，融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田野考证的结论，首次全面展示被遗忘、被误写的古蜀文化——天府文化的源头、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全程揭示“巴适、安逸、和美”产生的历史原因，系统再现古蜀文化与中华文化，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体”的过程，建构较为完整的天府文化前世今生的链条、世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来龙去脉，弥补中华文化基因理念体系的重要“缺环”。

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既相向注入融合，又独自个性发展。

非虚构全景展示。从“营盘山文化”到“宝墩文化”，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揭秘成都人的“根”，成都城的“魂”，为了生活更美好的“五千年梦”。

细节记叙。古蜀国与夏商周秦并存，既独立，又融合，为“中国安全第一极”“中国经济第四极”提供史志地理、历史人文的强力支撑。“修志为用”，再次确定成都城市形象。

作品追求史志价值、人文价值、美学价值、文学价值。





004

第一章
沿「西北走廊」南下

最深厚的历史文化沉积带	6
一条人类迁徙的天然通道	14
营盘山：天府文化的源头	22
牧马山：立国治蜀的「司令部」	30
宝墩文明：成都历史前推一千多年	38
奉献「公园城市」的史前「初级版」	48

诗与远方的世界。

文明路线。古羌部落，从岷江上游聚居地往东，循着“茂县→都江堰、龙门山→新津、双流（牧马山），滙江→鸭子河（三星堆）→成都（金沙村）”路线，时断时续，辗转迁移，开始了长达 5 500 多年的下山的双路线图。就像一粒粒种子，沿途撒放。

一个梦幻般的名字——“都广之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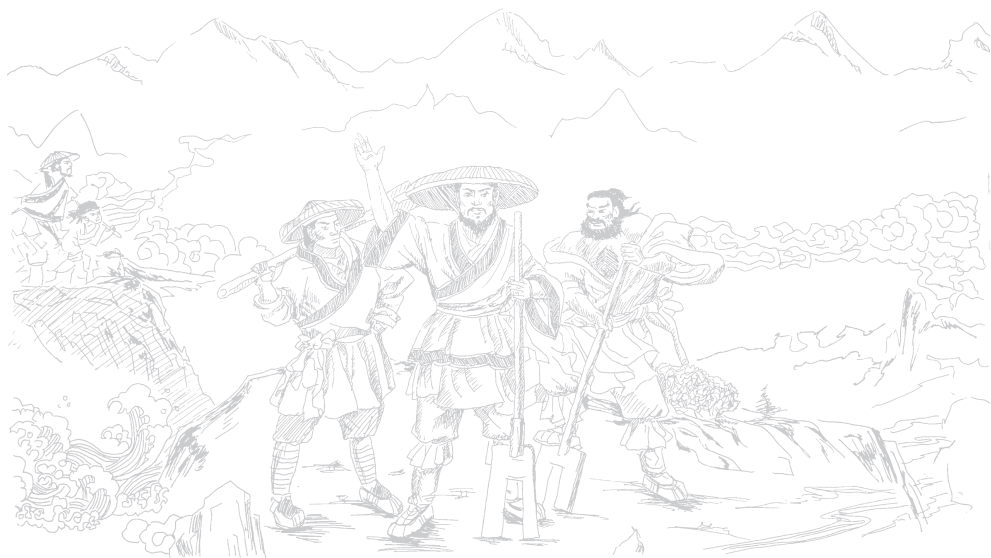
“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

都广天府，黄帝、嫫祖、蚕丛……美丽的故乡。

在 4 000 年以前，创业的“古成都人”，便在成都平原，创造一个傲视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一个存续了 3 000 年以上，距今不少于 5 000 年，以前长时间神秘、模糊、朦胧的伟大文明。

“成都胎记”，给“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植入山水、田林、生态、安居的基因。





056

第一章

「天府之国」的历史底蕴

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线条。与夏商周秦平行的古蜀，无疑最绵长、奇特、厚重。

大禹治水成功，开创中国的农耕文化。

“华夏”，始于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

古蜀州（崇州）的古城文明，大禹父子治水、建城的结果。

“江原文化”，形成中国独特的水文化思想理念，萌芽汉朝宗于海的“中华大一统”共识。“华阳国”应是最早的“华夏国”。只是大禹不断扩展疆土，才有“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中国”就慢慢转移到现在中国的“中原”一带去了。

震古烁今。中国安全第一极、中国经济第四极。

太平岁月，四川是安乐窝。

国家动荡，成都是避难所。

「汶川之会」，「川军」首次「北漂」……………	58
「松茂古道」起步最早「中国」……………	66
「蜀中之蜀」，大禹父亲是崇州人……………	74
世界「基建狂魔」的鼻祖……………	82
远古抗争特大洪水的「中国模式」……………	90
「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史前版」……………	98
哺育出博大奇绝的古蜀文化……………	106

美女配英雄的「成都精彩」

在浦江柔美的「臂腕」处停留	116
长江上游中华文明的「子宫」	124
「滇漂」到「新一代蓉漂」的演变	132
雪山下的「乡村游」与「第一夫人」	140
「杜鹃啼血」：镂刻在历史底板的灵魂	148
成都平原再次点燃创造渴望	156

森林密布，河渠纵横，动物繁多。

鸾鸟、凤鸟自由自在地歌唱、舞蹈。

层峦叠嶂的山林，阡陌纵横的原野，清流急湍的水系。枫叶似火的鸡冠山，托起塔尖明月的凤栖山，文井江勾勒出灵动的眼眸，雪山、草甸、瀑布、河川、平原，层次分明、山水相依。

以青山为底，草树云山、百渠入院、千秋瑞雪的旷世盛景。

以江河为脉，三江润城、清泓环绕、蓝绿交融的可感可及。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源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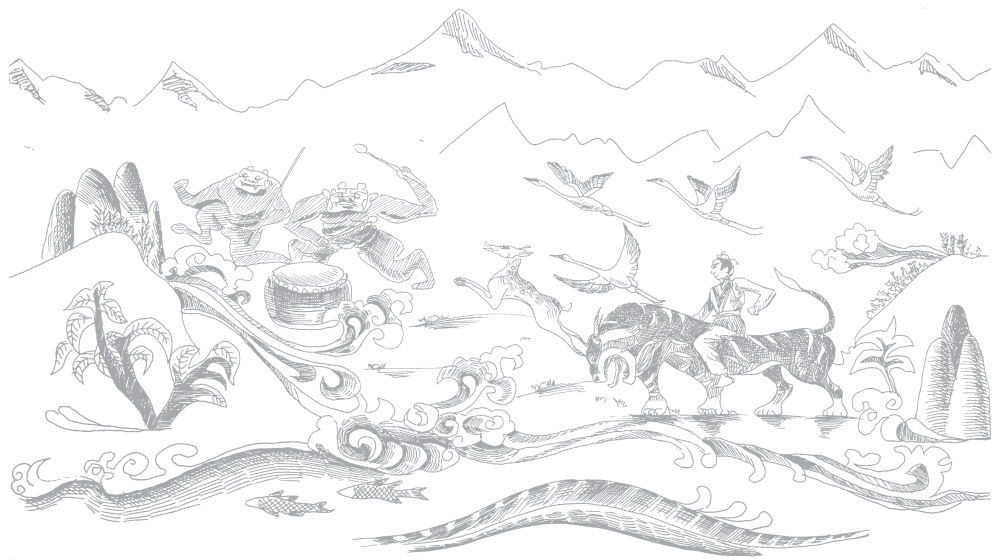
异曲同工。夏禹的“黄河向东”，鱼兔的“浦江南下”。

遥相呼应。中原河洛的“禅让”，成都平原的“民主表决”。

古蜀之根，从彭州延伸；古蜀之城，在崇州孕育。

蜀中先导，从郫都起步；天府水乡，在温江发迹。





164

第四章

周朝分野中西文化

“天下为公”的格局。
 “民惟邦本”的坚守。
 中国第一次把“州”作为行政区域名称。
 让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中国，与地理上的中国形神合一。
 “统一”的概念，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的心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过程，不断斗争、锤炼的过程。在与周边聚落或文化的对峙中，更优秀的文化脱颖而出，胜者为王，内外“双循环”，多元格局渐渐归为“一体化”。
 商，基于“众人”的社会。
 周，基于“庶人”的社会。
 夕阳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虽已经历数千年风风雨雨，人们仿佛依旧能看到古羌部落联盟、蜀族部落联盟数万人，从汶川出发，由西蜀向东，浩荡、迤迳……

「涂山大会」：四千年前的「鸿门宴」	166
「黄河向东」：政治博弈自西往东移动	174
埋藏「天下之中」重大秘密	182
《五子之歌》：史上首部「国训」	190
「优秀记者」孔子周游列国	198
商朝时东西文化相向而行	206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

「海窝子」到「三星堆」有多远	216
「副都」变「首都」的政治变革	224
「十二桥」的3D文化长卷	232
天人合一的浪漫情怀从金沙延续而来	240
成都隔空「呼喊」杭州	248
共同佐证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256
物质精神「双循环」的天下体系	264
三星堆：世界朝圣的中心	272
金沙城：「大国工匠」的发源地	280
「天时」狙击「外循环」	288
擦干眼泪泪悲壮地建起「蜀都」	296

城市中，全民祭祀，处处祭祀。

想象驰骋。与树对话，向山高歌。

呼吸新鲜空气，沐浴灿烂阳光，饮食山泉蔬果，倾听鸟儿欢唱……

日月同辉。长江、黄河，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

夏朝发明牙璋，具有中原文明色彩的文物却在三星堆出现，还传到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三星堆成为华夏文化向更广阔地域辐射的纽带、加油站。华夏文化里的每个文化圈都超越地理局限，相互又重叠。

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至少与6种早期文化“循环”。

通过汉中，与关陇古代文明交流；通过岷山羌藏地区，与山地游牧文化有交通；通过东面的巴濮地区，与长江中游相沟通；通过横断山区河谷交通线，与冰雪文化相沟联；通过南面的麋道，与“西南夷”交流……

小引

PREFACE

古蜀文明，并非孤独的文明。

岷江上游，“藏羌彝走廊”。

长江文明、黄河文明的汇聚之处。

一群又一群、时断时续的朦胧背影，忽远忽近，飘飘忽忽、实实在在。

长江、黄河，中华民族的父母河。

江河文化“双联体”，共同构成稳定的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链”。

北方的半月形地带，多条等温、等湿、等雨量线大致重合的地带，贯穿了中国版图，从中国东北，拓展到连接西北地区，至西南地区，呈现为“Y”字形——“长城·藏羌彝”传播带。

中国第一级“地理阶梯”。

青藏高原，雄伟广袤。

高原的东缘，群山连绵，重要的民族走廊。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许多族群、民族，在崇山峻岭中南来北往地迁徙，南方丝绸之路和藏羌彝走廊，与更晚时形成的茶马古道，都穿越在这片山岭之间，辘辘古道上马帮的铃声，从远古一直响到今天。

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

印度洋板块、欧亚板块巨大力量的碰撞，满布着高耸的山脉、湍急的河流，塑造出星罗棋布的河谷、湖滨平原和山间盆地。许多的少数民族都在这里，建立过自己的家园。

鲜明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特征。

中国西部巨大的文化传播带。

巨大漏斗，“Y”字形向下。

“文化梯递”，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

向下，南方的半月形传播带，“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再接一个倒“Y”字形。

两大传播带，优美的“中国弧”。

中间，著名的“T型经济带”。

两个“Y”结合部，形成一个巨大的“X”形。

成都平原，正位于“X”形交叉的中心地带。

“汤继强线”。成都，中心地带的“原点”，横向与重庆、贵州、湖南相连，纵向与西安、昆明相连的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直接覆盖中西部几省和一个直辖市的“T型经济带”。

“T型经济带”的“—”与“胡焕庸线”平行，几近重合，“|”与“藏羌彝走廊”的西南段，几近重叠。

天设地造。

东轴，从北方草原经四川西部、西南部、滇中、滇南，一直延伸至中南半岛的越南；西轴，从埃及、两河流域、中国新疆、西北、川西、川西南，延伸至滇西北、滇西以至缅甸、印度。

成都城，正处于两个半月形传播带的延长线交会地带。

这一交会地带绵延万里，从西北至西南，成一“中国弧”怀抱着中原大地、四川盆地。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青铜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若干共同的历史文化因素。

“松茂古道”。岷峨雪浪与悲凉羌笛。

那里，深藏着天府文化的“原始基因”“古成都人”的“生命密码”。

一幅古老、悲壮、凄美、辉煌的历史画卷……



诗与远方的世界。

文明路线。古羌部落，从岷江上游聚居地往东，循着「茂县↓都江堰、龙门山↓新津、双流（牧马山），前江↓鸭子河（三星堆）↓成都（金沙村）」路线，时断时续，辗转迁移，开始了长达5500多年的下山的双路线图。就像一粒粒种子，沿途撒放。

一个梦幻般的名字——「都广之野」。

「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

都广天府，黄帝、嫫祖、蚕丛……美丽的故乡。

在4000年以前，创业的「古成都人」，便在成都平原，创造一个傲视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一个存续了3000年以上，距今不少于5000年，以前长时间神秘、模糊、朦胧的伟大文明。

「成都胎记」，给「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植入山水、田林、生态、安居的基因。





沿「西北走廊」南下



壹

貳

叁

肆

伍

6 000年以前, 遥远得几乎看不清面容的时代。

“三皇五帝”时期。

“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依山势而居, 垒石为穴。

“能居山界之人则为仙”。

洪荒之际, 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氏族——蜀山氏。

生活地区除了岷江上游、中游, 还包括岷山山系在甘肃、陕西部分, 今称为陇南区域。

蜀山氏, 以眼睛“惑”作为氏族的图腾。夸张, 抽象又传神。总结出人一降生, 即从视觉、听觉上认知宇宙自然万物, 敬畏生命, 继而, 总结出人要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之道。

古蜀历史最早的开端。

炎帝以羌姜为姓, 乃蜀山氏其中的一支部族。

“蜀”, 时指“竹树”(俗称青杠树)叶上, 自然生长的野蚕。

将野蚕驯化后吐出的丝茧, 用于织锦, 称“蜀山氏”。“蜀山”, 指能生长、饲养桑蚕的圣山。包括岷山、龙门山脉的西南部, 从岷江到嘉陵江流域的广袤丘陵、坡地与平原。

一个人口众多的部族联盟——蜀山氏冉族, 中国最早发现从事农耕的民族之一。

有专家认为其先祖是元谋人, 整个蜀西非藏族类的人类, 都是元谋人演变而来。

大禹父子北上治水前, 蚕丛氏兴于茂汶(盆地)。

蜀山氏所在地“茂”, 即今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

叠溪的“叠”, 是古“嫫”字所省, 因嫫祖而得名。

刚刚站在中国蚕桑丝绸早期的门槛上。

鸟兽横行。成都平原还处于母系氏族原始社会，乃蛮荒之地。

《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邦……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

蜀族由冉族、羌族合化而来。

冉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土著民族。羌族，从西北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两大民族以岷山、邛崃山为依托，以岷江为轴心，不断融合发展，又循河谷，向岷江中下游，不断迁徙。

其生息范围主要在岷江上游、涪江流域，北到“松潘草地”；南到“茂县盆地”、汶川地带；西到黑水，理县、马尔康，沿大渡河流域；东到白龙江（羌水）、涪江流域的广元、绵阳地区。

古羌人的农耕特征，不是古蜀国的农耕特征、冉人的文物特征，更接近历代对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特征的描述。更早进入成都平原的冉族人，是比羌族人更容易被大量汉化的一类民族。

嫫祖，成都平原第一任古蜀国酋长，黄帝正妻。5 000年以前，嫫祖诞生于四川盐亭金鸡镇嫫祖村。

中国文化创始先祖，黄帝，起源于游牧民族。

古蜀部族与华夏部族联系紧密，千丝万缕。

《史记》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黄帝派元妃嫫祖入蜀，教蜀民养蚕，还专门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的一个女子。

昌意的儿子，娶蜀山氏女后，又生“五帝”之一的颛顼。

上门女婿。四川女婿黄帝，嫡长子定居“江水”、嫡次子也娶“蜀山氏女”。

“后封其支庶于蜀”。颛顼的庶支后代，被帝喾分封到蜀地“崇”，世代爵侯伯。

颛顼的儿子鲧曾，鲧曾儿子鲧祖，鲧祖儿子鲧父，鲧父儿子鲧。

鲧生禹，禹生启。

蚕丛与嫫祖、黄帝，或存亲缘关系，或是“师徒关系”。

蚕丛氏的养蚕技艺，按亲缘来推算，应发展于嫫祖之后。

黄帝时代，父系社会逐渐代替母系社会。

婚姻联盟。黄帝部族擅长织造技艺，蜀山部族擅长植桑养蚕，完美结合，互学互鉴，密切交流，家传或族内传承，形成丝绸文明独

远古，内陆亚洲每个区域都是相对独立、连续的文化、政治地理区域，与古欧洲的寂寞、枯乏迥然不同。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甚至毁灭欧亚各大文明的游牧族群的活动舞台。

特的起源、发展、传承的完整体系。

蚕丛，古羌人的首领，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

5 500年以前，蜀山氏变成蚕丛氏。

扬雄在《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王者蚕丛氏。”

岷山，大秦岭的西南边界，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川盆地与北秦岭交会的复杂地带。

地貌轮廓，宛若一个不规则“三角形”，称为“复杂的三角地带”。

岷山主体、主脊，在四川省境，全长约500公里。主峰雪宝顶，在松潘县与平武县交界地带，海拔5 588米。大岷山，一组走向复杂的三角形山脉，三条边分别是：西北—东南走向的岷山主梁，西南—东北走向的龙门山（九顶山），东西走向的擂鼓山（露骨山）。

西麓，发源黑水河（墨曲），从若尔盖草原向西，注入黄河。

“水育人性”。黄河流经若尔盖长达148.8公里，墨曲、嘎曲与热曲等支流，从南往北汇入黄河。若尔盖草原水源充足，河流蜿蜒曲折，牛轭湖星罗棋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南麓，发源长江一级支流岷江。

东麓，发源长江一级支流沱江、嘉陵江右岸最大支流涪江。

在岷山与西倾山的交接处，发源嘉陵江支流、西源白龙江。

岷山的长江水系，都呈西北—东南流向，滋润着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自西向东，分为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

岷山，蜀人、蜀国、古蜀文化的父亲山。

天然廊道。两个“Y”字，通过成都平原相连，链接中国三条民族迁徙流动的“生命走廊”——“西

北走廊”“藏羌彝走廊”“南岭走廊”，形成人类文明史上最深厚的历史文化沉积带。

“高地亚洲”。在“西北走廊”北部，高地的半月形地带的顶部上端，长达8 000多公里的欧亚草原，西起匈牙利、乌克兰，东至蒙古和中国东北，包括干燥的平原、高原，一些错综复杂的山岳、丘陵。下分满洲草原、蒙古草原、准格尔草原、哈萨克草原、俄罗斯草原、乌克兰草原等。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也是亚欧大陆桥必经地区。现在，又称“内亚”。

类似“中亚”。

亚洲中部，“内陆亚洲”。

中国语境中，“中亚”指的是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独立出来的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此外有人认为还要加上阿富汗。

游牧文明的核心地域，世界岛的“心脏地带”。

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演变中，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区域广大。东起亚洲东北部海岸线，西抵里海的广阔地域，由数个地理单元组成，深居内陆，远离亚洲海岸线的内陆腹地，以游牧文化为主。亚洲大陆闭塞、无通向外海河流的地区。

一个涵盖所有曾经在亚欧大陆上，存在的游牧族群的活动地域。

气候多变、灾害频繁，族群常常征伐、逃难。

自汉代起，中国称之为“西域”。

狭义西域，由河西走廊，到葱岭以东之地，大致等于今日的新疆。广义西域，意义不定，随着中国政治势力、文化影响、对外贸易关系时伸时缩，中国以西的地方，都是西域。

“自成一体”。远古，内陆亚洲每个区域都是相对独立、连续的文化、政治地理区域，与古欧洲的寂寞、枯乏迥然不同。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甚至毁灭欧亚各大文明的游牧族群的活动舞台。

“内亚”族群、部落，南北都有屏障。

往北，不易穿过的原始森林，难以为生的苔原。

由东而西，尽管山脉有些隘口可以通过，生活地带却大同小异。

也是必经之路。经过今日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的各山口，可

以进入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经过高加索山,可以进入亚美尼亚高原,以及更南、更西的地方。经过多瑙河下游的河谷,可以进入巴尔干半岛,再由巴尔干,又能容易地转入小亚细亚。

为了生存、物资,游牧族群大都选择迁徙南下。

由北向南,迁徙动力更强大,生命力更旺盛。

往南,尽管有延绵不断的山脉。一旦过了山峦,进入“西北走廊”,在中国的北边,经过阴山,过雁门,可以进入晋北;在西北,通过玉门、阳关,也可进入黄河上中游与蒙古高原。

心中的诗与远方。

易守难攻,诱惑挡不住。

一个个山间平原、河坝,环境相对封闭。

利于北方迁徙来的游牧族群生存。

云贵高原、川西高原、岷江上游,高山峡谷的山顶面,几乎与青藏高原的高原面同高。深切的河谷,在海拔2 000米以下,不少地段已是亚热带的环境。独特的地理环境,天然形成的地貌、生态屏障,地貌上与东西两侧的四川盆地、青藏高原迥异,生态上成为农耕区、畜牧区的天然分界,作为分界的高山峡谷区,又成为农牧交错带。

流淌在横断山区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分别自北向南穿流而过,从上至下,完整地穿越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经历源头区高寒湿地和中上游深切峡谷,都在中下游形成一个明显的拐弯。特点彼此相同,几乎等间距平行,在南端与干流汇合,最终流入长江,一如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在同一位置外开、伸展、绷直、旋转,整齐划一。

地图上形成罕见的“L”形直角拐弯。

令人惊叹。全球独一无二的高度协调性。

唯一区别是金沙江、雅砻江,向东北方向折转后,再次折转,重新回到南北流向。

大渡河折转后,再也没有回头,径直东流,在乐山汇入岷江。

一路延展。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与缅甸、印度北部,为中国南北方民族流动,提供了独特的生存空间,构成了甘青川滇区域农牧交错带,形成一个民族迁徙的“藏羌彝走廊”。范围覆盖川、黔、滇、藏、陕、甘、青7

省(区)。

“中国弧”区域，面积超过68万平方公里。

高地的半月形地带，中国西部腹心。

天然的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东西方交流的纽带。以夏季风的北缘为线，有东南的“中原”、西北的“草原”地带。在两个气候、经济、文化截然相反的地理单元的中间，一个“超稳定结构”的区域。北起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经内蒙古河套、陇东、青海东部、四川西部，连接西藏东部与云南。

源于童恩正提出的“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

衔合汤继强提出空间经济的“T型经济带”。

西侧，文化发展的步伐，与亚欧大陆中心地区趋同。

东侧，远古中国以独特的面貌示人，踏着不同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

中国物质文化的抵抗力。

种种“循环”“接纳”“拒绝”，大都首先发生在“西北走廊”上。

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空间广袤。

军事强权的跳板、争霸的战场。

农业经济、游牧经济过渡并存、商贸往来的中间地带，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夺、拉锯的缓冲地带、山河交错之地，又是经济生机蓬勃、潜藏军事危机的地区。

更是华夏民族拓展农业经济、防御北方族群的长城分布地区。

古代先民已在这里，过着渔猎和游牧相结合的原始生活。

内蒙古的敖汉旗，已经被考古专家定为世界小米种植发源地。距今8 000年的兴隆洼遗址，出土了全世界最早种植的小米。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黍、粟等农作物。被誉为“华夏第一村”。

文化区块链。在硝烟与战火远去的古代，区块链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技术和贸易，成为一个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天然存在。文化影响力，超越任何一种地理上的政治权利的存在。

跨越甘肃、陕西、河南。

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达湖北,北抵内蒙古。

血脉,可以代表至少5 000年以前中原的血脉。

华夏民族北上亚洲内陆时,能借助农牧经济,获得给养,还可发展骑兵,为与游牧族群一决高下,提供战术基础。游牧族群南下北方平原之时,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人马可以获得给养,农业经济也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的不足;商贸往来也可以壮大游牧族群实力,形成相对于内亚腹地深处游牧族群的经济优势,更易在中国的“西域”,建立较为长久的统治。

农耕民族、北方族群,强化自身的充电场所。

政治地理上,属于“九州五服”中的“绥服地带”。

经济形态上,古代农牧过渡带。以历史标志长城来命名,可称为“长城边疆”。历史上,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争夺的“核心边疆”,处于不同的时代位置,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能量。

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族群之间,不断互动形成的边疆形态,逐渐催生突破各自文明局限的规模较大的政权,推动中国历史走向发展与高峰,而这些“边疆政权”,便是农牧国家。

中国有两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又被分别称为“中国弧”区域、“童恩正线”。

与人口地理的“胡焕庸线”大致重叠。

“汤继强线”空间经济学的“硬核区域”。

文化共性,民族移动具有空间规律性的内在机制。

两大传播带有两个交会点:东北、西南。

向外辐射。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

高地的半月形地带。“长城·藏羌彝”传播带,以戎、狄文化为主,自中国东北,沿着长城地带,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延伸向藏羌彝走廊,分布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面向欧亚草原的广阔空间,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一面,万里长城,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族群的军事分界线。

一面,长城地带,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

沿海的半月形地带。“长江·沿海”传播带,自长江延伸至东部沿海,以水路交通为主,分布着苗瑶语系、壮侗语系的各族群,以夷、越文化为主,面向东南亚与环太平洋的广袤天地。

北中国海, 渤海和东海,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夷的天下。

南中国海, 黄海和南海, 从浙江到越南, 越的天下。

东北, 史前文化与族群结构, 兼有两大传播带特点, 影响中原, 面向内陆与草原, 奠定陆上丝绸之路; 西南, 文化与族群结构颇深的两大传播带相交融的烙印, 奠定海上丝绸之路基础。

两条弧线, 画出大圆。

闭合的空间, 便是远古的中原地区, 狭义的“中国”。

中国的核心区, 天下辐辏。

各种族群都往里跑, 有如漩涡, 有的被吸进去, 有的被甩出来。

吸进, 变成华夏; 甩出, 变成蛮夷。

文化区块链。在硝烟与战火远去的古代, 区块链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技术和贸易, 成为一个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天然存在。文化影响力, 超越任何一种地理上的政治权利的存在。

长江、黄河, 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江河交织成的历史经纬, 熔铸成中华民族的脊梁、魂魄。



成都平原处于半月带“中国弧”的下端。

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上的最低洼处。

北端，恰临西北河湟、渭河上游地区。

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的结合部。

沿“藏羌彝走廊”通道南下，大体有东、中、西三途。

东缘通道。从陇南，经嘉陵江上游通道，即西汉水、白龙江通道，往东南，沿南秦岭的大巴山脉、汉水河谷，通达江汉地区。

西缘通道。从西北河湟地区，沿黄河西侧西南行，经黄河沿，过巴颜喀拉山口，沿扎曲至通天河下游，再渡过通天河，自玉树南下，入澜沧江上游地区。

中缘通道。自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沿积石山两侧，从黄河大拐弯处，向东或向南，与从甘南洮河上游地区向南，进入四川西北高原、草原地区。顺大渡河上游，或在岷山西侧，沿岷江上游，顺岷江河谷南下，经成都平原西侧，接青衣江流域，再往南，越过大相岭和大渡河，进入安宁河流域，或顺岷江、大渡河，沿大小凉山东侧，金沙江一线南下。

历史上形成联系蜀滇、南亚的重要交通路线。

如影相随。

形成金沙江水系藏彝文化、岷江上游藏羌文化、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文化体系。

巧夺天工。

在走廊的东端，以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的弓杠岭为发源地，由北向南，沿岷江干流河谷而行的“松茂古道”，纵

贯松潘、理县、茂县、汶川，在都江堰切穿龙门山中段，过新都，进入成都平原；由茂县向东，沿土门河，经北川、安州、什邡、绵竹、广汉，过新都，进入成都平原；由茂县向东南，翻越龙门山，经彭州的湔江河谷，过新都，进入成都平原……

三条古道都各长约400公里。

走廊两边，还有两条孔道。发源于岷山的白水江，嘉陵江源头（曾名羌水）由西向东，穿过龙门山北端，形成北孔道；发源于夹金山南麓的青衣江，穿过龙门山南段，形成南孔道。

狭窄的山谷，称“沟”。

稍大的湖泊，称“海”。

开阔的山谷、河流交汇冲积区，称“坝”。

遍布的高山台地，有利于游猎民族屯兵驻守、定居耕种。

雕刻时光。一条古代人群迁徙的天然通道。

深藏着“成都人”的“生命密码”、天府文化的“原始基因”。

形成期始于史前，距今6 000年以前。

羌族，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民族之一。

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

“羌”，会意字，上“羊”，下“人”。

羌，中原部落对西部诸多游牧族群的泛称。羌族源于古羌。古羌分东羌、西羌，主要分布在巴颜喀拉山脉以北广袤的草原。现代羌族自称“日麦”“尔玛”，是西羌保留羌族族称的一支。

古羌并不是一个民族，而由许多不同族群组成。

“炎始于羌”。早在炎帝时代，古羌就已产生。

蒙古利亚人种的古老游牧民族。

一部悲壮的迁徙史。身上浓缩了曾仅次于汉族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羌人的历史，离不开迁徙，迁徙的原因，又离不开战争。为了延续一个民族的未来，不得不走上漫长的迁徙之路。

曾在昆仑山、天山脚下，生活过很长时间。

内陆欧亚，一个曾经聚集过西亚、中亚，甚至欧洲人种的地域。其语言文化包括阿尔泰语系中的满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芬匈语，印欧语系中的波斯语与汉藏语系中的藏语等。

从遗传学、人类学角度来看，汉族、蒙古族、藏族，甚至北美印第安人，祖先都是蒙古利亚人。

一部悲壮的迁徙史。
身上浓缩了曾仅次于汉族数千年来
的历史，离不开迁徙，迁徙的原因，
又离不开战争。

西方人类学家，把亚洲的黄色人种，统称为“蒙古利亚人”，并非现在的蒙古人。源于当年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铁骑，突进到欧亚，对欧洲文明造成巨大冲击、威胁。欧洲人对来自蒙古高原的人，认为全都是蒙古人，故才有蒙古利亚人种之说。

黄种人婴儿生下时，臀部往往带有青色的胎记，就被称为“蒙古斑”。

除日本以外，大蒙古汗国曾先后统一几乎全部的黄种人区域。

黄色人种（黄种人、蒙古人种），世界四大人种之一。

在四大人种中，数量排名第二。主要分布于乌拉尔地区、东亚、北亚、南亚、东南亚、马达加斯加、大洋洲部分地区。

古羌族，一个古老民族，华夏民族的主要祖族之一，与白种人结合，孕育了“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又逐步与其他民族混血，生发出了古羌人。

除了主流孕育了汉族、党项、土蕃、藏族等民族，还流入蒙古草原的支部族，参与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单音节有声调的汉藏语系，发源于单音节的古羌语。

直到现在，许多汉字还带有体现羌人的游牧血统的“胎记”。

用得最普遍的“美”字由“羊”“大”组合而成。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说：“美……从羊，从大羊。”徐铉注释道：“羊大则美，故从大。”

华夏先祖的审美观，古羌人的审美观。

羌族的伟大，在于性格刚强、智慧超人，与古羌族同时存在的古匈奴等游牧民族早已消亡，而她却一直顽强生存延续至今，儿孙子族的数量，已达到令世界震惊的十几亿之巨……

从内陆欧亚草原出发时，古羌人的头颅很圆，

因地中海贫血基因的关系，出现大鼻子、厚嘴唇等特征；顺着江，走过河谷，从“西北走廊”来到甘肃、新疆，人体形态也发生变化。

到了高原，登上昆仑山。

尽管不再受疟疾影响，但是缺氧，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人不易存活。

存活下来的人，脸都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六指”，最大的遗传特征。古疏勒国、现代的西藏人，都有这种显像遗传特征，甚至现代的汉人种群中，还有六指的隐性遗传特征——小脚指盖分叉。

古羌人居住地就是昆仑山脚下，黄河上游流域。

在漫长的行进中，使用的语言也发生变化。

经过数千年的迁徙，体内基因又诞生一个新的突变，一直到5 000到6 000年前，甚至更早，人体DNA又开始“不安分”。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人口增长的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

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族，开始分野。

其中一个亚群，DNA又发生突变。以农耕为生。带着这个突变的DNA，向东行走，到渭河流域才驻足、停留。

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迁徙中，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与原住族“混血”，分化出了藏族、羌族、彝族、景颇族、土家族。

在渭河流域，磨砺出骁勇善战的秦人。

盘踞在关中，积聚着统一中国的实力。

蒙古人种又可分两种：北方蒙古人种、南方蒙古人种。

介于两者之间的汉族、藏族、朝鲜族等民族，称为远东蒙古人种、东亚蒙古人种。蒙古人种与北欧白人的混血种，叫乌拉尔人种、北极白海人种。把中亚的黄白混血人种，叫南西伯利亚人种、中亚人种与突厥人种。南方蒙古人种，大致分为南亚蒙古人种、马来蒙古人种，两者区分不大。在广阔的太平洋上，生活着的蒙古人种与赤道人种的混血种，学术界称为玻利尼西亚人种。

爱斯基摩人，被称为北极蒙古人种。

“华夏民族之母”。

“为了生活更美好”。古羌人面对无情的战争、各种自然灾害和增长的人口，为寻找更加温润宜居的环境，不得不捧起大漠孤烟，带上必需的生活用具，悲壮地踏上离别故土的旅途，从北向南，一路逃亡，

分别越过金沙江、雅砻江、巴颜喀拉山口，躲到岷江周围的山上。

凄婉悲凉。

羌笛，伴着羌人一路远行。

羌笛，用羊腿骨、鹰翅骨制成。

既是乐器，又是放牧之鞭。几千年后，随着民族融合，成为征人思乡的寄托。从“羌笛何须怨杨柳”，到“羌管悠悠霜满地”，古代边塞诗词里吟咏不断的羌笛，正是民族迁徙融合的实证。

古羌人从北方宽阔的草原，翻过巴颜喀拉山脉，挤入“藏羌彝走廊”深切的峡谷。

距今5 700年左右，历尽千难万险。

像一群群失散的鸟，在岷江上游的“营盘山”，停下流浪的脚步。

叠溪以南近60公里处。

“茂县盆地”，岷江上游地区面积最大的河谷冲击扇平原。

茂县，古时的汶山，蚕陵。

“汶”“岷”通用，岷山又称“汶山”。

茂县县城，海拔1 668米。

自然条件优于山岩陡峭的叠溪。

境内山峰多，在海拔4 000米以上。

营盘山，一处蜿蜒的山头，又名红旗山，也称云顶山。

位于今茂县县城所在地凤仪镇南2.5公里，距成都城区约215公里，九顶山的山前脊梁地带。岷江东岸的三级缓坡台地。台地，南北走向，南窄北宽，形似马蹄，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

依山傍水，“峭峰插汉多阴谷”。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四周被北川、安州、绵竹、什邡、彭州、汶川、理县、松潘等市（区）县环绕。南有龙门山、北有岷山、西有邛崃山诸山脉。

定居的理想之所。东、西、北三面均为陡坡，岷江从三面呈几字形环抱。弯曲的河道，形成较大面积的回水湾区，河水流速减缓。浅水区域，理想的捕捞作业场所。

阳光福地。高出岷江河谷约160米。

地势平坦开阔，土肥地美，气候宜人。

境内河流众多。

扼上下交通咽喉。

岷江自北向南，纵贯全境，支流有黑水河、赤不苏河、松坪河，分

别在大小两河口、较场乡两个地方汇入岷江。东部还有一条土门河，从西向东，纵贯土门全境，最后汇入涪江水系。

更远的时代，早在羌人到来之前。一群身穿兽皮、手持石斧的最古老的原住族——冉族人，在这里生活。他们，居住在由黄泥筑就的矮屋子里，在方圆数千米的范围内猎羊、捕鱼。

冉族分布在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和甘肃、陕西南部地区。

主要的族群，生活在今都江堰、汶川、小金、理县、金川、茂县、黑水和松潘等藏、羌、氐部族汇集地，建立过冉族部落国、冉邦国等古蜀政权，为“六夷、七羌、九氐”中九氐之首。

冉族存在于游牧文明的前期。

发展比渭河流域的“炎黄”部落要晚。

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早期，处于同期。

部落中心，最早在今松潘的川主寺一带。

距县城17公里，距成都351公里。

与迁徙而来的古羌依山而住、依洞而息不同，冉族喜好农耕，建造固定居所，称“邛笼”。居所稳定，开始种植农作物，驯化和养殖各类家禽。中国很早就发现从事农耕的民族之一。

《后汉书》描述，冉氐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的“邛笼”，就是羌碉。羌人自古善搞建筑。据文献记载，最早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就有不少羌族工匠。

如今，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的高半山上，还保留大量的原生态羌寨。

民居以石木结构为主，顺山排列，或高或低，错落有致。

羌族男子的坚韧不拔，尽显在巍然屹立的羌碉、羌寨里。

羌族的伟大，在于性格刚强、智慧超人，与古羌族同时存在的古匈奴等游牧民族早已消亡，而她却一直顽强生存延续至今，儿孙子族的数量，已达到令世界震惊的十几亿之巨……

“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

接受古羌“输血”的民族，多达15个以上。

南下，为“蜀”“彝”。

东进，成为炎黄华夏族。

向西，成为藏族的先祖之一。

典型的游牧民族。《后汉书》说，“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族人更是“堪耐寒苦，同之禽兽”，久居苦寒之地，体格练就强悍，男人“性坚刚勇猛”，“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

汉族是以接纳为主，日益壮大。

羌族以供应为主，壮大别的民族。

羌族属于古羌族后裔。

古羌族又是西戎部族中的强大民族，羌族应为西戎支系。

西戎，古代华夏族，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统称。

魏国史官记录、搜集、整理的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西周时期，羌族先民就已生活在西戎部落。中原诸国与戎狄的战争此起彼伏，中原多为农耕文明，大兵团作战，更注重阵地式，戎狄以游牧文明为主，更为机动和灵活，中原人往往胜少败多。

《诗经》记载：“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

先民早在西周，甚至殷商时期，已经聚居于当时的陇西之地。

古代社会中，只要非中原华夏族，都会被冠以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等部落统称。

羌族别名“日麦”“尔玛”，大意都为“本地人”。

居住地带海拔较高，终年云雾缭绕，仿佛生活在仙境之中，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这与独一无二的住房习俗息息相关，羌族喜欢将房子建在河谷或半山腰处，给人一种高耸入云的感觉。

羌族聚居在四川各地，以茂县、汶川、松潘、黑水、理县等地居多。

营盘山，一块灼灼其华的乐土。

蚕丛带领族民从事畜牧、狩猎和农耕。

背山面水。居住在台地上用粘土、树枝，筑就的泥屋里。

农耕，主要生活方式。用石刀、石斧和石杵耕种、伐木、狩猎。以种植小米为主，还饲养了猪、狗、黄牛。猪，最多，先民们稳定的肉食

来源。狗，狩猎的帮手。黄牛，很少。

四处扩散。以营盘山为“根据地”，与冉族“混血”。

遍及整个岷江上游。蔓延到松潘、黑水、理县、汶川县境内、岷江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东至岷江与涪江的分水岭土门关，西抵大渡河与岷江分界的鹧鸪山，北起岷江源头的川主寺，南达成都平原西北边缘，青衣江、大渡河流域江边的平坝。

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聚落选址基本都避开地震断裂带。包括波西、营盘山、姜维城、下关子遗址等，龙门山地区的重要史前遗址，先民错开了3条断裂带，在“5·12”汶川地震中基本未受影响。逐渐形成中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

茂县为核心地区的中心。

最早将野羊、野牛驯化为家畜，以羊为图腾。

羌姜二字，本为同字，从人，从女，甲骨文中二者通用。

从女更早一些，母系文化的遗留。

向东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地区，转向定居农业，形成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姬姓轩辕氏长期通婚，最后融合成华夏族。向南的古羌人，一部分开始进入岷江河谷。

羌族，是古羌的直系遗存。



壹

貳

叁

肆

伍

中国最早人工使用朱砂的遗迹。

“营盘山文化”。

古蜀文化的“金钥匙”。

丰衣足食。渔业，成为不可或缺的“经济补充”。

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当时人已掌握彩陶烧制技术。

在15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近6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葬。

营盘山石板墓，许多祭祀留下的灰坑内，有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尸骸上，也有使用朱砂矿石粉的痕迹，随葬的饰物、兽牙、石珠之类，染过这种红色颜料之后的“形态”，随处可见。

以汞的氧化物存在的朱砂。

朱砂葬，在殷商时代开始盛行。

陕西韩城的芮公大墓、殷墟妇好墓中，都有大量朱砂，墓椁位置已被朱砂染成红彤彤一片。葬俗的源头，传播路线一直延伸到中亚草原、阿富汗地区，与古羌人西去路径完全吻合。

崇尚红色的习俗。古蜀先民崇拜太阳、血液，红色总是伴随着新的生命，利用火得到美食、温暖，借助火驱走野兽；人类自己血液都是红色，都有温暖的含义，象征生命、希望和平安。

从甘肃临洮马家窑，到四川茂县营盘山。

“彩陶之路”，远古就有一条人口迁徙通道。

高地的半月形传播地带。

成都平原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文化交流，营盘山的彩陶与马家窑文化有关。从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的金沙江流域，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元素，也来源于甘青高原。

出土的彩陶器，绝大多数采用精心挑选的泥土，手工制作，多为细泥陶，个别胎内夹有少量白色石英颗粒，烧制火候均较高，“扣之有清脆的响声”；彩陶瓶的颈部、腹部内壁，可见泥条粘接、修抹痕迹，部分器物经过慢轮修整，内壁保留有陶轮旋转纹路；器形主要有瓶、罐、盆、钵等，陶罐数量最为丰富。

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沟通。岷江支流南河，达至临邛（今邛崃）、青衣（今芦山），入“西夷”各地。又有“秦道岷山青衣水”，入青衣河谷，折转岷山谷地，北至秦陇地区。

“陇西走廊”。走廊中，黄河、洮河、大夏河、白龙江、白水江等江河形成的天然河谷，构成陇西走廊中的若干分支，形成天然的交通要道，成为各民族往来迁徙，通商贸易的重要通道。

史籍记载，黄帝后代曾在这一带活动。《山海经》记载，“白水出蜀（山名，今西倾山）而东南流注江”，白水（今甘南白水江）就是联系成都平原与武都（今甘肃西和南）的重要孔道。

甘肃处于半月带“中国弧”的前沿。

在黄河之滨，狩猎向农耕、手工业过渡的重要时代。

新石器时期，先民们被一种想象的自由、智慧的热情所弥漫，以火的威力，改变泥土的化学性质，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调和，发展、创造出陶器，以及繁荣时期达3 000年之久的彩陶艺术。

一个艺术时代。

史前文化的里程碑。

天文图案，优美而古朴。图案有太阳纹、月亮纹和星座纹等。太阳纹彩陶共12片。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推断，可能是先民对天象、历法在萌芽时期的一种观念，表示一年有12个月。

陶器，闪烁着人类智慧的重要器物。

既是生活用具，又是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信仰认同。史前艺术的真谛。

南方白陶上频繁出现的飞翔神鸟、獠牙神兽，8 000年前高庙人创造的神灵。

仰韶人崇拜的神灵，描绘在他们的彩陶上。

文明路线。古羌部落，从岷江上游聚居地往东，循着「茂县→都江堰、龙门山→新津、双流（牧马山）」，湔江→鸭子河（三星堆）→成都（金沙村）」路线，时断时续，辗转迁移，开始了长达5000多年的下山的双路线图。就像一粒粒种子，沿途撒放。

东南和长江中游玉器上精致的獠牙神像，4 500年以前的浙江良渚人、湖北石家河人分别创造的神灵。

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瑰宝，一簇永不凋谢的鲜葩。

成都平原处于半月带“中国弧”下端。

西部民族南北往还的重要走廊。饲养马、牛、羊的西部游牧族群，在向东迁徙过程中，与种植粟、黍、稻，饲养猪、狗的东部农耕民族，发生频繁的冲突、交融。彩陶成品与原料、技术，有高度“文化认同”，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一路南下，顺着崇山峻岭间的岷江河谷，向西南迁徙，直到把营盘山变成岷江流域文化走廊的“中转站”。

堪为佐证。经过对人祭坑中部分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鉴定，营盘山人群来源并非一地。一些人类头颅，具有典型的古代西北人群特征，与成都平原本土先民区别明显，还有两个成年牙齿标本检测结果表明，食谱分别以幼时吃鱼、吃粟为主；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有粟、黍等，以粟、黍为主要作物，应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形态。

文化区块链，没有死角。

四川和甘肃有文化联系，甘肃和新疆有文化联系，新疆和阿富汗有文化联系。

5 500年以前的区域政治、文化中心。

类似于北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

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一起，并称四大原始文化。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会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融合、重组。

营盘山，古蜀文化的策源地。

蚕丛入主成都平原的计划，在这里酝酿、实施。

古蜀先民，一直在与水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龙门山地震断裂带，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结合部。

洪水肆虐。5 000年以前，全球曾有一次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古堰塞湖就一直存在。地貌属于高山峡谷，受断裂带的影响，岩体比较破碎，易发山地灾害，每隔几十、上百年，就会因龙门山地质断裂带突发地震，形成高位滑坡，堰塞湖灾害链。

龙门山断裂带一场大地震，引发特大洪水灾难。

对于当尧之时的“滔天”洪水，《尚书》《史记》都有类同的描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鸿（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怀”，即环，古今同义；“襄”，字义同“攘”，为推去、扫除、攘夺之意。“怀襄之害”，强震震塌山崖、堵塞河道，淹没山陵、山陵崩溃，造成亘古未有的巨灾。

无法生存、发展。迫不得已，营盘山先民从丰饶的河谷，沿着岷江山谷行进。

羌笛悠悠。

诗与远方的世界。

河流冲积形成的较为平坦的土地，点燃先民们耕作生息的渴望。

文明路线。古羌部落，从岷江上游聚居地往东，循着“茂县→都江堰、龙门山→新津、双流（牧马山），湔江→鸭子河（三星堆）→成都（金沙村）”路线，时断时续，辗转迁移，开始了长达5 500多年的下山的双路线图。就像一粒粒种子，沿途撒放。

“岷江上游”河谷地带。

起于都江堰，沿岷江河谷一直到达松潘弓杠岭岷江源头，再西进、北上，进入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全长320多公里的“松茂古道”，第一次留下先民的脚印。

“松茂古道”，位于人流、物流大动脉要冲。

沿途居民以背足、挑运为业者，十之六七，并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马帮。一代代藏、羌、回、汉各民族力士、客商，一批批双语人、多语人，在平原与高原——中国两级“地理阶梯”之间，一个让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公共空间，演绎出豪壮、悲烈的原始交通的千古奇观。

山高水长。有文人雅士将全程的32个地名，撰为“三埡九坪十八

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的妙诀。在现都江堰市辖区内，现存最精彩的一段——从西街至二王庙路段。

“大兴老店”。

最早最大最著名，唯一保存至今的驛马店。

“路是人走出来的”。

《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伐岷山”的“岷山道”，指的就是沿岷江上游，北上陕西、甘青的“松茂古道”。即便不计公元前2284年大禹带领数万同盟部族，在“汶川”之滨的石纽举行盟誓，北上治水途经古道，仍有文字记载至少在3700年前，就有大队人马走过。

真正意义的古道，一条贯通古今的小路。

凝结着古蜀人，第一代“蓉漂”从远古走来的足印。

古道窄小，小得宛如一根羊肠；古道又宽敞，宽至容得下众多族群的经行。在苍茫的历史时空中，寄托着一代代古蜀先民的悲欢与喜乐、落寞与淡愁、幸福与梦想。一个有着丰厚民族文化积淀的秘境与情结。

具体路径，绵延200多公里的龙门山脉。

营盘山东麓，距今6000年前波西遗址等的发现，开启“古成都人”的“生命密码”；隔江相望，年代距今约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西麓，什邡桂圆桥等遗址的面世，掀开天府文化“原始基因”的面纱一角。

桂圆桥遗址和营盘山文化相似。

一山之隔。营盘山到红白镇，直线距离约36公里，距什邡城区（桂圆桥遗址）约70公里，尽管道路险峻，有一条联系通道，从茂县出发，翻越九顶山，前往绵竹清平、什邡红白一带返回。

红白镇再往东50余公里，就是广汉三星堆。

“5·12”汶川地震后，这条道路受损。

广汉三星堆，川西山区和成都平原之间。

年代介于营盘山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

填补营盘山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的缺环。

茂县土门镇，曾经发现的下关子遗址，串起了古蜀文明史前遗址文化序列。

营盘山文化与宝墩文化的“中界点”。

高原深处，古羌人顺流而下，进入成都平原的必经之路上。

一条沿岷江而下的文化脉络。

当营盘山、姜维城等河谷台地上，打磨出第一块石器，烧成第一皿陶器，播下第一粒种子，飘起第一缕炊烟时，岷江中下游的盆地、平原、丘陵，大多是一片苍茫的水乡泽国、蛮荒之地。

一条古蜀道一直存在。

形成黄河上游地区与长江上游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通道。

龙门山西麓岷江河谷，在仰韶文化晚期，就有西北文化陆续传入。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错落汇聚的区域。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中国最早的青铜刀，距今约4 800年；在酒泉四坝文化火石梁遗址、缸缸洼遗址，发现两处青铜冶炼场，距今已近4 000年。

那里，四大文明的唯一混合影响地。

古印度文明、古希腊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华夏文明，在世界唯一的交会之处。

北部自东而西的两大山系，将北中国分隔为气候、经济、人文都云泥之别的地理空间，“外山系”以北，亚洲内陆，“内山系”以南，内新月平原地带。夹峙地带，内陆平原过渡地带。

气候、经济、人文过渡之地。

能长期充作中原王朝、边疆政权的边缘地带。经济方式兼有农牧的复合特征，既能为中原王朝牧放战马提供草原，又能为边疆政权提供农业补充，北上、南下的经济补充与地理跳板。

活动族群虽缺乏明确的政治归属，却在长期南北战争中养成尚武风气，同样是中原王朝、游牧民族政权，竭力争夺的军事力量，视作战略重心竭力争取，这一区域称作“核心边疆”。

中国古代南北统一的“过渡阶梯”。

应时而变的动态、地理空间。伴随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政治重心，由西至东的历史迁移，争夺核

营盘山东麓，距今5 000年前波西遗址等的发现，开启「古成都人」的「生命密码」；隔江相望，年代距今约3 500年的沙乌都遗址；西麓，什邡桂圆桥等遗址的面世，掀开天府文化「原始基因」的面纱一角。

心边疆的重心与焦点,也呈现由西至东的历史转变,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

具体路径,沿岷江而下的“藏羌彝走廊”。

5 400年前,部分东麓的古蜀先民,从茂县翻过龙门山,进入成都平原,或沿河谷而行、或翻山越岭。交通路线沿河谷分布,较为便利,一些非天堑的山口,也是重要的交通孔道。

《华阳国志》记载了艰辛的历程:广阔的西北大草原的主人、山地文明的先驱蚕丛羌,因战争、灾害被迫南迁,翻越岷山,沿雁门东岸,越玉垒,过九峰,进入成都平原边沿……

神农,中国、世界的茶祖。

《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茶”,就是今天的茶。

神农,也称炎帝,因劝人种百谷,植桑麻,教民农作,被誉为“神农氏”。

蚕丛也发现了茶叶,与神农一样,是世界茶叶最早的发现者、利用者。

从游牧走向农耕,古蜀先民靠在山野狩猎动物、寻找植物作为食物。先民有时遇到毒草,吃后发生中毒现象,茶树鲜叶,虽然滋味苦涩,但吃后能使人精神兴奋,并有解毒作用。

这是茶叶生吃药用的起源。

在山野采摘茶树叶,不方便,下雨时更难,茶树生长还有季节性,鲜叶又不耐贮藏,蚕丛部族人便把鲜叶采下后,稍经摊放,直接放入陶缸中,用重盖压紧,边放边压,直到缸满,成为“腌茶”为止。吃时,用香料拌和,放在口中咀嚼,干叶很难下咽,后来就用水冲、水泡。

这是茶叶由生吃过渡到用水泡的缘起。

“营盘山文化”,天府文化的源头。

南海海贝的发现,将“古成都人”对外交流的时间再次前推。

文化交流,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早。

藏族说唱史诗《格萨尔王》记载,英勇善战的格萨尔王的一个祖先做了汉人的皇帝。藏人传唱,只是传说,却有真实历史基础。远古以来,原本游牧于青藏高原深处的羌藏等游牧民族,在某个首领的带领下,进入成都平原、中原腹地,建立起奴隶制国家,成为平原地区农耕民族统治者的故事,不断发生,只是没被史书记载,或者虽有记载,但已被严重扭曲。

遥相呼应。在阿坝州羌寨，流传着《羌戈大战》的创世史诗。

描述远古时代古羌人，千山万壑跨黄河，高歌猛进入岷江，从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裹挟着浑碧的岷峨雪浪，逐渐从川西北高原，到成都平原的迁徙过程，土著戈基人是最强劲的对手。凶悍威猛。“衣服制裁，皆有尾形”。

以狩猎为生，双眼鼓出，身材矮小，身后拖着长长的尾巴。

战争旷日持久，羌人、戈基人之间难定胜负。

岷江上游的土著戈基人，被称为有尾人。

“尾饰”，在齐家文化的源头之一的马家窑文化中也有发现。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的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墓中，就发现画有一群有尾人的彩陶。古代氏羌民族的独特风俗。

向着文明靠拢。

随着洪水的消退，古蜀先民沿江而下。

云朵簇簇，最后一抹夕阳，将历史的身影永远定格营盘山上，再也回不到羌笛的场面，呈现在面前的必然是悲壮、苍凉，岷江高山峡谷里，依然流传着坚韧不拔、勤劳友爱的民族密码……

蜀王蚕丛率领部族，辗转岷江流域，四处寻找……

年代邈远。这里，有一条大河洪江。

平原中心地带，还是一片泽国，湖泊密布。

来龙去脉。岷山，成都的“来龙”；牧马山，成都的“去脉”。



壹

貳

叁

肆

伍

牧马山，成都平原西麓第一山。

古韵神秘。牧马山枕足岷江，源起距成都市区13公里的武侯区金花镇，经双流区东升镇、黄水镇、胜利镇（2019年12月并入黄水镇），至新津区花源镇、花桥镇，绵延至眉山彭山区双河口。

平均海拔200米，迤迤近70公里，宽约11公里。

一条古蜀农耕文化演进的走廊。

鱼脊形的高地。

位处锦江、岷江正流间的三角台地，浅丘起伏，高出河水面40至60米，相对高差137米，喀斯特地貌，有可穴居的天然溶洞，绿色蓊郁，由南向北，再折向东南，高阜突兀，如城垣一般。

溪水环绕。东西两侧，形成平缓的河谷。

川西平原的大小河流，最后都在南麓，汇集到岷江。

山势特殊，暗藏玄机。

王都气象。具有吉祥的“龟蛇化气”与“蝙蝠”（福）形态。

牧马山，旧有女儿山、紫草山、宜城山、圣灯山、白塔山等名称。

“来龙去脉”。上水口，称“天门”，是都江堰。下水口，称“地户”，有三“去”，市区合江亭府河、南河汇聚；华阳，江安河、府河汇聚；以牧马山为中心，府河、金马河汇聚。

“地户”，财富汇聚之地。

放到成都平原，牧马山是最大的藏风汇水、财富发达

之地。

如今黄水镇的白塔寺，为风水水口塔，地理、文化的标志。

与旁边的蚕丛祠一起，延续成为千年吉地的象征、护佑。

蚕丛祠、白塔寺东西并列，白塔寺原址现为黄水镇白塔村一社9号民宅，蚕丛祠位于白塔寺东偏北处。两寺之间有墙相隔，有外、中、内三重围墙。

“九倒拐”，距离成都中心20公里。

位于今双流区原胜利镇白塔村，隔河与黄水镇相望。

山下一马平川，杨柳河、白河交汇后，沿山脚从桃荚渡，浩荡地流入新津区境，又沿山顺水，漫延至黄龙溪，在彭山区江口入岷江，直至眉山、乐山。

古洪江的遗存。黄水镇桃荚渡，旧称洪江渡口。

站在渡口，往山上望去，满目苍绿的生命摇篮。

山前，800多米宽的洪江、杨柳河汇合后，浩浩荡荡从“九倒拐”山脚下流过，江中有丰富的鱼群；洪江对面，一马平川的平地，沟壑纵横，土壤肥沃，可供种粮；山后，山峦重叠，绵绵起伏，两条九弯八拐的山沟，从山脚通向山顶，与其他山地交会。

古树参天，茂密阴深。

树连树，枝连枝，人可以从山脚的树杈上，一直爬上山顶。

山地，野兔、野羊、野狼成群，还有老虎出没，可以狩猎。

为古代居民生存提供肉食蛋白之源。

从洪江对面远看，地势如一只将要离地腾飞的巨鹰。两沟间的半山腰，一块梯度平地，山势就像一把巨大的交椅，稳稳地安放在两山沟壑之间；两侧，绵绵山峦，伸向远方，就像一只巨鹰的双翅，那块梯度平地如一只鹰身，前面那块山包如鹰头，后面的诸山如鹰尾。

山体的石质、岩石结构，开山凿洞居穴、生息繁衍的好地方。

距今5 300年左右，蚕丛率领部族驾着木筏，顺着岷江洪江古河道“考察”，来到牧马山脚下，一眼看中“九倒拐”之地，山虽甚低小，而冈阜萦回，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

他，环顾四周：高山环抱，沃野千里。

一块“风水”宝地。地势可进、可退、可守，可凿洞居穴，方便外界联系，可控制平原，山上又好垦殖、耕种，足以自给，形胜所在，是为立国之地。

安营扎寨。一切为了生存、为了部落。

蚕丛从陆路、水路，有计划地组织古羌人，带来黄甲麻羊的先祖，向“九倒拐”一带迁徙。

开山凿洞，完成安家。

他，带领首领和部落，凭借在营盘山的多年生产、生活资料的积累，在“九倒拐”认真规划，精心择地，夜以继日地奋战。一个又一个宽敞的穴居地，在洪江岸边的悬岩峭壁上出现。

又削包填沟，打造出一块偌大的祀祠台。

可供祀祠、集会，或调兵遣将使用。

在椅的背后山坡上，又居高临下地凿个大洞，供首领们下雨时开会、议事，或临时休息。

成都史上第一批“蓉漂”，迁徙、定居牧马山，创业的“古成都人”诞生。

筹建蜀国。

蚕丛王在“九倒拐”安营扎寨，取名“瞿上”。

《说文解字》解“瞿”字，“瞿，鹰华之视也。”按词意，纵目，鼓眼，蚕丛“纵目”的象征，正与三星堆巨大神秘的青铜纵目头像的意涵相合。蚕丛“纵目”传说，有文字与实证。

“瞿上者，瞿上城之谓也”，缘于一种高视鸟瞰的地貌，“仰而四顾，所谓瞿也”。上者，高大也。因此，瞿上城，应是让人惊叹的高大城邑之意，建立治所治蜀选择的最佳之地。

“瞿上”，成都平原立国治蜀建的“司令部”。

副政治中心。实现由游牧狩猎到半牧半耕的转变。

湿地低矮，洼地水汪。

史无前例。蚕丛率部“疏浚”，排除积水，挖掘沟渠，发展蚕桑，经营农业。

“疏浚”。打开“古蜀文化”谜底的钥匙。

南宋罗泌著《路史》卷四“前纪”中说：“蚕丛纵目，王瞿上。”

罗莘注在《路史前纪》指出：“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

《双流县志》对“樊乡”，作过明确记载：“樊乡，在双流汉广都县界。”

成都双流区，最早名为广都县。

流传至今。也是成都天府新区历史上的悠久地名。

蚕丛从“瞿上城”山下的杨柳河，坐木筏顺水而下，到达岷江、锦江交汇处，再折锦江逆水达黄龙溪，发现这里美丽无比，又距“司令部”不远，决定让自己的一支部落留驻此地。

查地形，择地势，伐木割草。

一年一年顺应山水，沿河建起排排干栏式居住房。

一代一代不断演变，更加坚固，能防洪灾、火灾。

码头集镇。今黄龙溪镇，西汉时属犍为郡武阳县。

地处岷江流域的锦江下游、鹿溪河交汇处。进出成都的水路必经之地。北面华阳、南临彭山、东向仁寿。从古到今，地理位置上一直有“鸡鸣三县”“一足踏三县”的重要特点。

扼守着古蜀水道的咽喉。

“武阳本作武扬”。《读史方輿纪要》介绍：“武阳城，相传蜀国故城也。”

秦于蜀王败亡之地置县，因地理位置特殊，具备城镇基础，还彰显秦灭蜀的胜利。名“武扬”，既合“定功戢兵，止戈为武”之意，又因县城位于牧马山南麓，合“山南为阳”的惯例。

县治在今眉山彭山区武阳镇五一社区。史籍称“武阳城”。

眉山历史上最早的城邑。

牧马山区与“武阳”，古蜀国的南大门。

军事要塞。从商朝中期到春秋时代，用兵不断。

天然屏障。波涛汹涌的大江、连绵70公里的牧马山，进可攻、退可守，极具战略价值。蜀与楚、巴的攻伐与争夺，大多通过水道，沿着长江一线展开。为了防御来自楚、巴的攻击，古蜀国在沿江，筑有很多

「来龙去脉」。上水口，称「天门」，是都江堰。下水口，称「地户」，有三「去」，市区合江亭府河、南河汇聚；华阳，江安河、府河汇聚；以牧马山为中心，府河、金马河汇聚。

“兵栏”，构建了不少军事防御工事、驻兵据点。

黄龙溪傍水而立，因水而生。

吊脚楼二三层高，“吊”在水面，却好像空中楼阁。

“十二桥”的吊脚楼，古蜀建筑文化的存续。

楼有“脚”，几根支撑楼房的粗大木桩。建在水边的吊脚楼，伸出两只长长的前“脚”，深深地插在江水里，与搭在河岸上的另一边墙基，共同支撑起一栋栋楼房。

天府福地，蜀汉政权的圣迹之地。

《华阳国志》中记载：“（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这句话，被作为天命象征，诸葛亮率800大臣上言，“咸称述符瑞，图、讖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又曰《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

既是自然造化，也是历史巧合。

东汉末年的一天，当鹿溪河的浊水注入锦江清水后，突然呈现一条黄龙形，有头有尾，活灵活现，在江中整整持续了九天九夜。当地的“土人”，形象地称为“黄龙渡清江”。

鹿溪河上游，源自龙泉山脉，多为山溪水，河水浑浊而赤，而锦江发源于上游岷山，江水为冰雪所化，水质清澈。当鹿溪河的浊水注入锦江清流，机缘巧合之中，呈现出黄龙之形。

在洪水季节，特别明显。

在微风中飘荡。一半清、一半黄，像两幅彩色的锦缎拼合。

自然奇观。蜀汉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

大造舆论。正值东汉末年，群雄纷争，天下大乱，“讖纬”之说盛行，在三国群雄鼎立，互争正统的特殊年代，占有成都平原的蜀汉君臣，抓住黄龙溪独特的水文奇观，极力将自然现象政治化，描绘成“真命天子”降临前的吉兆，沉龙形鼎于黄龙溪中。

诸葛亮亲笔隶书题字，建黄龙庙、立提名牌、籍田祭祀。

龙，在古人的眼中，天子的象征。古镇“黄龙”的再现，被人们誉为吉祥如意、国运昌盛的预兆。而正因如此，刘备便巧用“黄龙吉兆”登上皇帝宝座，黄龙溪也因此而得名。

三国鼎立。公元221年，刘备在武担山南设坛称帝，国号汉。史称蜀、蜀汉。

称帝前，曾请人占卜，以蜀汉国运乾位在市区西北，“龙脉”在武担山。

牧马山，丘峦起伏，湖泊棋布，“南征北伐”的厉兵秣马之地，精于天文地理的诸葛亮建成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军马不少于5 000匹。黄甲麻羊作为战备物资开始规模化养殖。

史料记载，黄龙溪“时常战鼓齐鸣，喊声震天，金戈铁马，战船、水寨绵延百里，云雾飘渺，飞沙走石”。常有骑兵在河岸演习，金鼓齐鸣，旌旗猎猎，场面十分壮观。

辉煌历史。立足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国，曾经在这个区域建立别都。公元前316年，古蜀王开明十二世在黄龙溪与秦军激战，“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兵败身亡，三千里锦绣河山归秦所治。

古蜀国腹心地带。樊乡，以蚕丛王的“瞿上”为中心，以牧马山为中轴，北至温江、郫都，南至黄龙溪、华阳，东至中和、成都，西至新津、崇州等，或更宽的大片土地……

气候酷烈。仍然是时断时续地迁移。

地震频繁，迫使先民们不断携家带口，从茂县盆地的东面，翻越与岷山相连的龙门山脉主干玉垒山脉，从岷江上游河谷，经汶川、都江堰，进入新津，或翻过龙门山，进入湔江河谷，顺江而下，从龙门山缓缓走进牧马山，依次进入成都平原……

远古的成都平原，并非千里平畴绿野，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沼泽。从高空俯瞰，水泽漫漫中，有一条条鱼脊形的高地，岷江、沱江与支流冲积形成的冲积扇。

“古成都人”在这样的高地上，从事粗放的渔猎采集等初级农业活动。如今的温江、郫都、崇州、双流、新津、都江堰，在岷江的冲积扇上；彭州、新都，在湔江冲击扇上；什邡、广汉与金堂，在石亭江冲击扇上。

古蜀族立国的原始核心区域。

初从岷江上游来到中游地区，牧马山浅丘地带、湔江河谷一带，正适合创业的诉求，从川西北高原山地，进入盆地底部的过渡地带、前站位置，背靠岷江上游根基深厚的故地，近窥水丰地沃的广阔平原，浅丘地势和近水环境，为发展农畜业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

距今4 500年到3 700年时，成都平原已不是蛮荒之地。

牧马山，丘峦起伏，湖泊棋布，「南征北伐」的厉兵秣马之地，精于天文地理的诸葛亮建成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军马不少于5 000匹。黄甲麻羊作为战备物资开始规模化养殖。

古蜀人选择了红土台地、河道之间的区域生活。

水资源极其丰富，水患也十分严重。7 000多年前，宝墩遗址的所在地，大河纵横。直径达30厘米的乌木，证明大河水量颇大。6 500年前，河水逐渐干涸，形成红土台地。

距今5 000年左右，宝墩人已在成都平原定居。

“宝墩记忆”。天府农业的开端。

平原西部山地，处于东南季风的迎风坡，在地形的抬升作用下，降水十分充沛。大小几十条河流，在地势的制约下，都流向平原腹心。长江支流岷江也通过都江堰，流入成都平原。

到处是台地，水土肥沃，创业的“古成都人”试图融入，还是走了弯路。尽管已掌握当时世界最先进“黑科技”的石斧、石凿，当掏出带来的白色稻米，却发现适宜播种的原始耕地不多。

探索中，点燃大火，点燃起滚烫的希望。

草木燃烧之际，文明的夜空迸出一道裂缝。人们在烧得黑黢黢的土地，虔诚地撒下一片水稻，惊喜地发现烧过的土地都长得很好，认定脚下水系纵横的土地，便是生生不息的天命之地。

“如法炮制”。开发了不少森林，庄稼也越长越好。

农田，基本种植着水稻。

宝墩先民以种植水稻作物为主，兼有粟作农业。

每年五月到九月，是水稻生长期。

已然是一个成熟的远古文明。出土的植物种子有两类：食物类，有水稻、粟、蕨苡属、野豌豆属和豇豆属；杂草类，有莎草科、银须草、飘拂草属、蔗草属、莎草属等种子。

种植物从小米开始，而后开启了水稻时代，开始养殖猪、羊。

水稻，人们的主食，还有黍、粟、薏米、苍耳等植物。

在堆满陶器的“宴飨坑”，即举行聚餐仪式的场所。

驯猪狗。在“宴飨坑”，也发现猪的头骨、狗的肋骨与鱼鳃骨。

“古成都人”已经将这些动物驯化，作为食物。

还发现了豇豆、豌豆、薏仁、水稻、小米等植物遗迹。

祖先们最常吃的东西。

把猕猴桃当零食。

耕作之余，用石箭、石镖狩猎。

打猎之余，就做一做陶器，称为“神器”。

结实耐摔，作用齐全。

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

部落里的工艺美术师，在陶罐上刻绘下生活场景，纪史、修志，述说质朴烟火人间。

陶制纺轮，已经掌握纺织技术。

制果盘，用滤水器……

“高级物品”陶器。通体椭圆，高约20厘米，底部有两个小圆洞，与炊具、盛具明显不同，属于一种净水器，借用鹅卵石、泥沙等，通过物理过滤方法净水。

还有打磨光滑的圆盘状陶器，用来盛放食物。

“奢侈品”，类似于果盘。

成年人身高在165至175厘米之间。

与当代成都人的身高，差别并不大。

大约与蚕丛氏同时期，古羌的一个支系，从西倾(巴颜喀拉山)进入小金河谷、大渡河峡谷，居住在成都平原西南边缘，因尊蚕丛青衣神为始祖，以穿青衣著称，故称青衣羌，简称青羌。



壹

貳

叁

肆

伍

生活，周而复始的迁徙。

卸下行李，开始营造家园。

创业的“古成都人”以种植小米、黍为主，开始种植水稻以来，成都平原长期保持着稻作、旱作混作的耕种方式，在山坡上排水好的地方，种植小米，在平原便于灌溉的河边，种植水稻。

直到都江堰治水后，才有成熟的灌溉农业。

年复一年，种植的土壤，慢慢变得贫瘠，耕地里的庄稼，稻穗越来越小；砍伐过度，让森林不再茂盛，野兽几乎看不到；渔猎无休止，河鱼、走兽来不及繁衍后代。

成都平原台地很多，又发现另一片水草丰茂、森林密布的台地。

远远不是终点。

又过了近200年，新的耕地也慢慢变得贫瘠，森林里的走兽一如既往地减少。

再开始迁徙，重新建立一个家园。

万事开头难。从头再来，却是辉煌的前夜。

受环境变化困扰，“古成都人”被迫离开故城，在对沃土的渴望中，沿着岷江古道，来到下一个区域，还是一条大河边。至少迁徙六次，每到一处，都给后人留下高大的城墙、陶器。

不断和自然抗争，调整生存空间。

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成为永远离不开的温床。

农耕离不开水利。平原腹心，溪流密布，迫使创业的“古

成都人”不断进行“疏浚”活动，而且要有统一的指挥，开展集团作战。分散的部落，便需聚合成稳定的族群，应对外部侵扰。

古老的城池雏形，在平原上萌芽。

农耕生产，必须平正土地，形成阡陌，开辟道路；农耕氏族也丢不掉从事过的渔猎、采集、畜牧生产，乐于环绕家门，开展多种经营，就有了剩余产品；交换产品，形成交换集市渠道。

定居、观象、水利、集市……

催生出以修建城池为特征的邦国。

开始，只能用双手作工具在平原、河谷垦殖。后来，在长期的劳作中，发明了石锄、石斧等工具，分别创造了“瞿上文明”、天府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

长江文明之源，古蜀文明发祥地。

“宝墩文化”，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

年复一年，种植的土壤，慢慢变得贫瘠，耕地里的庄稼，稻穗越来越小；砍伐过度，让森林不再茂盛，野兽几乎看不到；渔猎无休止，河鱼、走兽来不及繁衍后代。

成都平原台地很多，又发现另一片水草丰茂、森林密布的台地。

远远不是终点。

又过了近200年，新的耕地也慢慢变得贫瘠，森林里的走兽一如既往地减少。

再开始迁徙，重新建立一个家园。

万事开头难。从头再来，却是辉煌的前夜。

受环境变化困扰，“古成都人”被迫离开故城，在对沃土的渴望中，沿着岷江古道，来到下一个区域，还是一条大河边。至少迁徙六次，每到一处，都给后人留下高大的城墙、陶器。

不断和自然抗争，调整生存空间。

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成为永远离不开的温床。

农耕离不开水利。平原腹心，溪流密布，迫使创业的“古成都人”不断进行“疏浚”活动，而且要有统一的指挥，开展集团作战。分散的部落，便需聚合成稳定的族群，应对外部侵扰。

古老的城池雏形，在平原上萌芽。

农耕生产，必须平正土地，形成阡陌，开辟道路；农耕氏族也丢不掉从事过的渔猎、采集、畜牧生产，乐于环绕家门，开展多种经

宝墩古城、石垌古城、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的面积，都超过200万平方米。文明曙光的标志。东亚大陆上已经出现了网络状的古城聚落。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南部出现奴隶制小国，古代埃及已形成统一国家，印度河流域出现奴隶制城邦。

营，就有了剩余产品；交换产品，形成交换集市渠道。

定居、观象、水利、集市……

催生出以修建城池为特征的邦国。

开始，只能用双手作工具在平原、河谷垦殖。后来，在长期的劳作中，发明了石锄、石斧等工具，分别创造了“瞿上文明”、天府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

长江文明之源，古蜀文明发祥地。

“宝墩文化”，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

宝墩城，地属新津宝墩镇宝墩村。

距双流“瞿上城”20公里、新津城西北5公里、成都中心区38公里。与散落在平原中成百上千的村落一样，春华秋实，西河、铁溪河分别从村子东北、西南面穿过，灌溉沃土。

地形奇特。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突兀地耸起一圈高两三米、宽一二十米，不规则的脊梁似的黄土埂子。埂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沟底和两侧，会发现一些散碎的砖瓦器物。

史前城址群。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有明显功能标志的聚落形态——“城邑”开始出现。城墙建筑，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办法。

智慧展现。既要避水，也要利用水。

史前古城。比三星堆古城还早1 000多年。

三星堆古城，承袭关系明显。

宝墩古城、石垌古城、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的面积，都超过200万平方米。

文明曙光的标志。东亚大陆上已经出现了网络状的古城聚落。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南部出现奴隶制小国，古代埃及已形成统一国家，印度河流域出现奴隶制城邦。

文明与野蛮，一个区别在于“城市”。

大禹的父亲鲧，不但善于治水，还是最早发明筑城技术的专家。

“古成都人”聚居，有了房屋。聚居地的外沿，没有城墙防护，身为君王、诸侯地位较高的人，也与百姓混居。发明城郭后，四面环绕，除抵御猛兽、外敌之外，最主要的还能防洪水。

城，人类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地理现象，又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代表的文化现象，被称做“城邑文化”“防御文化”。

西方文明起源时，农村、城市各自独立、分离。

中国古代，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依然延续，虽然也出现城市，但城内的氏族贵族阶层与城外农村里的氏族平民，属于同宗、同族、同血缘，统一在血缘管理的共同体之中。

表现为“连续性”型态，与西方文明起源的“破裂性”型态不同。

中华文明起源走“维新”的路径，与西方的“革新”路径相区别。

旱灾、水灾交替频繁。

气候变动幅度增大，成都平原洪水频发，常常冲毁人们的定居点。

抵御洪水。宝墩时期城址，“远支流，近干流”，能避免水患，同时方便取水、渔猎。城池布局，大多与河流平行，加上城内地面高于城外，先民利用地势、水障沿台地边缘，筑起墙垣来防洪。

宝墩古城群的建造年代，与鲧筑城的年代相当。

大禹汶川石纽山出生，父亲鲧崇州鸡冠山出生。

大禹世系与古蜀州（崇州）人同出一脉。

“禹”字与“蜀”字，都从虫。

“虫”符，“龙”符。

鲧，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建造城郭的第一人。

各个城址的防洪功能，是鲧筑堤埂防洪水的治水理念，在成都平原运用的印证。

筑城时间比宝墩古城更早的高山古城，城墙与长江中游古城的城墙比较相似。

城墙，凝结“古成都人”的智慧。

先民来到成都平原后，重中之重就是建城墙。

高筑底宽厚达50多米的城垣，外挖数十米至百余米不等的环城深壕，利用北、南两条河流作为屏障，在城内开挖沟渠疏导洪水、种植水稻，在内、外城垣间，营建成片的居房。

修城墙功能之一，挡水。

不光修城墙，还修城壕。城墙挡水，城壕泄水，形成对水抵御的体系，逐级挡水的体系颇有成效。双重城墙挡水效果好，外墙冲破，但内城没被冲破过。

考古发现，宝墩内城到汉代，才被洪水冲破过。

城墙还有防御、避难的功能。

古城中心。大型建筑。

原始议事厅、宗庙场所。

和排房不同，建筑面积不小，单体面积都超过200平方米。

筑坑规矩，筑网清晰。

在考古现场留下的照片上，能清晰看到放置房屋柱子的方形深坑。以鼓墩子的三座建筑为例，1立方米的方形柱坑，共有42个，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各8个，南北侧各5个，房屋内部还有2个，建筑长20米，宽10.5米，房屋内部的两个坑基，还有两根柱子帮着承重。厢房在主体建筑的两侧，北厢房长10米，宽7.5米，南厢房长9米，宽8米。

整体布局主次分明，相对对称。

复杂而有序。分布在南北一条线上。

组成了一个“品”字形复合建筑。

3座3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屋，成都平原最早的大型建筑遗址。

为修建这几座“豪宅”，“建筑师”殚精竭虑：建筑采用立柱式承重，先开挖柱坑，竖立梁柱后，再加盖主体建筑，42根大型梁柱。主体建筑恢弘。周围，还有许多小房，部落居住。

每一个聚落点，都有一组大型建筑。

相当于如今的大礼堂。

聚落内部，城池内部有大事，居民就来商议、庆祝。

古观象台。外城西南，颇为奇特的建筑遗迹：土夯基。“古成都人”在空地上挖了一个平的大坑，大坑中间堆起一个土台子，也被河水破坏，残存的夯台长20余米，宽约6米，高约1米。

方向极为独到：北偏东21度。

角度与成都平原地区，冬至日太阳光的方向一致。

沿河修筑，因河废弃。

在古城址东北和南边，还发现大型古河道。

有与鲧禹父子同一时期、约4 200年前的护岸堤。“古成都人”在堤上开挖沟槽、安插木桩，起加固作用，再在近水一侧，用大量卵石堆筑作为护坡。

鲧禹所在年代，先民已摸索出一套治水经验。

宝墩古城遭遇大洪水，三条较大的古河道，从西北方向冲毁城墙。

附近，有两条河，一条，现在古城遗址的东北；一条，从碾墩子、大埂子、高地之间的空地流过，古城西北城墙的组成部分：大埂子、高地、胡墩子和狗儿墩，被河流分割在另一侧。

古城城墙的东北、西南，有两个地势低洼的条带状，在4 200年前，是两条河流的所在地。

从古今河道的对比图看，现在的两条河在以前的位置，平移差不多的距离。

古城修筑在被两条河流夹着的高台上。

河流改道，河水不管是否有城墙围挡，只管冲过去再说。

城墙遗迹间的缺口，河水改道从城墙上冲刷过后的痕迹。

城内有不少古河道、湖相沉积。宝墩先民在这里生活时，河道纵横，湖泽密布。后被河水冲毁，留下沉积。活动轨迹遍布整个新津，在新平镇、五津镇、安西镇、邓双镇、花源镇均有遗迹点。

宝墩先民定期到岷江与南河相夹最高峰祭天，山海拔仅617米，被称为“天社山”。

天社山“朝日圣会”源起，始于对太阳崇拜。

轩辕黄帝在山后轩黄台修炼功成，后人遂修庙设坛，祭祀黄帝。

“天社山”形如圆锥，俗称老君山。

张道陵天师创立五斗米道，便成为道教二十四治之一的稠粳治。

远古祭祀遗迹尚存。薪火相传，至今已近5 000年。

河流改道或洪水来袭，城池俨然汪洋。

在古城里高出水面的台地上，还有人留在这里继续生活。

一次次地成为断壁残垣。

“古成都人”多为“鱼鳖”。

剩下的选择离开城市，迁往其他地方。

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岁月流逝中，古城永远地湮没在地平线下……

距今4 000年以上的水利设施。

岷江水历来湍急，为了保护河岸边的城市、民居，不被河水侵蚀，修建了堤坝。堤坝的内侧考古，发现了大房子、家族墓地等。内侧沟渠里，还发现了许多木桩的痕迹。

水坝护岸设施，长147米，上宽12米，下宽14米，与城墙的夯筑做法相似。

成都平原河流遍布的土地上，人与水和谐相处的智慧已形成。

都江堰水利工程智慧的“原版”。

清晰可见。堤坝上，一排排鹅卵石。

先民用竹笼装着石头，将堤坝固定。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利用竹笼固定沙石的原理，中国水利史上的重要发现。都江堰的文明传承、发扬，源于4 000多年前“古成都人”的治水实践。

“古成都人”重视水患治理，远早于李冰治水，多条人工与自然交汇的河道，蜿蜒流淌，为千年前的古城，带来200多年的宁静生活，也为宝墩人的繁衍生息奠定最为坚实的基础。

已经有了御洪技术。郫都古城（三道堰古城）的城垣，也采用大量河卵石来加固城墙。独特“竹木护石”技术，也被视作后来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大放异彩的竹笼络石技术的“模板”。

工程庞大。内城墙土方量，约25万立方米，外城墙土方量，约115万立方米，总土方量达到140万立方米，在惊叹于古人精湛的建筑技巧的同时，对人力、政权，也有了全新解读。

共同见证刀耕火种之中的辉煌。

古蜀文明，呈现从“孤立隔绝”，到“包容互鉴”的演进图景。

“古成都人”生活，开启从“随遇而安”，到“造郭守望”的历史篇章。

古蜀国中心，面积很大。

包括今崇州、大邑、新津、都江堰、温江、双流的一半。

一种形制。“古城”为权力组织核心，统辖若干从属村落多层次大型聚落群体。

兼具治水、防御、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

宝墩文化城市群，规划、组织、施工、食物供给、指挥调度……

不仅表明已拥有建造宏大工程的专门技术，反映已具备与古城建造相应的配套系统，表明古城统治者统治着众多的人口，有力地控制了各自地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

农耕社会战胜渔猎社会的结果。

岷江扇形冲击平原，宝墩文化遗址在沼泽上打桩建城，形成满月状水寨，几个4 000年左右的小城，面积在10万至60万平方米之间，分布在宝墩古城周边。展现成都平原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承接夏商二里头文化时期，古城址文化面貌与前后衔接的演变过程。

鲧因建造城郭有功，尧把“崇地”封给了鲧。

实际建造的数量，应比这些还要多。

古城址与古河道关系密切。

出若水的三条江河口，崇州的街子、原三郎、苟家、万家与怀远，也是同一时间段所建。只是因建好后一直住人至今，现难以找到遗迹。若是仅仅只建8座城，鲧不会受到尧帝嘉奖。

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宝墩遗址，正位于岷江中游重要支流——文井江古河道的上、中、下三个地域，鱼凫城位于古岷江干流，郫都古城遗址位于《禹贡》所载江沱古河道近旁。

成都平原农业开发、陶器制作最早的地区之一。

与鲧建城起于崇州、鲧禹治水发源于岷江，始于江汉，正处同一时期。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古老中华道德文明的标志。

宝墩文化应该是先夏文化。

夏人尚黑。夏文化，灰陶文化。

宝墩文化正与从中心聚落发展到都邑国家的阶段相当。诸城林立，此消彼长，兴替频繁，已出现政治权力中心与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形成成都平原文明前夜的动荡期，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源泉，为过渡到文明阶段做好了准备。

正与宝墩文化器物多为泥质灰陶、夹砂褐陶相当,也可称“灰陶文化”。

在西亚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大约于公元前3 500年进入文明社会,距今5 500年左右。这里有文字、有城市、有宗教,是农耕时代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成了临近民族争夺的主要战场。

大致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文明出现于尼罗河流域,到现在也有5 500年左右。也在外族的数次入侵和占领后文明被中断,大约存在3 000年。到近代,埃及的象形文字才被学者重新解释。

古印度河文明,形成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距今4 600年左右。哈拉巴遗址属于城市文明,城市建筑水平远超同期的其他文明,位居世界之首。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古印度河文明被毁。

哈拉巴文化,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在方圆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起一个以烧砖建起的城市群。城里有街灯、下水道、豪宅、楼梯间、浴池、商业区、行政机构,个人有图章、首饰。

史前到文明起源的过渡时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与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

宝墩文化正与从中心聚落发展到都邑国家的阶段相当。

诸城林立,此消彼长,兴替频繁,已出现政治权力中心与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形成成都平原文明前夜的动荡期,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源泉,为过渡到文明阶段做好了准备。

孕育文明的火种。

将成都的历史往前推进1 000多年。





壹

貳

叁

肆

伍

“萌芽”阶段的城市。

成都平原古城址，方国酋邦阶段。

由混沌迈入新石器时代。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

占地约为276万平方米，城周近6.2公里。

与如今的一些小县城的面积相当。

南、东、西三个方向，都有内外两道城墙护卫，北面因外有河流，内外城墙重合。目前残存的梯形城墙，底宽30余米，顶宽20余米，相当于如今双向四车道的城市公路。

始筑约在公元前2500年，废弃约在公元前2300年。

长江流域规模第二大的史前城址，仅次于长江下游的杭州良渚古城遗址。

距今至少4500年。存在的年数，200至300年。

出于保卫政权、宗教组织的防御需要，修筑高大城垣、巨大壕沟。

戒备森严。先修建内城墙，再修建外城墙。分内、外两圈，呈“回”字形。一座由内外两重城墙包围，内外城墙四个方向布有壕沟的城池。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城河。

建成“一环路”，还有“新区”。

令人惊叹，想象空间巨大。

外城墙，晚于内城墙。

宝墩人最早生活在内城，由于人口膨胀，拓展到外城。

一些大家庭开始分家，外城“新区”成了先民的选择。

在外城角落，还有守卫的廓城。

同一时期的紫竹、高山等城，城邦之间难免攻伐，修筑工事是必要的选择。

内城、外城的城市格局，与同期的长江下游巨无霸“神王之国”良渚、稍后的长江中游以天门石家河古城（早期是神农氏之都）为中心的城邦集团相同，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地位重要。

王权逐渐掌握到少数人手中。

城墙，权力与秩序的象征。

城市聚落网络状。背后，有个强力的权力机构。全面集中的领导。

调动起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长时间、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修筑。

文化区域。富饶沃土，人口众多。

雪山下的城市群。几个大聚落形成的古城，被数十个小部落、诸侯围绕，有规律地排列在一起， just 又不具备古黄河流域聚落的“阨脱”隙地，形成串珠状分布的大小聚落。部落相互独立，相互交融，以宝墩文化为核心，带动中小坝子上发展不平衡的氏族部落，在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古蜀文化区”。

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坝子文化”的源头。

城市也处于起源过程中。

经历了从类城市、雏城市，到真城市的发展过程。

4 500年前，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群。

已处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阶段。

成都平原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带来陶器、古城，图腾崇拜、信仰。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标志。

“宝墩文明”大约延续800年，一直不断地迁徙，足迹几乎踏遍整个成都平原。艰辛地与自然斗争，在水与火之中顽强地繁衍、进化，留下“古成都人”第一部关于生存、文明的史诗。

成都从恣肆不羁的传说，真正地回到人间。

古蜀文明不是“从天而降”，不是“外来”，更不是“西来”，也未“突然神秘消失”，而是有序传承长达5 500年以上。蚕丛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开明王子迁徙越南……

繁荣景象。“部落相连，钟鸣鼎食”。

雪山下的城市群。几个大聚落形成的古城，被数十个小部落、诸侯围绕，有规律地排列在一起，但又不具备古黄河流域聚落的「阨脱」隙地，形成串珠状分布的大小聚落。部落相互独立，相互交融，以宝墩文化为核心，带动中小坝子上发展的不平衡的氏族部落，在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古蜀文化区」。

中国史前第三城。“宝墩文明”如流星一般划破长空，城邦林立，证实了成都平原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中国上古三大文明，交相辉映，光彩熠熠。

创造灿烂的“古蜀文化”。经历从蚕丛、柏灌、到鱼凫早期的“三王”的长期发展过程，经过2 000多年的努力，终于使原来沼泽密布、荆棘丛生的广都，成为中国三大农业起源地。

“立体农业”开始萌芽。

广都之野，“冬夏两季”播种。

农田里有稻、麦、粟、黍、豆等。

园艺发达。荔枝、柑橙、茶桑、“四季瓜果”。

引起古蜀丝绸的兴起。

“牲具六畜”。家养鸡犬豕，野牧马牛羊。

养鸡，农耕生产的特征，公鸡报时，母鸡生蛋。游牧时代用不着。

鸡，古名是“蜀”，不排除因“蜀”的得名，因最早从事家鸡驯育。

池塘里不仅有鱼、蚌、鸭，还种有莲藕。

为古蜀先民进入农桑时代打下经济基础。

形成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城邑并峙，人口繁衍，安居乐业的“古蜀文化区”。

成都平原历史的“活化石”。

彰显共性。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都古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加上大邑盐茶古城、高山古城。合称成都平原八大史前城址，一如金色珠子一般，连接成一条带弧度的项链，戴在雄伟的龙门山下，为世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奉献“初级版”。

“都广”，“广都”的倒文。

祥和之象。《山海经》的“海内经”里，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

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一个梦幻般的名字——“都广之野”。

古成都平原的代称。

《山海内经》给予“都广之野”“广都樊乡”的美誉。与《淮南子·地形训》记述一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天下之中”。《中山经》把成都平原包括在天下之中，对岷江中上游地区水道的记载，特别珍贵。《五藏山经》不仅以巴蜀荆楚为天下之中，更以详细记载岷江中上游，引人注目。

《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指成都平原。

在《山海经》产生的时代，成都平原已成为“天下之中”。

《山海经》里“天下之中”，撰写时间在古蜀国顶盛发展时期。自视“中心”，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豪感，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表征。“中心”，相对富庶、适宜居住的地方。

“都广”即“广都”，连“百谷”都能“自生”。

“内循环”，海纳百川开放型的农耕文明。

都广之野，山地、河谷低地农业结合的产物。

“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

“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亚热带气候，一年四季雨量充足，温润潮湿，特别适合各类果树的生长，柑桔、蜜桃、荔枝、杨梅，现在仍然是成都平原的特产。凤凰栖息，鸾鸟、各种飞禽走兽都安静地栖息。

悠悠游游。在太阳底下暖暖地躺着睡觉，生活节奏散漫、悠闲。

一年四季都能播种百谷。

出产各种豆类、稻谷、高粱与小米。气候温和，冬天夏天，都可播种。凤凰鸟欢乐地唱歌舞蹈。树梢上夏天结的果子，冬天已经成熟。树木茂盛，野兽成群，生长的草，冬天都不会死。

静淌而过的河流，泛着粼光的湖泊，高低不一的小丘草坡。

还有湖面上时而掠过的白鹭、开得正盛的野菊……

一年四季，草木常青。

乔木、灌木茂盛，江岸与泽地旁边，生长着繁茂的草本植物与蕨类植物。不远的地方，有丘陵山地，生长着茂盛的森林，林下遍布着低矮的杨梅、玉心花等灌木丛，树干上攀缘着南蛇藤等藤本植物，附

生着蕨类植物。

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气候环境, 呈现出一片伊甸园式的美丽风光。

“世外桃源”。

美哉, 都广天府, 黄帝、嫫祖、蚕丛……美丽的故乡。

与《圣经》中对伊甸园的描述十分相近。

东方伊甸园。世界级公园城市。

“城市胎记”, 给成都植入山水、田林、生态、安居的基因。

“宇宙之书”。包罗万象的《山海经》中, 记述的不仅是“禹迹图”“夸迹图”“昊迹图”, 而是中华民族整个群体英勇无畏、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创业图”“奋斗图”。

不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 代表着另一个文化传统。

“广都”的地名, 很早就出现在成都平原。

“天府之国”, 可能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

“天府”一词, 最早见于《周礼》, 专门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一种官吏, 用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之地。虽是赞美之词, 也是从远古沿袭的称谓。

《战国策》《史记》中的“天府”, “田肥美, 民殷富, 战车万乘, 奋击百万, 沃野千里, 蓄积饶多, 地势形便, 此所谓天府”, 指关中原, 古代也是华阳国的疆域。

《山海经》记载: “都广在西南, 其城方三百里, 盖天地之中也。”

《华阳国志》中, 常璩称: “地称天府, 原曰华阳。”

并标明位置: “广都县在郡西三十里。”

今天的成都主城区、天府新区、双流区核心区域一带。

诸葛亮称成都平原为天府, 在《隆中对》写道: “益州险塞, 沃野千里, 天府之土。”

明朝学者杨慎断言: “黑水都广, 今之成都也。”岷江上游, 古称黑水。

“广都樊乡”的人间仙境。《华阳国志》中, 记载: “蜀沃野千里, 号称‘陆海’, 旱则引水浸润, 雨则杜塞水门, 故记曰: 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 天下谓之天府也。”

誉称“天府之国”。

「巴适」「安逸」，四川话里舒适、愉悦的意思，体现了一种知足达观的人生态度。成都的城市风貌、文化，自古就给人一种美好、幸福的感觉，凝炼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城市理想。

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

农业之神。后稷，周朝始祖，“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焉，民皆法则之”。《山海经》说，帝尧时专门研究种植五谷的农师，黄帝、嫫祖的后裔，死后葬在蜀王蚕丛开辟的都广之野，不仅彰显成都平原与北方、中原，文化交流密切，也是高度发达的古蜀农耕文明的一种反映，还说明“都广之野”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4 000年前，创业的“古成都人”，便在成都平原，创造一个强大的文明，傲视长江流域文明中心，一个存续了3 000年以上，距今不少于5 000年，以前长时期神秘、模糊、朦胧的伟大文明——以“宝墩文化”发轫，以三星堆、金沙城为代表，系统、完整、辉煌的古蜀文化。

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与中原、东南并而为三，中华文化的源头多元。

不约而同。不同民族、族群来到成都平原，追求更为宜居之地，反映“天下之中”的向心力。

人类必然选择，“历史心性”的产物。

蚕丛被尊崇为蚕神，农桑业发达的反映。

蚕丛氏从岷江上游兴起，故地在叠溪。

蚕丛死后葬叠溪，名蚕陵山。

汉代曾在叠溪设蚕陵县。

西汉，益州刺史任安，感受“九倒拐”一带的“王气”，曾经在“瞿上”遗址上，再筑“宜城”。山，得名宜城山，寓意先人已筑过瞿上城，我再来筑城，无疑适宜。史籍称为“武阳城”。

宜城山称沿至明代，为“牧马山”取代。

古蜀历史由蚕丛“瞿上”为开端。后有三星堆文明、金沙村文明。对蚕丛纵目形象的描述和三星堆的“青铜纵目人像”惊人吻合。也是三星堆、金沙城后世蜀人，对蜀祖蚕丛、神王大禹的图腾崇拜。

“宝墩文化”表现古蜀国大厦的辉煌，“瞿上”

起重要的奠基作用。

神秘与苍桑,美丽与古老。

“九倒拐”,创业的“古成都人”进据成都平原的“司令部”。

如今,不忘“九倒拐”祖先们的卓著功勋,每岁清明时节,双流百姓都要成群集队到洪江对面九倒拐山涯岩墓、金花隅圣寿寺蚕丛墓前,悼念祖先的亡灵,并成为当地的时尚和风俗。

情感的源流。

寻找“古成都人”的面孔。

逶迤连绵的牧马山。沿着一部厚厚的社会进化史的铅字曲径,从未页慢慢地回溯,进入到谁也没有见过的远古山林;踩着厚厚的地衣、苔藓,吸着湿润的腐质味;探寻蓑草披拂的岩穴……

岁月悠悠,距“营盘山”已经过去千年。

岷江上游、涪江上游和成都平原,史前文明连成一片。

完善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

洪水仍频繁暴发,地震间或而至。

迫使创业的“古成都人”不停地搬家,产生一个个古城遗址。

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掀起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建设城市聚落的高潮,都江堰芒城、郫都古城、温江鱼凫城、大邑高山、大邑盐店、崇州双河、崇州紫竹,宝墩城面积最大。

八座城市,均建在成都平原岷江水系冲积扇、河流之间的龙岗状台地上。

城址均呈长方形,或近方形,既有利于防洪,也便于设防。

格局因地制宜。

兴建与废弃,都是为寻找到一个更好、更适合居住的建城之地。

成都平原洪水泛滥,水患最多,地震频繁。

为了避免地震、寒冷、冰雪、洪水、日晒,“古成都人”在许多地方建立城墙。作为治水示范地、样本,经济很强大,外敌不可轻易侵犯,长期繁荣,国泰民安,但自然灾害频繁。

营城理念,“因天时就地利”。

世界城市发展史经历三个阶段:“生存”为主的1.0时代;“生产”为主的2.0时代,“生活”为导向的3.0时代。4 500年以前的成都,一

建城就能感受到世界“公园城市”的未来形态。

防御导向。城市1.0时代，为了更好地生存，人们聚集城市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城市2.0时代，城市的一切资源都围绕着经济建设来展开，“生产”取代“生存”成为时代城市的主旋律。

信息革命。城市3.0时代，城市的一切资源，开始围绕着美好生活来展开，“生活”取代“生产”，成为时代城市的主旋律。

城市特质。北京“局气”，上海“腔调”，广州“搞掂”，成都“巴适”。

气质不同，也反映在城市风貌、城市文化等层面。

“巴适”“安逸”，四川话里舒适、愉悦的意思，体现了一种知足达观的人生态度。成都的城市风貌、文化，自古就给人一种美好、幸福的感觉，凝炼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城市理想。

地理条件对文明的进步、发展价值重大。

圣哲先贤的出现，使“人性和而才惠”的中华文明特质，变得更为显著。

古城文明，大禹父子治水、建城的“成果”。

时断时续、源源不断。

古羌族，仍然从“茂县盆地”不断迁徙……

古羌族的一个很大支派。携家带口，不断“南下”。

龙门山，古蜀人的神山。

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天然界线。

古称茶坪山、湔山，又名龙山。

为纪念大禹“凿龙门，铸九鼎，治水患”的伟大功绩，后人名为龙门山。

龙门山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并不仅是一座山，而是一个山系。

东北至广元，西南达泸定。

全长约500公里，宽30至70公里。

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线条。

与夏商周秦平行的古蜀，无疑最绵长、奇特、厚重。

大禹治水成功，开创中国的农耕文化。

「华夏」，始于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

古蜀州（崇州）的古城文明，大禹父子治水、建城的结果。

「江原文化」，形成中国独特的水文化思想理念，萌芽江汉朝宗于海的「中华大一统」共识。「华阳国」应是最早的「华夏国」。只是大禹不断扩展疆土，才有「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中国」就慢慢转移到现在中国的「中原」一带去了。

震古烁今。中国安全第一极、中国经济第四极。

太平岁月，四川是安乐窝。

国家动荡，成都是避难所。





「天府之国」的历史底蕴



壹

貳

叁

肆

伍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江河文明。

一部中国史，半部治水史。

4 200年前，中国进行700到800年的文明“热身赛”。

六位伟大的王者，引领华夏民族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准备。

炎帝、黄帝、蚩尤与尧、舜、禹。

百事之首。大禹治水成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事件之首。

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西周青铜器遂公盨上，中国最早的文献记录。

夏禹，也称帝禹、夏后氏。姓姁，字文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颛顼的玄孙。称夏禹，源自初封夏国（今河南禹州）。又称夏伯、伯禹，伯爵之位。遗爱中华，美称大禹。

大禹父子创建的“江原文化”，三代文化的源头和根基。

“三王”之首。

夏禹王与商汤王、周武王，并称“三王”。

四川第一个中国历史名人。

不是神性的天神，而是灵性的人王。

中华民族的立国始祖。

中华儿女的文化共祖。

文献典籍中，对大禹的赞美颇多。

《诗经》描写：“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尚书》记载：“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左传》评论：“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史记》中，司马迁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中华道统圣王之一，既是伟大的治水英雄，又是卓越的政治家。在治水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以民为本，敬业奉献，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不可磨灭，也为后世的水利工程施工立下典范。

出生地。岷江上游，龙门山的汶川一带。

母亲到石纽山下打水，看见蓝天上飘着一朵羊角花似的彩云，从云中掉下一颗白玉石头，极为喜欢。这时几个村姑前来打水，情急之下，她不得不含在嘴里，一不小心吞到肚里，便有了身孕。

禹待在母亲腹中14个月，迟迟不肯面世。

4 300多年前。公元前2314年农历六月初六临产。

生卒年月，说法不一。有专家考证推算，生于公元前2224年，治水的时间为公元前2162年，93岁时成为天子，建立夏朝，100岁时病亡，葬于浙江绍兴市郊的会稽山。

剖腹产。不能顺产，父亲鲧手足无措，门被风吹开，挂在墙上的宝剑自动出鞘，掉落脚前。瞬间，明白苍天旨意，剑剖开禹母腹部，救儿子出世。

《孟子》书中说：“生石纽，西夷人也。”

西汉初的陆贾，在《新语》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禹兴于西羌”。

扬雄《蜀王本纪》介绍：“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郫儿坪。”

西晋陈寿《三国志》确认：“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

东晋《华阳国志》记载：“石纽，古汶山郡也……而生禹于石纽之郫儿坪。”

唐代《括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治西七十三里。”

《禹贡》记载的梁州之域，古羌部落联盟所在地。秦时，属湔氐道。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蜀郡北部冉駹地置汶山郡，辖绵虬等5县。绵虬为郡、县治所，旧址在今汶川威州镇姜维城。

据《元和志》记载：“蜀将姜维、马忠等征伐汶山羌夷，此其地也。”姜维征西，至汶川、理县一带，修城筑垒，习兵练武。至今，还能看到如长龙盘旋而卧的古城墙，人称姜维城。

距都江堰79公里，茂县营盘山39公里。

“三山雄秀，二水争流”。

背靠青山，面临岷江峡谷。大禹祭坛。头戴平天冠、肩挎网罟、手执耒耜的大禹铜像，威严矗立，双目炯炯，仿佛凝视着群峰之上的诞生地——刳儿坪。形如躺椅而无扶手，双

威州四面环山，堡子关雄踞杂谷脑河与岷江之间。

西蜀羌乡。今天的汶川、茂县、理县、北川与都江堰市部分地区。

众多的石纽、刳儿坪、禹穴、石刻，古羌游牧习俗的遗迹、遗存。

大禹与率领的古羌部族“夏后氏”的发迹、发展地。“石纽”“以石为社”祭祀的崇拜，衍变为羌族白石崇拜的产物。凡有“石纽”“禹穴”处，都可能成为大禹降生、活动处。

岷江岸边。古汶川县城旧址绵虎镇。

雪山之下、河谷之上。

绵虎作为大禹出生地，在都汶高速绵虎出口右边。

石纽山，镇南5公里处大禹村背后。

山势陡险，飞沙射人，昔有关卡，故名。

山岸壁立，镌刻的“石纽山”三个大字至今犹存。

不远处，“松茂古道”关口，山势陡险，飞沙射人，相传附近为唐代杨贵妃出生地，幼时洗澡于岭下岷江边，有羌男偷看，小贵妃羞愧难当，扬沙投撒，故名“飞沙关”。

顺关梁而上，海拔1600米的半山腰的平坦地，是面积达40余亩的刳儿坪。

刳儿坪，意为剖腹生禹的大坪坝。

大禹祭坛。头戴平天冠、肩挎网罟、手执耒耜的大禹铜像，威严矗立，双目炯炯，仿佛凝视着群峰之上的诞生地——刳儿坪。形如躺椅而无扶手，背靠青山，面临岷江峡谷。

禹王庙所在地，旧称庙坪地。

后山野，称大神会地，与大禹“汶川之会”有关。

洗儿池，为禹母生禹到此处洗涤，血水染红池水浸红岩石。遗址依然保存较好。

绵虎镇、石纽山、刳儿坪、草坡、天赦山、涂禹山。

组成一套完整的大禹降生地，羌人崇禹的历史地名链。

石纽山出生，涂禹山成长，天赦山祭天祭神，三山皆在汶川。

上帝与众神所在的天庭圣山。

也是古蜀人的仙化圣地。

妻子涂山氏。涂山，为读山，即岷山，又称蜀山。

大禹娶涂山氏，西羌人的夏禹部族与古蜀土著涂山氏（蜀山氏）形成联盟。

西羌美女。大禹的妻子，仪容秀美，生性娴雅，

“夫从妇居”。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只能做“上门女婿”。

联盟至少延续400多年。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夏桀，就娶了岷山二女琬、琰。

迁徙定居，岷江上游的羌族，需用大禹神灵来建构族群认同。

古羌人自古崇拜大禹。羌族巫师释比（汉语称端公）经典，羌族的历史记忆。

以古羌族语言的方式传承。

龙溪等地的释比经典中，都有治水唱段，如“先有天、后有地，后有人、分男女，水有源、树有根，羌族根源说分明，羌族英雄大禹，开山治水数第一”。完整保存大禹治水的内容。

今汶川龙溪，为古龙水；玉（岷玉），为龙溪玉。

三星堆与金沙用玉，大多源于“龙溪玉”、玉垒山脉的“蛇纹玉”。

古蜀王暨最高巫师使用杖，作为权杖、神杖。古蜀国的礼仪、祭祀用玉石器，主要以汶川龙溪玉制作，反映出古蜀人认为大禹出生地的龙溪玉，具有沟通天地神灵的功能。

见证了古羌人智慧的结晶，患难与共与团结勇敢。

大禹故里。汶川、茂县、理县、北川与都江堰市部分地区，均属西蜀羌乡范围。

在汶川，祭祀大禹，传统民俗活动。

龙门山将汶川、茂县等地与北川东西相隔，东侧的北川禹里镇，也有石纽山、剝儿坪。在禹里镇禹穴沟沟口石纽山一块巨石上，扬雄所书题刻“石纽”二字，遒劲有力，至今清晰可见。

禹穴沟两山夹峙，一水中流，寂静清幽。

一沟上下，分布着有关大禹的历史遗迹。

沟的中部,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书石刻“禹穴”、当地百姓供奉大禹的禹王庙、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书题刻“禹穴”;沟底有刳儿坪、禹母崖、洗儿池、血石等禹迹。

历史上大禹生石纽的汶川、北川之争,表明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羌人对华夏大禹神话的羌族化改造、诠释,显示了秦汉时期以来,大禹崇拜多元化的显著特点。

汶川、北川在汉代,同在“汶山郡”境。大禹出生地。

都是羌族聚居地区,有共同保护“禹羌文化”的责任。

大禹在蜀地当部落盟主之时,父亲鲧正在中原治水。

尧舜时代,洪水威胁巨大。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记载,中原地带洪水泛滥,无边无际,淹没庄稼、山陵、房屋,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遍地饥荒,灾难无边……

北方部族联合体,被围困在山陵上。

洪水滔天。尧决心消灭水患,访求能治理洪水的人。

大禹的父亲鲧,水利专家。

治水时间长达九年,终未见效。继承父亲遗志。守孝三年,被推荐作了司空。

大禹贤良,并不因舜处罚父亲嫉恨。

首治家乡的岷江。积累了治水经验。

江源岷山导江第一人。

部族之争结束,有了生存之地,还需治理生存环境。

克服和避免岷江水患,解决立足问题的根本。

大禹在前人的经验上,开创独有的治水方式、体系和理念。

“上善若水”。尊重自然生态法则的精神。

治水,包含治山、治水。

治山,“随山刊木”。“随山之势,相其便宜,斩木通道以治之”,确定山居地形、水的流向。治水,“决川浚淤”。“尽力于沟洫”,疏浚河道。导山,导水的准备。

岷山岷江,大禹最先的治山治水之地。

疏导岷江,疏浚河道引流洪水。

华夏初始,与成都平原一样,抗洪救灾,重中之重,善治水者必赢得人心、被人拥戴。一如稍后的鱼鳧、鳖灵一样,因治水有功,被

推举、“禅让”为部落联盟领袖，专制权力加强。

治山、治水，留下“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历史记载。

让一片泽国的成都平原浮出水面，展现出“天府之国”历史厚重底蕴。

治水有功，大禹被封为“夏伯”。

“夏”，大禹古羌的部落名，儿子启继位，便成国名。

人类历史上的人文现象。

犹太民族的英雄摩西，可能是埃及人；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可能是意大利人；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奥地利人；美国国父华盛顿，英国人，英国国父征服者威廉，来自欧洲大陆。

4 000多年前的中国，氏族林立，无论是中原，还是塞外，无论是“西北走廊”，还是“南岭走廊”，都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各民族都还没有形成，每个氏族部落的地盘，大多只有如今的普通乡镇大。

会盟治水。古羌族部落联盟、古蜀族部落联盟。

带来联盟共体，带来文明融合。

让成都平原至今受益。游牧民族因水草而斗，农耕民族因土地而斗，必然演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从蚕丛率部踏入成都平原的那刻起，“古成都人”更多是与水顽强抗争，就一直把天造的力量与人造的力量不断融合，传承和积累治水经验、治水技术，就一直在寻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和理念，把“与水斗争”变为“与水和谐”，营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治水成功，大禹被舜帝选定为继承人。

会盟诸侯，“汶川之会”。

誓师治水。公元前2284年，30岁的大禹带领古羌部落联盟，迁往中原。

走出岷江前，在“汶川”之滨的石纽，举行盟誓。

同盟部族。大禹治水的过程中，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有跟随的本族部落，也有追随的其他古蜀部族部落。柏灌率领部分蜀族人，随同大禹“北漂”治水，迁居华夏，成为“斟灌氏”。

柏灌，古蜀国第二个王朝的统治者。

古人有分群的习惯，有时是环境变化被动分群，有时是主动分群。

祖传习惯。分群时，一般是两支分出，一支留守。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华阳国志》说，蚕丛先称王，“次王曰柏灌”。扬雄记述的柏濩，与常璩记载的柏灌，一字之差，实为同一个人。

华夏文明奠基性发祥地。

古蜀文明跨出成都平原。

中国历史上，“川军”首次大规模出川，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著名的治水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

两个部落联盟数万人，相继从汶川出发，由西蜀向东，浩浩荡荡，迤迤迤迤……

人最多时，沿岷江河谷的谷道上，接踵难容。

不知当年数万先人，何以携家带口通过“松茂古道”？谷道宽不到两米，窄处只能侧身而过，绝壁处是凿空的甬道，得低头勾腰，有数十处坡陡弯急的地方，道路右下是悬崖，步步惊心。

诱惑来自远方，其实并不遥远。

无法清楚了解到4 200多年前的“川军”，如何“誓师治水”交流，也更难知道，在蛮荒的年代，迁徙到远方，是否有人能够将远方世界的信息，反馈给汶川故地、成都平原的同族们。

一定不是载歌载舞地离开家园。

一路上，有多少泪水迷离的双眼，在不停地回头张望？

相信一个英雄的民族，铿锵挺进的脚步，从来都不会犹豫、迟疑，甚至退缩。面对刀光剑影，或者猛兽突袭时，一定会精神抖擞地向前，纵马驰骋，威武地呐喊声，顿时响彻云霄。

还有一点却能确认，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群的不断融合、分流，曾经在一起与大自然抗争的那群“川军”兄弟姐妹，后代的古蜀国最终与夏商周三朝并存，成为熟悉而陌生的族群。

祖先的古老记忆。

口耳相传，或许是无法连贯的碎片，演化成那些美丽的传说。

《禹贡》记叙，在虞夏时期，大禹带领古羌部落联盟、古蜀族部落联盟到中原地区，通过一条天然谷道，“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嘉陵江），逾于沔（汉水），入于渭（渭河），乱于河（黄河）”的水陆

交通线路，先乘船顺桓水而下，然后，转入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附近，至四川广元白龙江口的嘉陵江河段，经过古汉水上游，再进入渭河水路、黄河干流。

《读史方舆记要》说：“褒斜之道，夏禹发之，而汉始成之。”

《华阳国志》引《蜀志》称，其始通于三皇五帝时代。

“秘道”古陈仓道（褒斜道），第一次留下古蜀先人的足迹。

就是这批“北漂大军”，怀着对远方的向往，背井离乡，翻过茫茫岷山、龙门山，沿着奔腾的岷江河谷，来到了有黄河的河洛地区。那里有比故乡更加厚实的黄土，松软颗粒状的黄土层，对于手持原始石器的古蜀先民来说，非常容易耕种，同时具有完美的“自我加肥”特性的黄土地，对于刚刚进入农耕生活的“川军”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在长期的水患和治理中，“北漂大军”治水经验丰富。

大禹治水的方法，也引入到中原。

治水声誉崇高。联合共工一族与其他部落，把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整体来治理，疏通、平整，扩及“九州”，取得民得陆处、九河归道、九州划定的丰功伟绩。

开启治水大业，证明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领导古羌、古蜀族群与其他部族，共同开拓的成果。也佐证了西汉扬雄等人“禹生汶川”的观点，汶川是“大禹治水”的肇始地。

与治水功成后在古越绍兴会稽山、会盟诸侯计功，正好首尾相应。

中国历史上，「川军」首次大规模出川，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著名的治水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两个部落联盟数万人，相继从汶川出发，由西蜀向东，浩浩荡荡，迤迤迤迤……



壹

貳

叁

肆

伍

“汶川之会”。

夏王朝始兴的重大事件。

岷山, 中国神仙文化的仙源圣山。

古蜀人的仙化圣地。古蜀国盛行对天庭、日月、神树、神鸟等自然神灵的崇拜。天庭位于四方形三层的圣山山顶, 以古岷山主峰九顶山为圣山主峰并顶礼膜拜, 与“昆仑”神话一致。

2004年, 在三峡云阳县发现一块东汉年间的《景云碑》。

碑文记述, 大禹第七代孙伯杼(伯沆)的一次会盟, “先人伯沆, 匪志慷慨, 术禹石纽, 汶川之会”, 循大禹足迹, 在“少康中兴”后, 不忘祖地岷山、岷水, 以遵循大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 甲帐龟车, 巡狩回蜀, 从中原河洛回到汶川故里祭祖, 举行重大治水仪式, “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 结合大禹治水奠定夏王朝基业的事迹, 誓志继承大禹事业、德政。

《景云碑》, 250年胸肋县(今重庆云阳)县令所立。

少康(杜康)长子夏伯沆, 矛和铠甲的发明者。

从小聪明好学, 酷爱兵事。

“少康中兴”时, 辅佐父亲恢复夏朝, 安定民生。

跟随父兄学文练武, 掌握许多军事才能、治国之道。

公元前2057年即位后, 延续少康的方针, 征讨东夷各部落, 积极扩展疆土。

“杼作甲, 杼作矛”。针对武器长弓的特点, 用兽甲制作

成护甲，士兵穿上，能很好地防御石刀、石箭的砍与射，保护能力增强，原始的战甲起源。战甲的出现，使夏朝在军事装备上对周边文明政权，具有巨大优势。夏朝武力值进入鼎盛时期。

开拓疆域。带着军队，驰骋战场，一直打到东海边，扩大夏朝的疆域。

从夏杼开始，夏商军力几百年一直威震四方。

媲美大禹。《国语》记载：“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夏朝皇帝中唯一获得“报祭”荣誉的帝王，被后世公认能遵循大禹治国之道的君主，受到尊重、祭祀。

《景云碑》现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中。

布局严谨，书风俊雅，镌刻精细，被称“汉代西南第一碑”。

大禹世系，与古蜀人同出一脉。

一脉相承。古蜀文化中的“江原文化”。

距“营盘山文化”2 300年，距“古成都人”创造的“宝墩文明”30年。

英雄蜀王，治水救天下。无论长江黄河、岷江上游，还是长江下游。

文明与蛮荒的分水岭。

最早的“中国”起步。

“北漂大军”。岷江上游的古羌联盟、岷江中游的蜀族部落，自西向东迁徙，西兴东渐，形成三大版块，构成三大中心。初始，部落集中在岷江、汉江流域，形成最早的蜀汉版块。鼎盛，挺进中原，在今晋南、豫西、豫中地区，形成中原版块。衰亡，龟守荆楚江淮流域，形成荆楚版块。“景云碑”，衰亡时期产物，一个只能追忆先人辉煌的历史记忆、安慰。

《史记》记述，秦人的祖先曾“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称号柏灌、柏翳，都崇鸟。特殊渊源，跟随大禹治水“北漂大军”中，柏灌氏其中一小支，在甘肃天水定居。

那是秦始皇的祖居地。成为秦人的祖先之一。

史籍中的“斟灌氏”“斟灌族”，即柏灌部落的后裔、遗民。

《古本竹书纪年》《左传》等古籍中，有斟灌记载，既是地名，也是氏族名。

“南迁部队”。岷江上游的古羌联盟，大支部落进入成都平原，

「松茂古道」苍凉地盘山而上下，集秘境与情结于一身的人文宝地。有谁在繁华中，倾听远古的乐章？有多少血泪，在这条古道上洒过？又有多少先民，目送嘶骑奔向远方？

与“留守柏灌部落”蜀族联盟融合，建立历“虞、夏、商、周”的强大、富饶的古蜀国；一小支部落，沿岷江、大渡河南下，到汉源、西昌一带；到云南楚雄、大理、昭通。

现在的景颇族、彝族，应是古羌的后裔。

那时，宜宾和昭通，还没被后来地震而断裂的金沙江隔断。

“留守羌人”。迟在夏代中期，继大禹古羌部落联盟后，也建立以冉、駹（龙）两大部落为核心的冉駹古国，历商周，直至西汉武帝在岷江上游置汶山郡。

有时，徜徉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会迷失自己。

很多历史人物，总在梦中不断出现。

梦醒，时常有些许的怅然，心头萦绕，久久不能释怀。

亘古未变的四季轮换，沧海与桑田的变迁中，我们与4 000多年前的祖先，共享着同样的朗月清风，朝云暮雨，是否有过同样的遐想与对未知的迷惘？

并非偶然。

大中原区的形成，成为中国远古时代重要的区域。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陈子昂悲天悯人的忧思中，那个充满着原始困惑的年代，先人夏禹与古羌部落、柏灌蜀族部落，在艰苦的生命轮回中，谱写了怎样的乐章？

“松茂古道”苍凉地盘山而上下，集秘境与情结于一身的人文宝地。有谁在繁华中，倾听远古的乐章？有多少血泪，在这条古道上洒过？又有多少先民，目送嘶骑奔向远方？

宛如一根羊肠，从山下到山顶，再从山顶到山下。

一条古道有多少宽度，才能容得下世间万物？

“夏”的文训之义，“中国之人”。

时年“中国”，多从地理“中原”、旌旗“中心”去理解。

“中”在汉语里，意为“上下通和”，并不固指某地域、民族。

“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利味，咸有利器知道之俗，今之有量地度，居有城廓，地以度邑，邑以度民，以观安危……有君长正之者乎，公曰善哉。”指已经进入“安居、熟食、农耕、有城市、有生产生活管理制度与各部落所共同的祭祀崇拜礼仪，有解决人民矛盾纠纷与困难的机构，有公平公正机制”的国度。

西部地区的山谷、丘陵之中，中国农业最早发生地之一。

在夏代，四川为梁州，大禹开辟的农耕之地为梁山。

在四川语音中，梁州发音成连州、联州；梁山发音成连山、联山。

连、联，联合、连结之意。

既指岷江上游的连绵起伏的大山脉，也指长江上游联合的文明形态。

成都平原最早进入“中国”文明文化形态。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有庸、蜀、羌、葷、濮、氐、氐等不同的部落联合体，又各自称自己为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现在的羌、藏、普米、纳西、彝等少数民族，生活的岷江、雅砻江、大渡河、湍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大禹古羌部落联盟、柏灌蜀族部落联盟当年生长、活动之地。

现在的凉山州的彝族人，就称自己是“罗罗”；阿坝州的羌族人，称自己是“尔矛、冉駹（庸茂）”。至今，还留有介于藏族、羌族之间的一种独特民族——“白马藏”（濮矛赞）。

农业在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与中国东部地区平原得到高度发展，从事农业的群体逐步变成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而继续留在山区、高原地区半农半牧的人们，成为现在中国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

发式相同。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居民辫发三根，与成都平原古蜀人辫发三根一样。

中国历史上，哪个地方最早进入稳定有序的农业、渔猎、放牧生产生活先进文明文化形态，那个地方与那里的人民，就是“中

国”“中国人”，与地域的中心位置，并无直接关系。

“大禹治水”与继后的“鳖灵治水”。

带来农业生产生活中具有发达形式的水利农业。

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基础。

“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中国可信文献中，《尚书·武成》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

“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解释：“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

《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花。”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礼仪之邦，衣冠上国”，有高雅的意思。

《华阳国志》记载，夏分九州，梁州包含夏之前就已存在的华阳、黑水和江汉三地区，即现在的四川、陕西、甘肃一带。“华阳”，指梁州中心地区，巴蜀又是华阳之“中国”，梁州与巴蜀都是大禹治水之功所成。川人因为无翘舌音、后鼻音，阳(yang)应念为“雅(ya)”或“雁(yan)”，“华阳国”可念为“华雅国”“华雁国”。

古蜀人历来有崇“五”习俗，“五”为“中”义。

雅、夏同义，“华阳国”应是最早“华夏国”的“雏形”。只是大禹不断扩展疆土，才有“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中国”就转移到现在的“中原”一带去了。

夏人何以尚黑？只要到大禹古羌部落联盟生活的岷江上游、柏灌蜀族部落联盟生活的成都平原，看看土地的颜色便知那里土地十分肥沃，是大禹的“六府三事九功”的中心。

夏禹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农耕与稳定放牧时代。

夏人尚黑，指进入农耕时代的夏人尚肥沃的黑土。

夏人称为“华夏人”？华、花相通。

牛羊成群。岷江上游一带，4月到9月是放牧与农耕的黄金期，其余时间白雪皑皑，当地居民特别向往、珍惜农历中的夏天。“磨花”，判定夏天来临的象征，太阳花之意。白天，花心一直向着太阳，自旋转180°；夜晚，再次自旋转180°，将花心向着太阳即将升起的东方。

川西高原，《竹书纪年》《史记》《蜀王本纪》中，“禹出西羌”

之地。“华夏”，表示充满生机的“夏花”之意；“华夏人”生活在“夏花”之地的人，与“禹出西羌”不谋而合。

一本《华阳国志》记载了西南地区的情况。

华阳国和夏朝相加，难道是“华夏”？

夏王族自称“太阳家族”，“禹都阳城”之名、“太阳之城”的简称。

名称由来，与“太阳家族”有关。

三星堆文化，太阳崇拜特色鲜明。

太阳神鸟，“古成都人”早期部落的图腾。

“神鸟绕日”，表达先民向往太阳、崇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从古羌部落到今羌乡各族，4 000多年来始终守护着大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故园；守护着大禹初心，传习历代“术禹石纽、汶川之会”。生日回乡祭大禹的传统习俗，也有4 000多年。

“大禹禁地”，方百里，不敢居牧，不敢放六畜，有罪的人，逃入其中不能去追捕，三年后，即可赦其罪。羌族的圣地，称为“天赦山”，在绵虎镇草坡片区与耿达乡交界处。

大禹治水。改变以往的“堵水”，用“疏导引流”。

在《史记》里，司马迁为大禹画像：“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风餐露宿，治理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等，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往下流。

为准确地规划疏导路线，没日没夜地访山川地理，观察地势的高低，沿路测量好水流向的路线，召集当地百姓，按照费尽心血规划好的路线图，开山辟地，填洼筑堤，合力开拓。

大面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开展基础建设。

建立九州交通网络。除了水路体系，还有公路

「北漂大军」。岷江上游的古羌联盟、岷江中游的蜀族部落，自西向东迁徙，西兴东渐，形成三大版块，构成三大中心。初始，部落集中在岷江、汉江流域，形成最早的蜀汉版块。鼎盛，挺进中原，在今晋南、豫西、豫中地区，形成中原版块。衰亡，龟守荆楚江淮流域，形成荆楚版块。「景云碑」，衰亡时期产物，一个只能追忆先人辉煌的历史记忆、安慰。

网络，三横三纵，九条通达九州的交通系统，连接了荆山、太岳、王屋、太行、太华山、大别山、衡山。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

山路治理好，开始理通水脉。

共疏导九条河流。将黄河疏导过龙门山，最后流入大海，将汉水向南疏导，注入长江，开通汶山，疏导岷江，疏导沅水进黄河，疏导淮水入大海，渭水、洛河进黄河。

梁山北面，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大禹劈开龙门、伊阙，凿通积石山、青铜峡，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被疏导到梁山，被龙门山挡住。龙门太高，逆水而上的鱼，拼命地往上跳。

“鲤鱼跳龙门”。

极少数的鱼能够跳过去，变成一条飞舞空中的龙。

河水失去往日的凶恶，驯服、平缓地东流，昔日被水淹没的山陵露出峥嵘，人民又能筑室而居，“丰水东注，唯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进入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时代。

开凿的龙门有两个：陕西韩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山，洛阳之南的龙门山。

《水经注》记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汉书》记载：“昔大禹治水，山陵挡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

推广“稷降播种，农殖嘉谷”。

自律精神。离家治水长达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

只是对妻儿遥遥地挥挥手。

十分顾及常年一起治水的柏灌联盟伙伴，多年在外，许多人或许连路过自己家门口的机会都没有，若要众人臣服，自己必须带头做好榜样，坚持治水胜利之后，才返家与亲人团聚。

在婚后第四天，便离开心爱的妻子前去治水。离家前，涂山氏问怀孕生子，你不在怎么办，不如先给孩子起个名字。大禹回答生男孩就叫“启”，“治水启程”之意。

治水期间，涂山氏在家天天期盼丈夫回来，盼望不到，又跑到山坡上去等候。望穿秋水，不禁长叹一声，吟咏一句：“候人兮，猗！”中国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情诗。

“候人兮”，等候我盼望的人；“猗”，古汉语的叹词，相当

于“啊”。

“诗贵含蓄”。包含感情丰富复杂：想见到朝思暮想的爱人，望而不见的焦虑、彷徨与无可奈何的心情；一个人伫立山头，翘首远盼，一个思念、希望丈夫早日归来的女子形象。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女文青”。

也是第一位国母。

夏部族从黄帝时期开始，主管以观测云象为重点的天文历法，用云纹来代表部族人的名号。到了商代，就规范成甲骨文的“夏”字，看去“头上长发高竖”，与“蜀”字形近、意会。

商王朝把夏部族看作是专管云象的掌天文者。



壹

貳

叁

肆

伍

“世为侯伯”。

大禹的先祖昌意、颡、鯀均生活在古蜀国，家族势力较强，成功治水的群众基础扎实。父亲鯀在奉命治水前，已是治水能手、建城工匠，大禹受教育、影响、熏陶，情理之中。

汶川绵虎镇15公里外的羊龙山腰。

禹碑岭村，村中有一通石碑，被一棵大树包裹。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之地。

终日在泥水之中，整顿水利的工程长达20年之久。

上古时期，遵循的是祖母制，女为尊，男为从。按夏例，启身为男子，在家族里的地位比较低，无法继承家业。大禹出汶川时30岁，半年后，才有儿子启。大禹忙于治水，10多年都不曾回家。

启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便喜欢音乐，艺术修养颇高。

因为父亲常年不在身边，独立性很强，又非常聪明。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留守儿童”。

大禹继帝位后，把儿子夏启带到身边，倾力培养，足迹遍布黄河、长江流域。

每一个大动作，儿子都全程参与。

在夏部落内，夏君的职位和声望都极高。

承前启后。夏启，介乎神灵和凡人之间的君王。

上能沟通天帝，下能戡平内乱。

大禹、柏翳在治水期间，绘制《山海图》，记录华夏山川、河流、奇鸟和异兽。

《山海经》，大禹派3 000人从八方收集地理生物信息，

历时30多年而成。

记载了大禹、夏耕、后羿和夏启等4位夏朝英雄。

夏启的地位比大禹更高，驱使2条龙，地位堪比上古四方神。

在位第15年，发生“武观之乱”“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事件。

中国文艺、诗歌的始祖。

除了善于行军打仗，夏启还善于唱歌，会舞蹈，还会写歌词，一旦心情大悦，就会在朝堂上，翩然起舞，放声歌唱，喜形于色，肢体语言丰富。古老乐舞，《九歌》《九招》和《九辩》，原创作者就是夏启。

一生酷爱音乐，歌舞本只应天上有，利用几次去天帝宫中做客之机，一边欣赏，一边偷偷记录。还派了三位妃嫔，去天宫里学习，把歌舞带回到人间。

父子俩，从崇州的火烧营，到汶川的石纽山。

文化交集。汶川与崇州血缘之邦。

崇州，钻木取火升格为农耕文明的第一站。

一脉相承。从崇州到汶川、中原，东南至长江中下游……再从崇州到大邑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城，数十公里的迁移，博大的古蜀文明与绝世的成都风华，4 300多年来的第一篇。

“崇伯鲧”，在“崇伯”位上。

父子俩都是颛顼系的龙子龙孙。

黄帝的六世孙、昌意的五世孙、颛顼的玄孙。

夏朝开国君主大禹的父亲、夏启的祖父。

难以考证。生卒年月，说法不一。

鲧祖在耕种之法、治水方面颇有建树。大禹的爷爷白马，字熙，封于崇，今崇州道明镇白马社区、东北崇坪镇。“崇”，在岷江西南，汶山东南，崇阳镇北，拥有一个大诸侯国的面积。

“崇州”的“崇”，秦以前无资料可查。

可能沿用古地名，也可能是因鲧的封地得名。

鲧封崇地，继崇伯位。

《史记·夏本纪索引》引《连山易》：“鲧封于崇。”继崇伯位，《国语·周语》称为“崇伯鲧”。官名，崇伯。伯，爵位名称。崇，大禹父亲鲧的封地名字，崇地侯王。

鲧是崇地侯王。崇州、汶川相邻。

崇州北部与汶川接壤。从九龙沟翻过处于龙门山脉的褶皱带、海拔2 686米、大小六峰如群龙聚首的六顶山，纯原始状态、天工造物而形成众多的层峦叠嶂、深沟峡谷，就是汶川。

到汶川石纽村，不到30公里的路程。

大禹出生在石纽村的石穴。

石穴，类似于现在大禹父亲鲧夏季的避暑别墅。

汶川是别都，大禹的母亲是汶川人。

崇高、崇山二词缘由。大禹父亲叫崇伯，得一词崇高。崇字，上山，下宗。或叫山之宗。因地得名，鲧生长之地，有一座令天下臣服的高山。

若水之地：黑水河，九龙池。火烧营，3 868米。

火烧营山麓孕育二位帝王，承受得起尊崇、神圣。

崇山、崇高二词，为崇州山、水而“定制”。

崇州的火烧营够高，配得上“崇高”。

在中国古代，原崇州三郎镇的名字是“天国之地”。

崇高。鸡冠山原名崇山，主峰叫火烧营，又名天国山。

“人间龙宫”。天国山有九龙池，传说是龙王九太子居住之地。

司马迁《史记》记载：黄帝正妃盐亭人嫫祖生二子。长子青阳，降居江水（岷江）；次子昌意，降居若水（九龙池）。昌意娶蜀山氏女（古蜀国女子）生高阳，是为颛顼帝。

颛顼帝以鬼神制义。

道家鼻祖级的人物。

《山海经》记载：“西南黑水河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生长若木的地方，发源若水，流出后沿蜀郡（崇州）牦牛徼外（怀远镇），流经东南方向，到天社山“故关”（新津）这一段。

“天社山”，神圣祭坛。

古蜀第一代王蚕丛、第二代王柏灌，祭祀太阳之处。左有灵秀清幽老君山，右有古木参天宝资山，面对清波荡漾的南河，靠山面水，风水极佳。死者长眠安息的乐土，后世承荫的宝地。“老君山”只是俗称，仅见于清代的文献。历史地理文献中，因山上种植水稻，代替小米成为宝墩先民们的主食，被称为“稠稷草”，也就有了另一名称“稠稷山”。

一脉相承。从崇州到汶川、中原，东南至长江中下游……再从崇州到大邑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城，数十公里的迁移，博大的古蜀文明与绝世的成都风华，4300多年来的第一篇。

神木，若木；神水，若水；神池，九龙池。

若水，崇州西河水系。

蜀郡，为成都。旄牛，指汉原。

崇州在晋朝时，为汉原郡，郡治今崇州怀远镇。

九龙池，发源二条河流。火烧营东麓，东南流的汶井江（若水），上源叫黑函河；火烧营西麓，南流的黑水河（沫水）。两条河都“黑”，传说山上生长会发光的神树，流出的水，黑色。

黑水之间生长一种树木，夜晚会发光。

把山峰照亮如火烧一般，鸡冠山主峰得名火烧营。

黑石河为岷江干流时，称“黑石大江”；岷江干流，转走羊马河，称“羊马之河”，现在的外江体系，古称羊摩江。河西人的母亲河，沙沟河和黑石河。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蜀州，禹贡梁州之域，秦灭蜀为蜀郡，在汉乃郡之江原县也。”

文井江原名汶井江，地接汶川县。

古老经书《河图括地象》说：“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岷山指汶山，古语“岷”字与“汶”字相通。井络，指河流纵横交错，状如井字。文井江，由此得名。

帝，帝王。会，会聚。

昌，昌盛。神，超自然的创世者。

建，建设、建立。福，福地。

书中指出，文井江，帝王会聚昌盛之处，创世神建立的福地。

《水经注》记载：“东出于江原县（江原镇）也。东入（新津区）于江。”自西北向东南，流经10多个乡镇，至三江蒙渡入新津境，注入岷江。全长109公里，市境内长96.8公里。

至今仍是排灌兼用，灌溉崇州、大邑、新津、邛崃70多万亩丰饶农田。

在汉初，崇州得名江原县。

汉原县，古称“旄牛县”，与临邛（邛崃）同时迁入崇州，置汉原郡，领汉原、临邛二县。汉原郡与汉原县治，都在今崇州怀远镇。

《华阳国志》记载：“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緼拗为九江。”常璩充实《河图括地象》的具体内容，指明帝王包括伏羲、黄帝、颛顼。高度赞誉文井江的历史地位，“井络垂耀，江汉遵流”“四渎之首”。

四渎，长江、黄河、淮水、齐水。

《夏书》载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形成岷江为长江正源之说。

至今，仍然是一个史志奇迹。

《夏书》至明朝3 000多年的时间中，文井江被认定为岷江正源、四渎之首。

清代国学大师李锡书，一生对功名利禄“淡泊萧然”，却对修志情有独钟。曾经四任汶川知县，前后在汶川工作、生活了11年，在编修《汶志纪略》时多次考察，还邀《蜀水经》作者、好友李元为之考证，清初广柔城址尚依稀可寻，社稷坛犹宛然残存，记录：“广柔治在今治（绵虎镇）之南大邑坪。”广柔县（今北川县）在邛崃市北，汉代的江原县地。

《汶志纪略》，汶川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若水诞生颛顼，沫水诞生大禹的父亲鲧。

鲧是颛顼的后代，都在同一地诞生，九龙池——九龙沟源头。

韦昭在为《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一语作注时，说：“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融，祝融，炎帝后人，《三国演义》中提过祝融夫人，此姓氏在南中出现过。

历史上，南中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

三国时期，南中成为蜀汉属地。

崇州是鲧的封地，与欢兜、共工杂处尧朝。

《山海经》记载：“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江水，古时就指长江。“江”字，工水，即流经共工国领地的水，今岷江。

“邛”，工邑，共工的城邑。在秦时，邛崃称临邛，共工国在现在的邛崃以西。鲧的家，也在崇的高山、平原之间，也就是三星堆、邛崃

之间的一地，即现在的崇州一带。

《尚书·舜典》记载，欢兜、共工、三苗、鲧为“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令祝融“殛鲧于羽山”。欢兜被流放于崇山，今崇州三郎镇（现已并入街子镇）。

《国语·周语》称鲧为“崇伯鲧”。三国时期吴国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韦昭，在为《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一语作注时，说：“崇，崇高山也。”“崇高”一词由此而来。

欢兜流放于崇州，被“双规”的对象。

祝融成了继鲧之后，崇州新的管理者。

江原的地理位置，在蜀郡治所成都的西方，度过大江一侧。根据《水经注》等文献测定，大江是金马河。县城紧邻文井江，距离成都47公里，与现在成都故址遗迹的距离大致吻合。

《大元一统志》记载，“古州城（崇庆州），秦张仪筑”。

江原县县城，即今崇州市区。

古蜀之根，从江原发迹。

天府神韵，在江原孕育。

“蜀中之蜀”，江原的延续。“蜀”来源于崇州。

蜀，后来成了整个四川的缩影和代指。

蜀都，古蜀国的首都，成都的代名词。

远古人群大多会在河流两旁，选择居住地方。因为河谷相对湿润、植被丰茂，有利于桑蚕、渔猎等农牧渔猎生产发展，远古人类就在系列古堰塞湖两岸的谷地上，依水而生，聚落而居。

聚落之地，一把双刃剑。

往往是系列古堰塞湖周期性溃缺，造成巨大洪水肆虐、泛滥之处。

成都平原北部，因地形原因开拓缓慢，鲧祖带领着部族，来到西南部，今大邑、崇州一带，勘察地形、了解情况。对周边的地形、气候、水文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发现岷江汛期时，水会往两边漫灌，漫灌区域往东北，到温江的江安河，往西南，到崇州的西河。

在西河与斜江河之间，有些高台湿地。

除非发生特大洪水，不然不会被淹没。

鲧祖与族人们，将西河以西、斜江河两侧，作为主要区域进行拓荒，筑堤修坝，导水治水，全力开垦荒地。耕种方式，渐渐地由粗耕

江原的地理位置，在蜀郡治所成都的西方，度过大江一侧。根据《水经注》等文献测定，大江是金马河。县城紧邻文井江，距离成都约20公里，与现在成都故址遗迹的距离大致吻合。《大元一统志》记载，「古州城（崇庆州），秦张仪筑」。

向精耕发展，撒种的旱稻，朝着蓄水围田的水稻改变。

从大邑、崇州，顺河一直往下……

到新津南河一带，在今周边搭建驻点。

土地肥沃。介于西河、斜江河之间，有岷江漫灌带来的大片滩涂、平地，适合农耕。

选取了相对高企的地带，烧林伐薪，开始耕种。

鲧的父亲少年时代，就随鲧的爷爷——鲧祖参与治理古蜀州一带的水；成人后，一直在勘察地形、水文，总结知水、悉水的经验，走遍成都平原以北、以西的各个角落。

每年到岷江汛期，人们都心惊胆战，好在那些年岷江都在正常水位，并没有毁灭性地淹没开垦之地。人们就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南边的战线上，排沟、挖渠、引水，开荒种地，修整河道，鲧祖与族人们总结了不少岷江水文的特点、导水与引水的方法。

甚至，还观察到了虹吸现象。

对大自然和岷江的崇拜，无以复加。

鲧祖回中原复命，鲧父继续在“崇地”生活。

去黄河上游治水，汶川是必经之地。

从九龙沟翻过六顶山，到汶川石纽村，不到30公里的路程。

鲧在汶川绵茂一带娶羌女，在汶川生下大禹。

大禹妻常偷看丈夫率众治水导江情形。

岷、沱（杂谷脑河）汇合处，水道被突兀的鹫峰阻挡，苦无良策。她偷偷求助神力，将自己与儿子变成一群野猪，前去治水之地拱山掘地，开辟水道。被大禹慧眼识出，非常感动。

治水，始于岷江、汉水。

《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山番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岷，在岷江上游，山，番豕山在汉江源头，“沱在郫县，潜出山番

冢，蔡蒙在汉嘉，和读曰桓，桓水出蜀山西南。是《禹贡》于梁州所详，偏在西北”。

情理之中。对给成都平原构成洪涝威胁的岷江，首先进行治理。

成都平原西面的横断山区，受高温气候影响，夏秋雨量集中，盆地西部5至10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85%至90%，素有“西蜀天漏”之称。一旦夏雨集中，水流不畅，便酿成洪灾。

鲧禹父子治水，恰巧也在距今4 500年至3 700年的时间段。

商周时期，双流人就开始农耕。

商周遗址处于牧马山山前地带，沿河流台地分布，当时人们已处于定居，开始农耕。

新津花源镇遗址，地层堆积多达5层，包含丰富。如今还有宝墩文化的遗存，预示双流西南部与邻近地区历史源远流长，对探讨双流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意义重大。

河池遗址、凌石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友宁桥遗址（夏商）→三官堂遗址（商周）→树包桥遗址（春秋）→国家羽体基地遗址（战国），构建双流地区完整的先秦文化发展序列。

鲧禹父子远近闻名。

治水、建城成效显著。

中原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时，鲧被尧选中负责治理洪水。奉命治水。主要区域：河、洛、济、淮、泗等地。



壹

貳

叁

肆

伍

“子承父业”。

河南汝阳陶营镇境内牛头山，大禹治水的“工程指挥部”。牛头山现存文物遗迹有：大禹祭天的香炉石，缆船的枚船橛、玄女台、拴龙橛、大象石、夏代文字蝌蚪文化石等。

“地球万年一遇”。《尚书》记载，大禹治理的洪水，规模惊人，“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大水与天相接，浩浩荡荡，包围大山，淹没山丘，民众被大水吞没。

黄河上游积石峡。一场强烈地震引发大规模滑坡，堵塞黄河6到9个月，形成巨大的堰塞湖，水量持续增加，导致堰塞湖溃决，多达110亿至160亿立方米的湖水，短时间内快速下泄。

有历史记载的黄河最大一次洪水，发生于1843年，最大流量约每秒3.6万立方米。大禹治水前这一溃决洪水的流量，可能是1843年洪水的10倍左右，达到每秒30万至50万立方米。

彻底摧毁积石峡下游25公里处的喇家部落。

“喇家遗址”。黄河上游的青海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原始先民活动场景瞬间被“冻结”，至今还保持生前的姿势，姿态各异，有的曲肢侧卧，有的匍匐于地，有的上肢牵连，有的跪踞在地，下意识想保护婴儿的母亲，跪在地面，相互偎依，在灾难突然降临时表现的无助、乞求上苍救助的神态令人动容，与西方庞贝古城一样。这里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

著名的“官亭渡口”，就在遗址西南7公里处。

大禹首先治理之处，自是鲧治水的区域，在治平河、洛、济、淮、泗一带洪水后，便转战包括三峡在内的长江中下游。从长江上游的岷江、汉水，到黄河流域，再到长江中下游。

治水证据。大禹治水时期，岷江上游的古堰塞湖逐渐消失。

对茂县叠溪古堰塞湖沉积物的测定表明，自10 000年前发生第一次溃决后，大约每间隔1 500年，就会再发生一次灾难，最后一次溃决，发生在大禹治水的年代，距今4 000年左右。

大禹不敢懈怠、出错。

极为小心，怕授人以柄，命同父亲。

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中华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区。

大禹治水将古蜀文化，带到足迹所到之处，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使治水相对集中的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提速，情理之中。

江河文化“双联体”，再一次相互融合、重组。

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一脉相承。

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与殷商文化，相近、相异的内因。

《吕氏春秋》说：“夏鲧作城。”

《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淮南子》更是给出鲧作城池的高度：“昔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通志》记载：“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

《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介绍：“处土东里隗贲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

在鲧前，有城市遗址、防卫性的城墙——“城邦国家”。古文献称“国”。鲧作城，是作“城”的小城，独城国家变成以城市群组成的国家，即：帝王所居，都城；平民所居，郭邑。

“鲧作城郭”，并非指整个中国的建城鼻祖。

三种情况存在：在华夏联盟区域，属城池开创者，考古发现仅长江流域的最古老城市距今超6 000年；未必开创，一如仓颉作书、蔡伦造纸一般，属于改良或对造城有着重大贡献，或整理、推广造城

大禹父子开启的「江原文化」，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文化形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长期的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摸索出大自然的规律，开创、引领出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为世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植入文化基因。

技术；未必是指个人名字，而是指一个部落名称，是部落开创了建城历史。

地理条件对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价值重大。

真实事件。“共工怒触不周山”。

共工，上古时代的水官，炎帝的后代。

《左传》记载：“共工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共工时代的古中国，到处都是汪洋大海，今天绝大多数平原地带都在水下。《管子》介绍：“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

“共工欲壅防百川”。治水方法，堵塞。

黄帝死后，孙子颛顼即位。

共工氏不服，战争不可避免。

“神明间的战争”。颛顼与共工之间，一场帝位之间的战争，“实战”规模也就乡村械斗级别，只不过由于共工怒触不周山（石柱），引发的偶然性事件，被后世增添颇多神性色彩。

相互征伐、融合。

生存着大小数十个部落，形成了几个实力强大的部落。

颛顼、共工的两大部落，最具代表性。

共工战败，撞倒了天的柱子不周山。《淮南子》记载：“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争夺统治权，两大部落势不两立。

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一句，“不周山下红旗乱”，说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颛顼取胜。共工心有不甘，一气之下怒撞柱子。

恰巧，爆发大地震，滔天洪水汹涌而来，房屋瞬间被淹没。同时，两个部落也死伤惨重。人们每当谈起这事都惧怕不已，最终将这场灾难，归结为共工怒触柱子造成。

口口相传，也逐渐被神化，最终形成神话传说版本。
并非盲目的宗教信仰，承载古人世界观中的闪光点。
故事“实说”特大洪水，“隐说”中国的“地理阶梯”。
天往西北方向倾斜，地往东南方向下陷。
长江、黄河，顺地势都向东南流淌汇集。
中国地理的太极图，决定地理的生命脉。

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西北高，东南低。从海边到帕米尔高原，分三个阶梯，500米以下一级，1 000~2 000米一级，4 000米以上一级。东西，以晋陕峡谷间的黄河为分界线；南北，由秦岭、淮河分界。

第一级“地理阶梯”。

西北、西南，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第三级“地理阶梯”。

东南沿海，也是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西北地形，一个“高压槽”。

地势重要。风向在上，水也在上。

岷江上游的川西高原，几乎与青藏高原的高原面同高。

“中国弧”的下端。成都平原处于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的最低洼处，“水往低处流”。四川在西北地形“高压槽”的下方，衔接第三级“地理阶梯”，属于长江上游支流的“高位”盆地。

从高到低。给自流灌溉提供天然有利的条件。

岷江，成都平原规模最大的主干河流，上游呈单一的峡谷河道，到都江堰，便脱离崇山峻岭的“束缚”，在宽广的成都平原，自由散流。流速由快到缓的突然变化、平原提供的广阔空间，使高处被剥蚀、搬运的泥沙，在山前大量堆积。而且，由于西北的大山在不断上升，东南的平原在不断下沉，既有源源不断的泥砂物质供给，平原也有足够的容量来接纳。

典型事例。安德镇一带，郫都西北约10公里，距今约数10万年以来，河流堆积的泥沙、卵石层最厚的地方，达到541米，成都平原的下陷中心。

成都市中心与郫都间，有镇名犀浦。

与湿地沼泽中犀牛出没的场景，密切相关。

拓荒垦殖。由古湖沼,再到冲积平原的演变,古蜀先民奠定农耕沃野的根基。

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都在河流平原上发展起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文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平原的印度文明、长江—黄河平原孕育的中华文明等。

成都平原,横断山系最东缘的龙门山的山前冲积平原。

由岷江、西河、斜江、南河、湔江、石亭江、绵远河等多条出山河流,在山前形成的冲积扇联合而成,北达绵竹汉旺,南至彭山江口,东以龙泉山为屏障。坡降较大的扇状倾斜平原。

落差300米。海拔大约从750米到450米。

从都江堰到成都主城区,直线距离约50公里。

落差竟有230米,海拔由750米降至520米,坡降在8‰~3‰。都江堰能够借地势,依水势,以自然调节为主导,对岷江稍加“整理”,便可能水旱从人,又几乎不露人工斧痕。

同样历史悠久。

除都江堰外,类似的水利工程,出现在龙门山,河流的出山口。

石亭江出山口的朱李火堰,始建于秦代,湔江出山口的湔江堰,始建于西汉,绵远河出山口的官宋碛堰,始建于明代,蒲江入岷江处的通济堰,始建于西汉。

古文“邑”字,会意字。

上部,为“口”,意指城墙所包围的城市;下部,一个跪坐的人,表示城中按秩序生活的居民。有人居住的城市,便是“邑”。原始部落走入文明形态的最初城池。

一个具有“仁、义、礼”的文明之人。

坐容规范,汉礼的基本内容,要求坐的时候膝盖并紧,臀部坐在脚跟上,脚背贴地,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双手可以握拳,冲前方;也可收拢抱在腹部。

文献中对“邑”字的解释:《说文》,“国也,从口,封域也”;《正韵》,“都邑也”;《释名》,“邑,人聚会之称也”;《史记》,“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西周之前,邑就是国。

《尚书》《史记》中,“夏邑”与“夏国”同义。

夏邑,专指夏朝国都;商邑,特指商朝国都。

鲧治水，一场「取土造陆」的创世过程。代表5000多年前的伟人，象征那个时代救民于水火、克服自然灾害、带领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英雄们的化身。

“邑”，文明之人生活之地，文化产生之处。“邑”，夏朝国都的称谓，“夏”，对夏后氏族的称谓，“夏邑”，夏朝国都的商朝时期称谓，以区别商朝国都的“商邑”。

两周时期，“邑”字普及使用，成为“都”下的城池名称。

《尚书正义》注“华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萌芽原始的宗教祭祀、部落联盟。

圣哲先贤的出现，使“人性和而才惠”的中华文明特质变得更为显著。

常见的朝代更迭，没有产生本质变化。

成都平原最早进入“中国”文明文化形态。

“江原文化”。

一个融地理与文化于一体的专有名词。

“原”“源”相通，表示开始，河流的源头，精神和思想的源头，地理精神的确认，超出地理发现的确认，文化大于知识，文明大于文化，精神大于文明。

鲧禹治水、建城，起于崇州，兴于岷江。

大禹父子开启的“江原文化”，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文化形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长期的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摸索出大自然的规律，开创、引领出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

为世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植入文化基因。

“江原”也将正宗的传承，寄拥给成都平原。

古蜀文化的根脉，天府文化的源头。

《五帝本纪》，《史记》中开篇之作。

在司马迁的笔下，舜有着与生俱来的光辉形象、优秀品质，对应的“四罪”“三凶”，罪责昭彰，烘托舜的光辉形象。篇中，司马迁处处留下曲笔。

鲧的出场。《史记》记载，一次御前会议上，帝尧问谁能治水，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四个辅政大臣，一致举荐鲧。围绕鲧的任用，帝尧和“四岳”，进行了

一次著名的对话。

“皆曰鲧可”。

“皆”字，道出鲧在众臣心目中的地位。

帝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意明显，不想用鲧，主要是鲧如果不能完成使命，会给家族带来灾难。

四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四位辅政大臣反应极大：“奇怪，还没有治水，就知道完不成使命？完不成治水的使命，到时不用他，罢职就可，怎么会给家族带来灾难呢？”

鲧深得人心，全票通过。

于是，帝尧任命鲧为治水的钦差大臣。

鲧，大禹的父亲，家族就是黄帝的家族。《史记》记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出身显赫，令人惊叹。

爷爷是黄帝，父亲是颛顼，儿子是大禹。用意令人费解：作为上届天子的继承人，民间号召力广泛，为什么就不能治水？难怪“四岳”在帝尧面前反应极大，对帝尧说：“异哉。”

大禹的父亲鲧，以“堵”的方法，治理荆涂地区水患，正确、合理，得到尧帝、舜帝与“四岳”长老支持。尽管没有解决淮河水患，但为大禹以“疏”的方法，治理淮河水患，提供了经验与反思；虽然“负命毁族”有辱使命，但坚持不懈，以一族之力，治理危害整个淮河流域水患的努力，值得永远怀念。

据《韩非子》记载，尧想要传天下于舜，鲧劝谏说：“这是不吉祥啊，哪有把天下传给匹夫的。”尧不听，将鲧“双规”在羽山之郊。共工又劝谏说：“哪有把天下传给匹夫的。”

尧不听，又举兵在幽州之都，杀了共工。

天下再也没有敢说不要传位给舜的人。

尧舜时代，并没有“集权”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程度，想要流放部落诸侯鲧，需靠武力镇压才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九年治水无功，不过是个“师出有名”的借口。

父爱如山。处死鲧的罪名都不成立，只为儿子暖场。

华夏族在融合过程中，以“治水”为名的政治斗争。

每一个霸权更替的背后，都有着功业、权力格局的流变。

祖先都是黄帝，鲧的父辈、祖辈、曾祖辈与儿子大禹的青壮年时期，均生活在崇州、汶川一带，成都平原是先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父子俩因治水进入中原，大禹因治水成功，位列至尊。

从鲧禹治水，到武王伐纣，从“少康中兴”，到“武丁中兴”，从中华文化史上第一部国训《五子之歌》，到周公制定和发布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从觥筹交错，到茫然四顾，从“内循环”的繁华，到“外循环”的离散，从飞扬，到落幕，映射出一个上古时代的“背影”。

鲧治水，一场“取土造陆”的创世过程。代表4 000多年前的伟人，象征那个时代救民于水火、克服自然灾害、带领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英雄们的化身。

世界“基建狂魔”的鼻祖。

人性的光辉背后，必然笼罩着命运的巨大阴影。

终究，不是一场对等的角力、抗争。

天平两端，一方是胜利者之笔，一方是失败者的叹息。

“隐性”的历史规律。



壹

貳

叁

肆

伍

治水神话, 人类共通的原始记忆。

大约在5 300年前, 地球上似乎发生一场剧变。

浩大激烈。史前洪水, 覆盖世界每个角落。

古文明消失、消亡。

举世周知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在劫难逃。

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说法, 49个远古特大洪水传说。

地区有希腊、荷兰、中国、印度、南亚各国与南美各国。

“天象奇观”。洪水泛滥时, 也出现有多个“太阳”。

古代文明的消失。世界现存史料中, 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 记载大洪水事件最完整的史话, 由幸免于难的人口述而成。记载中说: 洪水伴随着风暴, 几乎在一夜之间, 淹没了大陆上所有平地 and 丘陵低山, 只有居住在高山、逃到高山上的人, 才得以生存。从“吉尔伽美什”到“诺亚方舟”, 在世界诸多民族远古传说中, 大洪水是共有的中心元素。

在《圣经》里, 洪水毁灭人类, 只留下诺亚一家。

《创世纪》在描写“诺亚方舟”时, 形容洪水刚开始的情景: “二月十七日那天,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在中国, 没有诺亚方舟。

洪水过后, 伏羲、女娲为了不让人类灭亡, 兄妹成婚以繁衍人类。《淮南子》的记载很形象: “天不兼覆, 地不周载, 火熾炎而不灭, 水浩洋而不息, 猛兽食颛民, 鸷鸟攫老弱。”

灾难越来越严重, 持续近半年时间。

意义相反。“诺亚方舟”与“大禹治水”。

中国人遇到洪水，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堵”或“疏”，与洪水进行坚决抗争，并最终战胜洪水。西方人遇到洪水后，被动躲避，坐着诺亚方舟逃跑了事。

本质区别。华夏传承是人伦传承，西方文明是神灵文明。

中华文明的核心，“以人为本”的集体主义。

西方文化的核心，“以神为本”的个人主义。

证据显示，史前大洪水确实发生过，还不止一次。

中国古代先民的文明程度发生大倒退。

大溪文化，以长江中上游为主要区域；凌家滩文化，以淮河流域为主要区域，在大约5 300年前突然消亡。凌家滩人死伤殆尽，剩余的人迁徙到江苏、浙江一带，繁衍生息成为杭州良渚人。

仰韶文化，以河南、陕西、甘肃为主要区域，在大约5 000年前消亡。

长城以北的红山人，也消亡了。

剩下的一部分，倒退成游牧民。

一部分，再次繁衍，发展成屈家岭人。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都在高山附近，洪水来临之时，撤退到了山地。

洪水退后，大汶口先民受洪水的影响最小，成为当地文化最为先进的古文明。

庙底沟二期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兴起，逐步扩张到陕西、山西、河南和河北地区。

劫后余生，河南淮阳地区的伏羲氏兴起。

接替出现的是女娲氏王朝、神农氏王朝。

距今4 800年前，根据考古、古史和传说，一颗彗星在晋南、冀南与地球相撞，导致了北方气温下降、洪水泛滥，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的过渡期，突然消失。

河北保定白洋淀湖，就是这次撞击的“作品”。

4 500年到4 600年前，上古轩辕氏部落的首领，与炎帝同出少典氏的黄帝，在河北逐鹿崛起，先后战胜大汶口地区的神农氏、蚩尤氏，定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市）。龙山文化一统天下。

蚩尤，大溪文化。

中国古人遇到洪水，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堵」或「疏」，与洪水进行坚决抗争，并最终战胜洪水。西方古人遇到洪水后，被动躲避，坐着诺亚方舟逃跑了事。本质区别。华夏传承是人伦传承，西方文明是神灵文明。

夸父，大汶口文化。

炎帝，仰韶文化。

4 300年前，发生第二次大洪水，毁灭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国，颛顼和帝誉的旧地，也沦为泽国。帝尧一脉的陶唐氏古国借机兴起，在其活动中心晋南一带的山西陶寺，建立起城邦。

“古国时代”。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创造出灿烂文明，城市、宫城与宫殿、王墓、观象台，宣示王权的礼器、铜器、文字，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都出现在晋南大地。

文明形成。晋陕高原各种文化碰撞，格局重组、融合。

上古时代的密码，都隐藏在大洪水里。

“鲧禹治水”，世界特大洪水的“中国模式”。

大禹治水之前，还有两次大洪水，成就了两位王者。

《竹书纪年》中，有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发生6.0级以上地震，引发大洪水，黄帝部落被迫迁走。

遗址发现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

黄帝死，古中国发生大洪水的历史真相。

4 100年前，即公元前22与21世纪交替时。

气候突变，普遍转暖。

温度上升，加速冰川的融化。

欧洲最古老的居民，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谷的斯拉夫人，还在冰川的侵袭中“僵硬”，广袤的欧亚干燥地区，已不再是边缘，被如今称为中亚的“巴尔干火药桶”的费尔干纳盆地（分属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锡尔河、伊法拉河、索赫河等灌溉，地位犹如中东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国的黄河、长江，游牧文明逐渐

转向定居的农业生产。

连接文明。产物连接欧洲、东亚的“亮点”……

第三次洪水。北半球，许多河流的中下游聚居区域发生洪灾。

在中国，陶唐氏一脉已经传到帝尧后期。

黄河大变道，由东流（山东入海）转为北流（河北、天津入海）。

洪水泛滥，影响到中下游诸多部落。

追述尧时发生洪水的情景，《孟子》书中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中国”，指上古形成的中国，并非指统一后的中国。

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中原地区处于四方之中，故称“中国”。

治水，需要一个诸族听命的中央权力来指导。

鲧被举荐，开始治理洪水。

古代洪水，长期多雨的气候现象造成。

不是如今南方、北方某年某月发生洪水的概念。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古人只能靠上山躲避或建筑城堡来对抗。

“帝尧之都”的陶寺古城，就在这种“新常态”下诞生。

在《史记》中，司马迁没有详述鲧如何治水，只是说了一句“行视鲧之治水无状”；《山海经》里，还有一句话：“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鲧带领的先夏部落，定居在华北平原。因来自成都平原，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发挥自己的看家本领，为了治水而治水。全身心投入治水大业，以填埋、围堵之法，与洪水对抗。

黄河中上游。河水在崇山峻岭、黄土高坡之间穿梭。

河道，亿万年前已经形成定型，人力根本无法改变。

水源来自青藏高原的高山融水，在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奔流到海不复回”。上古时代无须也无力治理。华北平原基本为黄河泥沙沉积而成，泥沙完全为黄河所夹带、裹挟而来。

涂山，蚌埠第一山。

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的山峰。

淮河东岸，距怀远县榴城镇东南3.5公里，又称为东山，与荆山隔河对峙。最高峰凤凰顶，海拔338.7米，周围延绵23公里。对面是

荆山,初见于《水经注》,因在河西岸,也称西山。

以山为屏,以水为障。

地势险要,扼守可拒。

秦岭淮河一线的关键节点。

中国地形、气候、植被、降水等形态的重要分界线。

清嘉庆《怀远县志》明确记载,大禹在疏通荆、涂二山之间的淮河水道前,淮河流至荆山之东,因受荆、涂二山的阻挡,无可奈何,迂回至荆山西麓,先入涡河东流后,再流入东海。

南高北低。荆、涂二山一带,江淮丘陵向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由山地到丘陵,再到平原,呈阶梯式下降。河流湖泊众多,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水生、陆生植物,品种繁多。

理想环境。从采集文明到渔猎文明,发展到农耕文明形成。

季节性的洪水经常发生,也是最容易遭受洪水侵害的地区。

水位抬高。荆、涂二山的阻挡,“麓高水汇为患”。

淮河流域的洪水,主要为暴雨洪水。

集中在6至9月。6月,暴雨主要在淮南山区;7月,暴雨全流域出现的机遇大体相等,天气系统的切变线、低涡、低空急流和台风,造成淮河大洪水的主要气候原因。

淮河中游全长490公里,水位差仅16米。

荆涂地区。荆山、涂山横亘在淮河干流中间,“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形成经常性的洪水环绕,水漫淮南丘陵的“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的洪水情景。

淹没上游大片良田,威胁下游民生。

低洼平坦。荆山北麓,广阔的淮北平原。

治理水患,唯一选择,就是在涂山西麓、北麓筑坝,阻挡高位淮水在荆山西麓的北流。在淮河北岸修筑长堤高坝,堵塞淮河之水的北流。鲧以堵的方法,修筑水坝,阻挡淮河之水北侵。

合情合理。水利工程巨大,非十年所为。

淮河上游受降水大小的影响,堤坝的高度无法实现在任何情况下,控制上游来水量,一旦决堤,威胁更加巨大。堵的方法,导致荆山地区淮河治水失败,九年而不成。

劈山导淮。儿子大禹便发动人力,将涂山一分为二。

形成了今天的涂山、荆山。

“涂山千古临淮水，禹殿嵯峨天际留”。

史载，“汉高祖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

禹王宫坐落于涂山顶峰，有2 200余年的历史，系历代游人缅怀大禹功绩所在，登高望远的好去处。汉风唐韵，集华夏古建筑的精华，以大气磅礴的面貌，展现在涂山之巅。

农历三月二十八，涂山禹王庙会。

省级非物质文化文件遗产保护名录。

唐狄仁杰毁天下淫祀1 700余所，惟禹庙不敢“轻举妄动”。

登高远眺，只见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大禹劈山导淮之地，涡淮萦绕，涡河、茨淮新河、淮河三大水系交汇相容，并与荆山夹淮并峙为胜，形成了壮观的涂、荆峡谷景观。

在《史记》的开篇中，惜墨如金的司马迁，不止一次详细地描述鲧被任用的经过，强调鲧治水是四大部落首领强行推举，鲧等四罪或被流放、诛杀后，才出现了天下咸服的局面。

些许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投影。

鲧的地位特殊，是尧舜统治天下的最大潜在威胁。解除、灭杀作为潜在最大威胁的鲧，成为尧舜维护统治的必然。理由来了：鲧治水不成，百姓苦之。司马迁以“九岁，功用不成”和“试之而无功”等语一笔带过，于是，“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修千里之堤，无异于筑万里长城。

共工失败，因填堵得太低，阻不住洪水。鲧治水，继续采用填土、筑堤、围墙的方法，来使洪水归流。只是，没有想到在“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广大地域筑堤阻水，短期内难以办到。

鲧禹治水、建城的路线，与古蜀文明的发展同步。以大禹为首的古羌、古蜀部族联盟，在治水的伟大斗争中，吸纳治水所到之地的不同民族，会同中原华夏部落联盟，建立了夏王朝。

洪水没堵住，被围堵的水越积越多，冲溃堤坝。

决堤的洪水更加凶猛，霎那就能吞噬一切。

洪水横流泛滥。年年决堤年年修。辛辛苦苦地奔波了九年，修筑许多大大小小的堤防，堵住了东边，西边却溃堤，围住了南边，北边又在泛滥，始终没有把洪水治服。

舜见鲧治水九年，不但未成功，反使人民不能安居而继续遭受损失，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指责鲧“治水无状”“违背天帝命令，危害同族”，将鲧流放到羽山……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失败英雄。

一个被逐渐遗忘的伟大人物。

《天问》：“顺欲成功，帝何刑焉？”顺，假设问语，直也。直欲，即将。

鲧治水，首先是筑堤坝以堵洪水。

儿子大禹，主要疏河道以引洪水。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屈原认为，按照鲧的想法并非不能成功，但却遭到了杀害，何以如此？《离骚》有“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屈原同情鲧，愤怒发问。对鲧最公正的评价。

鲧不是唯一被治罪，同一时期治罪，都是被流放。还有三苗，三苗是因为作乱被流放，鲧只是治水不力。三苗都没有被杀，那鲧的罪，也不应被杀死。

老死于东方黄海海滨的羽山。

位于江苏东海县和山东临沭县交界。海拔269.5米，东海县的最高峰。

治水方略，一个系统工程。

疏堵结合。堵，父亲的治水方法；疏，儿子的做法。

相对于正史，《山海经》中，是英雄史诗赞歌：“洪水滔天息，鲧窃帝之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洪水滔天的危难关头，鲧与为人类窃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从天帝那里盗来息壤，解决了水患，将鲧描述为解除人间疾苦的天神，即便是治水不成，除去功劳，还有苦劳。没有堵的失败，何来疏的成功。

儿子的最后成功，站在父亲的肩上。

寄予了敢为人先、开创引领的殷切期盼。

褒贬不同，背后的深层原因，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的再次书写。

鲧禹治水、建城的路线，与古蜀文明的发展同步。以大禹为首的古羌、古蜀部族联盟，在治水的伟大斗争中，吸纳治水所到之地的不同民族，会同中原华夏部落联盟，建立了夏王朝。

直到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中，依旧保留着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

大禹精神深深融入羌族人的血液中。

在婚丧嫁娶传统中，有一项不可或缺的仪式：踏禹步。

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

患上腿疾。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成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的治水精神。

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莎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

世代崇祭，年年如是。



壹

貳

叁

肆

伍

出自大禹父子，同一手笔。

《山海经》中，记载鲧治水共有七处，涉及世系、窃息壤、堙洪水、布土定九州、被殛羽山几件事；治水经历，并不是不懂科学决策——尧命鲧去治水，鲧只知道堵和截，越治越糟……

治水中，大禹选中淮河中游荆山北麓。

建造了史前第一座漂亮的城——“龙坑”。

宏大规模。今安徽蚌埠怀远县城。距今已有4 190多年，一座面积巨大、规模空前的城，由宫城、外郭组成的“双城制”模式，奠定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构架。

外围，耸立着高大的夯土城墙。

内部，规划分明，已经布局着雄伟壮阔的宫殿区、等级森严的墓葬区，独立完善，有专门守备的大型仓储区，阶级和阶层区划严明的居住区，技艺娴熟的工匠并由官方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

还有，神圣庄严的祭坛、天文观象台。

功能区划，齐备合理。

俨然已成气势宏大的中土“王都”。

乡野敬仰的权力中心，四方向往的首善之地。

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湖北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这三种文化在淮河中游地区形成并存互动、相互融合的局面。

宽阔的内陆三角洲。岷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

两处地理条件惊人相似。

东面，都受到山地阻拦，南北两面，都有出口。黄河，南流入黄海，北流入渤海；岷江，既可南流入长江，又可北流入沱江，再入长江；南北改道，都具备广阔的三角洲平原上的特征。

4 500年前左右，黄河由南流入黄海，改为北流入渤海，当年沿太行山东麓北流的黄河，与今天沿成都平原西南侧南流的岷江主流，十分相似；都在堤防的防护下，沿三角洲边缘流出，使三角洲的绝大部分，免于洪水之害；在三角洲的中轴部，由于受山地阻挡，泥沙易于拥积，河水只能南北分流，使三角洲的中央部分，大大高于两侧，减少洪水威胁。

两洲能发现大量古都、文化遗址的缘故。

治水方式也极为相似。

大禹父子在治理岷江时，率先采取“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方法，既便于洪水分流，又有利于舟楫、灌溉；大禹在治理黄河时，也采取了分流黄河水，入济水以通淮泗的方法。

水利工程也惊人相似。

沿岷江主流的古金马河大堤，类似黄河三角洲水利工程的鲇堤，宝瓶口分流的内江，类似于从黄河石门开凿以通淮泗的济水，金马大堤所用防冲卵石竹笼，相似于大禹父子所用息壤，都不是为分洪而设，而是为了航运、灌溉。

大禹父子先治岷江，后治黄河的缘故。

《禹贡》把漳河水，列为大禹治九水之列。

浊漳河最壮观的一处风景。

山西长治市平顺县奥冶村。

一处赤壁丹崖的峡谷地带。《水经注》描述：“清崖如点黛，赤壁若朝霞，树翳文禽，潭泓绿水，景物奇秀，为世所称。”4 000多年历史的山村。

太行小三峡，又称大禹峡。漳河水，自西向东流，自平顺县北耽车乡赤壁村的赤壁悬崖，飞流直下，向东而去。河水奔腾咆哮之势，被幽深峡谷吸纳，变得温柔、宽容，河水伸展处，有一条峡谷，延伸向南，两岸石壁高耸，峡谷顶端有依稀可辨的人工凿痕。长约千米的峡谷沟，有错凿沟遗迹，大禹的父亲鲇治水留下的遗迹。

烂尾工程。历史上最悠久、工程体量最大。

远古时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器测量，山南边地势高。在奥冶村

「崇伯鯀」治理洪水九年，救万民于水火，劳苦功高。失败，并非无能，而是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真实写照。没有鯀「堵」的失败教训，也就没有大禹「疏」的成功。更没有放弃志愿，留下一个伟大的继承人：大禹。

西现在的大禹峡处，鯀带领民众开凿沟渠，想导水向山南，因山南地势比北边高，开渠失败，留下了烂尾工程错鑿沟。

面对父亲留下的巨大烂尾工程，大禹开凿水渠，引漳河水东流，平息水患。

治水工程结束，烂尾工程也成为千古遗存，并且变成一个景色秀美的景区。

治水遗址错凿遗渠、大禹行宫，至今保存完好。

禹王庙、禹王陵、禹王井、禹畋，依稀可见。

使用“堵”，即采用筑堤拦洪的方法治水。懂得一定土木技术，开创筑城技术，在面对大洪水时，自然就想到这种办法治水。有功于华夏，至少是阶段性的功臣，可惜鲜为人知。

“鯀作城郭”，只是保护居住地，却不能保护农田。

才有“鯀九年无功”，大禹治水的故事。

《禹贡》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配套措施。

确定行政区划与治水的关系模型。九州重新划分后，治水先后、治水资源在各州的配置，是怎样的科学原理？何以要给治水后的各州，指定核心产业？

或疏，或堵，或建立大泽、小湖、湿地……

或建连湖、水网，城市小桥流水，深挖井……

不同措施的原理：水量、水速、地势、水产、交通……

各种要素配置，建立分析与决策模型……

确定治水岗位的责权利，用人标准……

团结众人。寻求伯益、后稷两位贤臣的帮助，联合共工氏与其他众多联盟部落……

在《创世纪》中，上帝耶和华看见地上充满罪恶、暴行、邪恶的行为，决定用洪水来消灭恶人。发现诺亚是个完人，指示建造方舟，得以渡过灾难。与天帝的行为颇为相似。

截然不同。面对天怒，与西方的表现方式。

积极应对，中国的鲧禹父子的选择，明知天有不测，仍然选择抗争到底，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在《圣经》中，诺亚选择听从“神”的旨意，带领地面上的动植物，逃离这场灾难。

自然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方式不同，没有孰优孰劣，都是顺应自然、内心。

两种文化的差异，延续至今。

异曲同工。鲧偷“息壤”，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的情节相似。后者从天庭盗取火种，归还于人类，惹怒众神之王宙斯，被囚禁于高加索山的悬崖之上，每日承受被鹰啄食的痛苦。在西方文学艺术里，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智慧，但鲧仅是个治水不利的边缘人物，背负4 000年罪名的大禹之父。

失败的英雄。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崇伯鲧”治理洪水九年，救万民于水火，劳苦功高。

失败，并非无能，而是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下的真实写照。

没有鲧“堵”的失败教训，也就没有大禹“疏”的成功。

更没有放弃志愿，留下一个伟大的继承人：大禹。

帝舜便征集大家的意见，普天之下，有谁还能担此大任。

众人回答，鲧的儿子大禹，任职司空，专门执掌水土工程等方面，颇有治水天赋。

大禹并不因舜处罚父亲嫉恨在心，暗下决心：“父亲因为没有治好水，而给人民带来苦难，一定努力，再努力。”从汶川出发，与自己的恩爱妻子洒泪告别，踏上征程。

沿途，看到无数的人民都在洪水中挣扎，一次次潸然泪下。

大禹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拿着规矩。

走到哪里，就量到哪里。

一提到治水，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都会献上最珍贵的东西。

决心、信心倍增。

认真地思考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总结父亲的经验、教训，放弃了以“堵”为主的治水理念，改用“疏”的方式治水，使得黄河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

每发现一个地方需要治理，就到各个部落去发动民众来施工；每当水利工程开始时，都和民众在一起劳动，吃在工地，睡在工地，

挖山掘石，披星戴月地干。

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生活简朴，住在很矮的茅草小屋里，吃得比一般百姓还要差。在水利工程上，又最肯花钱，每当治理一处水患而缺少钱，都亲自去争取。

成功地疏导了长江水系。

治理长江，从岷江开始。

四川盆地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水系也大多都西北东南走向，成都平原东南边缘有龙泉山脉的门槛，容易造成排水困难。每当雨季，岷江上游山洪暴发，洪水便会倾泻于成都平原，使得成都平原遭受水灾。

“汶川之会”。召集岷山上游的古羌部落联盟，研究解决治理岷江的问题。

决定，从源头岷江开始着手，采用疏导的方法治理。

他，完整地勘探了以岷江为主的河道，在原来的河道基础上，疏导、连通出一条新的半人工河道，从而分引岷江洪水。在如今的都江堰南部，科学计测，开出一个豁口，形成了沱江。

沱江向东南流淌，经过成都平原，最后又汇入长江。

水患得到治理，从川西北，到川西南，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农业发展，水利兴修，道路开辟，推动社会的发展。集合先民的力量、治理水患的过程，为古蜀国的建立，奠定基础。

天下各地区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

加速了各部落间的联盟、融合。

岷江狂怒、黄河暴躁，为了治理，大家必须团结一致，集中力量，统一行动。

也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统一的重要性、必然性。

创造了独有的治水方式、体系和理念，形成了“上善若水”，尊重自然生态法则的精神，开创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治水经验，贯穿古今。

大禹死后，后人尊为水神，各地兴建禹王宫、禹王庙。

祭祀，怀念治水功绩，祈求保佑风调雨顺，河流安定。

大禹文化的内涵、精神蕴藉，在于能以文象的力量、文脉的形式，潜移默化中，给受众以启迪、教益，获得人文精神的钙质，点燃止于至善的文化火焰，不断地走向睿智、崇高。

“汶川之会”，由氏族民主过渡到个人专制，阶层分化和斗争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建设大型公共工程与大自然斗争的客观需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崇州述说着父亲鲧时期质朴的山水人间。

汶川记录着儿子禹时期疏导的人间山水。

“江原”也将正宗的传承，寄拥给4 300多年文明印记的崇阳城。

不仅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还带来了民族融合、生产技术、文字、语言等文明体系。

民族英雄。大禹治水，古人类第一次真正降伏洪魔。

一如大禹一样，黄帝的生卒年月，考证说法不一。根据《竹书纪年》推定，黄帝崩于公元前2296年，恰恰是4 300年前大洪水发生之时。

《禹贡》记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安定九州，制定五服。

奠定了华夏泱泱大国的根基。

按照“五服”区域统计，共“2 500里”的范围计算，夏朝影响范围高达600多万平方公里，“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核心区域为100万平方公里。真正意义上的“大夏”。

鲧死禹兴，一次治水，建立一个朝代。

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史前版”。

首次展现，世界最强的规划能力、领导能力、执行能力和改革能力。

华夏民族的根基：夏朝。

三星堆出土的高3米的大“神树”，树分3层，每层3枝，共9枝；树枝柔和垂下，每枝中部又伸出果枝，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向上的9个花蕾上，各站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全树共9只神鸟，顶上还有一只大鸟，有10只“鸟头”，在《尚书》中，“鸟头”称为“星鸟”，即后人喻说“朱雀”，既代表星宿，也代表太阳。

“鸟头”，还代表成都平原不同民族部落、方国的人们，共同崇拜的“鳧”。

“鳧”，既可是鱼鹰，也可是大雁、鸭。

大禹文化的内涵、精神蕴藉，在于能以文象的力量、文脉的形式，潜移默化中，给受众以启迪、教益，获得人文精神的钙质，点燃止于至善的文化火焰，不断地走向睿智、崇高。

“禹”的古音，“鸞”“鸭”之意，与“五”里“中”之数同音义。三星堆中出土的金权杖中，就有“鸞”“鱼”的图案。“鸞、鸞”同为“鸭”，鸭、雅同音，雅、夏同义。

三星堆城建在古称“洛水”，又称“鸭子河”的河流旁边。

如今，依然是野鸭、家鸭成群之地。古人说大雅、小雅，大夏、小夏的意思，义都来自“鸞”，与“古成都人”崇尚“鸞”（鱼鹰、鸭等水候鸟），也是不谋而合。

一脉相承。“鸞”的全面升级，美学典范，神秘、精致的“太阳神鸟”金饰，“古成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

血亲文缘，关系密切。

鯀的父辈、祖辈与儿子大禹，青壮年时期均生活在崇州、汶川一带，成都平原先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父子俩因治水进入中原，大禹因治水成功，位列至尊。

追随大禹“北漂”蜀族部落联盟的柏灌，既辅佐大禹治理天下洪水、平水土，又是舜帝的虞官，“佐舜调驯鸟兽”，史籍记载中的称呼有多种。《尚书》中称“益”，《史记》中称“大费、柏翳、伯翳”，《汉书》中称“化益、伯益”等。

“舜赐姓嬴氏”成为秦国嬴姓的来源。

嬴姓，姬姓（周朝的国姓）最早分化出来的姓氏。

“第一代北漂”。两大联盟定居，“皆在河洛之间”。

荣辱与共。柏灌蜀族部落联盟，后裔被史籍称“斟灌氏”“斟灌族”，与夏王室毗邻而居。

由来已久。“二斟”与夏王朝亲如兄弟。

古蜀文化注入中原文化血管。

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取代夏的商、周，黄帝另一子玄嚣的后代，与夏本有血缘关系，与夏文化同源，继承、发展和丰富了夏文化的内涵；仅因自然环境的不同、土著居民的习俗差异，有所区别。

京畿之地。夏以后的帝王，多在中原地区建都。

长时期成为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平原与中原交流相对困难，既制约古蜀文化的“内循环”的发展速度，也助长古蜀文化“外循环”的独立性开放、融合。

夏代以后，中原文化“外循环力”，比古蜀文化更强。

“侧身西望长咨嗟”。

情理之中。许多人便误认为华夏文化唯一发源地是中原地区。

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就是大禹。

在《尚书》和《诗经》中，大禹就是一个治水者。

距今2900年的西周夔公盨的铭文，开篇即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记述了“大禹治水”“为政以德”等内容。

《史记》的真正开篇，《五帝本纪》后的《夏本纪》，《夏本纪》就是“大禹本纪”。

代表夏，是“禹”；代表商，是“汤”。



壹

貳

叁

肆

伍

大禹父子开启的“江原文化”。

古蜀文化的根源。

大禹治水将古蜀文化，带到黄河、长江流域等地，逐步形成参与度、认同度更高的华夏文化。商灭夏后，部分华夏部族移居古蜀，又带入黄河文化，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的融合。

缺一不可。长江、黄河不可分离，遗传基因DNA的“双股链”。中华文明的密码和钥匙，全都蕴含在长江和黄河“双联体”之中，全在“双股链”的相互作用、循环之中。

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循环”。

治水文化。古蜀文化的核心内涵，华夏大地的主体文化。

父子俩治水方略：一为堵，一为疏。

治水的成效：一个失败，一个成功。

两种治水思路，影响中华文明甚远。

鲧代表改造自然，禹代表顺应自然。禹治水成功，让中华文明走上顺应自然的道路，诞生了道家思想。鲧如果治水成功，或让中华文明如西方一样走上改造自然的道路？值得深思。

建城男神。鲧，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

古蜀州的古城文明，大禹父子治水、建城的结果。

“江原文化”，大禹精神内涵。

形成中国独特的水文化思想理念，萌芽江汉朝宗于海的“中华大一统”共识。

岷江汛期水势大、时间长，对农耕破坏巨大。

各部族都竭尽全力，在浩瀚无边的大自然力量面前，都终将沦为泡影。

经过几千年与水的斗争，对水和太阳的感受，比中华其他地区来得更深刻、刻骨，感恩、崇拜、敬畏、恐惧、喜悲、爱恨，情感复杂，再悲剧的人生，都要以喜剧的心态来过。

大禹精神的核心：大仁、大智、大勇、大爱。

以江源之地的水文化为动力，形成高阳氏家族公社、高辛氏农村公社两个部族结为联盟的农牧经济。夏后氏、蜀山氏世为婚姻，父系家长制与母系母权制农村公社长期联盟关系。

携手北上。大禹的古羌部落联盟，柏灌的蜀族部落联盟。

东迁中原，成为经济比其他族群，更发达的高等农业部族。

《史记》记载：“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

论功行赏时，大禹谦逊地说，治水能够成功，主要有伯益（柏灌）、后稷等助手协助。伯益根据地势低洼的特点，引导先民们种植稻谷，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还发明了凿井技术，改变只能沿着河流定居的局面，使更多的土地得以开发、种植；把治水中走过的地理山川，见过的奇闻异事记录下来，为大禹编著《山海经》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凿井技术，意义重大深远。在洪水泛滥的大地上，开凿水井就有了活命的水，让人远离洪水居住，华夏民族的生活，向前迈进一大步。有些史籍，将伯益造井与仓颉造字相提并论。

鲧禹治水，开创中国的农耕文化。

“夏历”，使人民过着定居的生活，人民通过观天象、依农时，从事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夏言、夏礼，使华夏民族有了共同的语言、大体相同的思想行为规范，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

道教，初始应肇自夏禹时代。

文化渊源，追溯到禹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巫教。

发源于大禹古羌部族联盟的祖居地“西蜀”，随着部族的西兴东渐，从西部传到中原，再传到全国各地。与东方夷人、东南越人的原始宗教融合，形成为滨海地区的方仙道。

在祖居地成都平原，演变为巫鬼道(早期的五斗米道)。

禹步、禹符、枚卜、拜斗等道教习俗，都源于鲧禹，发端于

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线条。毗邻夏商周的古蜀，无疑最绵长、最奇特、最厚重。一个与夏商周秦并存，甚至早于夏朝，并在夏商周秦的西南延续了2 000年以上，同时也被人们遗忘了2 000年以上的文明。

“西蜀”……

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线条。

毗邻夏商周秦的古蜀，无疑最绵长、最奇特、最厚重。

一个与夏商周秦并存，甚至早于夏朝，并在夏商周秦的西南延续了2 000年以上，同时也被人们遗忘了2 000年以上的文明。

四川盆地，中国四大盆地之一。

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超过英国。

中国山水的缩影。

底部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按地理差异，自西向东，又可分为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三部分。盆地东部，长江三峡；南部，云贵高原；西部，青藏高原；北部，大巴山。

按地理、人文，一分为二：川东、川西。

龙泉山，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的界山。

华蓥山，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的界山。

成都平原西侧为地表水系口，发育出岷江、沱江两大水系。岷江、沱江进入平原后，呈扇状分流，在平原东侧龙泉山麓收束，于金堂峡、苏码头、新津三处，再流出平原。

从西北的邛崃山、岷山，到北面的龙门山、米仓山，至东北的大巴山脉、巫山，向南武陵山，西部为夹金山、大小相岭、大凉山，东南为大娄山、云贵高原，海拔均为1 000米至3 000米。

盆地底部，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

海拔200米至750米的丘陵、平原。

植物超过万种，许多古老物种，为中国之最。

也是中国动物种类最多、最齐全的地方。国宝大熊猫，繁衍于此。

水系，由长江干流与5条南北向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组成。

岷江、沱江流域，蜀人的天下。

嘉陵江、渠江流域，巴人的势力范围。

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形成通向盆地四周边缘的密集陆路交通网络。

在龙门山、龙泉山之间，岷江、沱江合力，形成肥沃的冲积扇平原。

成都平原上，农田与村庄、树林交错分布，形成典型的林盘式聚落。

空中鸟瞰，阡陌纵横、水网密布，林盘状的村舍一如点点繁星，织就锦绣般的画卷。

生活在成都平原，犹如活在“天府田园”，享受着富庶。

相对隔绝的地形，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天然保护，减少战火祸患。

走出平原不易，外来侵略，想要攻入亦艰，反让人们的安全有了保障。

巴地，以重庆为中心，坐落于四川盆地的东南边缘，处于盆地向山地的过渡地带。由云雾山、缙云山、中梁山、龙王洞山帚状平行岭，与铜锣山、南温泉山、明月山等组成，在川东平行岭谷中，山岭海拔多数在1 000米以下，长度上几十到上百公里不等，谷地宽度在10至30公里之间，属于典型的“城在山中，山在城里”的布局。

南面是云贵高原，西面是青藏高原，根本不可能攻破。

仅有的两条通路，在北边、东边。

北边，掐住剑门关，守住米仓道，便可保成都平原的安全。

东边，在重庆。陆路进攻巴蜀，几乎不可能，只能走长江水路。位居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易，逆流而上难，有三峡阻隔，万无一失。崇山峻岭太多，外面不易进去，里面也不易出来。

中国第二级、三级“地理阶梯”之间。跳出局域范围从全局来看，显得极其重要。东面，与荆楚相连，占尽长江天险，足以与北方抗衡；与北面的关中、汉中相连，可顺流而下，直取荆楚、中原。

易守难攻。封闭但不闭塞的地形结构，自古就是躲避战火殃及的“大后方”。

跃然版图。也是大写意的“T”字形经济带。

“汤继强线”，南北向，成都居中，挑起西安、昆明成“|”；东西向，成都居首，串联起重庆、贵阳和长沙成“—”，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直接覆盖中西部数省、一个直辖市经济区。

中国经济最大的回旋空间。

区域经济发展版图上的“新大陆”。

震古烁今。中国安全第一极、中国经济第四极。

太平岁月，四川是安乐窝。

国家动荡，成都是避难所。

北方中原移民的“洼地”。

当有战争发生、处于乱世，中原就不断有人举家举族移民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的价值，在于天府之国。天府者，上天眷顾之地。资源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但上天也不是一直眷顾，如清初之十室九空。如果去“天府”二字，其地在现代战争模型下与诸地无异。

被纳入秦国的版图，那是诸侯秦国。

即使秦朝的秦国，也不是整个中华。

从夏商周前后看，古蜀文明一开始就和中原文明、中华文明一体。

历史证明，是否拥有四川，影响巨大。

秦汉据四川，一统天下；三国魏无四川，无法一统；隋失天下，李唐迅速发兵长安，拿下四川，奠定一统天下的基础。整个唐朝都重视四川，唐最发达的地区除了首都，就是四川、江南。

唐明皇丢首都长安，未丢四川。

南避入蜀。依靠财富和天险，李唐得以延续，收复失地。

到了南宋，初有四川，得以延续，遇到对手蒙古，尽管川北、成都也尽失，川人并未放弃抗争。蒙古最惨痛的两大损失，成吉思汗在西夏战死、强大无匹的蒙古大汗阵亡于重庆。

蒙古帝国仅用17年，便占中亚、越高加索、跨克里米亚半岛，横扫亚欧大陆，21年后灭西夏；28年后灭金朝，未尝一败。偏偏对积弱的南宋，不仅久攻不下，还使得大汗丧命。

面对汹汹铁蹄，宁死不屈。

以一省之力抗蒙52年，城城皆玉碎，处处见血战。

四川全部沦陷，襄阳失去防守的意义，南宋灭亡。

北明灭亡，南明即使失去江南、两湖，只要四川不在清军手里，明朝依然没灭亡。

即使依靠一时人杰李定国，反杀一波，两撼名王，杀得清军

胆寒。

最终，也免不了亡国的后果。

中国首富。即便不算先秦，两汉、隋唐、两宋时期，四川千年稳居中国最富裕地区，全国GDP贡献1/4，军粮贡献1/3，比例相当于如今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生产总值总和的两倍。清末，仍是第四富裕省份。

直到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才沦落为排名中游的中等省份。

全面抗战爆发后，千千万万巴蜀人，一如4 200多年前的“誓师治水”的“川军”一样，赤脚出川、走遍13省，参加了28场大型会战，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中华绝不会亡。

喊一声“雄起”，真刀真枪去拼命。

出钱、出粮、出人、卖命，反映了强调奉献的“大禹精神”。

以一省之力，承担整个抗战所需三分之一的钱粮……

“川军能战”。每5个牺牲的抗战军人中，就有1个川军将士。

面临国破家难，一次次抛头颅，回答铮铮。

易守难攻。地理优势，“天时地利人和”，适合发展农耕的优越条件，与伊朗高原封闭而不闭塞的地理结构区别巨大。而且，还拥有随处可以利用的井盐，作为支撑生命的基本物质。

在古代，盐是生活必需品，拥有盐资源意味着财富资源巨大。

成都平原盐矿众多。

古地中海（特提斯洋）的一部分，气候干旱，出现规模较大的咸化海域，称为上扬子蒸发海，膏盐沉积增多，规模达50万平方公里。

到了三叠纪末，海侵历史结束，平原东部转为内陆湖盆，逐渐干涸，出现含盐沉积，积聚于侏罗纪岩层中，即今雅安、峨眉山一带。

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岭护佑，又有江南水乡般烟柳葱茏滋养，充足的先天优势，加上刚健与柔媚、激昂与含蓄环境下熏陶出来的川人，不惧时艰，开放自省，便有“天府之国”美称。

声名远播。从鳖灵决玉垒山，到李冰修都江堰。

还是中国著名红层盆地。地表岩石，主要为紫红色砂岩、页岩，这两种岩石极易风化形成紫色土。紫色土，含有丰富的钙、磷、钾等营养元素，是中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之一。

一片丘陵性平原，一块由四周山脉合围而成。

与可攻可守的伊朗高原，异曲同工。

不同的是。伊朗高原，山脉围成的高原型盆地，海拔较高，而且也没有成都平原那样优越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一个沃野千里，一个赤地千里。

在成都平原内，平均距离不超过2.5公里，就会有一条河流。

渠道密集，流淌的河道，多从自然河道改善而来。蜘蛛网般大小的河流分布着，在干渠的基础上，分布出很多支、斗、农、毛渠，将地图缩小来看，就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扇状网。

大禹父子治水，将古蜀文化播向华夏大地。

古蜀文化，夏文化的重要源头。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上古蜀人，两套系统藏涵真实历史。

一套在《山海经》里。

三皇五帝时期，黄帝的妻子、西陵氏之女嫫祖，嫫祖“降居江水”的长子玄器青阳，嫫祖“降居若水”的次子昌意与妻蜀山氏女昌仆，昌意、昌仆夫妻的儿子颛顼高阳，大禹父子俩，为黄帝鼓瑟、掌医药的神女素女，死后葬在“都广”的后稷。

大禹一族，黄帝封于蜀的一支血脉，世为侯伯。

大禹的父亲鲧，相当于蜀国（侯国）的国王。

与大禹并肩作战的是，柏灌率领的蜀族部落联盟。

都是远古居于成都平原的“老成都人”。

一套在《蜀王本纪》中。

扬雄记载的古蜀五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几乎都与水有关，蜀王的名号，似乎也若隐若现地证明着，治水而居，傍水兴城，上善若水，安逸自在。

两套系统，互相交织。

本质上，就是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到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后，成都平原上有一个以水稻、蚕桑种植为主，并以林盘、灌区为特色，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

夏文化由成都平原发展到中原地区，古蜀人变为农业部族。

大禹也因治水成功而变成了农业神，执耒而耕的形象形成。

手里拿的是“耒耜”，不是“叉子”。

据《易经》记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盖取诸益。”耒耜，木头棒子加上一个比较粗的横梁，作用就是用来翻土，与现在的锄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木头制品容易坏，也不易翻土，改用石头制作耒耜。

后来渐渐有了青铜与铁制品。

先秦以前，耒耜一直是农作的重要工具。

大禹身先士卒，总把耒耜握在手中，刻苦工作，治水的同时，形象也就深入人心。

夏朝盛于河洛，传播“五服”。

源头在岷江、成都平原，成功却在黄河，东传江浙，甚至于海外日本。

江河文化“双联体”的“典型形象”。

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相互融合，优化重组。

四川位于这两支主体文化之间，又是长江和黄河的文化源头所在之地。

夏禹文化诞生于岷山西羌、成都平原的广阔地域，正是黄河与长江两支文化源头的结穴处。

自带大禹文化的“骨血”。

孩提“华夏”从崇州发源。

儿童“中国”从汶川起步。

“华夏”源自岷江上游的川西高原。

“华夏”始于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

“华阳国”应是最早的“华夏国”。只是大禹不断扩展疆土，才有“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中国”就慢慢转移到现在中国的“中原”一带去了。

华夏文明奠基性发祥地之一。

哺育出博大奇绝的古蜀文化。

夏朝盛于河洛，传播「五服」。源头在岷江、成都平原，成功却在黄河，东传江浙，甚至于海外日本。江河文化「双联体」的「典型形象」。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相互融合，优化重组。

森林密布，河渠纵横，动物繁多。

鸾鸟、凤鸟自由在地歌唱、舞蹈。

层峦叠嶂的山林，阡陌纵横的原野，清流急湍的水系。枫叶似火的鸡冠山，托起塔尖明月的凤栖山，文井江勾勒出灵动的眼眸，雪山、草甸、瀑布、河川、平原，层次分明、山水相依。

以青山为底，草树云山、百渠入院，千秋瑞雪的旷世盛景。

以江河为脉，三江润城、清泓环绕，蓝绿交融的旷感可及。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源处。

异曲同工。夏禹的「黄河向东」，鱼凫的「湔江南下」。遥相呼应。中原河洛的「禅让」，成都平原的「民主表决」。

古蜀之根，从彭州延伸；古蜀之城，在崇州孕育。蜀中先导，从郫都起步；天府水乡，在温江发迹。





美女配英雄的「成都精彩」



壹

貳

參

肆

伍

第二代蜀王。

留守的柏灌部落，深得蚕丛王的信任、倚重。

顺理成章。“汶川之会”后，大禹带领“北漂大军”北上，在黄河的河洛地区建立夏朝时，“南迁部队”中的大支部落，进入龙门山腹地的湔江“高地河谷”，汇入“留守”的柏灌部落。

柏灌时期，正处在全球性的灾变气候阶段。

小冰河时代。

温度上升，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全球性海洋环流和大气环流发生巨大改变，青藏高原上发生冰川前进的现象，岷江河谷附近的贡嘎山、四姑娘山的冰川，也“蠢蠢欲动”。天气变冷、变干燥，对成都平原的农业影响不可抗拒，岷江泛滥成灾，平原又再成沼泽之地。“古成都人”饱受水患，无法再种庄稼，又不愿远离岷山，不得不向“高处”迁徙。

柏灌氏又叫柏濩氏、白鹤氏。

柏濩、白鹤，又名灌鸟。

从高山向平原地区迁徙的蚕丛氏中的一支，活动中心在湔江上游的高山台地，今彭州龙门山镇的白水河上游、九峰山一带。现在，还有白鹤林、白鹤寺、白濩庵、白鹤桥等地名。

在白水河、白鹿河的高山上，经常栖息着许多吉祥的灵鸟。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描述“其状如鸡，其音若呵，名曰灌灌”。

古蜀“吉祥鸟”，部族名称始以“柏濩”为名，首领泛称

“柏濩”。

“白水河”，当地村民中的读音，柏濩、白濩、白鹤。以河水流动之“濩……濩……”声，为河命名，与柏濩氏在此居住过有关，反映“古成都人”与生养之地——龙门山一带的深厚感情。

岷江与湔江。天府文化的两道文化之门。

龙门山西南段。唐人卢求在《成都记》中，说到“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鳧而后徙”，而“鱼鳧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湔山，今岷山，湔江边的岷山，今彭州的龙门山。

从都江堰的宝瓶口，到北川曲山镇。

彭州，地处古蜀文明的原始核心地带，北部龙门山脉太子城海拔4 814米，南部平原最低点乌鸦埝海拔489米。整个地势，宛如一把巨型浮雕靠背椅。高出成都主城区4 300米以上。

北端的龙门山镇，与汶川接壤。

“土生土长”。分布着一连串“特殊”的山峰。

罕见的世界地质奇观：冰川漂砾群。

规模宏大的构造带，由西北向东南推覆、滑覆。

曾经和南极一样，有一整块巨大的冰盖。

从别处“飞”来。缘于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自然奇观，“孙子”背“爷爷”。飞来的山峰，年龄高达2亿岁，身下的地层才1亿年左右。“飞来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地质学家发现，是从25公里外的汶川、茂县“飞”来。

“物理现象”。平均高度在海拔4 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被厚约2 000多米的冰雪覆盖，冰雪后来断裂成面积达数百上千平方公里的一排冰山，向海拔1 000多米的汶川、茂县，排山倒海地“滑”过来。

冰期末期。气候转暖，大冰盖开始溶解，东缘的汶川、茂县一带，出现了大面积的整体由高向低，即由高原向盆地、由西向东的冰雪大滑坡，面积足有数百、上千平方公里。

冰雪层包裹之中，石灰岩小山随着冰川滑动。

冰川溶化。数万年后，雪水流走，无力再带动被夹带的石灰岩小山，成为“飞来峰”。

“蜀国有仙山，仙山有飞来”的“前世今生”。

“工程”浩大，上苍赐予成都独特的“厚礼”。

文明迁徙的具体路径、图系。一路，沿石亭江河谷，经红白、什邡进入平原；沿绵远河河谷，经清平、绵竹、广汉进入平原腹地。一路，过龙门山镇，进入成渝江河谷，到达「海窝子」，进入成都平原的北部。

南下的古羌人顺着地势，绕过“飞来峰”，向南前进。

众多山溪的分割，形成若干天然通道。

龙门山腹地，面对成都大平原，都江堰的白沙河谷（龙池镇）、彭州的蒲阳河支流土溪河谷（原磁峰镇）和成渝江河谷，妙趣天成，低洼谷地分布，有溪流泥沙堆积，四面环山避风。

现在，仍不乏池、潭、河、菜园等命名描述。

河谷间，有大量的沼泽湖泊，许多宜于种植、放牧的小台地。

非常适合居住，有开展渔猎耕作的条件。

从茂县、汶川，到现今都江堰城区一带，地理条件远不如茂县盆地，再加上川西平原边缘的彭、濮、梁等土著势力的强大，古羌人只有通过险峻的“松茂古道”，顺着岷江河谷“南下”，穿过“负山临江，两岸壁立，中通一线，只有鸿雁可以飞越”的汶川雁门关。河谷东岸有条小溪，沿岸曲折上升到山脊，海拔4 000米，行程不到50公里，却有3 000米的落差，令人生畏。

沿山脊下行，翻过高达4 000多米的玉垒山（今彭州九峰山）。

不到10公里，来到成渝江上游，与先到的向“高处”迁徙的“古成都人”汇合。

经过几代生息繁衍，那里人丁兴旺，台地便显得狭小。

再顺着地势，沿着两条路线，再向南推进。

文明迁徙的具体路径、图系。

一路，沿石亭江河谷，经红白、什邡进入平原；沿绵远河河谷，经清平、绵竹、广汉进入平原腹地。一路，过龙门山镇，进入成渝江河谷，到达“海窝子”，进入成都平原的北部。

也有两条孔道，到达成都平原。

一路，循着成渝江河谷北端，罗元坝→老熊坪→

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到达今日的都江堰，进入成都平原。一路，顺湔江河谷而下，出“天彭阙”，进入成都平原。

在龙门山中，行进约300年。

停停走走，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左右。

湔江，成都平原西北山区的一条重要河流。

“湔”，古通“尖”。

湔江河、岷江河、土溪河（杜宇河）三水绕流前山，形成“湔”。

“湔”也通“煎”，意即河床陡峭，水流很急。

“湔”，左三点水，右一个前，意为“水流的头部”“水流的前锋”。发源于彭州市龙门山脉中的太子城峰西南，从三口锅出发，在巍峨的群山之间，九曲回环，穿山而出，远望如一条蓝色的纱巾，全长139公里，流域面积2 057.3平方公里。

沱江三大源头之一。

古称湔水、蒙水、彭水等，上游称金河。

在湔江中游，“古成都人”再次停留。

湔江河谷。今龙门山镇、小鱼洞镇（并入龙门山镇）、磁峰镇（并入桂花镇）、白鹿镇（通济镇思文场社区划归管辖）、通济镇（合并了新兴镇）地域，一个大“回”字，海拔1 000米至1 500米，在高山与湖泊之间，有大量的台地、河谷丘陵。河滨区，有不少河坝地。

十分罕见。在成都甚至全国的“高地河谷”。

龙门山麓、中心台地，“海窝子”。

依山傍水。湔江横流，灌溉方便，气温较暖，雨量充沛，鱼多鸟多，适宜农牧。

小鱼洞，重要驿站。产“嘉鱼”之地。《蜀都赋》说，“嘉鱼出于丙穴”，丙穴，即小鱼洞。洞口周围的山川，形似篆文的“丙”字，又称“丙穴”。西岸，有大鱼洞。

杜甫极为推崇细鳞青尾鱼，“鱼知丙穴由来美”。

两岸的大、小鱼洞，盛产各种鱼类。

鱼，“古成都人”的主要蛋白质食物。

适宜人类生息、繁衍的风水宝地。

出山进入成都平原的“桥头堡”。

中游河谷20公里，九曲回环“臂腕”处。

“海窝子”处在白鹿河、白水河、通济河三水交汇之地，面朝广

阔的成都平原，地形平坦开阔，适宜居住；背靠绵延的浅丘、群山，生活着大量野鹿等野生动物，可以猎捕。

东邻葛仙山镇，西接原磁峰镇，南接丹景山街道，北靠通济镇，境内南北长9.4公里，东西宽9.7公里，海拔高752.6米至1 281.8米。山、丘、坝俱全，面积达31.5平方公里。

还有铜矿、玉石、沙金、陶土等。

靠近山区，海拔相对于平原地区高，不易积水；也是湖湾区，湔江上游来水惯性向外，“海窝子”的位置属于湖湾区，水流至此会受惯性影响放缓，不易受洪水危及。

确有王者气象。湔江从高山峡谷之中奔涌而出，到了“臂腕”处，形成一个水面宽广的湖泊。“海窝子”所处的地方，恰好是一处湖湾。古人以湖为海，“海窝子”之名由此而来。

海窝子得名，还有两个说法。

一是《华阳国志》记载：“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建都瞿上。”龙是帝王的象征，龙潜于海，后人称“海窝子”；二是古镇靠山边有一石洞，终年有冷泉水流出，村民称为“海眼”，将场镇一分为二，上场至下场必跨过一步水沟，一步跨“两里”（梯云里、鹿坪里），故称“海窝子”。

阳平山环山防江，峰峦相视，相山相对如阙。

站在狮子山上，阳平山与“海窝子”，刚好在一幅太极图的两边，划分线是蜿蜒的玉村河。

西北高、东南低，成阶梯状分布下行。

承上启下。下游有著名的“关口”天彭阙。

位于湔江出山处的“关口”，又称“壩口”。

“壩”“堰”相通。《华阳国志》有“天彭门”之称；《太平寰宇记》有“天彭关”之名。《元和郡县志》说：“彭州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

牛心山、寿阳山两山夹持，隔江相对，气势雄伟。

状如门阙。天彭门，又称“天彭阙”。

形似牛心。峡口湔江北岸的牛心山，最高点海拔 969 米。山顶，有一据险而建的牛心寨，可容万人。寨内，有天池寺。寺内，有一个天池，池水长年不竭。

自商到春秋，继鱼凫后，杜宇、开明等古蜀三王，先后迁徙，立国于湔山、湔水，不断与彭人杂居、融合。彭门恰好位于三治相际的中心，成为春秋至战国中期古蜀国治地的一个标志。

不是门，是圣地。

以北，崇山峻岭；以南，一马平川。“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指古蜀人死后，都要从天彭门经过，才能达到“昆仑”仙境，一如中原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泰山一样。

生时，懂水、用水，依赖舟楫。死后，也希望乘着“载魂之舟”，到达另一个世界。

“能知天文地理”的李冰，莅任首事，视察天彭门。

扬雄《蜀记》，首记其事。常璩《华阳国志》，有更详细的记载，说李冰至此“见两山相对为阙”，“云：亡者悉过其中”，本人也“仿佛若见神”，故号“天彭门”，又名“天彭阙”。

“阙”，帝王生前死后居处特有的标志。

“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

古蜀中，“天彭阙”地位显赫、崇高。

“天”字，“东周为蜀王所居”。

群山与平原坝的分割线。远望，在平原尽处，山岭连亘如垒，豁然开一口门，湔江辟山而出，江口处，两山对峙，状如门阙。天文地理合一，“天文则井络分其曜，地理则彭阙建其标”。

“观象台”功能：凭借太阳光照在山上产生的投影的位置，为农、牧业生产，准确地测定四时，观测季节，以及时耕种、放牧。从祀祠里，看四季水量的变化，预测何时爆发洪水。

《华阳国志》说：“（杜宇以）江、潜、绵、洛为池泽。”

“池泽”，富饶区域，“江”，今岷江；“潜”，是“湔”，湔江；“绵”，今绵远河；“洛”，今石亭江。四水相汇之处，是古蜀国的腹心地带与富饶区域，与“瞿上”相符。

《牧誓》中彭人的立国地，逢乡的出入口，始名

彭门。

甲骨文中的“彭”字，典型的象形字，一个人双手高举，正在用力打下面的鼓。“鼓”，正立于鼓架之上。右边的三撇，表示击鼓的反复次数——“彭，彭，彭”……

历史上，彭国在武丁的殷商军队打击下，一度由故地徐州向“东南”迁徙，一支至成都平原与丘陵山区交合地带，以彭州为主体、以广汉、郫都、都江堰部分地区为疆土。这里进可攻、退可守，适合安邦立国。它是古蜀国的隶属国。

彭姓出自颛顼的后裔钱铿（彭祖），得姓始祖。

“彭人击鼓”。鼓，写作“壺”，“彭”结构中左边的部分。“壺”，上下结构，上面“十”，下面“豆”。“十”，打鼓的木槌，“豆”，陶豆。寓意依旧鸣鼓而进、奋进鼎新的精神。

自商到春秋，继鱼凫后，杜宇、开明等古蜀三王，先后迁徙、立国于湔山、湔水，不断与彭人杂居、融合。彭门恰好位于三治相际的中心，成为春秋至战国中期古蜀国治地的一个标志。

精神崇尚。将灵魂与天门观念相连，成都平原一大习俗。

天彭牡丹因发源地，丹景山麓湔江口天彭门而名。

“天彭门”尚未浚通，“关口”内实际是个大湖泊。

距离距成都平原腹心地带仅12公里。

古蜀人从高山峡谷，逐渐朝着丘陵、平原方向逐步转移。

创业者筚路蓝缕，寻访美丽家园。

“留守”的第二代蜀王柏灌，一如蚕丛取名“瞿上”，将立足地“海窝子”，也取名“瞿上”。鱼凫氏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湔江河谷流域的上游一带，称“王瞿上”。

“瞿上”，一种泛指。柏灌和鱼凫，都曾都“瞿上”。按《彭县地名录》称，今彭州市的龙门山镇一带，湔江绕天台山南下，豁然开朗，小鱼洞处于高处，称“瞿上”。

“海窝子”，立国治蜀的“大本营”。

“鱼凫氏”，“鱼凫王国”的故里。

“鱼凫田于湔山”中那个“鱼凫王”，真正“建都”于小鱼洞镇的蜀王山一带，后迁于阳平观名叫“新瞿”的“瞿上”。不是历代蜀王“王瞿上”中的那个泛指的“瞿上”。

进入夏商交错的古蜀渔猎时代。

湔江，典型的山区河流，常致洪患。

向北，溯湔江而上，经“海窝子”，在通济镇三岔河口处，向西北而上，湔江的干流白水河，向东北而上，湔江的另一条支流白鹿河（又称雁江）。两河交汇，史称“两河流域”。

上源支流，在中低山区行进，一路上，河谷狭窄，岩坡陡峻，有些河段，水面宽度只有40至60米，加上河道中跌水、深潭，一个接着一个，水流湍急，飞流溅沫、涛声振耳。

告别大山，湔江从深山冲出“彭门阙”，挟带着龙门山的大量砂石，进入平原。河谷突然变宽，水流突然变缓，水中沙石停积下来，形成砂砾石河床，最宽处达12公里，最窄也有4公里。

春秋两季，河面上野鸭子、鱼老鸱，成群结队。

每至汛期，洪水滔天……

揭开“古成都人”长达3 000多年与洪水争战的序幕。



大作农事，“田于湔山”。

“田”，捕猎之意。

鱼鳧带领古蜀人打渔、养蚕。

顺应自然，择吉而居。

合理布局，天人合一的境界。

繁衍生息。古蜀人以打猎采果为生，开始生活比较安稳，随着人口的增多，山上的野物越猎越少，生活又变得较为艰难。每年在三四月份，缺少食物时，为解决吃的问题，开始在湔江捕鱼。

鱼，指湔江的名产大鲤鱼。

鳧，指在湔江上飞翔，在河滩芦苇中生蛋孵仔的野鸭。

生活在湔江、鸭子河里的野鸭有多种，不仅毛色不同，体形也大小各异。其中，黄鸭又大又肥，野鸭中的上品。只是，野鸭就是野鸭，并非功能性的水禽。

鱼鳧，指水中浮游的鱼老鸱。

《楚辞》形象地记载：“将泛泛若水中之鳧，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如今，依然是四川各地渔民的一种重要的捕鱼工具。

鱼老鸱全身羽毛黑色，双眼有金光，眈视可畏，被称作“乌鬼”。由人驯养后，便能帮渔人捕鱼。因此在湔江河谷的古蜀先民，才把自己的部落，命名为“鱼鳧氏”。

湔江鱼多水大，生活习性颇有规律。

“丙穴鱼七上、八下、九归团”。每年九月，以丙穴鱼为主的河鱼，都要回小鱼洞中过冬。来年三四月间，庞大的鱼群

闻惊雷，从洞口汹涌游出，在湔江形成壮观的“鱼潮”，水浪巨大。

部落首领，善于水性、捕鱼。

带领部落族人到小鱼洞大量捕鱼，获“鱼鳧王”美称。

鱼鳧王统治早期，以鸟、鱼作为部落族徽。

随着部族的壮大，族徽渐渐变为图腾物，形成过程与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其食物来源主要靠水产物，渔猎生产成为第一生产支柱，渔业的地位在部落生活生产中极为重要。

鱼鳧文化中的鱼鳧，捕鱼的水鸟。

原始社会，只有稳定、充足的食物来源，才可以保障部族的稳定、发展。对于靠水生活的渔猎部族，鱼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因被氏族居民食用，成为社会珍视的圣物。

鱼老鸱忠于主人，能捕食水中之鱼。

《山海经》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列子》说：“大禹，一体偏枯。”

《庄子》直截了当：“禹，偏枯。”

禹、鱼，成为同音通假字。大禹父子鲧禹，同具水族特征，都有鱼的化身，被历史纪念为水神。鱼的形象，族群的图腾，可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

鱼，汉语中具有生殖繁衍的意象，有这种朴素愿望的人会祈求，期望像鱼一样产子、繁衍。原始氏族十分重视人类自身的生产，血缘关系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和结构。人面鱼纹，陶器装纹，图腾崇拜。

公元前2000年左右，柏灌驯服飞禽。

《山海经》记载：“（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鸪，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食之不疥。”柏灌之名的由来。

一分为二。公元前1800年左右，经过多年的努力，在驯服鱼鹰后，鱼鳧氏族并不满足于对湔山一地的治理，为壮大和发展部族，选择向周边区域扩张、不断迁徙，沿着“湔江南下”……

创造的“古成都人”诞生。

蕴含“成都人”的生命密码、文化基因。

理念差异。鱼鳧氏的一支部族，跨蒲阳河、越柏条河、过走马河……

距离湔山不远。

三代蜀王的国家，也不是前后相继的统一国家，族群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的族群，各族群的来源也不一，各自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到了江安河一带，以渔猎为主，耕植为辅。

选择今天温江区万春镇为驻居点。

温江位于岷江东岸，地势平坦，水草丰茂，有诸多剪山分水的岔道，十分适合渔猎、放牧，与岷江上游山区、湔江河谷地带比较，利于鱼凫部落捕鱼生存，没有过多的危险。

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

得天独厚。江水温润，气候适宜。

为种植业、蚕桑业的开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岷江曾名汶江，因“汶”“温”音讹得名。

古籍称“大江”“汶江”“温江”。

“温江”之名，源于境内的杨柳河。

《元和郡县志》记有：“大江，俗谓之温江，南流经县一里。”

《太平寰宇记》写有：“大江，在县西二百步，自青城界入，俗谓之温江。”

明代《郡县释名》记述：成都府温江县，“总志云以江水温润也。予过温江，询之父老，云温江发源于岷山，至灌口，水在山谷中，其气寒，至温江而气暖，故云温江，其说近是”。

“江水至此始温”。

气候和暖，原本发源于高山雪谷的江水，流到处时也开始温润。

金马河是岷江（汶江）的支干或叉河。

古杨柳河自然河流，曾是岷江（汶江）的正流，河水来自金马河玉石堤杨武堰，河宽、水深、流量大，排灌、航运兼用。正流地位，后被支干金马河取代。古今杨柳河，仍是同一河流。

在湔江河谷，因为渔猎的生活方式，先民经常在水面上劳作栖息，多年的摸索、运用，鱼凫氏似乎找到一种与水的相处方式，他们对水性非常了解，傍水而居，取食于水，弄水于潮，拜水于赐。

轻车熟路。鱼凫在鱼凫城发展、创新。

公元前1700年左右，鱼凫在温江建都。

柏灌、鱼凫氏，还有南面玄器部、颛顼部后裔，川西的古羌，川南的古彝（夷）等，聚在一起商议，重新商选大族长。用“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鱼凫氏作为成都平原上的“国王”。

异曲同工。夏禹的“黄河向东”，鱼凫的“湔江南下”。

遥相呼应。中原河洛的“禅让”，成都平原的“民主表决”。

不修城墙，鱼凫城周边种植不少柳树。

柳树可以防风防洪，做藤条编织。

夏天，可以乘凉，冬天，可以折藤条做柴火。

杨柳依依，史称“柳城”。

开创一生。公元前1200年左右，最后一代鱼凫王，含恨崩殂。

《蜀王本纪》说：“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于湔。”

鱼凫王到龙门山打猎，突然悟得仙道，飞升而去。臣民们纷纷追随鱼凫。

得道仙去，春秋笔法。

所谓打猎，部落争斗。

《华阳国志》记载：“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

“古成都人”思念鱼凫，设立祠堂，用以祭拜。

“蜀王祠”，静静地矗立在通济镇的老君山（阳平观）上。

光绪《彭县志》记载：“古蜀王祠，盖即阳平观，祠蜀王鱼凫也。”

如今，在湔江河畔的“海窝子”一带，仍能见到相关的地名。

祠，先秦时期的“蜀王道场”。

怀念祖先蚕丛氏，感戴其丰功伟绩，深知其创业的艰辛。先民把对面外形颇像桑蚕眼睛的四峰并耸的山峰，视为祖先蚕丛王的魂灵，取名蚕丛山（当地称狮子山），创造了“蜀”字。

“蜀”，野蚕之形意。

图语式的“文字”。

寻古溯源。道教的本根所在。

天师道首治阳平治，建在祭祠古蜀王——古鱼凫祠的原址上。

道教首治阳平观。

中国西部古文化的“原生底层”。

成都平原历来不缺仙道仙学。从三星堆、金沙遗址中被崇拜的“飞鸟”“羽化升天的青铜”形象，已经出现仙道信仰。到西汉时期，

仙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司马相如《大人赋》说尽神仙之事,严君平的《老子指归》、扬雄的《太玄学》,更成为道教祖师张道陵著成《老子想尔注》,并创办道教的直接理论和思想基础。

鹤鸣山、青城山,道教的发源地。

“海窝子”的阳平治道观,道教“祖庭”。

《老子变法无极论》说:“二十四治会阳平。”

具有“总本山”“中央教区”的崇高地位。

凡二十四治,阳平治为最大者,堪称道教最早的“天师府”。

“阳平治都功”,天师道道士的最高教职。

“阳平治都功印”,世代天师嗣教的法印。

张道陵自创建道教以来,在成都最先建立的组织、管理机构,分布于四川各地的二十四治,核心管理机构,称为首治,“海窝子”旁的阳平治。天师道(五斗米道)创始人张天师,闻悉蜀地之人易于教化,入蜀布道,住在阳平山,在东汉顺帝年间,创建第一个道教场所阳平治。

“东方耶路撒冷”。

地理位置独特、修炼环境幽静。群山环抱,坐落于中;龙门背靠,山脉郁依;湔江环绕,清流淙淙;松柏如盖,相对如阙。环境清幽静寂,虚幻缥缈;翘角飞檐,形态古朴,气势宏伟。

被唐代诗人王勃,誉为“蓬莱仙居”。

阳平观内新修的八卦亭,全球最大的道教八卦亭。

葛仙观,道教前二十四治中的上八治。第三治,属于天师道正一派。对应天上28宿的“天心宿”,称明堂,天王的布政之宫。又似人体的丹田,道家内丹形成的标志。

王重阳,创立全真道,弟子丘处机创立龙门派。

潮汐、海浪、飓风、地震,大自然威严的力量,完全可以在瞬间毁掉家园,再创奇景。

奇观之处,尚存一处“葛仙山”。

集“雄、奇、刚、秀”于一身。

葛仙山,原名白石山。从远处看,像莲花,又叫莲花山,亦称道场山,又名五斗山,因山有东、南、西、北、中五斗峰,故名。

“飞”来的葛仙山。世界地质的罕见瑰宝。

天然仙人图像。地质学的“飞来峰”与道教的飞仙山融合,从“天

农耕文明与古蜀文明的深厚积淀。前江走出大山后，有了一段伟大的新文明旅程——在平原中自由驰骋，将璀璨的古蜀文明，带到了诗与远方……

眼”俯瞰，道观的位置处于大地“丹田”之位，腰上的葫芦，形成气口延伸。道教文献《云笈七签》描述葛仙山：“周回岩峦，左右嵌穴，地灵境秀，迥绝诸山，故有二十四峰、八十一洞焉。”

头上道巾逍遥，身上道袍飘逸。

龙门山的核心地带、风景带，一度成为宗教圣地。

山门年代久远，颇有万夫莫开之势。

自从蚕丛王带领族人，通过险峻的“松茂古道”，从茂汶盆地来到岷江河谷，经柏灌、鱼凫到杜宇王朝，都先后在今彭州市的龙门山镇、白鹿镇、桂花镇、通济镇活动；“岷江南下”，鱼凫部落在温江万春镇、崇州崇阳镇、郫都城北一带，建都立业。

在《淮南子》中，对鱼凫做了相关的记载，有“后稷垆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郭璞注引《淮南子》，也有记载：“后稷垆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

“鱼凫出建木西”。建木，据《淮南子》记载，“建木在都广”。都广，即为广都，广都是成都平原腹地，建木西，成都平原的西面，岷江上游地区。鱼凫重要的活动区域。

“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反映出“古成都人”相信他们的三位蜀王，每一位都活数百岁。每一位蜀王，就是一个朝代，称为古蜀国的“三代”。

蚕丛、柏灌、鱼凫，只是各自部落、族群的领袖，整个部落、族群共有的名称。

作为领袖的蜀王，原本都有各自的名字，但一旦成为族群的领袖，就用共有的名称，替代私有的名字。不仅不是三个人，更不是三个相互承袭的蜀王。

“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

附会、错觉。

温情脉脉的“禅让”，后世史志者的一厢情愿。

杜宇与鳖灵之妻私通，更是荒诞不经。

自然规律。从古至今。

从动物到人类，新老大要取代旧老大，必会爆发冲突。

4 000年以前，就有尧舜禹的“禅让制”。即使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时期，无数次的武力夺权，王朝更迭；在虚伪的程序上，绝大多数都会完成一次虚情假意的“禅让”仪式。

中华儿女，骨子里认同祖先的“禅让制”，也符合中国数千年的官员择优选拔体制；同时，也说明中华文明数千年前，就有高阶的文明。

古蜀并不是一个次第相继、一脉相承的王国。

三代蜀王的国家，也不是前后相继的统一国家，族群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的族群，各族群的来源也不一，各自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杜宇、鳖灵之际，“国家”已经形成，私有制深入人心，古蜀国与中原的夏朝一样，也已经进入“父传子”的“家天下”时代。这种政治形态下，根本就没有“禅让”的可能。

政权更迭是王权战争的结果。

从蒙昧到文明的一种历史演进。

水上，南北纵横，东西驰骋。

水上用具，已经从原来的简易浮木，改成木筏、竹排。

成都平原上水系纵横，极少有石桥、木桥，南北氏族部落间渡河艰辛，要么在枯水期时趟水过河，要么在水势大时，抱木沉石的方式过河。

水上用具大大改善成都平原南北的交通情况。

立业定都之地。

扬雄《蜀王本纪》说，杜宇取代鱼凫后，定都“汶山下，邑曰郫”，在今彭州磁峰镇（合并进桂花镇）皇城山建都郫邑；为了威慑、管理好其余地区，又移居到鱼凫氏的小鱼洞，在“海窝子”又建立一个别都，也叫“瞿上”，“治瞿上为别都”。

杜宇比鱼凫，更有皇家气派、领袖气质。

有时在桂花“办公”，有时又会在通济“开会”，有时还会在万春“歇息”……

魅力特殊。农耕文明与古蜀文明的深厚积淀。湔江走出大山后，有了鸭子河的新名；有了一段伟大的新文明旅程——在平原中自由驰骋，将璀璨的古蜀文明，带到诗与远方……

时间一年年过去。

成都平原除岷江、湔江每年发大水，让“古成都人”心惊胆战外，其余时间都很巴适。虽然夏天湿热点，冬天湿冷点。“古成都人”对药材的运用愈发熟练，偶尔熬制喝喝，有点效果，日子过得像“小康”。

最隆重、最鼎盛的事件。

每年的秋收祭祀，都是“古成都人”的大聚会。

重要改革。蚕丛时代，石棺无椁葬；柏灌时代，石棺有木椁土葬；到了鱼凫时代，土葬慢慢改成火葬。想法美好，人自天上来到世间，人身消亡后魂归天神怀抱，与先祖相遇彭门天阙。

“古成都人”北上秦关，南下三江，东出三峡。

商贸触角伸到长江中下游。

给后来成都平原航运，带来深远的影响。

湔江河谷古蜀文化的“摇篮”。

长江上游中华文明的“子宫”。



“古成都人”，傍水而居。

舟船，在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

死后，用船棺作葬具。

丧葬制。崇拜“天河”（银河），崇敬天神（阳神）。

火葬的规格、地点，根据地位、身份来划分，只有神王才有资格火祭，然后，被运回祖地湔山、湔江河谷。身份低下的庶民，只能土葬、水葬。陪葬品的规格，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公元前1600年左右。

竹杖瘦马，麻袋藤框，推行坊市的运营、商贸道路的开拓。

中原处在夏末商初，百业兴盛，人丁兴旺。

求富思想。《礼记》记载，“殷人贵富”，商人讲“五福”，富居第二位；讲“六恶”，贫居第四位。汲汲以求地追求财富，极大地促进了商朝经济的发展。

殷商文明的崛起，发生在黄河流域。

南北呼应。古蜀与殷商齐头并进。

古蜀文明的兴起，在长江流域、西南区域。

古蜀人尚礼崇商，大促商道。

他们十分了解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形、地貌、风土人情。

往东，乘船走盐道，到巫山、荆湘一带；往西，来回穿梭于西南丝绸之路；往南，到云南“朱提”带回不少铜矿；往西北，过汶川、茂县，到松潘、九寨，上甘青高原；往北，到褒地，近陈仓，登陇南……对中原情况，也有所耳闻。



壹

貳

叁

肆

伍

公元前1500年左右，农耕繁忙，商贸兴盛。

成都平原与中原不同，水上往来频繁，槽船应运而生。

槽船，也称单体船、独木舟，将一根粗壮的圆木中间凿空，做出船型，如叶般飘荡在水面上，穿来梭去，船里不进水，比竹筏、竹排先进，不仅可用于捕鱼、捞虾，还可以运输货物。

船在水上飘，人在轻舟里。

木可浮于水。枯木到处都是。

无数次的试验、尝试，槽工在劈木板时发现一个现象：木头里有结疤，木材生长枝桠产生的结，在没有脱落、腐朽时，与周围木结构有完整的纹理连接，没断裂就是活结；与周围木结构有环形分离，干燥后收缩，镂空就是死结。两结之间的相互转变，不用麻绳来绑，直接用“结”连接。用石斧、石锛开楔形槽口，过盈连接，把两块木板硬生生挤压、扣接在一起。

掌握了过盈连接的大小、尺寸的“度”。

“度”大，会直接挤裂；“度”小，连接又不牢靠。

原始的积木拼接，不断改进后成为“榫卯”。

一通百通。单体船、拼接船、槽船……

发展出具有古蜀特点的大型船体，一如开明时代的鸂鶒舟。

如今泸沽湖中，摩梭人独特的“猪槽船”，保持着原始槽船的特征。

造船技术领先中原数百年。

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后，用太白船、船舫，载数十万大军、巨量物资，顺江而下，掠巴取楚，缺乏大量的船舶、行船技术，根本就办不到。公元36年，东汉大司马吴汉伐成汉，公孙述筑大船堤以阻吴汉。船堤外高34米，船内可四马驰骋，比曹操“赤壁之战”中被烧掉的战船高大得多。

《后汉书》记载：“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十层赤楼帛兰船”，相当于小型航空母舰。

不断革新行船技术，小船变大船。

水上交通便捷，大大促进“古成都人”与巴人、荆人、越人的交集。

有了更多的重庆人、湖北人，进入成都平原。

杜宇带领部落，又从朱提出发，沿着先人「南迁部队」的「来路」北上。山川阻隔，道路难通，沿着河流上溯、下行，从昭通峡谷，走到浙江河谷，来到河流纵横、平坦如砥的成都平原。

巴地巫山人，也从盐业贸易中获益良多。

巴蜀联系，愈发紧密。

古成都平原的水上交通，一如现在的高速公路。2 000多年后，从李白、杜甫的诗句中，仍然可知一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宇族群，来自“朱提”。

杜宇。万物自木生，自土生。木与土合，便为杜。天下四方为宇。

两个字，蕴浩瀚之意。

“朱提”，即今云南昭通。

昭通，古称朱提，不读本音，读“shū shí”，即“书时”。

“书时”，“蜀氏”一音之转。

朱提称“蜀氏”，因其是大禹“汶川之会”时，“南迁部队”中客居昭通的小支部落。

《史记正义》中称：“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崑等处。”

姚，云南姚安；崑，四川西昌。

蚕丛有后裔，分别居于姚安、西昌等地。

《山海经》记载，岷江即长江，江水的上游。黑水（金沙江）、赤水（雅砻江）南流入海，今宜宾段，只是大江的东折处。从岷山往南，顺江而行，就能轻松到达云南昭通。

从昭通到宜宾，由宜宾沿岷江，北上成都平原。

岷江南流到乐山，经犍为到宜宾，再注入长江。

昭通一带，古夔（濮）人的聚居区。

地处云、贵、川三省交会处，金沙江下游沿岸；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当地人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邑居、定居生活。

“从天堕，止朱提。”

“外来户”，首领称“杜宇王”。

成为蜀王，不是濮王，“南迁部队”迁徙到昭通的古蜀人。

从岷江顺水而下，到宜宾，再过盐津，沿金沙江下游右岸一级支流横江，就可直达昭通。比去四川西昌、云南姚安，还更为方便、省时。横江，曾是昭通、宜宾间的重要码头。

十分密切。古犍为郡南端与成都平原相连。

一个地处大山怀抱中的小平原。

地质和茂县盆地、湔江河谷极为相似。

四川进入云南的通道，连接中原、巴蜀与云南腹地文化的重要桥梁。古代巴蜀向西南传播中原文化的第一站，也是云南古代人群，向更发达的巴蜀、中原学习、交融的前沿窗口。

鲁甸的野石山文化，具有成都十二桥文化的特征。

昭通盆地发现过蜀式戈、典型的古蜀文化器物、巴蜀图语印章、铜鉴等，充分证明这一带深受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影响。鲁甸马厂的铜剑、戈、矛、陶器，也见于滇池地区。

不仅有横江与长江相通，矿业也十分丰富。金、铜、银等矿产已大量开采，陆续地经过水路，输入中原。而且，气候暖和，稻作物种植技术异常发达。

云南的地图像一只开屏孔雀，昭通如孔雀的头。

位于云南东北部，“彩云之南”的气质并不鲜明，反像四川的“飞地”，孤悬于云贵川之间。可能与蜀地靠近，昭通对成都平原有天然的亲近感，常有人戏称昭通为“三川半”。

一面镜子。不仅拂去云南的神秘面纱，也照亮古蜀文化。

农业起源早，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之一。

“南迁部队”的古蜀人，在此找到生存的感觉，学到许多铸造、农作物种植的技术，为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夔人、彝人的包围之中，艰难、顽强地发展，站稳脚跟，逐渐强盛起来。

昭通平原，面积不大，发展壮大空间有限。

夔、彝势力又相当强盛，对当地古蜀人构成严重的威胁。

杜宇决定北上，重返故土，再铸祖先大禹在成都平原创业的辉煌。

溯岷江，回到鱼凫故里“湔山”，即今彭州鹿鸣河畔北面的皇城山，再创家业。

从高原到丘陵,再到平原,回到河谷。

诗与故乡。为了寻找更美好的生存空间。

浩浩荡荡。迁徙路线,“灵关古道”。

“藏羌彝走廊”上。南迁的古蜀人从成都出发,往东南行,经樊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贵州威宁)、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继续向西,至叶榆(大理)。

克服重重险阻、困难。

杜宇带领部落,又从朱提出发,沿着先人“南迁部队”的“来路”北上。山川阻隔,道路难通,沿着河流上溯、下行,从昭通峡谷,走到前江河谷,来到河流纵横、平坦如砥的成都平原。

异曲同工。复兴“蜀国”,1100年以后,秦灭蜀后史称“安阳王”的开明王子“蜀泮”,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向南行进,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称为“蜀朝”。

迁徙、征战……

征战、迁徙……

杜宇终于把部族带入肥美的成都平原。

当一群“故乡游子”的后裔,也是新一代“蓉漂”,站在平原周边的山峦上,手搭凉篷,打量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时,欢呼雀跃,先人的土地今非昔比,适合人类生息。土壤只要播下种子,就能收获大担的粮食;河流、沼泽和池塘里,各种鱼游来游去;浓密的森林中,大象、梅花鹿、野猪等珍禽异兽,飞翔与追逐。清晨的霞光像紫色的瀑布,笼罩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从“滇漂”到“蓉漂”,勤政爱民的好君王。

杜宇擅长农耕,带来新技术、理念,大力促进稻作农业的推广,把五谷栽种技术传给周围各族,深受各族爱戴、拥护。

胆大心细,敢想敢干,富探索精神。曾派使者北出东进,了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情况,把成都平原的商贸触角,延伸到黄河中上游一带,并沿着长江,到长江中下游与荆湘百越一带。

北上,经广元、汉中,走古陈仓道。

到陕西、山西,再到黄河中游一带。

正值商朝走向鼎盛,中原文化颇为兴盛。

北到褒地,只需跨越高耸的潘冢山。

来回一次要一年以上,自褒地出秦岭,到陕南的古陈仓道,山高

路远，对北出商贸不利。

杜宇派人重新勘察道路，发现借道褒水、斜水，可以缩短距离，只需在一些险峻之处，想法疏通、连接。蚕丛开商贸道路，大禹带领“北漂大军”治水也做了一些探索，多次采用陈仓道，偶用祁山道。

上古褒斜道，直线距离最短，也最惊险。

如今的褒斜道经行路线，大致为自古长安，经户县折西过周至、眉县，由斜谷口入秦岭，再沿斜水东侧南行，经鸚鵡嘴、下寺湾，越老爷岭入桃川谷，西过灵丹庙、杜家坪，登五里坡，进入褒水上源之一的红岩河上游，折向西南行，经两河口、关山街、古迹街、西江口镇、孔雀台、马道镇、褒奴铺，穿石门或越七盘岭出褒谷口，经褒城到达汉中，全长近250公里。

褒斜二水，在今宝鸡市太白县城东11公里处分流。斜谷水流平缓宽畅，全程距离不足50公里；褒谷水流除上游近20公里平缓外，红岩河以下至褒城之间，山谷狭窄、群峰峥嵘，为褒斜栈道险峻之地。

南下北上。感慨万千。

古蜀国商贸的往来繁盛，相比中原还是差距巨大。

杜宇王朝日益强大，狭窄的湔江河谷的“瞿上”，再也不适应发展需要。

走出“天彭门”，在广阔无垠的成都平原，建立新的都城成为必要。

杜宇一如先祖鲧禹一般，四处巡游，穿过茂林、转过山口。

“聚宝盆”般的坝子，崇州出现在面前。

青草还沾着露水，一只野鹿嚼着青草，小心地穿过那片茂密的灌木丛。耳畔，山泉顺势而下，汇聚成浩荡的河川，向着山外奔去，在垭口那块连自己也登不上去的岩石上，激起丛丛白花。

鼻尖动动，空气中，似乎有着与山林不一样的味道。

群山叠嶂。湛蓝的天空下，淡淡的烟尘弥漫开来，遮蔽山下那片坝区阡陌纵横、河网如织的画面。那里，一丛丛蓬草如同树冠般绽放，围成一个个聚落。星罗棋布。

白昼，人影如蚁般来回。

一片片灌木、草丛、树林被伐倒，平整出方正的泽田。

夜间，有火光摇曳。

河谷通道、军事防线、商贸通衢和民族走廊，不仅串联起沿途无数城池、关隘、寨堡、峰岭以及湾、滩、桥、索、渡，还娓娓述说着乡土、乡愁久远的故事。

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一幅美妙的川西岷山江水图。

一个个部落聚集，琢磨着农耕，尝试着建城邦、开展祭祀。

江原古地。

“江”，指滋养成都的岷江；“原”，指文明的起源。因“原”“源”相通，因地接汶川，上源支流纵横交错，古人误将“其水错综散流，形如井字”的河流——发源于平原西部的山区的文井江，流经崇州、大邑，于新津境内注入岷江，在怀远镇以下，习惯称为西河——当作“江之源头”，命名为“江原”。尽管是地理上的美好的错误，但寄予了“古成都人”对于源头的尊敬。

崇州的母亲河。成都市第二水源地。

“蜀中之蜀”。

崇州古地旧称“江原”，古称蜀州。

古蜀州将现在的都江堰、温江、大邑、新津等地，统于一体。

岷江中游的平原区域。

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

自带大禹文化的“骨血”。

温江鱼鳧城被洪水淹没后，杜宇部族联盟或过金马河，或溯金马河而上，向地势更高一些、物产更丰富一些的崇州一带“移动”，那里是鲧祖与族人们曾经拓荒之地。

离成都平原最近的典型的高山峡谷区。

崇州城西北约20公里，距成都中心城区69公里。文井江穿场过镇，北去可到青城山，西去可进鸡冠山、九龙沟，西南可至西岭，东边是广袤的川西坝子。海拔600米。

来源于山中的江河，用亿万年的冲刷与堆积，为平原积攒下足够的养分。

怀远，原名“横原”，两名谐音，“怀远”更上口，更响亮。“横原”更名为“怀远”，取义于《中庸》，“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著名的茶马古道中，有一段重要通道。山地与平原交界处，水陆码头。古羌人从文井江出山打工、做生意，怀远不仅是进入平原的第一座市场，还是歇脚的中转站。

冉駝古道。从崇州出发，经汶川、松潘后，进入青藏高原的古代商道。

河谷通道、军事防线、商贸通衢和民族走廊，不仅串联起沿途无数城池、关隘、寨堡、峰岭以及湾、滩、桥、索、渡，还娓娓述说着乡土、乡愁久远的故事。

文井江边。如今的怀远古镇东一里的“青岗墩”，杜宇祭祀鲮祖祭台。

台土平坦宽阔，绿草如茵，春天百花盛开。

站台远眺，北望平川，南视太平山，顿时让人心清气爽。

中国黄茶之源。怀远、文井江镇一带，古称“横原”。

经考证，史上“西路茶”的重要产地。



壹

貳

叁

肆

伍

鱼凫渐走渐远。

杜宇声名鹊起。

古蜀国，从夏商到西周，就是西南第一大国。

第三代蜀王“鱼凫”，融合并取代蚕丛、柏灌部族，成为最先统一蜀国之人。

鱼凫王朝统治时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的时期。

蚕丛代表栽桑养蚕。

鱼凫代表部族的渔猎经济生活。

古蜀文明由渔猎进入初级农耕时代的奠基者。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高山石室到平原择居，从采集到渔猎，再到农耕文明，每一次大的转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都蕴含着先民们开拓、进取、创新的价值取向和智慧的闪光点。

巨细靡遗。“让生活更美好”。

离开温江鱼凫城后，杜宇才会把自己统治的中心选择在江原。

天气特别好，适合“过朱邑”观山。

奔流而下。一条文井江，延绵3 700多米的落差。

生活美学。两岸点缀着雪山、森林、草甸、湿地、湖泊等多种地貌，有大熊猫、雪豹、金丝猴、珙桐，有商道、泽田、聚落、民居、农人等，山川隽秀，富足丰饶，生态宜居……

心之所向，为景。

行之所至，是游。

东西夹持。川西坝子，四周群山环抱，龙门山脉的邓峡

山斜列于西,龙门山横拦于东,呈现出从平原中心向周边阶梯状抬升的封闭的菱形盆地景观。往西,距离最近的西岭雪山,直线距离约82公里,距离四姑娘山景区约126公里,视觉距离,雪山近在咫尺,纵观南北的横断,能看到、能辨识出名的连绵雪山有许多。

看雪山不以为稀。海拔3 000米以上的山峰多达126座。

上到海拔7 556米的“蜀山之王”贡嘎山,下到海拔今1 600米的道教圣山青城山。

海拔6 250米的“蜀山之后”幺妹峰,海拔6 618米的爱德嘉峰,海拔6 070米的田海子山,海拔5 353米的“成都第一峰”大雪塘,海拔5 040米的巴郎山,与都江堰的赵公山等。

成都市区沙湾一带,处于原始森林中。

“金牛乌木”。

出土大量乌木。犀角河挖出一根乌木,根部径粗约2米,干长30多米,木质紫红细密。营门口立交桥出土巨型乌木,直径3米多。西南交通大学西门外沙西线、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处都出土了乌木。

城北的金牛区,蓬勃地生长着野草和树木。太平洋、印度洋的季风迢迢吹来,与亚热带高压相碰撞,相融合,气候温暖,生态环境湿润。温暖湿地,争夺太阳的照耀,享受雨露的滋润。

蓝天白云下,原始森林。

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碧海绿波,林涛滚滚。林海中,象跑狮吼,虎啸猿啼,牛奔鹿窜,狼突蛇行,凤唱鸡鸣……即使亭午夜分,也不见曦月,惟有云绕雾缠。有“蜀犬吠日”之说。

乔木高大,凭借天生的发达根系,吮吸着充沛的雨水、丰富的湖底沉积物与草木残枝落叶所化成的腐殖质,不断地营养着自身的躯体,高与天齐,成为林海中标志性的大树。

《山海经》多处记载为“建木”。“百仞无枝”“日中无影”,顶天立地,“众帝所自上下”“盖天地之中也”。建木,在碧海绿波的原始森林中,诚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英雄之树,圭臬之木。

建木,远古时代高大树木的代名词。

成都平原上的人们,已有超过5 000年的观山历史。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在成都,有一种生活方式,叫“在成都遥

望雪山”，东看朝霞，西望雪山，杜甫那句“窗含西岭千秋雪”，如今已成了成都人阳台外一道不可或缺的常见风景。

“出门见绿地，推窗见雪山”。

遥相守望。成都平原与西岭雪山的壮美画卷。

杜宇“过朱邑”观山，实为今成都平原、四川旅游业的滥觞。

“农耕女神”，生有国色。

朱邑“乡村游”，杜宇“邂逅”朱利。

峰回路转。转弯，遇到爱情。

两情相悦。“蓉漂”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朱利诞生在文井江畔的朱亭。今崇阳街道朱氏街。

扬雄《蜀王本纪》，“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

来敏《本蜀论》，“自江源出”。

常璩《华阳国志》，“朱提有梁氏女利”“宇悦之，纳以为妃”。

郦道元《水经注》，“女子朱利自江源出”。

李昉《太平御览》，“自江源而出”。

朱崇河，崇州一条普通的小河。

文井江在鹤子崖分出的岷江二级支流，流经今怀远镇北，过洄澜塔、崇福桥，至元通镇原公议乡将军桥下分二支，左为泉水堰，右称桤木河，下流复合为一，统称桤木河。全长25公里。

成都名字最古老的一条河。

朱崇河，朱利、大禹父亲家门口的河。

大禹父亲、女子朱利，就在“岸上住”。

朱利是望帝的妻子，鲧禹一系。

梁姓，与鲧禹有关，属于黄帝族系。

鲧禹带领“北漂大军”北上治水，留下一部分族人，以梁为姓。

《说文解字》解释说：“梁，水桥也。”徐锴《系传》：“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发明木桥的氏族，在多水之区，不会生于高原。梁姓，鲧禹之后，属蜀中黄帝系的大族。

蜀族与黄帝族系，早有稳定的姻亲关系。

天造地设。奇男美女，结为夫妻。

从“游客”变为“崇漂”。与大禹一样的“上门女婿”，古蜀州女婿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望帝，悄悄诠释一见钟情的含义。而这次“邂逅”，不仅成就经典爱情故事，也成就伟大事业。

“崇州女婿”。专业人才，有技术、项目、团队。

《蜀王本纪》称，朱利“从江源井中出”，反映了凿井技术在成都平原的运用。有了生产、生活的新水源，部族可以离开江河湖泊，到更广阔之地发展农业，这是“原始农业”迈向“灌溉农业”的关键性一步。

强强联手。杜宇部族来到上芒城、下芒城一带古江原的平坝时，朱利部族处于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型中，农作技术发达，不仅植麻、种小麦和菽类，而且已经掌握水稻种植、酿酒技术。

“美女英雄配”，意义重大。

杜宇与朱利婚盟，得到族人增援，力量更为强大，地域逐渐扩充。

朱利辅佐杜宇称帝，带领人民治水，在文井江穿行的土地上，从一片片沼泽、山林之中，实行按季节耕种的农耕制度。五谷丰登，古蜀文明开始向更平坦的郫都、成都城区迁移……

“望帝”杜宇，古蜀称帝第一人。

妻子朱利，堪称“第一夫人”。

“教民务农”。全新的农耕时代，温文尔雅的杜宇，常常戴着金灿灿的王冠，主持一年四季的播种、收获与祭祀等活动，手把手地教导“古成都人”耕地，展示出一代明君的耀眼风采。

农业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

成都平原农作物种类繁多，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等品系；“膏”，郭璞注解为“味好皆滑如膏”，谷物质量上乘；“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冬夏播琴”，成都平原开始双季种植农业。

大量生产粮食，确保国富民强。

正向结构。内生动力为经济赋能。

杜宇、朱利“教民务农”的农本意识，使成都平原及其西南、西北地区的整个杜宇帝国范围内发展

强强联手。杜宇部族来到上芒城、下芒城一带古江原的平坝时，朱利部族处于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型中，农作技术发达，不仅植麻、种小麦和菽类，而且已经掌握水稻种植、酿酒技术。

了农业，“江原”成为长江上游农业发祥地，并奠定了后来的四川成为农业大省的地位。

“清醞之美，始于耒耜”。

酒，农业生产的附着物。

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的发达与酿酒业的兴盛。

百姓食不果腹，哪有余粮用来酿酒？

在朱利时期，古蜀州人就接触到酒。

意外偶然。把采集到的果子，放在一个木制容器或皮革容器中，果实互相挤压产生果汁，果汁会吸收葡萄等植物上的酵母菌发酵，温度合适，就变成含有酒精的酒，尽管度数较低。

人尝到美味后，会觉精神愉悦，喝多了还会产生精神幻觉，羽化升天。之后，发现容器中的果汁，不需要用火加热，自己都会升高温度，还会咕嘟地冒泡。一种神秘的力量。

继而，用剩余的粮食来作醪酒。

“第一夫人”朱利，酿出“务农酒”。

金沙人超过古蜀州人，比三星堆人更聪明，不会“饱暖思淫欲”，而是大量生产粮食。粮食多，就酿酒。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酒器，酒器包括酿酒器具、饮酒器具两大类。

叹为观止。品种繁多，埋藏集中。

成都平原酿造酒历史悠久。

有说，酒发明人杜康家族的酿酒作坊“瞿上”，即今彭州“海窝子”。

另说，在双流牧马山、什邡市。

“酒文化”可追溯至蚕丛时代。

酒祖崇拜、业神祭祀。“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尧酒代表着古人的物质生活，舜琴代表古人的精神生活。《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

仪狄与禹同时，少康晚于禹五代，亦为夏朝君主。

族姓之书，谱系之学的《世本》卷一记载：“帝女令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

仪狄，“夏禹之臣”，主管酿酒的女性官员。

《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秫酒。”

仪狄发明酒醪，少康发明秫酒。

杜康，又名少康，大禹的四代孙，夏朝的第六代天子。

杜康的祖先“崇伯鲧”所在部落族民，在崇地就已掌握酿酒方法，随大禹北上中原治水，将酿酒的基本技术从成都平原的崇州，带到北方夏禹部落的居住地——伊洛平原。

“杜康造酒”与“苍颉造字”相提并论。

浊醪，古人眼里的“白酒”。

“醪”，一种糯米、粳米经过发酵而成的“醪糟”。性温软，味甜。现在成都平原的不少农家中仍有自制醪糟。醪糟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就是“旨酒”。

《礼记·月令》在论述酿酒的必备条件时，称“秠稻必齐”“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金沙城也有大量的酒器、造酒作坊。

一些颈高、口直的铜尊，罐口便于密封，为发酵创造厌氧的条件。底部小而平，便于埋在灶坑边的热灰中保温。《华阳国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

“醴”，即为酒，2 300多年前的甜酒。

“天府之国”，富甲天下。“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又有鱼盐铜银之利……”粮食丰产，为崇州酿酒业的发展、兴盛提供了优良条件。

“江原县，（蜀）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小亭，有好稻田……”在《华阳国志》里，东晋时期的崇州人常璩，描述川西平原的水旱从人、沃野稻香。“小亭”，现在的崇州隆兴镇。

“崇阳城”距金沙城仅30公里，距三星堆77公里。

自然禀赋优越，“中国白酒原酒基地”。

三星堆国、金沙国的酿酒基地、作坊区。

“蜀州浓无敌”。隆兴镇梁景村酿酒历史源远流长。

“兴顺长”酒窖曾达到400多口，川西坝子上最古老的窖池群。

据称，“古蜀国母”酿出“务农酒”之地。有待考证。

崇阳1886窖池，成都地区除水井坊遗址外唯一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酒窖。

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前，先在崇州喝碗4 500年前古蜀国母“非遗”下来的酒，以润文采；杜甫寻友观景，也爱来崇州喝酒提神。连徐霞客探访长江源头，也捎带一壶酒壮行，再踏上行程。

从「游客」变为「崇漂」。与大禹一样的「上门女婿」，古蜀州女婿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望帝，悄悄诠释一见钟情的含义。而这次「邂逅」，不仅成就经典爱情故事，也成就伟大事业。

世界两个地方，出产金贵液体。

中东，液体黑金，石油蕴藏量最大。

成都平原，液体白金，白酒生产量最大；成都（含崇州、邛崃、大邑等县市）白酒原酒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经济富裕、文化昌盛，才能产生白酒。中国传统白酒原酒基地。

饮食奢靡的汉代人，常常大摆宴席，及时行乐。

四川出土了不少东汉宴饮画像砖、画像石，画面中，既有樽、盂、杯、勺等餐饮用具，也有丰富多彩的歌舞百戏，抚琴、杂耍、说唱精彩纷呈，为宾客助兴。

上流社会的宴饮，在汉赋中也能找到生动的描述。

左思的《蜀都赋》就是其中之一：“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觞以清醪，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颺厉；纤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

酒度数不高，即便“过于三觞”，也不会“醉酗生乱”。

《史典论》说，汉代的筵席上准备了大铁针，如发现有人醉倒，旁人就用这铁针扎，检验到底是真醉，还是假寐，成为酒桌上的笑谈。

酿酒历史至少3 000年以上。成都城郊出土汉代画像砖中，《酿酒图》《宴饮图》《酤酒图》《酒肆图》等展示的真切场景，酿酒技术相当高，提示中华民族独创的酿酒工艺起源，就在古崇州。

得天独厚。酿酒的原料、水性、土质和气候条件。

崇州至今，还在盛产美酒，流行藏酒、种酒。

“崇阳大曲”酿造工艺，早被列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崇阳酒”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天府之国的味之源、酒之头。

从“第一夫人”朱利的“务农酒”，到“慧妃”花蕊夫人徐惠消暑的“无汗酒”，再到“贵妃”杨玉环的“琵琶酒”，“起来携素手”，遥望星月当空，进入广阔的天地之境。

文明从有酒开始。“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

“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从古蜀国母孕育的“务农酒”起，到唐宋以来的“藏酒传统”，成都平原唱蜀歌，闹蜀嫁，藏蜀酒，成为习俗。

如今，崇州仍是成都唯一的优质粮油产业功能区，拥有数十万亩良田，西蜀粮仓名副其实，拥有四川唯一的“古镇金三角”文化传承区，复制人文鼎盛的“古代天府”独立于中原的繁华。

隆兴镇梁景村。成都市历史文化名村。

川西酒村。九九重阳节，种酒文化节。

传统品牌。隆兴梁景村因家家作坊、户户飘酒香，成为“佳酿之乡”。姚氏烧坊，繁衍生息，崇阳酒业老窖所酿“姚林酒”香飘十里，名扬四川，成就了“姚林酒，家家有”的佳话。

悠久酒文化。在古韵的情趣里，在蒹葭苍苍的崇阳城池，与晓风残月，与山水人文，与丝丝细雨，共饮一杯老酒，拥抱最好的锦绣年华，人间的快乐，悠然入怀……

“四山一水五分田”。

森林密布，河渠纵横，动物繁多。

长得像竹子的灵寿树按时开花。

鸾鸟、凤鸟自由自在地歌唱、舞蹈。

层峦叠嶂的山林，阡陌纵横的原野，清流急湍的水系。枫叶似火的鸡冠山，托起塔尖明月的凤栖山，文井江勾勒出灵动的眼眸，雪山、草甸、瀑布、河川、平原，层次分明、山水相依。

以青山为底，草树云山、千渠入院、千秋瑞雪的旷世盛景。

以江河为脉，三江润城、清泓环绕、蓝绿交融的可感可及。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源处。



壹

貳

叁

肆

伍

古蜀文化的重要根源。

大禹文化与古蜀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相融互动。共同的血缘、族缘、业缘、水缘，争奇斗艳、相得益彰。

朱利，当之无愧的“农耕女神”。

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宝墩遗址，位于岷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文井江古河道的上、中、下三个地域，鱼凫城位于古岷江干流，郫都古城遗址位于《禹贡》江沱古河道近旁。

不以日出为早，不以日落为迟。

“江原文化”。相差1 000多年，鲧与朱利都在文井江“岸上住”。不仅是大禹父亲“鲧作城郭”的历史遗迹，也是杜宇朱利联盟在古江原区域宣扬与推广农业的历史见证。

开创农耕文化的女部落首领，农本意识极为浓厚的崇州先民，在崇阳城修建了一座八蜡庙，每年十二月农事完毕后，都要举行祭礼仪式，含八种祭名：一祭神农；二祭后稷；三祭田官之神；四祭邮表畷，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之人；五祭猫虎；六祭堤防，免水患；七祭水沟，保灌溉；八祭昆虫，免虫害。祭祀包括农神在内的八位神仙。

通向八蜡庙的小街，被命名为八蜡巷。

旧城改造中，“八蜡巷”被更名为“大东街”。

成都城市群的“胚胎”。

在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邑(今崇阳镇城区)。

“一脊两侧”，古蜀国早期城址分布。

崇州基本位于扇形三角洲的西侧，三星堆古城在东侧，都江堰—郫都—成都，正好在中脊，聚落布局呈现出从两侧向中间高地推进的趋势。

屹立在山川平坝之间，坐拥良田千顷，远眺群山耸翠，江中船只往来，路上旅人不断，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之景，在成都平原的核心地带，演绎着富庶、安宁的“蜀中之蜀”的盛景。

风华绝世。江原之地成为长江上游农业发祥地。

成都3 000多年的繁华，都被崇州在历史风烟中低调地隐藏。

时年的江原地区，已经有了后来由多个部落构成的国家雏形。

古蜀的璀璨文明，来源于崇州大地上纵横的阡陌田埂之中。

武则天何以要在今崇州一带设置“蜀州”？从“热血青年”变成“逃跑皇帝”的宋高宗赵构，时年封号何以要称“蜀国公”？都因古蜀州曾是古蜀国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杜宇与朱利夫妻，将崇阳城与三星堆、金沙村、十二桥无缝链接。

才有了开明王美丽的“爱情传承”。

先有崇州的“爱情之城”，才有成都的“爱情之都”。

古蜀国母，演绎古蜀国最早的爱情传奇。

诠释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农业经济高度发达，杜宇王朝建立辽阔的区域共主政权。

“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不仅反映疆域范围，更是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对成都平原因地制宜而做出的最早的农业生产区划。

三层经济圈的“内循环”。

以“汶山为畜牧”，反映距今4000多年前川西高原气候，由湿润转向干冷，沦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的经济地位凸显，逐渐成为主要生业；“南中为园苑”，广大南中区域兼营种植业、狩猎采集业的多种生业模式；“江、潜、绵、洛为池泽”，突出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的平原、坝区，农耕条件优越，已普遍进入水稻生业的农业经济形态。

农业结构以稻谷为主，兼种少量粟和黍。

成都平原的植物遗存浮选结果，也反映杜宇时期仍是以蜀地悠

久的稻作农业为主，辅以粟和黍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郫都区菠萝村遗址，一处商末周初的聚落遗址，“宽锦”地点2011年浮选出的农作物种子，有稻谷、粟和黍三种。

稻谷数量，占农作物总数 69.64%，出土概率高达 88.46%；粟的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 5.73%，出土概率42.31%；黍的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0.1%，出土概率7.69%。

2021年3月，在三星堆考古现场，文保人员发现碳化的大米种子，证明4 500年前“古成都人”就已开始种植大米、吃大米了。

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地点2007—2008植物遗存浮选，亦有类似的结果，出土稻谷的数量，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77.6%，粟的数量，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 22.4%。

稻谷都占绝对优势，粟和黍处于次要的地位。

种类和数量很多，可分为农作物、水果（干果）、杂草、乔木、灌木、藤木等，在总共浮选的7 000余粒种子中，鉴定出40余科60余属300余种。稻谷占80%以上，最多的时期能达到100%。粟和黍的比重较低，粟的数量多于黍。

杜宇王朝农业的发展，还得力于妻子朱利的族群联盟。

在农业经济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影响深远。

“化民往往复出”。视杜宇为“农神”祭拜，与周朝人崇拜祭祀后稷如出一辙。

常璩写《华阳国志》时，成都至重庆一带，“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蜀中之蜀”的“蜀”，江原的延续。

蜀，后来成了整个四川的缩影、代指。

寻根问祖之地。

江原，杜宇“移治”前的蜀国故都。

公元前1047年，周王册封杜宇为蜀王，准予建都立国。

史称“望帝”，号“蜀”。

杜宇同朱利结合后，“移治郫邑”“更名蒲卑”，把都城搬家，移到“郫邑”。

雄心勃勃。公元前1400年左右，杜宇带领部落再出发。

从崇州的“崇阳城”，进军广汉，承接鱼凫创立的三星堆。

湔江与鸭子河一脉所系，开启了湔江文明。

湔江出关口进入平原，分为九支——鸭子河、小石河、马牧河、濛阳河、小濛阳河、白土河、新润河、新开河、清白江，被称为“湔江九河”。平原区以鸭子河最长，约57公里。

内外“双循环”，拓展疆域。

功德高于诸王。

在杜宇之后，鳖灵建立了“开明王朝”。

“蒲卑”，蜀国建立的朝代名称。

“郫邑”，今郫都城北郊的古杜鹃城故址。

“郫”，地势低洼，把都城迁移到地势更高之地。

与商末周初“元圣”、儒学先驱周公，在岐山“观其流泉，度其隰原，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的精心选址建设相同，开明王朝先在彭州军屯营建都邑，北部的清白江、南部的毗河，组成顺山理水的格局，逐步让平原充盈着“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稻莫莫”。

春秋战国时期，富有繁华之地。

成都平原，处处“有鱼、田之饶”。

郫邑以“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由最初的“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的水患泽地，逐步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重要稻作农业经济区。

能力超群。鳖灵治水如同大禹一般，“水利殖则养其国”。治水使百姓生活进一步安定，满足部族的最高利益和追求，鳖灵得到拥戴和支持。望帝杜宇效法“尧舜禅授之义”，将统治权“禅让”给鳖灵。

新一代“蓉漂”鳖灵，号“丛帝”，称“开明王”。

清心寡欲。望帝隐居“西山”的“海窝子”。

丛帝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百姓生活快乐。

距“牧马山”创业，已经2 000多年。在历经蚕丛、鱼凫、望帝时期持续开拓、耕耘，在沼泽里积淀

在成都平原的人文语境中，望帝就是杜鹃鸟。爱民治水的故事，比都江堰还要久远。天府文化的强大「基因」。代代相传。望帝和丛帝的灵魂，浸透到民间，浸透到系列故事和传说里。

起来膏腴厚土上，农耕文明渐成气候，物质财富丰富起来，权力与财富的双重诱惑，使开明王萌生“私心”。

功高自满，不顾民生，变得独断专行。

断然开启“父传子”的王朝世袭制度。

是祸是福？屹立千载的古蜀国，真要废除“禅让制”？

消息传出，望帝非常着急，食不好、寝不安，夜已三更，还在房里踱来踱去，想着劝导丛帝的办法。决定亲自进宫，去劝导丛帝。次日早晨，从“西山”动身，进城去访丛帝。

百姓闻知，一大群人跟在望帝后面，欲进宫请愿。

丛帝心起疑惑，下令紧闭城门。

无法进城，望帝只好无奈地回到“海窝子”。

心系百姓。多次前去劝说丛帝，却被挡在城门外。

想到，只有变成一只会飞的鸟，才能飞进城门、宫中、高树枝头，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亲自告诉丛帝。于是他化为一只会飞、会叫的杜鹃鸟，飞进城里、宫殿，高声叫着：“民贵，民贵呀……”

丛帝也是一个清明的皇帝，听了杜鹃的劝告，幡然悔悟，明白老王的善意，心中愧疚，更加体恤民情。遗憾，望帝已经抑郁死去，死后那一缕精魂，便化作杜鹃鸟，无法再变回原形……

“杜鹃啼血”。一种附会，体现了百姓对望帝的情感。师旷《禽经》说：“杜鹃出蜀中，春暮即鸣，田家候之，以兴农事。”才把杜鹃与“农神”杜宇相联，成为世代相传的神话故事。

“教民务农”“功在田畴”。

拳拳之心。两缕镂刻在历史底板的灵魂。

望帝和丛帝，以悲悯的目光，关心着黎民百姓的生活。

两个布衣“帝王”的行为，让子民们感动2 000多年。

世代不泯的尊崇。一个人的行动，感染另一个人。郫都城的历史，便让后人记住他们清瘦的面容，开始生生不息地向前跋涉。郫都被赐予一个诗意而响亮的名字——“鹃城”，区花为“杜鹃花”。

“蜀中先导，天府前驱”。

一祠祭二主。中国西南地区唯一。

帝王陵冢。望丛祠，纪念望帝、丛帝而修建的祀祠。

正襟危坐。望丛祠的大殿上，两个并排的塑像。

左边，望帝杜宇；右边，丛帝鳖灵。

和杜宇一样，鳖灵的事迹，多源自《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

“望丛祭祀”，成都平原、川西坝子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活动。在云贵川和东南亚等地区，长期流传有“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不少农村建有“土主庙”（杜主庙）。

二帝被尊为“开天府之师”，为后人尊祀。

《郫县志》载：农历三月初三，“每年都江堰放水，成、绵、龙、茂道台，过郫境则祭之，旧例也”。礼毕，方去都江堰，隆重举行放水祭祀仪式。都江堰砍掉“马槎”，放下蓄水。

一年一度。春耕春播正式开始。

成都平原上飞来一只只孤独的杜鹃鸟，发出急促、悲凉的啼鸣声。

百姓听啼叫，也都纷纷下地耕种，不敢耽搁农时。

艺术高于生活。扬雄《蜀王本纪》、许慎《说文解字》、左思《蜀都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都称杜宇死后，化为杜鹃，成为唐宋文人的咏诗题材，形成“意象杜鹃”。

回味无穷。意象含蓄深沉，情感浓烈真挚。

不朽之神。二帝遗爱在民，历代为后人尊祀。

杜鹃鸟身体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

春末夏初，时常昼夜不停地鸣叫，一种美丽可爱、富有灵性和神奇传说的益鸟，又叫杜宇、布谷、子规、望帝、蜀鸟等。杜鹃鸟意象，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的常咏之物，文化意蕴丰富多彩。

“杜宇化鹃”，一如庄周与蝴蝶，不可分离。

说蝴蝶必提庄周，谈杜鹃必悲杜宇，“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成为最美的绝唱。仅一个“悲”字，便拉近人神之间的距离，也幻化出文人笔下不胜枚举的情感寄托。

没有化鹃的情节，杜宇的神性不仅大打折扣，人格魅力也难以得到升华。唯有化鹃，才能使望帝的神性得到最大的彰显，才能体现对蜀地、蜀民推心置腹的爱，才能在蜀民心中神化不死。

家喻户晓。杜鹃，别名“布谷鸟”，农林益鸟。

杜鹃鸟的吟唱，有“四音一节”的旋律，连续不断，凄厉动听，正如李白在《宣城见杜鹃花》诗中说：“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

不断吟咏中，精神意蕴不断地阐发，构成极具审美价值的人文精神。游子的羁旅之愁，君主的亡国之痛，志士的报国之情，佳人的春闺之怨，离人的怀人之意，或喻游子，或喻君王……

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悲苦相联。古诗词中的杜鹃，凄凉哀伤的象征。

古典文学，杜鹃意象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表现忧伤。对应西方文学世界，夜莺的文学意象。

“人化的自然”。在古代典籍中，杜鹃被认为是古代蜀国望帝杜宇的化身，因失位而亡国，魂化杜鹃，日夜悲鸣，鸣至啼血，血染草木遂成杜鹃花。蕴含苍茫无涯的愁思。

不断吟咏中，精神意蕴不断地阐发，构成极具审美价值的人文精神。游子的羁旅之愁，君主的亡国之痛，志士的报国之情，佳人的春闺之怨，离人的怀人之意，或喻游子，或喻君王……

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图画。

“意象杜鹃”，川西坝子的至美里，只有诗意。

好像一位温柔可人的少妇，迎纳着高原汉子般的岷江水，从雪山千里跋涉而来，在她怀抱里，野性全无。变得像水一样柔软，古蜀国开枝散叶的子民们，也像这岷江水一般柔软。

“德垂揖让”。

两颗始终呼唤为官者德政的仁厚之心。

两颗对百姓生活始终充满悲悯的慈爱之心。

两颗开山平田、罢水患、息离乱的功德之心。

《华阳国志》载：“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

3 000多年来，川西坝子的人就浸泡在柔软的时光里，惦念着一只鸟。春光明媚时，这只鸟从历史深处的山谷飞来，在成都平原的天空盘旋、飞翔，发出摄人心魄的“布谷、布谷”啼鸣。

每个春天，郫都人都被这只鸟儿唤醒。

油菜花开时节，田畴上散居的“古成都人”，迎

接美丽春天。“祭望丛、拜杜鹃”仪式仍然在这里传承，三月三赛歌会后，农人们就会祭拜这只鸟，在心中升腾起不一样的情愫。

在成都平原的人文语境中，望帝就是杜鹃鸟。

爱民治水的故事，比都江堰还要久远。

天府文化的强大“基因”。

代代相传。望帝和丛帝的灵魂，浸透到民间，浸透到系列故事和传说里。

崇州、郫都、彭州，也因两个布衣“帝王”做过市民，便多了许多城市没有的特质。

“天府记忆”的唯美诠释、完整记录。

天府之美，就在平淡与细微之中，让人留恋与沉醉。

“君住湔江尾，我住湔江头”。

三星堆文明的发现，都在湔江河谷找到源头。

古蜀文明的摇篮，“三星堆人”的真正故乡。

承载着“四代蜀王”的伟业。

以湔江河谷为据点，向成都平原、四川盆地拓展，演绎更替。



壹

貳

叁

肆

伍

向着文明靠拢，“为了生活更美好”。

两路人马，一个目的。

自湔江顺流而下的杜宇部族，沿岷江而下的鱼凫部落。

平坦肥沃，成都平原再次点燃先民们耕作生息的渴望。

新治所地。离开湔江“故地”，东迁来到温江。

苦心经营几百年，鱼凫建成后世所知的鱼凫城。

留下最早天府水乡城市的雏形。

鱼凫古城遗址，位于成都温江区万春镇报恩村，现依稀可见城墙遗迹。古城遗址埂长1 810米，到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有1 300米，城址呈新月形。距今约4 500年，早于广汉三星堆遗址。

首度试掘证实，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出土有大量陶片，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镑等石器，与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

距成都市中心城区16公里。

鱼凫王墓位于寿安镇火星村，俗称“大墓山”。

清乾隆《温江县志》、嘉庆《温江县志》和民国《温江县志》均载：“大墓山，城北二十五里，相传为鱼凫王陵。”坐南向北，单冢墓土冢，长85米，宽62米，墓高5米，占地3 000多平方米。在鱼凫王墓北约1公里处，原有鱼凫王妃墓，俗称“小墓山”。

现已成平地，但较周围略高，遗址隐约可辨。

原先建在台地上，城内地面明显高于城外，城墙主要修筑在台地边缘，属于平原台城型。城区平面，一个规则的六边

形，与宝墩古城遗址相比，形制独特，其他古城多为长方形。

城内，已有功能分区；发现祭祀坑、礼器等宗教祭祀相关的文化因素；建筑物多样性特点明显；筑城采用卵石，比土坯墙先进；城墙的修筑中，有意采取了一定的防洪措施。

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垣为显著特征，有干栏式、木骨或竹骨泥墙式房址、竖穴土坑墓和灰坑等遗迹。出土文物有石斧、石锛、石凿、陶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和尊等。

类似的还有郫都古城遗址，成都西郊化成村遗址、成都南郊十街坊遗址、岷江小区遗址等。

石制劳动工具不计其数，再现“古成都人”创业的艰辛；随处可见的屋基、灰坑，诉说着“古成都人”安适、恬淡的生活；卵石、粘土交替夯筑垒起的城墙，闪现着智慧的光芒。

如今，还残存有数千米城墙埋遗迹。

经年代检测，属于早商时代的一段城墙，被称为“古城埂”。

出土的鸟形器，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鸟头柄勺、带鱼鸟图案的金杖等文物，颇为相似。

鱼凫桥，位于温江城北约7.5公里万春镇鱼凫村境内，横跨温江与郫都交界的马坝河。

温江文庙，又称柳城文庙、鱼凫文庙。

“鱼凫”图腾，在三星堆的金杖、金沙的祭祀器皿上，都能见到图案。

柏灌的墓，也在温江。

柏灌和鱼凫的王墓，均在温江境内的寿安镇。

与鱼凫城遗址所在的万春镇紧邻。柏灌王墓、鱼凫古城、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鱼凫桥、鱼凫村等古蜀历史文化遗迹，千百年来深深地镶嵌在温江的土地上。

有关鱼凫的传说故事很多。

“鱼凫王大战饮马河”“鱼凫架桥”“鱼神节的由来”等，饮马河、鱼凫桥等地名，至今尚存。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六为鱼神节，人们到河里去放河灯的习俗，为了纪念鱼凫王奋勇保护都城的故事。鱼凫王与花莲公主的爱情故事，更是美丽动人，表现了鱼凫部落来到温江建都后，与当地土著民族和谐相处的历史文化。

鱼凫部落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运食盐。

「蓉漂」杜宇入主成都平原，带来水稻栽培、种植技术。稻作农业传入，不止一个方向，也不止一次。宝墩文化时期，就有新的生产技术、理念进入，促进稻作农业的普遍推广、提升。「一号杜主」，被尊为「巴蜀农神」。

盐泉密集。生活在长江三峡和川东一带的巫耄、巴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巫耄的盐产量高于巴人，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都会影响到古蜀国的食盐供给。

强大的鱼鳧王，一面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阻止巫、巴的纷争，建立“非军事区”，保护“国际盐利”，保证长江盐运畅通无阻；一面暗中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避免古蜀国的食盐供给，因巫巴之争而间断。

队伍在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石垒纵横8行，共64垒，被后人误为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

实为古蜀国“维和部队”的大本营。

温江有数条大河流淌，境内金马河、江安河、杨柳河、清水河自西北向东南呈扇状分布，使温江又有“川西水乡”之称。在宁静诗意处，也能繁花似锦。

河流都通航，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途径。

河流众多，“处处是流水”。

“时时当渡桥”，桥也多。

清乾隆版《温江县志》记载，有38座；清嘉庆版《温江县志》记载，有79座；民国版《温江县志》记载，一共有216座桥。叫得出名的桥在史书上有记载，叫不上名的小桥，不知有多少。

一份不需自夸的闲逸，一份不需自矜的幽淡。

安安静静。一片祥和，与世无争。

沿河岸边湿地，宜于养鸬鹚的区域分居。

迁徙路线，从温江到夔州（整个川东地区），多有以鱼符、鱼涪、鱼妇津命名的区域。从已知的地名看，温江有鱼鳧城，犍为有鱼鳧津，泸州有鱼鳧关，奉节有鱼复城（国）。

不断迁徙。沿岷江、长江，南下东去……

最远的已在四川西昌、云南姚安等地。

养鸬鹚的民俗，扩散各地，直至传入日本。

日本国初代神武天皇之父，便是以“鸕鷀草葺不合尊”为御名。

光荣历程。逐步向成都平原迁徙的过程，经历从湔山，停崇州，到温江，再到广汉三星堆，展现了鱼凫部族不断壮大，寻求不断扩张，最终实现统一众部族，建立古蜀王国的历史演进之路。

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正从大片沼泽过渡到冲积平原，生产方式由渔猎过渡到农耕，杜宇带领族人部落迁徙过来，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文化，使农业生产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数百年的柏灌时代，行进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氏族社会的过渡中。过渡中，完成由原始的血缘文化，进化为文明时代的地缘文化。

形成的文明要素十分清晰。

原生文明，又一个“中国原生国家”。

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既是各部族联盟的族称，又是联盟首领的名称，还是各部族所统治的时代之称。后人将蚕丛、柏灌、鱼凫称为“三王”，将杜宇和开明称为“二帝”。

杜宇第一个称帝，继蚕丛、柏灌、鱼凫氏后，蜀地立国的第四个王朝。

“蓉漂”杜宇入主成都平原，带来水稻栽培、种植技术。稻作农业传入，不止一个方向，也不止一次。宝墩文化时期，就有新的生产技术、理念进入，促进稻作农业的普遍推广、提升。

“一号杜主”，被尊为“巴蜀农神”。

湔江流域的崇山峻岭中，生活着一种身体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的杜鹃鸟。初夏，时常昼夜不停地，在山间树中飞鸣。“古成都人”崇鸟，重迁回来的“故乡游子”的后裔，就把这种鸟神化后，作为部族崇拜的图腾，以表示从遥远地方返回故地的决心。

由北向南，现流经彭州桂花镇（磁峰镇已并入桂花镇）的土溪河，飞银湍玉，穿村而过。因发源于上游的皇城山（杜宇的都城）而具有古蜀文化内涵，民间又称为“杜宇河”。

定都的皇城山下，早就发现有宋代著名的“金城窑址”。

历史上，彭州就以制陶烧瓷著称。

“土陶之乡”的桂花镇，如今还保留着远古的传统制陶技艺。

“彭门阙”以上的湔江流域，历史上称为“西山”。广阔的山上，长满野蚕喜欢嚼食的“竹树”（青杠树）类的叶子。通济镇，过去的俗

名,就叫“青杠林”。

还有一种与桑树类似的“野桑”,蚕丛氏教民养蚕,抽丝织锦,条件得天独厚。

当年古蜀王身上穿戴的精美的丝锦,令周围方国、氏族部落羡慕。难怪时年三星堆因洪水灾难,再次走向衰落,王位“禅让”鳖灵时,杜宇仍还要眷恋湔江河谷,重返湔山故里“海窝子”,隐居在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山野。

凄美的感人故事。化为杜鹃,声声啼血。

满山遍野的野生杜鹃花,如火如荼地盛开。

在九峰山上,每到农历四五月,花上染满“杜宇王”的涓血。

当地山民使用的很多农具,残留有古蜀文化的印痕。

一种锄地的镐头,形状就像鸟头。

砍柴使用的刀,俗称“杜宇刀”,外形极像杜鹃鸟,和三星堆发现的青铜树上的“神鸟”形状,极为相似。教民务农,崇拜神鸟,后人为纪念杜宇王的恩泽,特别制作……

“蜀夏同源”,落叶归根。

“成汤放桀于南巢”。在“鸣条之战”中,夏朝最后一个皇帝夏桀并未死,带着妹喜等妻妾,在数百精兵的护卫下,带着不少夏族民众,向“南巢”逃匿,回到“湔江故地”……

相当于“海外游子”,漂泊千年后疲惫地回到“故地”。已经充分融合中原各族生命基因,跟随夏桀迁徙的夏朝遗民,带回了中原的先进文明。

“杜宇王”全盘接受“同宗同源”的夏桀。

让“夏氏遗族”担当起古蜀国的巫师。

寻访“海窝子”,就像是寻找一个失落已久的文明。

平原核心区域,有3 000至4 000户。

人口,15万至20万。

神王以下设司马,司马直属神王,军队举神王旗号。

王旗图案,青铜神桑侧面的巨形神鸟图形。

军队由两部分组成,神王卫队、长领族兵。

神王卫队为常备力量,约300人,长领族兵分三旅,分别是:步旅,约500人;骑旅100~200人;射旅300人左右。射旅,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兵种。“蜀射三百”并非空穴来风。

兵农合一。军队闲时为民，战时为兵。

最好装备，桑弓。

最强兵种，射旅。

杜宇亲率古蜀军讨伐西边的僚人、氐人等异族。

回到岷江一带驻扎，沿江耕田、渔猎，饮马江边，设立据点，以防僚人、氐人的滋扰、侵犯。岷江因驻军饮马，得名饮马河。在以后岁月中，因为岷江河道的有效治理，郫都、双流、温江、新都、崇州的农耕条件大为改善，耕地平整肥沃，水稻成片种植，秋收时遍地金黄，五地成为古蜀时的产粮圣地。

灌溉水、饮水，都仰仗饮马河，饮马御敌，依江以耕。

秋收金黄，颗粒归仓，在民间，饮马河逐渐更名为金马河。

江安河之名，也来自古蜀国时期，江水不过，是为江安。

推行坊市的运营、强化商贸道路的开拓。

在沱江要冲，设立三星堆坊市。

方便广元、绵阳一带的部族，沿着涪江南下；绵竹、什邡、彭州以西的部族，沿着鸭子河而下；由“松茂古道”来的羌人，可从都江堰（芒城）的蒲阳河，顺河而下，到广汉附近。

南北西三个方向，都可兼顾到。

南边的部落，需跨过金马河，走芒城、郫都一带，路途相对遥远。

南北呼应。扩建新津宝墩的聚落坊市，互通有无，彼此多有往来。

开拓商道。细致的考察汛期、枯水期的河流支系，整理交通路线。

梳理南北路线。枯水期时，自广汉起，过青白江区、越新都区的凤凰山，横穿过平原核心地带，下双流，进新津；汛期时，自新津起，借道大邑、崇州，在元通古镇，跨金马河，进入都江堰、郫都，再取道东北，沿蒲阳河到广汉。

拓宽西路。从崇州北部出发，拓宽“松茂古道”，慢慢形成后来的“冉駹羌道”。岷江上游的古羌部落，为方便进出平原交易，越来越多的古羌人，聚居在都江堰芒城、崇州江原城。

开通南路。开通两条线路，连通南北。

一条，沿着杜宇一族曾经南迁之路，自广汉到成都，经乐山、宜宾，后逆金沙江往上，到朱提一带。宜宾珙县到昭通的道路（后称犍道）窄险，直到开明二世卢帝之后，才陆陆续续拓宽。

一条，从崇州、大邑出发，过邛崃，再沿着青衣江、大渡河流域，

经雅安，过汉源、石棉，借道西昌、德昌，入朱提到滇北。这条道，一直是成都平原和古滇交往的商贸和交通大动脉。

终成为南方丝绸之路。

整修北路。自广汉出发，过德阳，绕梓潼，越大小剑山，经广元，跨潘冢，入汉中，走祁山道或陈仓道出秦岭。这条路最后成为“古金牛道”。

东路：几乎没有东出的陆路。

“古成都人”很少跨过龙泉山。

整修入中原之路。北上治水，整修大禹带领“川军”到中原地区的“秘道”。

平原以北、以西，逐渐出现每隔十里就见炊烟之景。

对平原中部的水道，持续梳理、改进。

岷江不分内江、外江，开阔、渊深。

大船。《战国策》中《楚策一》追述：“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

能够让装载50人与三月之粮的大方船，循江鱼贯而下。

轻舟。“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夏季，岷江到达一年中的峰值，乘轻舟而下，经长江三峡，五天就可以到达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

南北坊市，已经是人声鼎沸。

丝织业、手工业发达。

物品交换，渐渐演变成物品交易。

有专门的贝壳，或者信物进行交换。

信物由坊市担保、管理。

三星堆坊市里，有人专职物品交易。西羌因为路途漫长，来回不便，会租赁一些场所作为专用，每次用牛马把大批货物运来后，留下专人负责交易。

南北坊市的使用、扩展，使周边越来越多的异族人进入平原，以游群的形式，聚居在坊市周边。物品交易，加快人员的流动，促进行业的分工。周边部族不断迁进成都平原。

金面具和青铜面具一样，多有耳洞。怀念大禹，三星堆人制作的面具都有耳朵穿孔，传统延续到金沙村，“古成都人”确有穿耳洞的

习俗。与21世纪的少男少女们一样“潮”……

《论衡·骨相篇》中说，“禹耳三漏”。

《帝王世纪》里说，大禹“两耳叁缕，首戴钩钤”。

“叁缕”，即“三漏”，指大禹耳朵上的三个洞。

“首戴钩钤”，钩钤不是星宿，而是“纶巾”的误记，根据“纶巾”发音写成“勾今”，抄写者又把“勾今”按照星宿的名改成“钩钤”。

“首戴钩钤”实是“首戴纶巾”。以前四川人头上戴头巾。

“两耳三漏”“首戴纶巾”，夏朝创始人大禹的标志。

“古成都人”，将长发在头顶，挽成一个发椎，穿着精美的锦绣长袍，款式特殊，衣服全是左衽，眼球外突，颇像现代人的“甲亢眼”。耳环，整体装饰的一部分。

古蜀国内外“双循环”，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古蜀文明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也明显地具有向外开拓的开放性、对内充分凝聚的向心力。

从蒙昧到文明，一种历史演进。

古蜀之根，从彭州延伸。

古蜀之城，在崇州孕育。

蜀中先导，在郫都起步。

天府水乡，从温江发迹。

古蜀国内外「双循环」，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古蜀文明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也明显地具有向外开拓的开放性、对内充分凝聚的向心力。从蒙昧到文明，一种历史演进。

「天下为公」的格局。

「民惟邦本」的坚守。

中国第一次把「州」作为行政区域名称。

让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中国，与地理上的中国形神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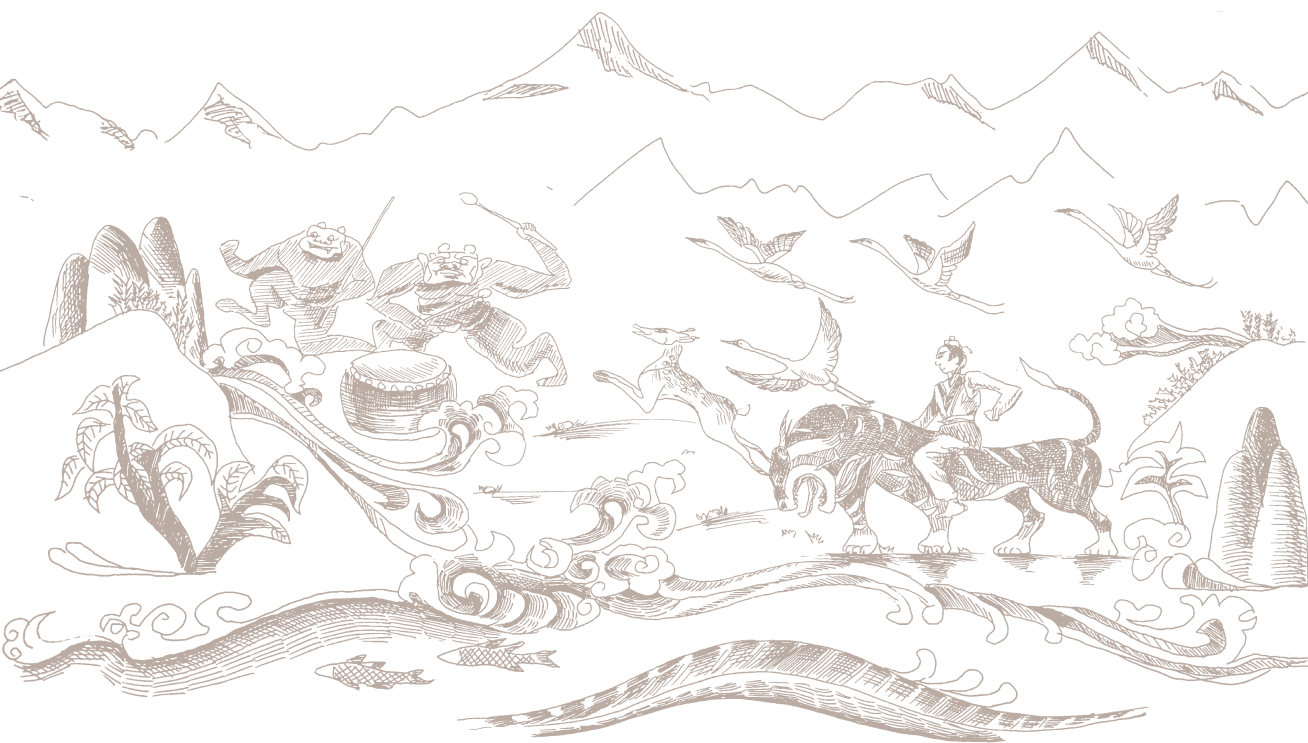
「统一」的概念，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的心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过程，不断斗争、锤炼的过程。在与周边聚落或文化的对峙中，更优秀的文化脱颖而出，胜者为王，内外「双循环」，多元格局渐渐归为「一体化」。

商，基于「众人」的社会。

周，基于「庶人」的社会。

夕阳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虽已经历数千年风风雨雨，人们仿佛依旧能看到古羌部落联盟、蜀族部落联盟数万人，从汶川出发，由西蜀向东，浩荡、迤邐……





周朝分野中西文化



壹

貳

叁

肆

伍

古蜀国，与夏朝同代，甚至早于夏朝。

“两条河流，一个王权”。

大禹，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大禹从治水经验中，总结出“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的“六府三事九功”的和谐文化模式。既是中国各朝代的立国宗旨，也是中华文明、文化的中心特征。

感念大禹的功绩，后世修庙筑殿。

尊他为“禹神”，整个中国也被称为“禹域”。

《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圉。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

《礼记》记载：“夏后氏亦禘黄帝。”

黄帝最早作为部落始祖为后人所祭祀。

“禘”，帝王对有血缘关系始祖的祭祀。

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商朝、周朝虽不再“禘黄帝”，血缘上仍是黄帝的后裔，夏、商、周三代王朝，都建立在黄帝所开创的大部落联盟基础上。

形成共识。华夏部落共同体，以黄帝为血缘“始祖”。

大禹带给中华民族，不仅首次科学治水的成功案例，更通过治水大业，促进部落联盟的统一，将华夏先民的政治形态，由部落联盟升级为国家制度，为建立华夏文明国家奠定基础。

强调开渠疏导，洪水顺利宣泄入海，重现江山如画之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国家管理理念影响重大，凡是和谐

或较为和谐的朝代，对民众的利益、欲求，通常都采取疏导方式，而非堵压。

到处巡行。成为联盟首领，对各地部落发号施令。

联盟领导机构的权力，类似于当今世界的联合国。没有形成强大的领导力，既办不成大事，又随时有解体的可能。大禹建立了共同的文化、道德标准，共同的礼仪、祭祀等制度。

治水成功，被舜帝选定为继承人。

37年摄政王经历，8年在位时间，正好“45年”。

安居乐业的华夏文明形成期。

经过不懈努力，“禹鑿（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按名胜志谓，淮水初从荆山西麓迂回入涡，禹疏二山水乃安流”，彻底根治天下洪水，形成“排淮泗而注之江，中国得而食也”的“中国”，得到“天下”诸侯的拥护，奠定夏朝建立的物质基础与民望基础。

大禹登基10年到涂山。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领集会。

前五年间，大禹做了两件大事。《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后汉书》记载：“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

大禹在位第六年左右，铸“九鼎”。帝威四方，权势鼎天。

召开“涂山大会”。

四千年前的“鸿门宴”。

以天子身份命令，华夏、四夷各部落的首领，在指定时间内参加。

地点：治水成功现场，涂山南麓、淮水之滨的禹村岗，今安徽怀远县禹会村。

天下各路诸侯，纷纷赶来，络绎不绝。

手执玉帛，带许多礼品，前往朝拜。

“天下共主”。为表示受命于天，举行隆重的祭天祀土仪式，让乐队演奏夏族音乐，命士兵手持兵器表演舞蹈，颂扬自己的功德，向诸侯显示军威，到会的各部落首领，无不表示臣服。

站在台上，穿上法服，手执玄圭。

两面分列，四方诸侯按着自己国土的方向，齐向大禹稽首为礼。

在台上，大禹稽首答礼。

礼毕，大声向诸侯说道：“我能鲜德薄，服众不足，召集大家开

会，希望大家明白恳切的责备、规戒、劝喻，能使我知过、改过。我胼手胝足，平治水土，虽略有微劳，但生平最兢兢自戒的是个‘骄’字。先帝亦常告诫我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如果我骄傲矜伐，请当面告知，否则就是教我不仁。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

将没有封号的部落首领，封为诸侯方伯。

命令诸侯方伯，每年必须进贡物品。

华夏各氏族部落团结、统一、逐步走向一体的盛会。

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

华夏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标志。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

中国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统一思想和分配联盟权力。

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绩效考核。

“会稽者，会计也”。防风氏违抗指令，姗姗来迟，大禹为严肃纲纪，“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警示诸侯，达到“万国定”目的。

“会计”之称，从“会稽”而来。

以仁德而闻名。告诫大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希望“与百姓平等”；交待后事时，要求“薄葬、环保，节约资源”。“以民为本”，民本思想的渊源，世界上最早提出，意义重大。

影响巨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源于大禹。以民为本，本固邦宁，一个国家根本的基础是百姓、民众，民众安稳、安定，国家才安宁、发展。

“民本主义思想”首创者。

“绝旨酒”。发布世界最早禁酒警示，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仁爱之心。“巡狩江南”，在钱塘湾，遇到一位“哭泣的犯人”，得知是百姓养不起儿女，不断地卖儿卖女。愧叹自己“责任与仁德不够”，遂制一批钱币，赏给养不起儿女的家庭。

为建立治理天下的团队，四处寻访，先后向东走到海边，到过青丘之乡的黑齿国，向南走到裸民之国、交趾，向西走到三危国、一臂国，向北走到人正国、犬戎国、夸父国、禹强国。

带领军队，征伐盘踞在江汉地区的“三苗”部落。

政治联盟。“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东夷图腾为鸟。代表上天，战前动员，“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统一天下。

一次诸夏、东夷的联合军事行动。

电闪雷鸣。战前，可能发生了日食现象。

一个人面鸟身，宛若雷神的将领，一箭射杀三苗首领，致使苗军大乱溃败。

华夏史上成功实施的第一例斩首战术。

“三苗”逃入汉水、丹水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有的到达江南。

在治水、军事与政治上的成功，使大禹逐渐由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联盟首长，演变为独裁的君王。

以这一方土地为界，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落幕。

众星捧月、一枝独秀的王国时代，开始引领数千年的风骚。

疆域，西起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和河北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北部，北及河北南部。地理中心，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都城要选“中”地，“择中建都”。

《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世界各地的大河流域中游，都更为各地先民所重视。中原地区地处温带，少有东北的严寒、东南的台风侵扰，建都主要以“长安—洛阳—开封”为轴心分布。寻求空间距离的平衡。

国家政治中心，选择地理空间的“中”。在中国，在北半球中，黄河中下游地区耕地面积超过尼罗河三角洲、两河流域的“新月形农耕带”，土地连成一大片。一体化的地理基础。

《清华简·保训》记载，虞舜、夏禹先后“求中”

华夏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标志。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中国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思想和分配联盟权力。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绩效考核。

于“鬲茅”（“历山”，河南濮阳一带）。《保训》又记载，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都邑“求中”于“河”。“河”即“河洛”。

迁国徙邑。夏人遵从上甲微重定的“中”。

以河洛嵩山为中心建“中”。

天地之中。国家认同理念的“初级版”。

“中”，多民族统一国家至高无上地位的符号。

国家的形成、发展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

象征中央集权，国家认同理念的“升级版”。

重大政治区别。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的都城布局：国家从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一元政治”。

强化国家认同。夏商周到春秋战国，都城一般为“单门道”。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各辟3道城门，都城一般由12道城门组成，“定制”均为“一门三道”。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

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孔子对大禹赞不绝口：“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饮食很简单而尽力去孝敬鬼神；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祭祀时尽量穿得华美，自己住的宫室很低矮，而致力于修治水利事宜。对于禹，我确实没有什么挑剔。

屈原赞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由多中心的“满天星斗”聚落格局，到“月明星稀”单中心格局，与后世的“三星堆国”与商朝、“春秋七国”到“战国一统”的模式相似。

不同历史阶段、相同历史发展规律，推动的结果。

西汉文献《风胡子》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禹画五服、定九州。

大禹把天下，分成五个“服”。服，不是如今网游里的服务器，而是地区之意，类似于罗马时期的划分“万国法”，服事天子之意。以首都安邑为中心，王畿外围，以250公里为一区划。

国家，土地与人的有机连接。

“五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甸服，距离首都250公里以内，君主直接管理，人民直接向君主纳税。

侯服，距离首都250公里到500公里，酋长直接控制，酋长向君主进贡。

绥服，距离首都500公里至750公里，与蛮荒种族的缓冲地带，君主力量无法延伸到。

要服，距离首都750公里至1 000公里，生产工具落后，对绥服的人，非常尊敬。

荒服，距离首都1 000公里以外，顾名思义，蛮族、化外之民。

根据与中央的距离，衡量其文明程度。衡量内与外的概念与中国的中心密切关系。

根据“五服”制度，命把中国分为九州。

九州又呈“井”字形分布，恰应和“天子居中，八方朝贡”。

冀州，今日的河北大部分地区，内蒙古赤峰一带，北京、天津，山西小部分地区。

青州，黄河和济水之间。大体为今日的渤海、泰山，山东省中部以及河北部分地区。

徐州，淮河平原。今日的江苏北部和安徽东北角加上山东的一小部分。

豫州，中原地区。九州中心，又称中州，相当于今天河南黄河以南驻马店、平顶山一带。

雍州，今天的山东泰山以西地区，加上河南的濮阳、安阳，河北的邢台、邯郸一带。

梁州，甘肃部分地区、陕西汉中地区，秦岭以南、四川全境、贵州，云南一带。

扬州，今天的江苏南部、安徽省大部分地区、浙江全境与福建北部与江西东北部一带。

荆州，长江中游地区。今天的河南南阳、信阳地区，湖北全境，安徽西部地区，湖南部分地区与江西西北一小部分地区。

中国第一次把“州”作为行政区域名称的开始。

加强国民对共同体的认同。

让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中国，与地理上的中国形神合一。

屈原赞姜：「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由多中心的「满天星斗」聚落格局，到「月明星稀」单中心格局，与后世的「三星堆国」与商朝、「春秋七国」到「战国一统」的模式相似。

夏商时期，台湾属于九州中的扬州。

《禹贡》篇中，就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的记载。

《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文章，1 000多字，主要叙述中国地理方物兼均税。大禹所作是假托，夏朝时文字绝无如此发达，研究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王国维认为是西周初年所作。

“岛夷”，指台湾先民。禹夏时期，沿海居民已经开发海洋发展海洋渔业、盐业等产业，部分海洋物产通过水路等方式贩卖到内陆，以麻织品为衣服，以贝类为饰物，使用竹器，地产桔柚，精品自当纳入中央王朝制定的贡赋制度中。

《禹贡》成书之时，台湾已经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

一生，都在治理水患，伟大的一生。

登基后在位仅8年，公元前2198年，死在出巡会稽的路上。

“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禹都阳城”，大禹在嵩山之阳建都，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石。在会稽（浙江绍兴的别称）盟会而驾崩。

汶川与绍兴，因大禹结下的不解之缘。

大禹去世，儿子启登上王位。

中国“家天下”的历史启幕。

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定鼎九州。

统一天下。派人把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精选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鼎铸好后作为镇国之宝。

“大一统”夏王朝正式建立。

既是野蛮和酋邦制社会结束的物化标志，又是文明开创和国家形成的形态表现。

新时代开端，两个成语诞生。

“一言九鼎”的守信。

“天下为公”的格局。

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人礼。

“统一”的概念，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心中。

“小康”社会由此肇端。

一禅一继。象征性的统治。小康社会，孔子视为“天下为家”的产物：“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分清禅让制、世袭制两个不同的时代，明确指出世袭制开始于夏后氏。

夏朝并不干涉各诸侯国的内政，各诸侯国在人权、财权、军权等方面完全独立，只是象征性地纳贡，相当于当今各国向联合国交纳一定的会费。夏、商、周三代的王朝，都可称为“世界政府”。

“国中之国”的架构，高于国家之上的“天下”政权。

中央政权又不干涉各国的内政，和各诸侯国彼此双赢的合作。

君主，夏朝称“后”，商朝称“帝”，周朝称“王”。

夏后氏，就是“夏王氏”。

保留着部落联盟中军事民主的传统。

建立夏王朝后，伯益被任命为执政官，总理朝政。

选定伯益作为王位继承人，在政事上有意培养。

伯益曾劝谏大禹，做事要考虑周全，不能违背制度；治国要勤勉谦逊，不能沉迷享乐。能够成为指定的继承人，资历和个人能力与大禹的儿子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一生勤劳节俭，群臣根据生前的意志，只用衣衾三领、薄棺三寸装殓，葬在苗山之上。

按照部落联盟的传统，伯益为大禹举行丧葬，挂孝、守孝三年。



壹

貳

參

肆

伍

“吾君帝禹之子也”。

百姓在歌中唱到：“启是我们君王大禹的儿子。”

三年丧礼完毕后，伯益没有能继承王位。

“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伯益虽然助大禹治水，功绩卓越，但时间短，资格不够，诸侯和人民，只承认大禹的儿子夏启，而不认同伯益。诸侯都去朝拜夏启，而不朝拜伯益；人民打官司都去找夏启，不去找伯益。

顺应时势，夏启成为夏王。

伯益担任卿士，相当于丞相。

认清形势，隐居到箕山（今河南登封东面）的南面。

远离朝政，安然老去。

“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

禹帝也没免俗。禹启时期，阶级分化明显，“公有制”和“禅让制”摇摇欲坠。各方诸侯作为未来的奴隶主，个人情感上更愿意“世袭制”，把拼命挣来的私有财产，代代传给子嗣。

伯益有两个儿子。后代建立多个诸侯国。大儿子大廉，封在秦地，廉姓的始祖；次子若木，被封于徐国，为徐氏始祖。若木的玄孙费昌，在夏桀时投奔商朝，费姓的得姓始祖。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世界结束。

比秦始皇还早2 000年。

《史记》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

夏启当上夏王后，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强烈不满。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有扈氏，公然表示不服从夏启作为新的领袖。

一场战斗，发生在夏族往东扩张的过程中。

甘在今郑州西北古荥泽之外。

有扈氏，夏族中心地区东边，一个强大的部落，活动中心在今河南郑州以北的原阳、原武一带。对于占据洛阳一带的夏后氏的威胁最大。“黄河向东”，早在舜禹时期，就曾多次征讨。

夏夷矛盾，由来已久。

面对有扈氏的威胁，夏王朝也要保卫腹心地区，拒外侵于甘地。有扈氏部落也处在氏族公社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为了夺取更多的财富，更需要扩大地盘，发展势力。

“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

“修教”，用了一年时间治兵，准备用更大的兵力来打仗，同时，用大禹之德来作宣传。文武两手，双管齐下，终于使有扈氏臣服，并加入华夏部落联盟。后封有扈氏为诸侯。

有扈氏，“九扈”中的一支。

“九扈为九农正”。“九扈”部族，擅长农耕的部族，开垦肥沃的中原功劳至伟。区域在西部黄土高原、东部太行山脉，夹杂在两大区域之间。以炎帝为代表的东夷部族，在东方。

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族，大多自西方而来。

夏人与有扈氏的争端，东西领土之战。

夏人从岷江上游的川西高原、中游的成都平原，“北漂”到中原地区，发现生存环境明显优于“西方”，落地生根的信心坚定，“黄河向东”的思维形成，“向东进军”成为部族共识。

西高东低。有扈氏聚居的区域，再往东走，越过太行山脉，就是广阔的华北平原，夏人要真正掌控天下，遭遇原本居住在中土地区的有扈氏部族，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无法避免。

中国第一级“地理阶梯”，长江、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

只有新疆的额尔齐斯河，所有支流都来自右岸，唯一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外流河。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一条条支流，就是牧民的一条条转场的道路，被称为“一条游牧的河”。

水往低处流。自西北向东南，从高到低。

水,代表生机和财运,东南人财更旺。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变化趋势,自西往东移动。

“地理阶梯”。天然气势,从西北打东南,顺势;从东南打西北,逆势。在《史记》里,司马迁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向北,不打到长城,就会被草原民族欺负。

向西,不拿下河西走廊,就会断掉丝绸之路,失去经济命脉,甚至被游牧民族包围。向东,不打到海边,就会失去钱仓、粮仓。

向南,不打过长江,就会失去半壁江山。

中国不统一,就会诸侯割据,后患无穷。

“据上游之势,以临馭六合。”关中山河四塞,地势高峻,居高临下,故称建瓴之势;洛阳、开封,地处中原四通八达之地,可向四面扩展,故称宅中图大之势;挈裘为提衣挈领之意。

夏商周三代,持续以东方为主战场的原由。

夏族人与有扈氏的战争,持续时间很长。

黄帝与炎帝、蚩尤打过仗。黄帝当年,也没有从这个区域攻进东夷核心区域,只能绕道而行,尽管在“涿鹿之战”中,黄帝部落打败蚩尤部族。后来尧舜禹都在东方部署军事力量。

“向东进军”,华夏内部两大政治力量,也不协调。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大禹在选择继承人上,也多次产生过纠结,到底选择代表“世袭制”的儿子夏启,还是选择代表“禅让制”的战友伯益?伯益已是东夷管理区域的首领。

政治博弈。“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大禹父子年间,攻破南方“三苗”部族,“涿鹿之战”后,本身就已大部分成为华夏人的势力范围,等到夏启剥夺了伯益的实权后,在广阔的平原上,摆开战车部队,全面迎战有扈氏。

从正面攻进东方,攻进真正的东夷核心。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今河南荥阳地区,古代曾有潘水、荥潘之泽;周代以前,称“甘水”“荥甘”。地傍甘水、荥甘之泽的区域,为甘地,北距有扈氏故地就几公里,既是有扈氏的南方门户,也是大战的战场。

公元前2070年,出兵前召集六卿商定讨伐。

在甘地,有扈氏国都的南郊甘水之滨,夏启举办誓师大会,对六

军的兵将们，宣布有扈氏两条罪状：“威侮五行”，不敬天象；“怠弃三正”，不敬大臣。

天子率领将士亲自出征，必定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决战，一定要使将士们明白为谁、为何而战？主帅是天子，发布战争动员令，既有权威性，又有感召力，还要证明出征打仗的正义性。

战争动员。“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六军将领们，我向你们宣布誓言：有扈氏蔑视仁、义、礼、智、信五种规范，背离天、地、人的正道，不敬上天，荒废天下人公认的法令制度，上天要断绝他的大命。如今，我恭敬地执行上天对他的惩罚，大家要同心协力地执行天命去消灭他。

战争誓词。“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间驾车的兵士，如果不能使车马进退得当，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将在祖庙受到神主奖赏；不服从命令的人，将在社稷之神的神位前惩罚。我将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

没有豪言壮语，也不长篇大论，没有表决心，却提出最足以征服人心的理由——奉行天命，简洁而震撼人心，充满了一位王者睥睨天下、雄视古今的霸气。

大战在甘地进行，史称“甘誓”。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檄文。

行文套路与后世如出一辙。先历数罪状，再宣布规矩，言语之中，充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最终，赶尽杀绝“家天下”反对势力，新的政治体制在华夏故土上，生根发芽。

训练有素，夏启率领六军兵将。在夏军强大的战车冲击下，有扈氏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一直打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变化趋势，自西往东移动。「地理阶梯」。天然气势，从西北打东南，顺势；从东南打西北，逆势。在《史记》里，司马迁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到扈地，杀了有扈氏的首领。一场血腥的战争。扈氏的族人，全部变成从事放牧的奴隶。

夏王朝的立国之战，史称“甘之战”。

四处征战。“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不如父子兵”。

军队，从古蜀国就开始四处征战的两大部落的子弟，核心人马，亲王室的宗族子弟。12支夏后氏后代，或在成都平原近亲通婚的部落联盟的人马，维护自己宗族的兴衰和领地，舍生忘死。

与后期国家的役兵制不同。平民在战场上拼命，还有获得当将军、上升通道的机会。在早期王权社会里，你若不是核心宗亲人马、部落子弟、后代，要上战场拼命，都不给你机会。

担心你出战不出力，甚至出卖机密。

在原始社会，首领与普通军人、农民差不多。以身作则，打仗时，要冲锋在前，耕种时，要吃苦在前；还要处理部落里的一切大小事务，非常劳累。这，也是上古帝王多圣贤的原因。

军队拥有战甲、长矛，又万众一心，所向披靡。

三年中，“隐匿”了按“禅让制”接班的伯益，讨伐了有扈氏。

战后，夏启在“均台”之地，举行盛大的典礼、国宴。

天下诸侯、部落首领全都参加，夏启亲自在露天坝，点燃篝火，表演歌舞。《山海经》记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配玉璜。”

神仙附体。夏启出场时，驾着两条龙，飞腾在三重云雾之上，气场十足；跳舞时，腰间佩戴着玉璜，左手举着华盖，右手摇着玉环，载歌载舞，完全沉浸在歌舞音乐的世界里……

“云盖三层”，指上天之路。在《大言赋》中，宋玉提及“圆天如盖”；算经十书之一的《周髀》中，有“天象盖覆”一说。远古的“盖天”说，从天形大圆如盖而来。

“云盖三层”，即云天三重。

操羽舞环。夏启在大乐之野，舞《九代》之舞，借助于物之精灵，舞雩而上通于天神，乘龙而上，冲破三重云天，到达天庭。通过舞雩与天神沟通，上古巫师常用的“套路”。

绝非巧合。相隔2 000多年，在夏后氏故地的成都羊子山祭台，也是三层。

画面中，祭坛，高耸入云。

坛上，打扮怪异的巫师，又唱又跳。

坛下，匍匐着无数子民，虔诚祈祷。

突然，巫师跳上两条巨龙，冲天而去，成为天帝的贵客……

“登天”的形状，谁都看不真切。想象中御龙登天的画面，从未曾出现过。真正“登天”的只能是夏启的元神，而非信徒们目睹夏启登天。毕竟祭坛高高在上，信徒们则匍匐在地。

《竹书纪年》记载：“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天穆之野。”

寻常的“舞”，不会见诸史册，在《竹书纪年》中，夏启一生不过百来个字，肯定是一场值得铭记的盛大活动：在巡狩之后，夏启在天穆之野，曾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祭天活动。

与《礼记》中记载周人祭天时，人君的行为类似。

向上天“述职”，汇报牧守得失，感谢护佑，祈求继续降福护佑，借用上苍的名义，发布政令，对巡狩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整顿。朴素的“政教合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

象征意义。都是为了“娱上帝”“乐皇尸”。

一次胜利者的炫耀，而非虔诚地请示上苍。

无论占卜，还是祭祀，都拗不过上位者的意志。政权也一直凌驾于神权之上，胜利者将神灵的血脉、上苍的旨意，附会成统治的合法性，或者发布政令的“天意”。在后世，渐成惯例。

史册上随处可见的“祥瑞”，为“升级版”。

华夏民族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即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仪”，“礼”的具体表现形式。“乐”“舞”，“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后世帝王郊祭礼天的滥觞。

完整的超级大帝国，凝聚力无可比拟。兴衰有时，每个衰落的朝代，每个割据一方的势力，设立的终极愿景，还是统一全国。没人认为安享巴蜀，雄踞关中，划江而治，可被接受。

每一个新朝代都会在法理上，认可前一个王朝。

然后，认为自己才是中国最合法的正统，而不是另立一个国家。

夏朝有文字，比甲骨文更成熟、规范的夏篆，笔道圆润，讲究对称，夏禹书、禹王碑、象牙文，夏朝文字。商朝建国后，开疆拓土，300年难得“安稳”，导致夏篆荒废，官方文字采用更方便书写的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过程，不断斗争、锤炼的过程。在与周边聚落或文化的对峙中，更优秀的文化脱颖而出，胜者为王，内外「双循环」，多元格局渐渐归为「一体化」。

朝俗体字甲骨文。周武王克商后，又恢复夏朝官方文字夏篆。

周篆与夏篆接近、相似的真正原因。

中国第一次推出简化字是在商朝，从复杂的夏篆转变为简化的甲骨文。

酒的发明者也在夏朝。

早期可能有自然酿造的果酒，后来太康，探索酿“秫酒”。

粮食酒，曹操吟唱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由来。

中国的酒仙，应该感谢夏朝。

都有了喝点小酒成仙的机会。

一场“遭遇战”。“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王朝诞生。

历史进程也进入奴隶制社会。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

国际秩序，全都是打出来。

一战后，有“英国和平”；二战后，有“美国优先”。

中国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前与后，既有连续，也有断裂，几千年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内与外，农耕与游牧，既有辐辏，也有辐射，中心四裔，互为主客，也不是铁板一块。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过程，不断斗争、锤炼的过程。在与周边聚落或文化的对峙中，更优秀的文化脱颖而出，胜者为王，内外“双循环”，多元格局渐渐归为“一体化”。

商的中心，本在郑州，周的中心，本在西安（丰镐），夏的二里头遗址、商的尸乡沟遗址和周的洛邑遗址，才是“天下之中”。夏的意义在“中”，夏、商、周三朝的共同“中”。

《禹贡》借大禹治水表明，朝贡体系以冀州为中心，贡品都往山西送。山西处于“中”。商从东征

服夏，周从西征服商，都在围绕“中”。“最早的中国”，要有“国”，还要有“中”。

“中国”的成立。

没有一个文明中心，就不能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构成核心地区，同样也无“中国”。夏就是“中”。“中国”，国中之国，周围有“四国”。“国”，古文字同“域”，中国即域中，有中心城市区域。

“四国”分东国、南国、西国、北国，复数的国，每个方向，不止一国。汉代的“西域”，就是“西国”。西域号称36国，不止一个国。

核心地区，《禹贡》九州描述的范围。

不仅是西周的底色，也是秦汉疆域的主体。

地理视野。

一头一尾，都装在西周的筐子里。



壹

貳

叁

肆

伍

“蜀夏同源”。

先有禹，后有夏。

大禹率领古羌部落联盟、柏灌蜀族部落联盟建立的国家。

三星堆的地形、地貌与二里头相似。

三星堆文化承接、光大夏商文化。

二里头文化，夏禹文化。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头”，指凸起的高地，长约一公里。

文化发展序列：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三星堆文化。

“华夏第一王都”。夏朝都城斟鄩，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遗址，上承龙山满天星斗的邦国时代，下启青铜时代的巅峰殷商王朝，遥相辉映“故地”的古蜀文化。

洛阳偃师西南约9公里。

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

3 800年前，精密、复杂的大都城。

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

中心区，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由宫城城墙围起，四周井字形大路，宫殿地面下，埋一节节陶质水管组装连接起来的下水道系统，也有木结构，上面铺有木板，可以行人。

迄今，史上最早的“紫禁城”。北面，祭祀区；南边，有一个被墙垣围起、由重兵把守的手工业作坊区，里面掌握着王国“高科技秘密”、中国最早的的青铜器、绿松石器作坊……

“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等营国制度基本成型。

“王都”气象。明确城市规划、布局的框架。宫城遗址尽管仅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但城市布局的中轴对称、坐北朝南、功能分区等特征，“四合院”形制，“不让看”的封闭特点，为中国古代宫城、宫殿确立了基本范式。

世界范围少见。都邑设计上执着地追求方正规矩、中轴对称。

绝对理性的平面布局，不难让人感受到规划者对秩序的追求。

聚落布局，“金字塔式”与“众星捧月式”。

400余处聚落中，以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为都邑，周边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20万平方米左右的次级中心聚落，以及众多更小的聚落。分布等级分明。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井字形大道，大路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4车道公路。

里程碑意义。路上还发现双轮车辙痕，比最古老的车辙还早数百年。

“井”字形主干道路系统，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

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契合，显示王者的政治抱负、蓝图。

遗址宫殿区3号基址院内，3号墓葬出土玉器、漆器、海贝项链等100多件器物，其中还包括“超级国宝”绿松石龙，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实属罕见。

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院内，发现了一座高规格的夏代墓葬，发现多件陶器、漆器和一件蝉形玉器。墓葬填土中，散落多片绿松石片，推测该墓葬内会有大型绿松石器物。

社会分层、等级划分。

“九宫格”分隔形成多个网格，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家族，可能已出现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既断裂又连续的早期文明。

各地文化完成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

“中国”世界的雏形出现。

首次突破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大都邑。

气势恢宏。远眺，规划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身躯上覆盖22 983块铜板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仿佛一条盘旋的巨龙，显示着威仪四方的华夏最早王朝的气象。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兴衰与洛阳息息相关。

在《史记》里，司马迁记载：“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

《逸周书》中，也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河洛文化的内涵，就是夏禹文化。

二里头遗址，河洛文化的核心载体。

“河”指黄河，“洛”指洛河。

地处黄河中游与中下游之交汇处。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出发，路遥茫茫，并无现成河床可走，穿平原、走峡谷、绕山峦、过湖泽，北路不通，走中路；中路不通，向南行；总能拼搏、开拓出一条奔向大海的路来……

以洛阳为中心，西到潼关、华阴，东到郑州、开封，南到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大体相当于今豫西、豫中、豫北与晋南地区。核心区域，洛阳所在的洛阳平原（伊洛平原）。

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区。

洛河，潼关以下黄河最大支流。洛阳平原，由洛河、伊河（洛河支流）下游，冲积而成，主要包括今日洛阳市区、偃师市，及孟津、巩义、宜阳、新安等县（市）一部分。

黄河与洛水的交汇，孕育出“河洛文化”。

“河洛古国”，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

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

巩义河洛镇，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距今约5 300年。

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

经过精心选址、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与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

「天下之中」。河洛文化圈，南为外方山、伏牛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

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有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坛遗迹等。

三，中国古代神圣的数字。

“三重”结构，一直是宫城、皇城的“标配”。

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中心居址前，有一处面积巨大，曾被多次使用的大型夯土基址。

中心居址内房址前，以九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

北斗九星斗柄的指向，与冬至的方向吻合，表明早在约5 300年前，中原先民对“北斗”天象、“斗柄授时”的观测利用，就已非常精确。已经具有天文、人文、地文合一的初步文化观念。

房址。面积达到220平方米，位于遗址中间位置。前面，有“北斗九星”，中心，还有一头面向南、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刚好在“北斗九星”上端，对应北极的位置。

古人将北斗、极星作为整体来认识，称“斗极”，处于星空旋转的中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似乎都随北斗指向而来临。天地秩序的制定者、天地万物的中心，北极星又有“帝星”之称。

聚落布局，体现了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

表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团结、向心、中和的礼制核心。

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

“五都贯洛”。沿洛水之北，自东向西，洛河两

岸不足3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与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黄金地带。

狭义中原,指如今的河南省;广义中原,指黄河中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甚至指整个黄河流域,还包括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

“河南”行政区划,始于汉高祖刘邦所置河南郡。

郡治雒阳,辖洛阳、河南、偃师、缑氏、平(偃师西北)、平阴(孟津东北)、新成(伊川西南)、谷城(新安东)、巩县、成皋、荥阳、密县、新郑、中牟、开封等。

大体相当于河洛地区中东部。

河洛地区,夏王朝中心地区。

洛阳城,最早诞生的都城。

《禹贡》中,记载“豫州”时写道:“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伊、洛、瀍、涧四条河,水流都不长,都在洛阳市附近汇集,终汇入黄河。

这四条河,至今仍是洛阳行政区划分的标志。

“王者之里”。瀍、涧二水,流长不过50公里,却在最早的史籍《禹贡》中地位显赫,“河洛为王者之里”。从著名的二里头遗址,到如今的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遗址,都是力证。

“豫”,象形字。右边的“象”,代表着瑞兽,寓意安乐,左边的“予”,表示游乐、开心时发出的声音,放在一起,“一人牵一象”,欢快嬉戏的意思。河南简称“豫”,大禹的“杰作”。

“凡大皆称豫”。首都阳城所在州,称为豫州。

位于九州之中,河南又有“中原”“中州”之称。

《禹贡》明确表示:“豫,舒也。”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称:“豫,乐也,厌也,安也,舒也”。汉经学家郑玄说:“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

豫州东接山东、安徽,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历史上曾几度达到鼎盛时期,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

“天下之中”。河洛文化圈,南为外方山、伏牛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

古代所称“中国”“中土”“土中”,都指这一带。

地理位置优越，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

文化起源。“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还有夏商周三代诸王生活、活动的都城之地。

以洛阳为中心，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

久负盛名，又称“京都文化”“王畿文化”。

距今4 000年至3 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比现在多出200毫米以上；年均气温16℃，比现在高出1~2℃。黄土疏松易耕、富含肥力，日照充足，具备全新世温暖期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条件，当辽阔洪荒的南苗、东夷、西戎、北胡，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豫州由于农牧生产的先进、手工业经济的发达，与成都平原一样“五谷丰登”。

“北漂”来的“川军”与中原先民，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也种植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

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相符。

猪、牛、狗等家畜，肉食的主要来源。

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的牙雕蚕，呈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农桑文明、丝帛文明。

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

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一如东汉傅毅《东都赋》的描述：“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嶠之崇山。”为东西之中，居南北之中。

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可通关中盆地、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

居中央，应四方。

文明先汇聚形成，然后扩散。

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双联体”。

不独在于汇聚周边文化，更在于融合、重组后，文化能够辐射四方。

《史记》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以星月为棋盘的时代，书写在中国历史第一页的王朝，史前文明的丛林里，物流、情报、信息的中心，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

河洛文化肇始于“河图”“洛书”。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口诀：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很多人都懂得演变出易经、八卦等。

“洛书”图案：正好对应着从1到9的九个数字，无论纵向、横向、斜向、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之和，皆等于15，相当于现代数学中的三阶幻方。

《论语》中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

《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有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出现；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图”“书”，画成八卦，周文王又依据伏羲八卦完成文王八卦和六十四卦，并分别写了卦辞。

伏羲依河图画作八卦，《周易》一书的来源。

大禹对洛书进行阐释，《尚书》中的《洪范九畴》。

取法乎天，二者皆出自天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

“河图洛书”，凝结了中国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超凡的智慧、古老的原创思想，并以“母本”生发出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兵、刑、道、法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有两位洛阳人可谓成绩卓著。一位，北宋易学家邵雍，光大了易学思想，著《皇极经世》巨著；一位，“二程”的程颐，溯本求源，有《易传》和《系辞说》传世。

以星月为棋盘的时代，书写在中国历史第一页的王朝，史前文明的丛林里，物流、情报、信息的中心，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

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

和而不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大江大河具有物质、精神的双重性。

夏朝，以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为代表，当时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开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先河，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陆上。

都产生于公元前2 000年左右。

二里头文化与克里特文明，起源时间点上相同。

二里头吸收周边各地的文明要素，各个地区间的文明，从相互碰撞而被融合统一。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辐射范围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流域。克里特文明的繁荣期，米诺斯王朝不仅统治克里特岛，还包括基克拉迪斯群岛，米诺斯的商站，殖民点遍及整个爱琴海地区。

不同点，古希腊文明持续时间短，华夏文明的持续时间长。

地理上，都源于平原。古希腊是一些山间沿海的小平原，与华夏文明起源于平原相同，两者之间只是量的差异，并无质的区别。古希腊也是农本社会，与华夏文明相似。

经济上，都是农耕经济。一种以农业为主、以手工业、商业为辅的共生性经济形态，国民的主体都是农民，都具有重农的价值观，在经济形态上总体上是一致。

最大差别。奴隶劳动的不同，古代中国的奴隶劳动并不广泛，主要局限在奴隶主家庭内的劳动，从事农业、商业的奴隶很少；古希腊的奴隶在生产领域广泛存在。

《荷马史诗》神话色彩浓重，最早记载米诺斯存在的文献，被怀疑的史诗巨作。

中国夏朝完全不同，从周朝的文字记载到《史记》，从对大禹和桀的简单故事描写，到《史记中》商朝的事迹和王表，甲骨卜辞的出土将一切再次证实。



壹

貳

參

肆

伍

华夏之“夏”。

夏文化，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原始来源。

“华夏”，中国的代名词。

大禹建国初时，定都阳城。

位置在今天河南登封的告成镇。

夏启死后，太康继位。

国都从登封阳城，迁移斟鄩，即今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附近。

洛阳城市的开端，最早的名称之一。

斟鄩，较大范围的地名，包括今偃师东部、巩义西部的广大地区。

经太康、仲康、夏桀三帝王的统治，经96年。

来去匆匆。留下了承传几千年感人肺腑、催人猛省的国训“五子之歌”。

在《史记》中，司马迁借《商书》说：“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纳。”

太康外出打猎，到洛河水北岸留恋，数月不归。

“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引起诸侯不满，失去民心与支持。一向有野心，在夏王室为官的东夷有穷国首领后羿，乘机利用民心，瞅准机会，起兵占领都城，“因夏民以代夏政”。

甲骨文中的东夷，即东夷人，山东半岛早期的土著人，伏羲氏族从甘肃一路东迁，来到山东。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

2200年，山东半岛的东夷族群分化，有的分支加入了黄帝集团、炎帝集团。

“后羿射日”的发生地。

鲁国在东夷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

孔子就是鲁国人，祖先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

后羿娶夏人为妻，占领都城后另行拥立太康之弟中康为王。

夏朝第四位君主。

中国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犯上作乱”，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的五个弟弟保护着母亲，逃难至洛水之北，作委婉凄切、动人肺腑的《五子之歌》。歌中“五子”，追忆先祖唐尧、大禹的功德，感伤被民众驱逐后的羞愧、悔恨，批评太康肆虐百姓、淫游无度，丧失王权，表达对兄长的怨恨、指责，劝戒太康幡然醒悟。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对民众只可亲近，不以卑微加以轻视。

大禹在世时就训诫。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我看天下的百姓，即使是愚夫愚妇，也一定有能人。能够超越我。一人之身，三次有失，百姓怎不产生埋怨情绪呢？我治理天下民众，常常害怕民众产生怨恨情绪，害怕那样像用腐朽的绳索，来驾驭六匹大马，时刻有绳断马奔的危险。民众的可怕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治理民众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呢？！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太康兄弟借《五子之歌》，述大禹训诫。

难能可贵。“三个一次”，践行民本思想。

一次回忆、一次谈话、一次实践。

一次回忆。孙儿回忆先祖之戒的《五子之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概念。

一次谈话。大禹和舜帝、皋陶商讨政务、治国见解，首次提出民本思想的概念。《尚书》记载，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

“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知人”，执政者要知人善任；“安民”，为政宗旨。

大禹和舜帝、皋陶商讨政务、治国见解，首次提出民本思想的概念。《尚书》记载，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知人”，执政者要知人善任；“安民”，为政宗旨。《尚书》记深思熟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实施已久。

深思熟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实施已久。

一次实践。大禹治水“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带领民众治水，“禹与士民同务，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故治天下，以信为之也”。大禹不仅提出民本思想，也在身体力行。

“民”，相对“天”，天意服从于民意。对执政者，“安民”“敬德保民”为政宗旨，凡违背就失去政治的合法性，就有新的执政者代行“天之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民(之)主”。

《尚书》中，有更多的民本思想的记述。

《泰誓》篇，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洪范》篇，记载周武王说“天阴鹭下民”，上天在冥冥之中，保佑安定下民。

《召诰》篇，总结夏、商、周更替的历史教训，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坠厥命”。

《多方》篇，说“天惟时求民主”，天总是寻求能够“敬德保民”的人作民之君主。

《蔡仲之命》篇，提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只辅佑“敬德保民”的君主。

《五子之歌》，中华文化史上第一部国训。

太康的孙辈、遗腹子少康，立志复国，凭借个人魅力，广施德政，得到夏后氏遗民的拥护，经过周密的策划，通过用离间、行刺等手段，以弱胜强，重回斟鄩，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血脉。

不离不弃。“打仗亲兄弟”，伯益后裔的斟灌族、斟寻氏遗民与夏禹的后裔，组成的军队，扶助少康即位。“复禹之绩”，忠肝烈胆的形象被后世称道，“二斟”成忠义之师的代词。

史称“少康中兴”。

历史意义。后世帝王从专注于富国强兵，以军力夺取天下的治国之道，转移到聚集百姓的民心上

来，为后世的“德政”“仁政”思想埋下种子，作用举足轻重。

少康复夏后，又令“二斟”后裔，重建斟灌国、斟鄩国。

《汉书》记载，夏古斟灌国当在山东寿光、平寿两县之间，今天的潍坊市潍城区一带。

“商汤伐夏”，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北方黄河流域以商部落为首领的部落集团，发动了对南方淮河流域以夏后氏族为代表的华夏集团的战争。

杞国，夏禹后裔建立的姒姓国家。

夏朝亡后，商汤封杞国，夏的后代被汤流放到杞国，今开封杞县一带，以奉夏后氏祀。周武王克商，求禹后裔东楼公，为方国，封之于雍丘。保存夏礼。

甲骨文中的“西邑”，应是夏朝。

商朝称前朝为“夏”，周朝称商朝为“商”，《尚书》等称为“殷”。“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商朝的伊尹，说自己曾就亲眼看到“西邑夏”，君主能够保持忠信而善终。

周人称商为“大邑商”，自称“小邦周”。

夏商时期，都城称为“邑”。

《白虎通》：“夏曰夏邑，商曰商邑。”

《诗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看到商朝首都繁荣发达，周人心生崇拜，用“大邑”来称商朝。同样的记载，在《礼记·缙衣》和《清华简·尹诰》中，也有出现。相对于发源于东方的商人，夏朝的核心地区河洛一带位于西方，称为“西邑夏”。

商灭夏后，商人在洛阳一带建立新的亳都，称为西亳。

商朝时期，主要由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上层阶级的贵族，更关心战争，夺取土地、财富和奴隶。土地是财富的基础，权力代代相传。

“西邑夏”一词，符合商人的用词习惯。

夏代部族处于联盟状态，疆土并不明确。都邑也因暴乱等原因，屡经变迁。族群、部落在某个河谷平原，建起四座城墙一围，住城里，叫国人，住城外，叫野人。相较广袤无垠的荒野，城邑数量很少，城与城之间空白大片，信息不通，别国军队偷偷越境都不知道。

都邑的分布，主要控制区，豫西、豫东、豫北、鲁西和晋南部分区域。

核心控制区，豫西地区的洛阳盆地附近，史载“有夏之居”。

地理位置。亚欧大陆的最东端，大海，再向东，没有任何民族可以入侵（古代日本没有条件入侵）；西南高山，有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阻止西方的外族入侵；东南和南面是大海、丛林、山区……

热带、亚热带雨林，不太适合人类的发展。

黄河、长江流域一带，有适合耕种的华北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成都平原等，有利于华夏民族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逐步向四周稳定扩张，形成足够庞大的人口规模。

北方，即夏朝的东方威胁最大。

东方，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危险，也正来自无险可守的东方平原。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内部混乱，东方华北平原的商人，通过“西北走廊”，与西域的游牧族群交流、融合，学习战马、青铜冶炼技术，在三方争霸中逐渐强大。

两种文化的遭遇、碰撞和调适。游牧内亚与农耕中国，分界线并不清晰，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内亚政权之间，都保留过渡地带，保持空间、文化和人群的部分重叠关系。

商部落的历史，可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商族的先族东夷人，活动在商丘一带。

部落始祖，叫“契”。

黄河冲积平原区一个古老的部落。

著名传说。《诗经》记载，“天鸟有感，降而生商”。

五帝时期，帝喾娶有娥氏（今在山西永济西）之女，又称简狄。

“应感而生”。有一次，与两个姊妹一起去洗澡，突然天上有一只玄鸟（燕子）飞过，三女发现岸边留下一枚玄鸟蛋，简狄争抢到，一边跑一边把蛋含在嘴里，一不小心吞进肚里，便怀孕。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后世就杜撰一个美丽的故事，以免尴尬。完全神化、贴金，后世许多帝王将相出身时，几乎都有“异象”。

一个比一个神奇：天雷地火，霞光万丈。

《史记》记载，商的先祖契，与大禹同时代。

帝喾的妃子简狄所生，帝尧的异母兄。

《尚书》记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

契，又名高，商丘人把契叫作“阍伯”。

历史意义。后世帝王从专注于富国强兵，以军力夺取天下的治国之道，转移到聚集百姓的民心上来，为后世的「德政」「仁政」思想埋下种子，作用举足轻重。

阆伯当年建的观测火星的土台仍在。

位于商丘睢阳区商丘古城西南3公里处，又名火神台、火星台，比东汉时张衡在洛阳建立的灵台，要早2 200年，甚至比周公在嵩山脚下建立的测景台（观星台附近），要早1 000多年。

商族的起源。帝尧时期，契跟随大禹一起治水九川，铸鼎九州，又遵从舜帝的指示，担任司徒一职（相当于如今教育部长），出色表现，舜帝分封“商”地（今河南商丘），赐姓“子”。

“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

阆伯之孙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六世孙王亥又发明了牛车。

商丘是先商、商业的发祥地。

下传十四世到汤。

王位继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励精图治。汤即王位后，商国逐渐发展壮大，开始兼并战争。

公元前1600年，占领伊洛平原后，建都西亳（洛阳偃师商城）。

亚洲人进入农耕时代，欧洲人才进入游牧时代。

新一轮小冰河周期，在欧亚草原生存的游牧族群，生存难度不断加大。拥有一大片原始森林的古欧洲，比较适宜穴居巢眠的人生存。

在欧亚草原，欧洲人进化长达4 000年。

一批批欧洲人，走出原始大森林，来到欧亚草原过游牧生活。这片区域，人类贸易交流、战争称霸和民族迁徙的大动脉。世界史上的众多大事件，都以内亚区域为轴心展开。

文化区块链。四方文明成果的交会之地。

绵延不绝。迫使一波波的“蚩尤”们，沿着“西北走廊”南下。

危险和威胁，随时存在……

炎黄二帝形成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到了大

禹、商汤时代一直没散。

由小氏族进化到大部落的“蚩尤”，首批进化到大部落的欧洲人，南下到黄河流域，掠夺农耕文明。继被炎黄二帝联盟打败，又遭夏朝军队重击，一批批的“蚩尤”，改从西线南下……

黄河流域的诸侯方国，发展空间受到“蚩尤”挤压。拥有马车族团的商汤，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一带建都立足。

公元前1300年前后，正值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时期。

“西亚文化圈”。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亚述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哈拉巴城，崇拜的偶像是“舶来品”，美索不达米亚的公牛、独角兽。印度河文化的范围很广，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至纳巴达河，西自伊朗的莫克兰海岸，东达恒河平原的边缘。还有尼罗河流域，都相继出现了大小不同的城市……

商势力不断壮大。

《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在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

夏王朝镇守东方的哨所。

郑州新郑北的望京楼。

一座防御色彩比较浓厚的城址。

超过100万平方米。古城墙有7公里长。

望京楼城南、北、东三面，有护城壕，西面“假河为壕”，组成封闭的空间。

最为雄伟。望京楼西南靠着具茨山（大隗山），战略缓冲空间足够，西距二里头约100公里，南北与二里头文化重镇大师姑、稍柴、蒲城店的距离，都在100公里以内，没有骑兵的时代，距离半径，步兵在三天之内，能轻易地覆盖；东临一望无际的豫东大平原，正好位于中原地区山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扼守着南北向、东西向的交通要冲。

防线核心。望京楼位于二里头东部外围区域，由北往南，还有郑州大师姑城、东赵和平顶山蒲城店城，共同组成夏王朝的东部防线，拱卫伊洛核心区。望京楼遗址，处在防线的最东部。

媲美古埃及、古巴比伦。

克里特岛上的“度假别墅”难望其项背。

武丁从中原出发，南下远征。

向南有条古道，经洛阳盆地，到达南阳盆地，再经过湖北随枣走廊，就到长江边上。

摧毁夏朝南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盘龙城（今武汉），将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商人在武汉，建立大本营，成为商王朝控制南方战略资源的中转站，一度成为商业中心。

还在今湖南岳阳一带，建立了军事前哨（铜鼓山遗址）。

孤立无援。夏末商初，盘踞在夏朝东北方的商人，在商汤的带领下，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了黄河之南。雄心勃勃、一鼓作气，突破夏王朝的东方防线，并攻入夏王朝的核心区域。

《说苑·权谋篇》记载：“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诗·商颂·长发》记载：“韦、顾即伐，昆吾夏桀。”

夏末，晋中南土地被占领，周人的祖先被迫西迁于“戎狄”。



壹

貳

叁

肆

伍

豪杰辈起，风云变幻。

夏朝，山河江泊经年祸乱，部落家国战乱不休。

万物初蒙，教化未始。

至九鼎立、九州和，却又创造传承至今的文明。

地中海的每一个“文明”遗址，都只有几千人的规模，“二里头文化”的规模估算至少15万人。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头文化”才像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都城。

持续300多年。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6世纪中叶。

二里头古国，几乎涵盖了河南全部，山西的运城、临汾盆地，陕西的关中地区东部。以今天河南省16.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推算，二里头古国的面积，即便不计“五服”之地，也不算“北漂”来的“川军”之前所在的川西高原、成都平原，仅以王畿文化之域看，4 000年前的二里头古国，就有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遵从同种类型的文化。

今天，英国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德国为35万平方公里，法国为55万平方公里。

世界同期，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王朝；在北非，夕阳照耀着埃及人神秘的金字塔，这一景象已历千年；在欧洲，地中海的爱琴海上，克里特岛呈现出米诺斯文明的异彩。

与成都新津宝墩文化同期，印度河谷的哈巴拉文明全面崩溃。

古埃及第二中间期、米诺斯旧王宫时代，被外族入侵中断。

大禹称王后，夏代历法颁布于九州邦国。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夏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

“夏时”，夏代记载物候、农事的历法。

简奥古老。夏代遗留的物候、农事历法《夏小正》。

古杞国，夏禹后人居住的地方。

有夏朝的天文台遗址。

位于开封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村。特殊建筑，内墙呈圆形，外墙呈方形。内圆形、外方形的房址形制，立杆测影的地平式日晷盘。外方内圆，象征天地，圆室内巨大十字，象征太阳。

敬畏历史。孔子是个“优秀的记者”。

春秋时期，夏代礼仪、历法等几近失传。当孔子到杞国“采访”时，发现“夏时”的存在，立刻挖掘。这在《礼记》中有明确记载：“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做过“随军记者”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追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周灭商后，继续分封杞国，负责夏代君主的祭祀之礼。周王室衰微，弱小的杞国屡受宋国与淮夷等排挤，迫不得已，迁往山东。曾经由鲁国人牵线搭桥，还曾与强大的晋国联姻。

礼崩乐坏的时代，即使在夏朝故地杞国，也无多少夏礼的影子。孔子能采访到“夏时”，是对其孜孜不倦的奖励。再往后，杞国内乱频发。公元前445年，上千年历史的杞国，被楚国所灭。

杞国的灭亡，并未掀起多大波澜。

数十年后，在《列子》中，记录了《杞人忧天》的故事。杞国有个人，整天担心天地崩坠，自己身无所寄，因此寝食难安。为让他打消疑虑，别人讲了很多当时的自然观、宇宙观。

孔子周游列国时，从卫国、宋国，到陈国、蔡国的往返，必经之地。

“子畏于匡”。鹿台岗南部数百米处，大禹开发的汴渠古运河，今为惠济河；南部直线约14公里处，为孔子路过的睢县古匡城。带领诸多“记者”（弟子）周游列国时，孔子曾途经匡城。

《庄子》中记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之地。

路过今杞县东部一个村子时，饥饿难耐。

无奈之下，一名弟子在村子附近逮了只鸡，煮熟让孔子吃。孔子

春秋时期，夏代礼仪、历法等几近失传。当孔子到杞国「采访」时，发现「夏时」的存在，立刻挖掘。这在《礼记》中有明确记载：「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知道后，训斥弟子一顿，亲自到村里赔礼道歉。后来，人们为纪念孔子，就把村子称作“赔情店”，后演变为“裴村店”。

农历雏形。孔子发现“小场面”的《夏小正》，“夏历随笔”集，记录一年各月的天象、气象、大量的物候、农事活动等。“行夏之时”，也称“夏时”，或“夏历”。

杞国保存下来的夏历，得到了孔子的推崇。

鲁国大夫梓慎精通天文，称“夏数得天”。

面向全民的历法、农书，已经把天体运行、时令变化、动植物发育与相应的农事活动系统研究，寻找最佳对应关系。正月，梅花、杏花、山桃花开放，田鼠出没；二月，燕子飞来，春耕开始；三月，采桑养蚕，并“祈麦实”，期许麦子丰收；四月，“囿有见杏”，天气容易干旱……到十月，天气转冷，“王始裘”，一年的农事，也就到了尾声。

全文共463字，“经”“传”两部分组成。

《尚书》中，进一步确认：“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继承自夏王朝的殷商，完全可能收集、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物候星象等资料，甚至编辑成书，也在情理之中。

《夏小正》流传至今，已有不少增删。春秋时期，孔子曾“正夏时”，对《夏小正》的内容进行整理；西汉时，戴德在《大戴礼记》中，收录《夏小正》，又增加不少注释。

“观象授时”。记载了恒星、北斗、银河等，出现时间、位置的变化，表明当时人们对季节、时间的掌握精准，季节性很强，农业发达的必要条件。到了东周，孔子还主张“行夏之时”。

《尚书》称，尧时以羲和为天文官，“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夏代观测天象的水平更高，无论是仲康时发生的日食，还是夏桀时发生的流星雨，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记录。

商灭夏后，曾改夏历为殷历，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称殷正。

夏代“以天明为朔”，商改为“以鸡鸣为朔”。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公历，也称“阳历”，为国际通用历法。

农历，也称“夏历”“阴历”等，为中国传统历法。

历代王朝都重视历法编订。从《夏小正》，到唐代“大衍历”，再到元朝郭守敬《授时历》。

文中，有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的记载。

“养日”“养夜”，如同《尚书》中的“日永”“日短”，意为白天最长、黑夜最长（白天最短）。五月，白天最长月，相当于今天的夏至月；十月，白天最短月，相当于今天的冬至月。

夏至月至冬至月，间隔五个月，不是现行农历的六个月。

共有55条物候记录。据统计，书中记述植物物候18条，有动物物候37条。

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知最早的“物候”专篇。

“物候”，生物长期适应温度条件的周期性变化，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生长发育节律。现象称为“物候现象”，主要指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活动规律与非生物的变化对节候的反应。

何以叫小正？“正”通“政”，古人认为国家大事只有祭祀、战争，“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夏小正》里记载，都是农猎渔等生活活动，是小政，故而得名。

《诗经·七月》，一首记叙许多时令、物候的长篇诗歌，与《夏小正》关联最大，同用的古夏历，也就是十月历。用词的相似度高，物候、天时与时令、节气庆祝等也高度相关。

《夏小正》：二月有鸣仓庚；《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夏小正》：二月采蓄；《七月》：春日迟迟采繁祁祁。

《夏小正》：三月摄桑；《七月》：蚕月条桑。

……

文明继承。周王朝与夏王朝相关性极强。周朝的先祖后稷，《史记》记载：“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又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周朝的先人。夏朝时期的农业部部长、大禹的助手。

叶落归根。死后葬在故地、古蜀王蚕丛开辟的都广之野——成都平原。

“夏周同源”。

周王朝才会在前期，沿用夏王朝的历法。

《礼记·表记》中说：“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天命观上的变化。夏朝时，对鬼神怀有敬畏之心，但更尊重天命自然，跳过画风不同的殷商，到与夏王朝“同源”的周朝，同是“事鬼敬神而远之”，精神内核却已是云泥之别。

《夏小正》的“表现”，更贴近于直觉、古朴的天地观。

夏朝的粮食产量，提高显著。

夏王杜康（少康）擅长酿酒，族民在古蜀州就已掌握酿酒方法。

原料高粱一类的谷物。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能看到出土的稻壳、粟壳，还有镰刀等农具。根据《夏小正》中的描述，夏代种植的农作物有稻、麦、黍、粟及瓜、豆等，相当丰富。

与成都平原种植的农作物大同小异。

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部夏朝科技、文化的“史记”。为我们展现4 000年前的星空下，夏朝人勤劳、充实，对自然的用心观察、热爱生活的一幅幅绚丽的画面……

正月来了，柳树开始吐苞生长，梅、杏、池桃也陆续开花，韭菜绿色。

要绑好绑带，开始打理田地：除草。

躲着过冬的动物，蠢蠢欲动：蛰虫开始出土；鱼跳出水面透气；田鼠出来觅食；山里的野鸡，不停地扇动翅膀；叫声传得很远；大雁开始往北飞；天气要变暖，母鸡也在加紧孵化小鸡。

祭祀不能松懈，要采一些芸草备用。

二月就要播种了，羊妈妈开始帮助羊羔独立吃草，不再喝奶了。小虫逐渐多起来，燕子也回来做巢。运气好，在田地里还可以捕捉到黄鳝。葵、蒿等，也可以采摘回来做食物。

到田里翻土种稷。仪式不能忘，要举行大规模的释菜礼。

三月，桑树萌发，杨树抽枝，桐树开花，斑鸠鸣叫，该忙碌了，不

「二里头」，遭到「长城·藏羌彝」传播带文化因素的大规模渗透，中原地区经历了一次新的文化洗牌。大量古蜀文化因素涌入，融入中原，一个经过重铸的「中国」，已呼之欲出。

分男女贵贱，都要投入到采桑养蚕的重要活动中来。

四月，蜻虫、蛤蟆开始鸣叫，要训练小马，朝见君王时，最好的礼物。

五月，伯劳鸟、蝉鸣叫，吃瓜的季节，瓜熟蒂落，口味正好。水里，虽有很多细小的动物游来游去，让人不舒服。既可烹煮梅子，也可采集菽熬粥解暑，启灌蓝蓼，即种植蓝草。

《说文解字》中说：“蓝，染青草也。”有它，就能为丝织品染色。

六月，煮山桃储藏起来作为食品，鹰开始搏击捕杀小动物。

七月，芦苇开花，池水中长出浮萍，扫帚草长成，寒蝉开始鸣叫，雨也下得多些。

八月，收获季节，开始采摘成熟的瓜，枣也开始剥取，各种瓜果都可以收割。山里的动物也已经长大，打猎的最佳时机。只是有点冷了，君王也带头穿上皮裘衣服。

九月，大雁迁往南方，燕子升空飞去，各种野兽入穴，菊花盛开，要开始种麦。

十月，白天变短，捕捉野兽的时节来了。祭祀过后，大家聚餐分享美食之时。

十一月，国王进行狩猎活动，陈列精良的弓箭，麋鹿坠落了角，商旅不行，万物不通。

十二月，鸷鸟高飞鸣叫，昆虫潜入地下，掌管水泽的虞人，设网捕鱼。

夏朝的有关史料、商朝的甲骨文中，保留中国、世界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

干支纪日法。商朝历法的最大成就，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纪日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创造的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比欧洲早2 000年以上。

《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世界上公认，比欧洲早600多年。

春秋时期的立法，已经形成固定系统，基本上确立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比西方早160年。

丰富的天文记载。楚人甘德、魏人石申，各写一部天文学著作，合称《甘石星经》。

军事也颇为发达。战役中，军中使用了战车。

《左传》记载，夏禹时奚仲为车正。

“车正”，管理战车的长官。

夏朝初年的奚仲，发明马车，中国科技史上一大创举，“引重致远”成为可能，在战争与生产生活中，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人们的远程交通条件、战争的机动性，加速国家统一的步伐。

造车有功，“龙心大悦”。

夏桀封他为“车正”，负责“舆”的制造、运用和推广。

驻马店平舆，成为中国车辆的发源地，名传古今。

《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记述了奚仲造车的史事。《管子》一书，给予高度评价：“奚仲之为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施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

《甘誓》记载。夏朝军队阵型，左边弓射手，右边长矛手，中间是马车、牛车冲击手、指挥官。

军事阵型先进，一直延续到商朝军队。

夏朝早期战场武器，依然是打磨精致锋利的石器为主，青铜器虽然已经出现，数量稀少，铸造大型武器，还不具备，短刀短剑，也仅在贵族将官们身上携带，作为短兵近身攻击性武器……

中华文明史不断溯源向上。

“二里头”，遭到“长城·藏羌彝”传播带文化因素的大规模渗透，中原地区经历了一次新的文化洗牌。大量古蜀文化因素涌入，融入中原，一个经过重铸的“中国”，已呼之欲出。

经历更多的碰撞。

“长城·藏羌彝”“长江·沿海”两大文化传播带。

“Y”字形，优美的“中国弧”。

向世人展现出了更为壮丽的图景。

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以领先的姿态，完成第一次整合。

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大主体文化。

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晨光中誓师治水的“汶川之会”，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土地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虽已经历数千年风风雨雨，却仿佛让人看到古羌部落联盟、蜀族部落联盟数万人，从汶川出发，由西蜀向东，浩浩荡荡，迤迤邐邐……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二里头都邑建设中挥汗如雨的场景。静下心来，仿佛还可以看到鳄鱼成群、大象孤独。

古老的巨兽，沿着河床闲逛；饥肠辘辘的夏民们，手持棍棒正在逼近。

大象的悠闲之间，笼罩着末世的阴影，人类的文明却正在拉开新的序幕。

神秘王朝为中华文化留下的财富，永远不容忽视。



盘庚的侄子武丁“修政行德”。

商朝历史上有名的一代雄主。

一位被古人称为贤君的存在。

《晏子春秋》中，将武丁与汤、太甲、祖乙，并称为天下之盛君；左丘明也称当时君王皆不及武丁；孟子则将其称为贤君；司马迁更是认为“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靡，殷道复兴。”

商朝逐渐衰微，导致不断有方国叛乱。

武丁即位，立下大志要复兴商朝，励精图治。

任命傅说为相，整治朝政，征服诸侯。

通过三大措施，强化王权。

强调“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的君臣秩序。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改革用人制度，加强商王对官员的任免权。建立任人唯能、任人唯贤的规则，力图改变盘庚强调的“惟图任旧人共政”的用人模式，取得了对官吏的最终任免权。

“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

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

商代前期，与王权对立的贵族主要依靠神权。

神权成为对王权的主要威胁。

武丁提出，“黜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

难”，对祭祀进行改革。

在军事上设立常备军，制定征兵制度，军队编制分为左中右三个师，计三万余人，作战方式有步兵战、车兵战等。

伟大创举。《管子》中，记载商人祖先相土、王亥，分别驯服马、牛，作为家畜，拉车运货。农产品、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带来剩余生产资料，用牛车、马车代步，产生商贸活动。

“立皂牢，服牛马，以为专利”。

部落首领王亥，率领族人赶着牛羊与外部落交易。

坚持以“诚信”“仁义”为本，平等交易。

开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史称“高祖亥”。

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最后一次贸易。

有易氏想空手套白狼，杀了王亥，强占货物。发生在3700年以前的刺杀，是因财物的争夺，还是氏族的颜面，抑或是一场王权阴谋，再也无法知晓，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桩不解的悬案。

王亥被称为“中国商业的鼻祖”。

商人从事贸易往来的范围，也随部落的强大而扩张。

具备远洋航海能力。《诗经》介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飘扬过海，做起生意。商朝器物“父乙盘”“手面纹鼎”，上面刻着商朝人担贝乘船，在海上贩运货物的图像。

在商朝与周初，买卖人被称为“贾”。

在贸易领域，商朝遗民非常出色。《尚书》中，周公劝战败的商朝人继续从事贸易以赡养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羊厥父母”。

春秋时期，“商人”，用来称呼所有的买卖人，沿袭至今。

《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

弦高救国。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秦国军队，得知秦军要去袭击郑国后，他一面派人急速报告敌情，一面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为礼物，犒劳秦军。

秦军以为郑国已知偷袭之事，只好班师返回。

郑国避免一次灭亡的命运，君主要奖赏弦高。

弦高婉言谢绝：“作为商人，忠于国家理所当然，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

武丁时期，随着对外征伐、开疆拓土，委派统治族的族众，到归顺的侯伯、新征服的土地去开垦荒地。围戍性质的垦田，不但加强了

国防,也扩大了生产基地。“商人”全程参与。

铁腕谋国。内部有所改善,开始寻求“安外”。

“地处边缘”的“循环”,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超越帝国与边界。中亚草原地带,才真正成为亚欧大陆的枢纽地带,也是一个川流不息、车水马龙的人力、商品和各种资源流通的大通道。

没有民族对立。只有掠夺者、劳动者的对立。

游牧族群带来很多东西,小麦、青铜器、冶金等。

商朝并非铁板一块的政治机器,富有弹性的文化构造。

平时驰猎经商,战时出征打仗。社会组织、生产生活方式,都宜于征战。能够与入据“西北走廊”的游牧民族碰撞,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接受中原文化,提高社会组织上的效能。

在“地处边缘”中,遵循着一定的秩序,不断“循环”。

崛起集团初起的锐气、消化游牧民族惯于征战的天性、全盘接受华夏民族先进文化,几种力量形成“合力”,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至少在军事上,强于夏朝。

军事实力强大。

殷商军队,征服了东亚西边的众多游牧民族。

通过不断收编周围方地,拓展耕地面积。

贤人甘盘,尊之为师;罪犯傅说,举以为相。除了甘盘、傅说两位人才外,还有祖己等大臣。在他们的辅佐下,殷商灭躬方,亡土方,平西羌,定荆襄,开创了“天下咸欢,商道复兴”的大局面。

王朝形成的广大疆域。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中国边疆族群很多,大都有强大的武功,最后,边疆族群大都消融在中原文化里。中原在历史上都是一个中心,不是地理中心,而是文化中心。

如影相随。文化消融,族群也跟着消融。

资源储备,非常丰富。

成熟王国,以族群为单元的等级社会。《尚书》中的《酒诰》,记载了官僚体制,“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各司其职,承包到户。

“内服”,国王身边的“百僚”,负责各种事务。

发展势头非常凶猛，农业水平、军事实力强盛。

商代后期，畜牧业相当发达。

献祭祖先用牲最多可达“三百牢”（300头）。

除了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外，手工业也同样发达，铸造的青铜器实用、精良，有戈、矛、钺等。不仅成功攻克周边国家，也成功打赢了发源于欧亚草原欧洲部分古印欧人中的雅利安人。

至少发动了大小60多起战役，将国土面积极大向周边扩张。

史书将统治的59年间，称为“武丁中兴”。

鼎盛时期，人口500万到700万。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12万至15万的兵力，武器装备，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冑等，多用青铜铸造。

《汉书》评论：“内举傅说，授以国政，外伐鬼方，以安诸夏。”

雄主作派。武丁，一位没有门第观念、男尊女卑思想的君王，任用出身低微而有才能的傅说为相，让妻子妇好指挥大军，文治武功，终使“殷国大治”，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王国之一。

武丁妻子“妇好”，不但是配偶，还是战将、臣僚。

集王后、母亲、将军于一身……

中国最早的杰出女政治家、军事家。

非同一般的出身和见识。

商朝的很多国策，都是妇好制定。

嫁给武丁前，下属或周边部落的母系部族首领、公主。

全能王后。“妇好”并不姓妇，妇是属性，姓倒过来，姓子，“妇”为亲属称谓。嫁给武丁后，封地为“好”得名。铜器铭文中，又称“后母辛”，因庙号称辛，即乙辛，周祭卜辞中所称的妣辛。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

中国边疆族群很多，大都有强大的武功，最后，边疆族群大都消融在中原文化里。中原在历史上都是一个中心，不是地理中心，而是文化中心。如影相随。文化消融，族群也跟着消融。

出身贵族, 漂亮, 喜欢修饰打扮, 品貌双全。

深受武丁宠爱, 却没有恃宠而骄。

前后立过三个王后, 妇好是原配。

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祭祀与军事, 中国古代的政权根本。

祀与戎都不让须眉。虽是美丽女人, 行军打仗, 疾如风, 徐如林, 侵掠如火, 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 动如雷震。既是中国有史记载以来, 第一位巾帼女将军, 又任占卜官, 经常受命主持庄严神圣的祭祀, 代表商王祭天、祭先祖、祭神泉。堪称“三位一体”的“女武神”。

职业女性。内外兼修, 学识渊博。

女祭司。地位极高、学识超凡。

祭司, 职业在当时地位非常崇高。先秦时期, 神权与王权并重, 带兵打仗和祭祀祖先, 都是最高统治者干的活, 祭祀是最重要的国事活动。武丁倒是像女王背后的男人了。

祭祀种类丰富。

人们崇尚天命, 迷信鬼神, 有任何重大事情要祭祀占卜、祈问鬼神。

地位至高。为天地祭祀、祖先祭祀、王室中已经去世的人, 为驱除灾祸、疾病举行祭祀, 在出征作战前, 以求平安等。担任祭祀占卜官的妇好, 盛装站立在祭坛旁的显要位置, 高声诵读祭文, 参加仪式的奴隶主贵族、平民, 个个衣冠齐整, 肃穆端庄, 随着号令进退跪拜。并把牛、酒, 当场杀死的奴隶和战俘等作为祭品, 奉献给享祭的神明。

在王室中, 学识超凡, 文化研究很深。

渊博的知识, 卓越的见地和高贵的身份才能, 拥有通神愉鬼的能力。

中国历史上皇权背后的智慧女性。

最高祭司。曾多次主持各种类型、各种名目的祭祀。

在祭祀中, 会用酒, 也会用火; 会屠杀牲畜, 也会屠杀俘虏。

占卜讲究, 常常是用火烧炙整治好的龟甲, 使龟甲兽骨烧裂出焦纹。占卜人再根据焦纹的纹理判断凶吉, 决定事情能不能做, 并将占卜的结果和以后发生的事情, 刻写在同一块甲骨上。

整治龟甲兽骨，占卜前重要的准备工作，将龟甲上残留的肉渣、皮筋等除去洗净，如果龟甲兽骨不经整治，烧炙不出焦纹。等整治干净的龟甲兽骨干燥后，会再用特制的青铜钻，在上面钻出一定数目、间隔的小圆孔，以备占卜时用火柱烧炙。

卜官不仅要亲手整治龟甲兽骨，还要将事记录成卜辞，刻写在甲骨上。

甲骨卜辞中记载，妇好曾因为国家发生的一场可怕瘟疫，受武王之命，举行一场相当盛大的祭祀大典。此外，还为王室中去世的祖母祭祀过。还有一次，祭祀的是一口神泉。

商朝第一次征兵出战，就是源自于妇好的占卜之术。

南征北战。巾幗不让须眉。

驰骋战场，为国献身。

国宝“妇好鸮尊”，武丁为奖赏妇好，3 000多年前的“私人定制”。

夫妻情深。妇好接受奖赏封地，也没有因为是王后，因私废公，为管理自己的封地，经常离开王宫，到封地去生活。一位经济独立的贵族领主，拥有庞大的仆从群。

更是一位爱喝酒、爱美、擅长装饰的艺术鉴赏家。

拥有自己独立的嫡系部队3 000多人。

普通小国的全部兵力，也达不到这个数目。

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奴隶民人。

兢兢业业。处理封地内的大小事务，依旧按时交纳朝贡。

封地，商王朝最富庶之地，向丈夫交纳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诸侯的礼仪来办理。经济独立，能够为自己铸造大规模的青铜制品，现存于世的妇好偶方鼎，其中之一。

虽然常因征战、理政与武丁分别，仍然为商王生育儿女。

感情上，夫妻；事业上，伙伴。

并不满足于做不问国事的宫闱佳人。

一位伟大的中华女战神。与宫斗剧中在后宫明争暗斗的女性不同，并不以处理王族家务著称。相反，一名鼎鼎大名的军事统帅，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

商王朝频繁用兵。

战争不仅是男人的事情，无情的杀伐，也将女人卷入。

武丁，一位没有门第观念、男尊女卑思想的君王，任出身卑微而有才能的傅说为相，让妻子妇好指挥大军，文治武功，终使「殷国大治」，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王国之一。

一领锦袍殷战血，称得云鬓婀娜。

爱“武装”胜过“红妆”，从小就喜欢研究排兵布阵和学习武艺，身为王后却舍弃相夫教子传统，用自己的才能帮商王处理政务，更是勇敢表达自己想上战场带兵打仗的愿望。

商王顾忌妇好的多重身份，犹豫不决。

直到“西北战争”打响，两方僵持不下，甚至“兵临城下”。焦头烂额时，妇好自告奋勇替商王征战，竟大获全胜。用自己的实力，向商王和朝臣子民们证明，女子也可以当军事统帅。

胸怀千万精兵，魂魄与本色。

身为女子，勇于担当重任，敢于上战场为国杀敌。

能征善战。一个传奇，一个神话。

妇好凯旋时，武丁总是出城相迎。

有一次，一直迎出80多公里。

经常并肩作战。

征伐巴方，精彩战役。战前，夫妻议定计谋，妇好在西面做好埋伏，武丁带领精锐部队在东南面突然袭击，配合完美，形成巨大包围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伏击战”。

带领着各自的部属，得胜归来。

郊外“邂逅”，喜不自禁。

二人策马扬鞭，并肩驱策。

小别胜新婚。忘记了国王、王后的身份，远远地甩开自己的臣下，湛蓝的天幕下，一幅纯净的丝绸，铺满了一大朵一大朵洁白柔软的云块，高远、洁净，如明镜一般的古睢水，倒映着湛蓝的天空，相互映衬，构成一幅静谧美好的图画。

追逐打闹，奔跑，一同分享胜利的喜悦……

既爱且敬，浪漫并骑。

琴瑟合鸣。在史官鞭长莫及之地，琴瑟和鸣的恩爱之景，应该更多。

武丁意开疆扩土，妇好就是冲锋陷阵的将军；

武丁欲向上天祈祷，妇好就是最好的传达者。二人在事业上是政治伴侣，在家庭上是佳偶天成，一生幸福美满，开枝散叶，其乐融融。

堪称绝配，被称为伟大的王后。

开疆拓土，战功赫赫。

指挥有方，身先士卒，率兵征讨作战，击败小国多达20多个。

商，基于“众人”的社会。

周，基于“庶人”的社会。

商朝，女性的社会地位高，有独立的财产、人格，甚至可以拥有封地、军事指挥权，甲骨文中可以见到大量的女巫、女性小臣、女性史官，方国中的女官等。女性作器，明显多于周代。

一个商业国家，需要占据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更注重契约、形式。为了保持商业行为的持续性，不与外族通婚，一律实行“族内婚”。即便到了春秋时期，后裔的宋国也是“族内婚”。

人口的流动性强，后来把军队贸易的人，称为“商人”，对海洋的探索，与西方文明接近。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的商业文化，社会形态商业文化转向的多元文化，认识契约，重视差异。

商朝时期，中西文化同方向。

中西文化分野，在周朝。

城市中，全民祭祀，处处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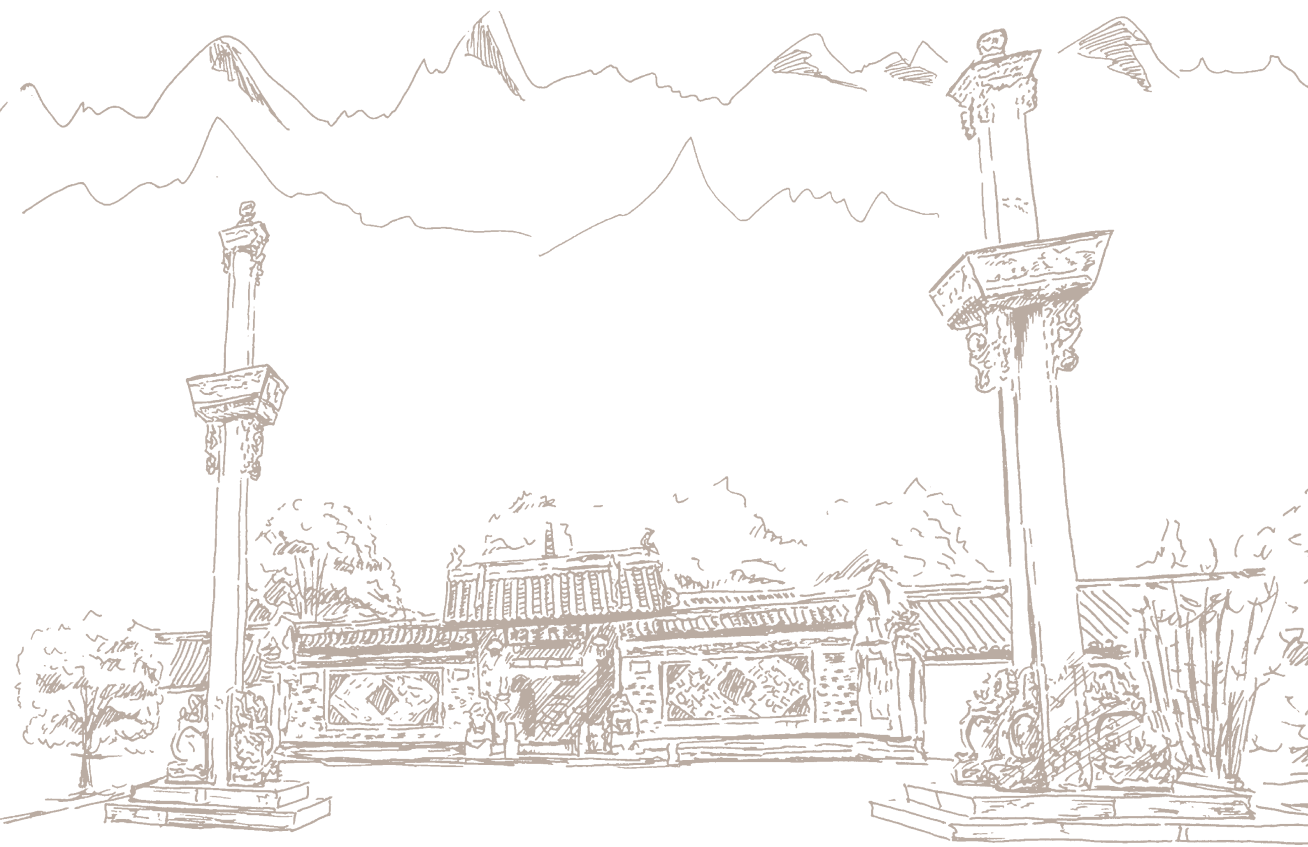
想象驰骋。与树对话，向山高歌。

呼吸新鲜空气，沐浴灿烂阳光，饮食山泉蔬果，倾听鸟儿欢唱……

日月同辉。长江、黄河，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

夏朝发明牙璋，具有中原文明色彩的文物却在三星堆出现，还传到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三星堆成为华夏文化向更广阔地域辐射的纽带、加油站。华夏文化里的每个文化圈都超越地理局限，相互又重叠。

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至少与9种早期文化「循环」。通过汉中，与关陇古代文明交流；通过岷山羌藏地区，与山地游牧文化有交通；通过东面的巴濮地区，与长江中游相沟通；通过横断山区河谷交通线，与冰雪文化相勾联；通过南面的夔道，与「西南夷」交流……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



壹

貳

叁

肆

伍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

夏末商初，就在与中原地区华夏文化融合成长时，早于夏朝的古蜀国，大禹父子开启“江原文化”的故地、最早进入“中国”文明形态的成都平原，已经提前完成向奴隶制的转变。

经历300多年尖锐、复杂的斗争。

第四代蜀王杜宇，在融合蚕丛、柏灌部族的基础上，取代鱼凫。杜宇王朝国力强大，建立在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成都平原传统稻作农业普遍推广，治水患、兴水利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

文治武功，承上启下。

巨大成就，为开明王朝以降。

巍峨的洁白雪岭与举世的青铜文化。

在成都奏出“雪山城市”的千年回响。

古蜀王朝全力促进平原商贸、水上交通发展。

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笮都（雅安、汉源一带）、邛都（安宁河流域一带）、滇黔之北（朱提一带）等，变得越来越繁茂，大小邑落，乃至小镇，不断涌现。

“化民往往复出”。杜宇大兴农业，正好契合先民从“西北走廊”，沿着岷江峡谷高地，进入成都平原发展的需求，平原四周山民，看到山下蒸蒸日上的生活状态，都纷纷出来归附。

聚聚散散。最初在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的羌族，直到解决水患，又从周边的高山地带，与顺着岷江

河谷、岷江河谷而下的族群，断断续续，迁入平腹心原北部的广汉“三星堆”。

从营盘山的“小米”，到岷江河谷的“嘉鱼”，温暖过多少先祖的胃。时至今日，虽已无法了解更多细节，但世界看到在多条河流出山形成的复合冲积扇上的“三星堆国”。

河流台地。仍是“远支流，近干流”。

既能避免水患，也便于取水、渔猎。

“汤继强线”，空间经济学的“硬核区域”，“T”型经济带中“大T”中的“小T”：“一”，茂县、汶川、绵竹、什邡；“|”，岷江经济（文化）带，彭州、新都、青白江、广汉、金堂……

“瞿上”——“海窝子”，一个等边三角形。展示创造的“古成都人”的智慧与魅力。

到岷江下游鸭子河畔的广汉三星堆，约53公里。

到市区“十二桥文化”中心金沙城，约53公里。

“让生活更美好”。

人口迅速膨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全面铺开。

三星堆城的区域划分，进一步细化、规模化。

广汉黏土作为建筑地基条件较好，阶面常较平整，利于开垦居住。又是高于一级阶地、河床，既方便取水，又不易遭受洪水侵害，实为成都平原选择建筑原始遗址的最佳位置。

3 200年以前，蜀都城渐渐成型。

主体年代。三星堆遗址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 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距今2 600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2 000多年，不曾间断。三星堆文化正好对应夏朝、商朝。

三星堆也称为“南殷墟”，与殷墟遗址基本相当。

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三重城圈格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分别有五道城墙：仓包包城墙、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和马屁股城墙。

面积约12平方公里。

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

面积约3.6平方公里。

规模与同时代的城址相比，虽然比商代早中期的首都郑州商城的外郭城要小，但比内城要大0.5平方公里。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

周边的商文化城址相比,规模又大一些,面积约3.6平方公里的古城中央,一段弯曲的城墙形如月亮,将古城分割成城中之城,分为宫殿区、居住区、祭祀区与城外的墓葬区。8个祭祀坑,就大致位于古城西南的祭祀区。

已知东城墙长1 100米,南城墙长180米,西城墙长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

原本条状的城墙,可能是晚期人类活动挖开两个缺口,形成三个孤堆。

城内水系发达。以穿城而过的马牧河,逐渐把人们的世俗空间和宗教空间分隔。马牧河和月亮湾城墙,又将古城大致划分成田字形。同时期中原城址,多由规划好的街道划分成井字形,借助自然水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规划。

繁衍生息。建立了雏型的“工业基地”。

古蜀国的国家矿场。《华阳国志》里,记述龙门山脉,“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制作三星堆诸多器物的玉、金、铜,都在其列,演绎更替着古蜀文明的灿烂历史。

自古,龙门山就是有名的产金区。

古称“金河”的湔江,也生产砂金。

就地取材。彭州的大宝铜矿,距离“三星堆”最近。铜矿是自然铜,含铜量在50%以上,可用通济镇一带的青杠树余烬(木质钢碳)直接冶炼,并且分析含量与三星堆的青铜吻合。

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化,铜源可能就在湔江流域。

大宝山有废矿穴、炼铜炉的遗迹甚多。

他们,可能正是从龙门山矿山开采、冶炼后,经湔江“高速公路”运送到广汉。

古蜀国的青铜器,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四种。

礼器含锡低、含铅高,实用器含铅低,甚至不含铅,与中原殷虚出土的青铜器具特质完全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独立于中原之外的的独立的青铜文化。

灿烂的青铜文化,铜源就在湔江流域。

大量玉器的来源,汶川的“龙溪玉”(岷玉)“盛产美石”的玉垒山脉。

《彭县地名录》上介绍:“彭县北部诸山,均为玉垒山系,而其

玉垒之名，也与产玉有关。最著名的龙神岗，所产的玉，与灌县西山同。”

“蛇纹玉”。远古信物的特质——“石玉不分”，玉垒山脉的玉石质地细腻致密，属石质含量很重的“软玉”。在古蜀先民活动过的山脉，完全能开采到，并有条件进行加工制作。

时年，爱美、崇拜“蜀神”的蜀王，派遣无数手工艺精湛的工匠，翻山越岭地来到祖先曾经印满足迹的“故地”“故路”开石采玉，以石相击，或用火攻，或用水润。

聪明的工匠，用捡到的坚硬的陨石碎块，锤打成斧凿，把一块块巨大的“石玉不分”的美玉坯料采下，再通过人工搬运下山，利用湔江宽阔的河道，以竹筏顺水运到三星堆再进行精制……

沿途河谷，有失落无数的玉石碎块。

小的碎块，都随着湔江的波涛，付之东流。

巨大的碎块，也许沉眠于江底，至今不为人知。

有人就曾在通济镇湔江河谷一带，捡拾到一块重达200余公斤的蛇纹玉石料，上面还留存着没被河水冲刷磨损过的粗糙痕迹。

这些石料是当年“三星堆人”因竹筏翻沉，遗失的在玉垒山脉采下的用于制作各种玉器的石料。

三星堆博物馆中收藏的部分玉石，产自湔江河谷。

宝山墨绿玉，一种珍贵、稀有的自然资源。

主产于彭州龙门山镇宝山村燕子沟景区内，因产地取名宝山墨绿玉，色重质腻，纹理细致。有的漆黑如墨，有的黑中透绿，光洁可爱，极负盛名，硬度为Mohs4o左右，素为治印、雕刻和制作手饰品的上佳珍料，与钻石、宝石、彩石，并称为“贵美石”。

四川产碧玉、龟纹玉、夏珠玉、黑玉、牙黄玉、会理玉、青金石玉、夏珠翠、蓝纹玉、桃花玉、软玉和

「汤继强线」，空间经济学的「硬核区域」，
「H」型经济带中「大H」中的「小H」：「H」，茂县、汶川、绵竹、什邡，「H」，
湔江经济（文化）带，彭州、新都、青白江、广汉、金堂……

龙溪玉等，唯独墨绿玉稀缺。

如今，在燕子沟景区内，蕴藏有大约0.7公里宽，10多公里长的墨绿玉石矿脉，每年夏季山洪暴发时，常有墨绿玉石从上游，冲到湔江河谷中，如在河中寻觅奇石时，常有意外收获。

纯天然岩石原生玉矿。集日月精华，大地灵气于一体，上亿年的产物，含有钙、镁、铁、锌、硒等26种微量元素成分，药理作用特殊，被称为“药王石”，与羊脂玉、翡翠媲美。

量丰质优。

三星堆文化除了青铜器、玉器外，成都平原的陶器、丝织、漆器和一些生产生活用具等，都可以在鸭子河上游的湔江流域，找到原初缩影、原料制材。

大量陶器用土，就以广汉黏土为原料。

力推制作青铜神桑、神王铜像。

初始，还没有发现浅表性铜矿，铜矿主要来自滇东北的古东川地区。

铜矿的需求量巨大，将铜矿运回三星堆冶炼铸造，来回运输路途遥远，时间漫长，艰辛难言。面对棘手问题，将铜像、神桑所需的铜锭，先在古东川铜矿粗冶炼，再用马牛，将铜锭的半成品，经西南商贸通道，驮回三星堆城。

在铸造冶炼区，由青铜工匠负责神桑、神王像的制模、做范、浇筑、脱模、打磨、组装等。一些小型简易的铜制器件，直接在古东川制作完成，然后将成品，驮回成都平原。

一直持续到在龙门山、湔江河谷上游发现铜矿。

铸造八棵青铜神桑、神王像与人兽面相、动植物雕像等，所需铜矿石以千吨计，铜矿的挖掘、铜锭的炼制工程量，需时漫长，消耗掉古蜀国积累数百年的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

向古蜀先民征缴，部分部族庶民自不乐意，偶有反抗、争斗。

制做蜀牢。在地下，挖成圆形的土坑，上面竖起栅栏篱笆，或在地上，围起圆形石墙，仅留一小口，以监禁罪犯，防止其逃跑。与夏王朝夏台（监狱）类似，“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

设立刑罚结构，强化执法力度。

以畏众生。甚至，在祭祀大典中，专门制作罪人石像惩戒展示。

富有创造力。“古成都人”崇尚黄金。

“沙里淘金”。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

神秘和精致。“太阳神鸟”金饰，堪称美学典范。图案由12道光芒、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组成，围绕着太阳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飞翔，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

精美绝伦。至少采用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

出现在神圣的祭祀区，自身必定承载着创造的“古成都人”对于自然的无穷想象、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远古太阳崇拜文化的缩影，“金乌负日”的古代传说是最好印证。

创造的“古成都人”，也许已经掌握岁、时、月的概念与形成的原因。

表达了对太阳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光明不间断的向往。

勾勒出瑰异的青铜文明在华夏文明生成过程中的持续贡献。

亘古以来，金碧辉煌的太阳，辉映地球，滋润万物生长，古代民族以为具有能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敬仰、创造出令人激动不已的太阳神话。“夸父追日”“后羿射日”……

崇拜太阳，中华各民族共有的习俗。

三皇五帝、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密切相关。

审美趣味、对细节的着意表达，都与如今的成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非常相似。

大量出土的金器、玉器、象牙昭示，“主人”是“古蜀五王”里的杜宇。

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

类似儒家的氏族王权、近乎道家的自然神权。派生出古蜀文化另两个特征——注重人物造型的艺术传统、有机融汇多元文化，在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和矛盾之中，形成人神相通的神仙观念。

联合执政。由辫发、笄发两个族群。

特征鲜明。3 000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一片缩影。

发型两种：“辫发”，长长的辫子垂在脑后；“笄发”，头发卷起，用笄系在脑后。

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身着华丽的服饰、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手中还紧攥一根神秘的树枝。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中，可能正在从事着宗教活动。

占有神权。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的联系的

英雄美人、王侯将相、文人骚客、贩夫走卒们丰满了她，又纷纷挥手离去，最后沉淀为独特的气质，成就一方人情。大到国家，中到省份，小到城市，都有独一无二的底色，区域的「魂」。

媒介。

梳着“辮发”的青铜人像，神情闲适、安逸。一个世俗的集团，掌握着政治权利。

占据王权。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

联合执政，意味着平衡，平衡打破，就会出现

问题。在对抗自然中，中原人书写“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等故事。

古蜀国，“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在和谐的乐土，春耕待秋收，鸾鸟且自歌，居民们怡然自乐其中，自由自在的道家雏形思想开始挥洒，“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与森林为伍，与鲜花为伴。

城市中，全民祭祀，处处祭祀。

想象驰骋。与树对话，向山高歌。

空气中四处散布着浪漫的气味。

呼吸新鲜空气，沐浴灿烂阳光，饮食山泉蔬果，倾听鸟儿欢唱……

人文总是与地貌匹配。四川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古蜀文明自诞生开始，地域性格就不断发展、衍化。

被时代、自然与历史，抹上层层色彩。

英雄美人、王侯将相、文人骚客、贩夫走卒们丰满了她，又纷纷挥手离去，最后沉淀为独特的气质，成就一方人情。大到国家，中到省份，小到城市，都有独一无二的底色，区域的“魂”。

祭祀方面的最大变化，更换祭祀用品。

祭祀方面，给先贤铸像、塑形，既寄托哀思，也可供后世敬仰、参拜，有利于祭祀、悼念，自无不允。期初，人像多是石制、木制，也有些许玉石、铜矿，但

体积小，数量少。

慢慢用铜制用品，取代石制。

保留玉制、象牙，制作神王铜人像，以示王鼎。

辞旧迎新。强化王权，开启新的时代，将原来的石制、陶制、玉制和少量铜制祭物、器物焚烧，集中掩埋，进行了高规格的祭祀，表达对先祖的缅怀。

自鱼鳧王时代起，上至王族，下至庶民，渐渐形成了“燎祭”的模式。将先人的东西或者器物，以焚烧的方式烧给先人，时至今日成都平原城市、农村的丧葬，依旧沿袭这样的习俗。

祭祀时，为了彰显神王的威严、营造肃穆的氛围，大量采用象牙作为祭祀主祭品。

随着青铜器水平逐渐提高，大型的牙璋和青铜祭品，才慢慢取代象牙作为主祭品。

没有文字完整记载的时代，一个部落、氏族、一个方国的延续、表明自己由来，最佳方式莫过于祭祖祭天，以祭祀的方式来铭记。历史的另外一种书写形式。做法虽有异，但异曲同工。

欲革其史必毁其祀，欲灭其国则除其史。

三皇五帝时期，立兴于世。

蚕丛、柏灌时代，表现采集经济为主的生活。

鱼鳧反映着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杜宇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时代。

开明成为拓地千里的强国。

一个知识为王、工匠为术的时代。

王者们都是用技艺、知识，引导民众走过蒙昧年代的先行者。

无独有偶。在与开明王朝同时代的古希腊的神话中，也出现一位知识的先行者，著名的普罗米修斯。他，从天神那里为人类盗来智慧的火种，引导着民众走出混沌愚昧的暗夜。

人类对知识的认知和崇敬。

惊人相似，相互完全隔绝的东、西方。

历经夏、商、西周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铁器时代。

同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



强势发展，四顾无敌。

“双循环”。从内到外，进行了一场“洗礼”。

落到实处，就是文化、思想、技术。

再落到实处，就是城市发展、城市特色、城市魅力。

商代晚期，成都上演“双城记”。

时间，200年左右。

并存交错。三星堆“首都”，金沙城“副都”。

各霸一方。古蜀国与商朝，都是方国，没有隶属关系。

生机勃勃的文明，拥有着庞大的领土、强大的国力，为了争夺附属国、水源、土地、矿藏，很快与中原一带的商朝，兵戎相见。

“三星堆文化”，延续了约2 000年。

发展到后期，形成“十二桥文化”。

金沙城的位置，成都平原相对偏北，成都平原的中心。

距“营盘山文化”4 500年，距“古成都人”创造的“宝墩文明”1 500年。

气候干旱。“三星堆文明”处于亚北方期，伴以突发性洪水。

地震与洪水、次生灾害，往往伴生。

代代相传。上古蜀地频发的地震洪水，在“古成都人”心灵中留下深刻记忆。

在成都平原，总是生活在对洪水的恐慌之中。

频频受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影响，四处迁徙，在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创造的“古成都人”希望有一双“千里眼”，寻找一片安宁的土地。三星堆青铜纵目像，充分表现了愿望。

虽然离开灾难频出的岷江河谷，却没能能够摆脱地震洪水灾难的魔咒。

“水泻盆底”。一次特大地震、一场巨大洪水，就可毁掉一个文明。治水，历代在成都平原生活的人群最为关注，从大禹父子开始，治水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每一代成都人的福祉。

冲积扇的平原，左右堆积改变，使得在迁移过程也左右“摇摆”。

历史竟如复刻一般。

“天水倾盆”。夏雨集中，盆地四周高、中间低，迫使水系向盆地中心汇集。冲积扇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迁徙性，经常改道，一旦遭遇频繁的暴雨，便成水中泽国，生灵涂炭。

磁极倒转。洪灾成为文明中心迁移的潜在动因。

古岷江曾在汶川雁门一带，穿过光光山，并沿今白水河、濛江，流向沱江。

距今4 000年左右，龙门山一带突发强烈地震，导致山崩、滑坡，沿今白水河、濛江，流向沱江的古岷江，在峡谷中被堵塞，光光山以下成为断头河。堰塞湖湖水上涨，在雁门与汶川县城间的低矮分水岭溢出，向西南流向汶川县城与杂谷脑河交汇。

形成今日岷江上游的水系形态。

《水经注》做了记载：“汉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

河流改道。原流经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今都江堰玉垒山出山口水量急剧增大。

三星堆人赖以生存的河流陡然消失，致文明衰落。

祸不单行。古历七八月份，起初是沿海，然后，中原一带涨大水，沿海及中原一些古文化先后遭到毁灭性打击，大批人员死亡，消息传到成都平原，引起最易遭水患的三星堆人的恐慌。

最后时刻，匆忙决定，上山避难。

根本没有料想到，洪水会淹没大山。临走时，带上兵器、日常用品，通过一次盛大而隆重的“燎祭”，把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举行最后和最大的祭典，然后，把与生活无关的祭祀用品、金属制品与易碎的

人类文明，在互相开放、交流中发展，三星堆文化曾受到南亚、西亚、北非古文明的影响，创造出崭新的东西方复合文明；拥有冶金、纺织、建城、金属制造等多项世界领先技术。

第一轮人类文明瑰丽辉煌的篇章。

玉器等，打坏、焚烧，有序地埋藏于统一挖的祭祀坑中，表示送到天上和神界，逐渐往“副都”转移。

计划等洪水消退，再取出来。

大多数人迁到金沙城，开始“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蜀王杜宇”时期。

小部分人留在三星堆，在数百年间，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因水而断。在三星堆前已经消失的还有，新津宝墩城、郫都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等，这五座古城同在成都平原核心地带，同在岷江中游，沿江分布，平均距离不超过30公里。

逃到高山上的人，除了病死、冻死、饿死和因山体垮塌而死的人外，仍有极少数人幸存。

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第一黑暗时期”。

毁于一旦。以西亚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欧洲等地区的古文明，几乎都在4 300年前左右，出现同步的中断、衰落。

三星堆文化具有多种族属性，是形成多种文明起源的基础。

人类文明，在互相开放、交流中发展，三星堆文化曾受到南亚、西亚、北非古文明的影响，创造出崭新的东西方复合文明；拥有冶金、纺织、建城、金属制造等多项世界领先技术。

第一轮人类文明瑰丽辉煌的篇章。

戛然而止。宏伟的古城消失。

盛大的祭仪不见，青铜人不见，金玉不见……

留下一片荒凉。

如同父与子，一脉相承。

“十二桥文化”，继“三星堆文化”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宝墩、三星堆、金沙城，古蜀文明的三部曲。

无缝对接。三星堆被洪水淹没，政治中心转移

到金沙城。

改朝换代。“副都”变“首都”。

相距不过40多公里。创造的“古成都人”迁都过程中，联合执政的平衡被打破，宗教被过分强调，财富被集中到神权贵族屡见不鲜，王族发动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辫发”族群取代“笄发”族群，成为宗教的“代言人”，在上流社会一家独大。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不同的是，人头图案却从两颗变成了一颗。权力拥有的两者间，一个消失、衰落，一个成为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

金沙遗址中，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不见，只剩下“辫发”铜像。

王权拥有者们继续掌握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神权。

出土一个小铜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的辫子，腰间插着一根短杖。头上戴着象征着太阳的高冠，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祭祀坑中，还出土多尊跪坐人像，与青铜大立人相比小得可怜，最典型的跪坐人像通高仅13.3厘米，头戴平顶双角冠，左腿弯曲，右腿单膝跪地，手按腹部，一如在恭敬地向青铜大立人跪报。地位明显低下，身穿右衽短衣，下身穿着犊鼻裤（类丁字裤），显然只是奴仆。

小人像基本是小方脸，典型的川西坝子人长相，与如今的成都平原居民也较像。

“古成都人”在一场灾难中，废弃“旧都”三星堆，来到“新都”金沙城。

真相大白。神权与王权之争，“辫发”胜出。

最终成为古蜀国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唯一主宰者。

“辫发”族群迁到金沙，“笄发”族群迁入陕西宝鸡。

三星堆消亡，实际是“宗属”体系的解体。

气候温和。“金沙文明”处于亚大西洋期，太阳神鸟金箔呈现的是一派祥和。

金沙城一带，“十二桥文化”的核心区。

碧野蓝天，万物萌发。

田园牧歌，气氛祥和。

森林茂密，由近至远，直达天边；重叠的建筑，自大而小，横陈眼前。伴随着林间禽鸟的高唱，摸底河清波潋潋，掩映茅屋，流水淙

淙,自然天籁之中,还夹杂着几声驯畜家禽的鸣叫。

纵目天际,大气涌动。

放眼春野,生机盎然。

草木际天,千里一色。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小桥流水。近处农田中,往来种作,有人精耕细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远方森林里,有人狩猎捕获,河中的独木舟上,有人放老鹅捕鱼,村寨院落边,有人进行手工制作,还有小孩在玩耍嬉戏,稚情欢歌……

郊区,一副唯美的平原画卷。

站在高处,抬眼望去。

浮云之下,晨雾远方,乡村、河流、旷野,星罗棋布。

花蕾绽放、青草微黄的声音,被钻出泥土的牛尾笋、绿了枝条的乌木树听见。

层林叠嶂,河流纵横,湖泽密布。

丛林中,野生亚洲象,成群结队穿梭。各种小鹿、小麂、野猪等动物,在林间草地上自由觅食。老虎、犀牛、豺狼、豹子、熊、山魈等,经常出没,间或打破林间的和谐。

苍翠的沼坝中,雾霭缥缈,白鹭、野鹤、鸚鵡、孔雀等,在湿地间自由飞翔,禽鸟争鸣;金丝猴、播猴、猕猴、藏酋猴、狒狒等灵长类动物,在坝丛间嬉戏、跳跃。

貔貅(大熊猫)在竹林间,悠闲漫步。传说中黄帝、蚩尤,都爱拿它当坐骑,曾一度成为勇猛的战兽,却始终没做出有效战绩,慢慢变成破坏铁器的“害兽”,得名“食铁兽”。

独一无二。60多根乌木的特色景观,由金沙遗址与成都地区出土的乌木组成,陪伴沉睡了3 000年的太阳神鸟,让人敬畏的乌木林。经碳十四测定,距今3 000多年至10 000多年。

金马河潏潏浓郁,杨柳河清波涟漪。

摸底河畔,流水潺潺。

薄雾淡烟,白云飘浮。

四季轮回,花开十月。

南岸,一株巨大的乌木旁,铜铃叮咚作响,一座黄土垒成的长方

形祭台上，人们虔诚地向天地神灵，献上他们最为精美的礼品：象牙、鹿角、野猪獠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

祭祀，灵魂观念的派生物。降福免灾，“古成都人”相信，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人死后灵魂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

原始而丰满的生态景象。

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深厚基因。“在成都遥望雪山”。

西岭雪山，绵延千里。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白雪，覆盖的龙门山脉诸峰，在灿烂阳光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金沙城就像是雪山下的一座大公园，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极致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生活方式……

原始版本。一幅“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奇丽画卷。

自古一绝。生态之美、山水之美、人文之美。

四川第一高峰，海拔7 556米的贡嘎山，颜值媲美珠峰。四姑娘山，名字就带着浓浓川味：主峰幺妹儿峰，身旁立着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

稻城亚丁三座神山：仙乃日、央迈勇、夏纳多吉，被川藏人奉为雪域神峰。

成都平原上的人观雪山，已有超过5 000年的历史。

气候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宜人的环境中，“古成都人”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种植、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与手工业等活动，世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美好画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

绿道、林盘、流淌的锦江之水，已经成为宜居的鲜明符号。

成都人居家园的起源，城市文化的发轫。

绿道、林盘、流淌的锦江之水，已经成为宜居的鲜明符号。成都人居家园的起源，城市文化的发轫。逐渐显现。一个崇尚中心、文化包容，发展军权、王权、生产力，重视民生、农桑、人口发展，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多把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更多投入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模式。

逐渐显现。一个崇尚中心、文化包容，发展军权、王权、生产力，重视民生、农桑、人口发展，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多把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更多投入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模式。

金沙城面积足足有5平方公里。

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600年，古蜀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

众星拱月。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同时存在几十个小城市，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城周围，不仅烘托出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又共同构架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国的宏伟面貌。

环境优良，人口数十万之巨，国力强盛。

疆域宽广。北至陕南，东至三峡，南至雅安，甚至云南北部的昭通。

文明汇聚中心。向北，联络周天子，向南，吸引南方众多民族部落，向东，穿过三峡，联系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国的西南角，太阳旋转翩然，在金沙的天井中起舞，神鸟围着盘旋不停。

五彩斑斓。“十二桥文化”，一幅晚期的古蜀文化画卷，悬空而建的民居、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都是文明华表的见证。

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

大体相当于春秋晚期。

功能明晰。宫殿区、手工作坊区、仓储区、祭祀区、墓葬区、生活区等。

创造的“古成都人”似乎已经懂得城市设计和规划。

井然有序。金沙村为祭祀区（权力中心），黄忠村为宫殿区，十二桥为生活区……

太阳的曙光刚照到大地，早起的男主人已经在忙碌干活。

修建的是金沙城中常见的木骨泥墙式建筑。

轻车熟路。要修建房屋，地基已经先打上，插上圆木、竹子作骨架，外面抹上草，混上泥巴、牛粪。然后，生起火烘干。待到泥墙快要成型时，上面混上木头条子，盖上几杆芦苇茅草。

民居多为2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讲究通风、日照。

墙高度多为3米，高敞、轩亮。

房顶的样式，两面斜坡式，采用榫卯加绑扎法。先将作为檩、椽

的圆木在屋顶连成方格网，再一层层地铺草，边铺边用竹篾分层绑扎，以利防风防雨，坚固耐久。

居民小区，星罗棋布。

地名是历史长河里的文明化石。

今成都金牛区金泉街道金泉场（土桥场），古蜀沙金盛产地。

古金马河的支流金水河，携带大量金沙，咆哮着冲向天隰山（今天回山），顺着山麓向西南盘旋、流淌。翻滚的水浪，卷着泥沙，泥沙包裹着金沙，金沙随着水流减缓，沉积于河两岸。

3 000年前，“古成都人”在沿河两岸淘沙金，加工成华贵的饰品，供蜀王、贵族享用。金泉场一带，淘沙金集中之地。涧槽村，就因当年淘沙金的冲水涧槽，得名。

淘沙金的人有上百户，年复一年地淘金。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地出现商品交易市场。

专业市场。沙金买卖，淘金工具，淘金工人的日用百货、油盐柴米。

淘沙金人经过的小木桥，改为铁板桥。

铁板上积土，成为土桥。市场，也被称为土桥场。

碧水悠悠。金水河缓缓绕场而过。每年春暖花开时节，场内场外，桃花灿若红霞，李花皑如白雪，菜花金黄，蜜蜂轻舞，“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大好春光。

金水河岸边，淘金人挖金沙，一股清泉涌流而出，波光金灿灿，称“金泉神水”，砌一口井，称“金泉井”。井四周修房造屋，筑殿为寺，《成都县志》（重修）记载：“金泉寺，县西四甲十五里。旧名尹公祠。有古井，名金泉井。今无考。梁间正书，创自大梁景历。明弘治七年重修。”

明代蜀藩王府太监尹公公仙逝，葬于金泉寺侧，金泉寺更名为尹公祠。



壹

貳

叁

肆

伍

商末周初，成都已经是一处宗教祭祀的中心。

具有政治功能的文明古都，经济、文化中心。

岷山，中国山川文化的“龙首”。古蜀文化重神仙、神器，同中原文化区系重礼制、礼器有所不同。与汉中、关中、江汉与南亚次大陆相联，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成都是“龙头”。

古蜀国，中国神仙说最早产生地。“皆得仙道”，蚕丛、柏灌、鱼凫三王，魂化啼血杜鹃的仙化故事的杜宇帝，守天门的开明兽故事的开明帝。正好同三星堆、金沙城的奇特器物相印证。

成都西门。“上风上水”。

有效地开发滨河地带。

能得以居息于低湿临水之地，却不为潮湿所困。

古蜀国的中心“都邑”的金沙城，至少包括古郫江水在内的四条古河道，由西北蜿蜒流向东南，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渠，体现城与水互相交错的格局。依水兴建是对水的利用能力增强的反映。

大型滨水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反映成都平原干栏式建筑技术的成熟。

营城实践。

体现对山水人居要素的综合驾驭，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筑城智慧。

十二桥畔。“水上人家”。

夏日的傍晚，熏风从水面上吹来，贵族们摇着芭蕉扇，穿着丝质的衣服，在回廊上乘凉；市民区的妇女们，蹲在自

己房屋的旁边，举着棒槌似的木棍，锤打和浣洗家人的衣服。

游玩嬉戏。孩子们像蝴蝶似的围着长廊。

触景伤怀。只有那伤心的王妃，独自倚着竹制的门帘后，看见水中金色的鲤鱼、青色的鲢鱼，在“锦水”里快乐地游来游去，享受着河水和水草带给它们的乐趣。

虽然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心却是既凄凉，又失落。

水边生活层次丰富，精彩有序，贵贱贫富皆可共享。

懂生活，崇尚田园，成都人惯有的生存状态。

成都北门。“生态山水”。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横跨沙河。

沙河，人工挖掘，都江堰水系的一部分。凤凰山因形状奇特，山丘南北走向，由首尾相顾的两个山头组成，远观似迎春展翅、翘首远望的凤凰。流过的河，时称升仙水、凤凰水。

凤凰，神话中的神鸟，与“龙”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原始人类，中国南方稻作民族以“鸟”为图腾。

古称“丹雀”，又称“阳鸟”“鸾鸟”，与稻作文化起源关系密切。

《拾遗记》卷一说：“（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凤凰神鸟的原型。《广雅》记载：“鸾鸟，凤皇属也。”

深深植根于稻作文化中，“和”成了凤凰形象的基本特性，《山海经》介绍：“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凤凰在民间，自古就代表着和美、和谐与吉祥。

“凤凰”形象本身，和谐观念的产物。

“二合一”的对立统一体。雄为凤、雌为凰，阴阳调和、合和祥瑞；一个多元和合体，在鸟图腾的基础上，融合原始时代多个不同氏族崇拜的自然物特征，集大成之美而成。

《说文》描绘：“凤之象也，鸿前麟后，鸛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

在中国文化中，不仅表示自然物的“和”，也表示人类社会的“和”。

凤凰“五色”，维系古代社会和谐安定的“德、义、礼、仁、信”五条伦理的象征。《山海经》说：“（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广汉联合遗址小型聚落。

距离三星堆遗址约8公里。

“龙凤呈祥”。发现距今约3 200年前的图案：凤鸟，振翅欲飞，蛟龙，环游其间。龙角、龙须、龙爪俱全，与凤搭配的图案，诠释中华文明中“龙凤呈祥”的寓意、源远流长的历史。

陶盖顶部中央，一只有羽冠的鸟，昂首而立；盖顶的边缘，清晰可见一条游龙，盘旋在鸟的周围，嘴里似乎喷出一道火焰，整体造型，动感十足。鸟与龙一起出现在陶盘，鸟代表凤鸟。

最早的龙形象，被指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玉猪龙。

凤鸟的形象，诞生于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迄今已有4 000年。

商代，才开始出现“龙凤配”形制的玉器。

年代相近。陶盖上的龙凤组合纹饰，与妇好墓出土的龙凤组合玉器类似。

同时，一件拳头大小的泥塑陶猪令人称道。形象呆萌可爱、栩栩如生、堪称一绝。

“古成都人”即使在三星堆国的年代，审美水平让人感叹不已……

凤凰水，古蜀国的杰作，早于李冰治水500年以上。

碧澄清冽。河道弯曲。

两岸遍生竹林、桃林，颇有几多人间仙气。

体现了成都平原寻仙求道的仙化文化。

远看，凤凰山系与成都平原接壤的浅山丘，山脉逶迤，若伏若连，势来形止。鸟瞰，山势恰如一只栖止的凤凰。权威地质专家评价，山势“类似北京的十三陵”；有学者喻称，“踞而侯，揽其有，来积止蓄，冲阳和阴”的“山川融结奇秀之所”。

与“古者葬乎北”的礼制相合。

《礼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

堂局完密的风水，离金沙中心城区最近的丘陵。

十分热闹。“古成都人”在城北，修国家祭坛。

开明王朝的综合实力，大大超过杜宇王朝。

农业发达，蚕桑、纺织业规模大，手工业、商业兴旺。

百姓生活富足，喜乐、幽默源自内心的乐观、知天命。

各行各业的工匠，大量的民间手工业者，长期从事成都平原和边

境（夜郎、滇越）贸易活动。汶山（今茂县城区）、笮都（今西昌市），内外贸易的重点城邑。

属于早期的封建社会。

建造祭祀台，表示国家机制的完善。

威严自信。祭祀台，沟通天地不可或缺的建筑。主要是国君、贵族祭祀、观象之用。天地间万物有灵，祭祀可以祈求神灵的庇佑。巫师可以通神灵，祭祀与王权往往统一。

东周末年，战乱不止，混沌之世，礼乐崩坏。

周室倾颓已久，威严扫地，早已不复昔年武王伐纣盛况。

祈神求福。古蜀国好像置身事外，开明王仍然我行我素。

纵有无数星辰可见，天地为一。

然有万千道法传扬，礼宗为一。

“吾道不孤”，出自《论语》。

周易、周礼、诗三百。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

“礼仪之邦”。推崇“读孔孟书，识周公礼”。

文明传承，礼仪作为一大主线，始终贯穿根系血脉中。

成都羊子山祭祀台、金沙遗址祭祀区。

重要建筑。帝王得民心、得天下不可或缺。

一幅美好和谐画面。站在此处，想象着古蜀王在巨大、高耸的方台上，祭神灵，求护佑百姓；观天文，保农业生产。民乐之、附之，古蜀王舞之蹈之，与民同乐……

传统习俗，“尚五观念”。

崇尚祥瑞。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古成都人”又以“五”数为尊。一种精神性的转换，满足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期盼、愿望，对一个民族、王朝，有凝聚人心、激发热情的效力。

在郫都三道堰古城遗址，“大房子”中的五座卵石祭祀台基，显示“五”与神圣祭祀的关系。在三星堆

文化内涵一样。独特的祥瑞观念，一如华夏先民尊「九」，中原王朝的皇帝，使用九鼎等礼器象征地位、身份，古蜀王以「五」为吉祥、尊贵的象征。「九五之尊」，江河文化融合后才形成的说法。

一号坑、二号坑中，发现的宗教首领形象，都戴着“五”齿高冠。不但青铜太阳轮上表现为“五”条射线，石边璋上也以“五”幅图为一组，每组图案上表现“五”个人物。

新都战国蜀王木椁墓的中随葬青铜器，也以“五”为基本单位组合。

开明王朝统治时期，盛行“尚五”。

开明前五代君王，谥为五色帝。以五色为庙主，“每王薨……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以“五妇”，为蜀王妃。

矗立在蜀王墓前的大石，亦有五块石。

地名也有五妇山、五块石、五丁冢之类。

“时蜀有五丁力士”。《华阳国志》中，记载较多。

“五丁”，用于各种劳役，凿出开道、王室迎送等。

随着统治的强化，演变成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类的社会基层组织。

密切相连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十字形源于“五”，被分为五个方位的十字形宇宙。古蜀文化“尚五”的神圣性，与殷商时代十字形的宇宙观，具有同一古老的精神谱系、文化传承。

青铜祭器圈足上有十字形穿孔；氏族徽号、祖先名多用十字形；殷墟的墓葬用十字形营建。

“五”具有核心性质的意义。

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双联体”。

共同拥有一个“文化底层”：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链”。

文化内涵一样。独特的祥瑞观念，一如华夏先民尊“九”，中原王朝的皇帝，使用九鼎等礼器来象征地位、身份，古蜀王以“五”为吉祥、尊贵的象征。

“九五之尊”，江河文化融合后才形成的说法。

蜀郡太守李冰，对“古成都人”的尚五习俗，也非常熟悉。

在修建都江堰时，雕“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真正尊重传统习俗，赢得了“古成都人”由衷的拥戴，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在治理水患、发展农业等，都获得极大的成功。

“五里云雾”。在彭州与周边的什邡、广汉，遍布和“五”有关的地名、物什，如五仙庙（葛仙山镇）、五里地（致和镇）、五龙洞（白鹿镇塘坝村）、五珠沱（什邡湔氐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要求“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但在成都平原与周边开凿的道路，仍称为“五尺道”。《史记》记载：“秦时常頡略通五尺道。”

根深蒂固。秦朝虽然高度集权、令行禁止，却也难改变蜀地风俗，只能顺其自然。东汉末年，张道陵在湔江河谷创建天师道，也充分利用“古成都人”尚五的传统习俗，以“五斗米道”为号召。

在《神仙传》中，葛洪“翕然奉事以为师”，也大获成功。

历史谱系。在距今4 000多年，直至开明王朝晚期，延绵3 000年之间，一直保持着对神圣数字“五”的崇拜，一种“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最高范式，将“古成都人”的生活宗教化。

宗教意识。

古蜀国和古埃及，都曾有过太阳崇拜。

都有多种形态。远古中国的日神传说中，鸟、兽也主要是太阳神形象。在古埃及的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日神拉是一只鹰，而5 000年前埃及底比斯，日神是尼罗鹅或绵羊……

无论是古埃及人敬畏的翱翔于尼罗河上空的雄鹰，还是华夏先民感到迷惑不解的“大鸟”，都象征太阳遨游太空的自然意义，体现两大古老文明早期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的相似性。

二者都将太阳视作对生命和权力的象征。

印加古文明，也崇拜太阳神，与中国古文明一样，将天体神灵分成不同的层级的“神子诸系”，以对应人间社会的等级分层，从而构成政教合一的文明特征。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与玛雅文明中的木棉圣树相似之处颇多。玛雅木棉圣树展现宇宙的四个方向，象征天地等元素结合体。相似的象征意义，体现两种文明类似的宇宙观。

在玛雅人的观念中，世界的定位点太阳，将世界划分为五个位置，中心位置，正是一棵被称为“世界树”的木棉树，下端，根植地下，顶端，上达天界，中间的枝条，连接着人间。

“古成都人”的想象中，自然与人类共同众神的世界，通过一棵通天神树相连。

不同文明还有一些“共同语言”。

中国古代把冬至视为一年的开始。

埃及庆祝日光节的圣地有两个，加龙神庙、卡纳克神庙。

卡纳克神庙中轴线上的大门、柱殿和祭坛，都朝向冬至日出的

无论是古埃及人敬畏的翱翔于尼罗河上空的雄鹰，还是华夏先民感到迷惑不解的「大鸟」，都象征太阳遨游太空的自然意义，体现两大古老文明早期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的相似性。

方向。

冬至的清晨，太阳在卡纳克神庙的轴线上升起，连续穿过阿蒙雷神庙的两个石门，沿着主入口的通道，指向神庙中心祭坛，日出方位，横向东偏南26°左右。

英国奥斯通道式古墓，每年冬至同期左右，黎明日出的光线，穿过幽暗的墓室入口通道，照射在内部墓室棺槨上，场景令人震撼。

古爱尔兰的纽格莱奇古墓，建造时间比英国著名的巨石阵还早1 000多年。每年冬至前后数日，日出的光线，沿着长长的古墓甬道，十分精准地照到墓穴深处。

太阳崇拜。

不约而同，数千年前，世界各地都出现城市布局斜向的现象。

“古成都人”因为太阳崇拜，对城市建筑布局选择西北、东南斜向。

公元前1000年左右。冬至日出的时刻，金沙遗址的观测点。在太阳完全跃出龙泉山山脊时，早上8点12分14秒，角度为东偏南28.5°，与成都中心城区蜀都大道、东大街等横向街道，倾斜角度偏差不超过0.1°，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三。

太阳完全升起的那刻，“古成都人”测定金沙九柱建筑的方位。

修建了祭祀所用的明堂。

冬至那天早上，古蜀国王早早地站在明堂楼上，虔诚地朝着东方。

成都平原多云雾，上午见到太阳时，太阳已升至东南方所致。当太阳完全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龙泉山山脊)时，祭祀正式开始：国王念祭词，臣民跪拜，一片肃穆。

太阳崇拜，能解成都城布局斜向之谜。

三星堆遗址→郫都古城遗址→金沙遗址。城市

布局均为斜向，只是倾斜角度不同：三星堆、郫都古城遗址，大致为横向东偏南35°，金沙遗址斜向，大致为28°。

影响后世成都内城的布局，直到现在仍为28°左右。

虽然靠近龙门山断裂带，但川西拗陷刚性稳定的岩石圈结构，决定成都平原不会发生破坏性的大地震；沉积盖层厚度大、质量佳，分布适宜，决定发生地震不会对主城区造成巨大破坏。

说文解字上说：凡居中曰脐，“肚脐”为人之中，“天脐”为天之中。

现代社会把“天脐”称为大地原点。

成都原点位于文武路与锣锅巷交叉口西侧。

东经104°04'、北纬30°40'。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图案制作的标记，包围着这颗小圆球。太阳神鸟标记外侧，标注着“1956成都市平面坐标系原点”。

最外面的正方形，每个边正好对准正北、正南、正东、正西。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中国的中心。早在周朝时，就开始中心位置的研究。

确定豫州为九州的中心，测出汝南为豫州的中心。

西汉时期，测算的一条长达1 000多公里的建筑基线，刚好穿过整个大地原点，基本重合。2 000多年前测定的建筑基线，与现在中国大地原点基本一致，相差就2秒经度（60米）的距离。

北纬34°32'27.00"，东经108°55'25.00"。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位于陕西泾阳永乐镇，距西安市中心36公里，距咸阳市中心28公里。中国国地理坐标经度与纬度的起算点、基准点。

泾阳，在北山之南、泾水之北筑城，故得名。

“泾阳”之名，最早见于《诗经》：“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将泾阳作为专用地名，是在战国时期，秦始皇嬴政先祖秦灵公始置泾阳县，迁都于此。

离中国正北为880公里，正东1 000公里，正南1 750公里，正西2 930公里的一个点上。

大地原点。国家授时台必须建在国家中心地带。

陕西渭南蒲城，就成了“北京时间”的授时台。

智慧价值。古今测量史上的巧合，令考古与测绘界感慨不已。



壹

貳

叁

肆

伍

祭祀繁盛, 人类活动兴盛的表现。

早在商代, 成都就是热闹城市。

天命观念, 商周时代逐渐明确。

主宰人间一切的神, 称“天”; 天的意志, 称“天命”。

周人深入地发挥“天命”思想, 提出“天命靡常”“以德配天”。儒家的天命观由此而来, 经过孔子、孟子的阐述, 儒家明确宣扬“天命”“天道”, 对人事的终极决定力量。

周易启迪了《道德经》对宇宙本源的探索、认识世界的方法; 儒家源于周礼, 秉承先周的贵民思想, 主张民贵君轻, 施仁政。具有地缘和历史特色的人文思想, 源于周文化。

天、地、人, 中国古代宇宙观最基本的三要素。

《礼记》称: “夫礼, 必本于天, 肴于地, 列于鬼神。”

《周礼》记载, 周代最高神职“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

在《史记》中, 司马迁也说: “上事天, 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本也。”

人们用竹木、泥土塑造神灵偶像, 或在石岩上画出神灵形象, 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 在偶像面前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礼物, 由主持者祈祷, 祭祀者对着神灵唱歌、跳舞。

《礼记》说: “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 污尊而抱饮, 蕡桴而土鼓, 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祭礼起源于向神灵奉献食物, 只要燔烧黍稷, 用猪肉供神享食, 凿地为穴当作水壶, 用手捧水献神, 敲击土鼓作乐, 就能够把人们的

祈愿与敬意传达给鬼神。

西方文明起源后，青铜器成为生产工具，文字用于商贸产品的交流记账、私产记录。

中华文明起源后因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需要，祭祀祖先神灵的原始巫术，不但升格为原始宗教神灵观念，还进一步强化通神手段，集中到氏族贵族手中。

玛雅文明的文字，也不像西方文明用于商业贸易，而如同中国一般用于宗教祭祀。

物质丰裕，使古蜀国祭祀礼节复杂，祭品讲究规范性、等级性。

金沙遗迹祭祀区的黄土台建造前，祭祀品主要以石器、象牙为主。

在建造黄土台后，祭祀开始大批应用金器、铜器、玉器等。

全盛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开明王朝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地位重要。

与商周文化相同的占卜习俗。习惯、爱好烧灼龟甲，观察兆纹，预测吉凶。大凡祭祀、征伐、田猎、使命、往来、年岁、婚娶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古成都人”眼中，都需要占卜。

占卜文化发达，与当地大量产龟密切相关。

龟看似笨拙，寿命却相当长。

3 000年以前，成都平原江河密布、湖沼众多。各种各样的龟，爬来游去，在河滩上行动迟缓，像背负着命运的大山。“百年鹤，千年龟”，先民对龟类崇拜的习俗，被慢慢培养起来。

“扬雄《蜀记》以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

杜宇住在城北天隳山（天回山）上，利妃生一女，可爱至极，取名为“凤”。

红颜薄命。公主从小体弱多病，直至二十，尚未出阁，病死宫中。杜宇悲伤不已，将爱女葬于天回山西南边毗邻的土坡上，以便随时看到爱女之墓。

还常在宫中说，凤儿年方二九，取九九长寿之意，不忍说已满二十。

爱女情深，将凤儿以王妃的规格安葬。

墓上覆盖大石镜。形状像古代的量器斛（十斗为一斛），后人称为“石斛山”。

建筑技巧上，十二桥遗址的大型廊庑式木结构宫殿建筑，与羊子山国家祭坛的三道式砖坯建筑，十分相似。尽管一个是土建，一个是木建，技术革新，已使两座遗址有了互通的血脉。

凤凰水迂回处，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2米的正方形、呈三级递高，每级高4米，用泥草制作而成的土砖修建，以土夯实。四面皆有供登台的阶梯的土台，著名的羊子山（凤凰山）祭台。

古蜀国最早的遗迹，杜宇王朝兴旺的象征。

用于观望、集会、祭祀的地方。

中国最大的祭祀台。距今3700年以上。

比足球场还要大，足有四层楼高。

羊子山，大、小羊子山的会称。

大羊子山，人工堆砌的回字形三级四方台。

年代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至春秋晚期，高达10米。

面积逾1万平方米，用土总量超过7万立方米。

边长超过100米，由160余万块土砖堆砌而成。

距金沙遗址直线距离约7公里，建筑方向为北偏西55°。与金沙遗址建筑方向基本一致。

在开明王建都成都时，与中原王朝高台流行时间吻合。

建筑物无论体量，还是高度，都是当时的冠军。

土坯工程技术、夯土技术，也领先于同时期中原遗址。

遗址台基下，发现的打制石器，比宝墩、三星堆、金沙文化还要早。

建筑技巧上，十二桥遗址的大型廊庑式木结构宫殿建筑，与羊子山国家祭坛的三道式砖坯建筑，十分相似。尽管一个是土建，一个是木建，技术革新，已使两座遗址有了互通的血脉。

使人想起周代的灵台、鲁国的观台与楚国的五仞台。

在平原的腹心地带，祭祀台显得十分高大。

在《归藏》《左传》中，被称为“钧台”“璿台”。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历数历代传天者，考古所见，也有以候气、观斗、测影为职之官，证明至少

在新石器时代，天文官制系统，已经具有基本的雏形。古或以司历之官，名为“历正”。

皇权神授的象征之所。

祭天拜地。不仅观测天象，还是告朔之地。

“筑灵台，祭苍天，安黎民”。最早的记载，在《诗经》中的《诗序》，“天子有灵台者，可以观天象，周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据说挖土修灵台，土坑积水成灵沼。

做出的每项决策、任命，都在执行上天的旨意。

最高指示。知天命、顺天意、天命不可违。

沟通天地。祭坛建好后，要知道日升月落，昼夜交替，四季变化，古蜀王可能还兴致勃勃地前来“踩场”，耸立在面前的是一座高达12米的雄伟之坛，一级一级地往上走，台阶坡度13度，比较平缓，并不费力。登上祭坛顶时，有种豪迈的感觉，觉得自己头顶苍天、脚踩大地，为自己的设想、建筑师们的技艺满意。

公元前1260年，三星堆文明毁灭。

张冠李戴，在《竹书纪年》中，称为“益干启位”，在《左传》中，称为“后羿代夏”。将神话“后羿射日”的发生地，由河洛之间“转场”到成都平原。

金沙文明崛起。《竹书纪年》中，称“夏启杀益”，《左传》中，称“后杼复国”，更是“黑白混淆”，把夏启继位、少康复国，“穿越千年”到春秋时期……

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手工业生产服务于宗教信仰，统治阶层将社会财富用于祭祀活动。

鼎盛热闹。开明王曾先后举行过两次重大的祭祀活动。

第一次：在今天的三星堆遗址举行，祭祀亡灵，留下了两个祭祀坑中的其中一个。《蜀王本纪》所称的“开明”，即继承三星堆王朝而得，义为“太阳家族”。

第二次：正式迁都往成都城西的金沙城，真正的改朝换代，“副都”金沙城变成“首都”，进一步确立开明王“一统天下”的地位，举行一场盛大的祭天仪式，留下另一个祭祀坑。

两次盛大的祭祀仪式，完全配得上《左传》中的12个字：“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诗经》里的《生民》。

周朝贵族在祭祀祖先时，总会唱祖先后稷。

一个重农业的民族，在祖庙里高唱《生民》，缅怀大禹功业、神化祖先的同时，也是对农业的一种表态；神化农业能手，实是对农业的一种尊崇，对“民以食为天”信仰的尊崇。

后稷是尧舜时期掌管农业之官。

稷，粮食；后，君王，百姓就直接尊称为“稷王”。

中华农耕文明的缔造者。“后稷”，周始祖弃，因“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第一个建立粮食储备库和畝亩法，放粮救饥，赐百姓种子，被尊为中国农神。

农神后稷的“叶落归根”之处，成都再次展现农业高度发展的“历史背影”。

“蜀周同源”。史载：“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还协助大夏“治梁（山）及岐（山）”的水利。曾经“建步立亩”“经理疆界”，还是中国田亩制度的创始人。

《诗经》中，《生民》《思文》两首诗，颂扬后稷创业的史诗……

天刚蒙蒙亮，开明王就率领皇室、贵族从金沙城出发。

一路骑马坐车，朝羊子山赶来。

与民同乐。开明王率领的队伍，绵延达5公里之长。

事前，按照选定的祭祀日期，遍告百官、附属国诸侯，邀请参与羊子山祭祀。

仲春时节。漫山遍野，千树万树桃花怒放。

如彩云似红霞，辉映着观宫亭榭。

百姓养蚕织绸，依然沿袭远古蜀人种植桑树的习惯。在今凤凰山与天回镇一带，春天到来，田野上，一棵又一棵的桑树嫩芽绽放，微风拂过，真有“陌上柔桑破嫩芽”的诗意感觉。

沿途，钟鼓齐鸣的声音、随风飘动的旗帜。

金沙城的百姓也都纷纷赶往羊子山，男女老幼身着花衣锦衫，戴着金银珠贝的装饰物，成群结队，笑语欢声，朝北而去。人群像是一条汹涌浩荡的江河，把两边的庄稼、树木都映红了。

高下相照。各种楼台亭阁绸缎扎制，幻若海市蜃楼。

天空中，飘飞着纸鸢，似群鸟翱翔，如春燕低飞；山道上，彩衣华服，逶迤不绝。管弦笙鼓之音与香烟青雾，缭绕于山前山后，其乐融

融，一片繁荣景象。

日暮时分。城里而出祈神求福的人，从早晨开始，从未中断。

全然不分。人与自然一体、人与动物一体、人与人一体。

“天时地利”。羊子山渔猎画像砖。

把“古成都人”爱吃、会吃、懂吃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

上半部分，有一个莲池。

游鱼，河中嬉戏，两个猎人，正隐藏在莲池旁边的树荫下，张开的弓箭犹如满月，向天空中结队飞翔的鸿雁，瞄准射击……

川西坝子的秋天：天空中白云淡淡，群雁结队往南飞。

下半部分，收割水稻图。

三人执镰，弯腰割稻，二人绑扎稻草，一人挑起一担谷穗，急步飞奔……

渔猎画像，将农、渔、猎等生产场景，形象地展现。

画面离21世纪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

用嘴巴衡量生命价值，巴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千年佛系心态”，性格与道家《逍遥游》一脉相承，造就成都人松弛、笑对无常的心态，大事绝不慌张，小事更是“算咯算咯嘛”。

聪颖的“古成都人”，创造了璀璨的文明。

异彩纷呈的古蜀文化，树立大美成都。

重塑了“古成都人”的精神面貌，滋润了生活方式。

难怪，都喜欢称自己是“老子”。

公元前311年，张仪曾从羊子山挖土，修建成都城。

筑城不易，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唐代新罗（今韩国）人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追记：“蜀地无土，昔张仪筑子城，犍土于学射山，日役往返，九载后始成。”

凤凰水在祭祀台，向南潺潺流过，再缓缓流经凤凰山南麓，进入锦江……

水上有升仙桥，引流而修的升仙湖。

励志之桥。司马相如进京，从升仙桥经过，对即将离别的妻子、前来送行的官员，题桥志奋：“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不乘坐高车驷马，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一任激情澎湃。

《凤求凰》的琴韵，始终荡漾在升仙水上，升仙水又被誉为“诗意之水”“幸运之水”“爱情之水”。湖畔有茶铺，800多年前，陆游

就因为暴雨，被迫在当时的“河边茶座”里消遣。

也是成都的“两路口”。

“金牛道”起点，通秦往蜀的“高速公路”，比欧洲的古罗马大道还早30年，北上，穿越秦岭险峻山谷，连接北方丝绸之路；南下，出成都万里桥，上“西夷道”，南方丝绸之路起点。

迎接与送别之地，今天倡议的“一带一路”的交会处。

“古成都人”走向世界的路径。

成都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

文化基因开放，北与中原，进行双向交流；正东方向，有荆楚、长江下游，南方文化的西进；东北方向有河南、山东，北方文化的斜插；西北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厚重氏羌文化的南下；南通南中、东南亚并与西亚交往。

大山高耸、路途艰难，似乎从未阻止过“古成都人”与外界的交流与往来。“古成都人”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力量与周围甚至世界的文明，进行深刻交流、互动和影响。

太阳神鸟，象征“古成都人”遨游远方的期许。

三千年前，将翱翔太空的美梦，寄托在神鸟上。

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与良渚文化水乳交融。石峁文化、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诞生大禹父子的“江原文化”、孕育夏文化、承接商文化进入。西亚与埃及“闻风而动”，尼罗河彼岸的法老面具、金杖，也间接传播到成都平原。产自印度洋的玉海贝(饰品)被三星堆人、金沙人所用，贸易发达，人群流动频繁，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

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

在商周时代就发明象形文字，常被刻在青铜兵器上。

金沙文化的扩张也最广：向南，达到滇北一带，朝北，达到陕南地区。

春秋战国之际，同时使用同一系统的中原地区的汉字与巴蜀文字。

成都平原的东部，巴人活跃，属于同一性质的文化。

许多文明都崇拜太阳，但将太阳以辉煌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现，唯有金沙做到。

成都的浪漫情怀、审美情趣，都从金沙延续而来。

神秘传奇。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等古蜀先民们创造的真实历史。

空间坐标，成都先民生活的地理环境。

时间坐标，古蜀历史所在的时间范围。

让生活更美好。

在岷江上游河谷、龙门山、成都平原三大地理单元上，不断地迁移。

成都平原是中国唯一处于内地，却享有“海洋性气候”的“飞地”。因为水患等原因，曾经并不适合居住，“古成都人”均生活在高山、高原地带。直到水患解决，才从盆地山区、山前地带，一点一点往下游迁徙，逐步进入到腹心地带，住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再继续往平原移动，最终定居，成就天府之国的一方乐土。

《山海经》，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地理与神话的古籍，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中国历史上一部想象力非凡的百科全书。

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

大禹与助手伯益，治水时，游遍了九州天地，见识到了各种奇人异事，都被记录在《山海经》里。成都，唯一见载于中国最早地理古笈《山海经》的大城市，光芒四射。

成都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文化基因开放，北与中原，进行双向交流；正东方向，有荆楚、长江下游，南方文化的西进；东北方向有河南、山东，北方文化的斜插；西北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厚重氐羌文化的南下；南通南中、东南亚并与西亚交往。



壹

貳

參

肆

伍

成都与杭州。

都在北纬30度,地球上最神奇最有趣的一条纬线。

北纬30度,主要指北纬30度上下波动5度所覆盖的范围。沿着北纬30度前行,能领略许多奇妙的自然景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埃及尼罗河、中国长江等,均在北纬30度入海。

人类文明史上一条极其特殊的纬线。

神奇地带。孕育源远流长的第一波五大文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印度哈拉巴、古中华良渚与宝墩文化。良渚文化跟苏美尔文化几乎同时代,比古埃及更早。

同处“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上。

成都在西端,长江上游。

杭州在东端,长江下游。

文化交流,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

水乳交融。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与良渚文化。

一个集大成的文明,持续发展约1 000年。串满文明奇迹的珍珠项链上,与“宝墩文化”同期的良渚文化的余辉,在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中闪烁。

良渚古城与宝墩古城,反山王陵的土筑金字塔与营盘山石板墓的朱砂葬、瑶山祭坛与三星堆祭台,两地发达的稻作农业、高超的手工业技术,共同谱写了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华丽篇章。

长江流域最早驯化水稻。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数量巨大的成熟的栽培稻谷，年代为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4500年。湖南澧县彭头山类似的稻谷遗存，距今8 000多年。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吊桶环，发现更早的稻谷的植物硅酸体，证明在距今约1万年，稻子已经开始被栽培。在湖南道县玉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了3粒半稻谷，当时测定与稻子共生的其他作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2万年。

良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

杭州的“杭”字，指用于远洋的工具木排方舟。

杭州的前生。余杭区的一个地名，距杭州市区约30公里。地势比杭州高，天然屏障天目山余脉，对外的重要通道苕溪。山脉众多，大面积湿地。鱼肥稻香，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杭州从这里出发，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再也不走了。

形成了江南水乡都市最早的格局。

横塘纵溇间，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期建成。

考古称为“良渚文化”。中国最早的区域性大国。

人口9万以上，居住在城与周边的人口，2.8万。

鼎盛时期，城区人口可以达到4万。

良渚古城遗址，地处东南沿海，在浙江北部太湖以南、长江中下游的天目山东麓，悠悠流水，润养着杭嘉湖平原。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控制太湖地区1000平方公里、数百个小型聚落。覆盖了古会稽（今江苏苏州至浙江绍兴）与古扬州（今安徽宣城至江苏扬州江都区）的全部，延伸至闽赣川湘地区、豫鲁晋陕地区。

南北，分别峙立着大遮山、大雄山两座天目山余脉；西部，一系列低矮山丘，均距古城约2公里；向东，敞开的平原，以山为郭。东苕溪，自西南向东北蜿蜒流过，最终向北注入太湖。

人口比世界上最早诞生的城市“乌尔古城”还多。

密集分布区，集中在余杭区中西部的瓶窑镇附近。

城墙接近长方形，四个转角处呈现圆形，称为“圆角方形”。

有四个故宫那么大。

面积约14.33平方公里，周长6公里。

由内而外，城址向心式的“宫殿区、内城、外城”、水利系统完整的都城结构，与后世都城“宫城、皇城、郭城”的结构体系类似，世界

举族迁徙。特大洪水灾难延续若干年，良渚先民被迫远走他乡。北上，争夺生存空间，爆发与黄帝、蚩尤的冲突。南下，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相继分两路，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游迁徙。一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与石家河文化「交融」；一路，走中原路线，过河南，辗转入川……

上已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的早期都城系统。

工程量顶两个金字塔。

“中华第一城”。意义与价值，可比殷墟。

无论规模，还是内涵，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极为罕见。

外围大型水利工程，在余杭区瓶窑镇境内。古城的北面和西面，由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塘山长堤区三个部分，11条水坝组成，形成3个水库，蓄水量高达6 000万余立方米，多出西湖4倍有余。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距离为5.5公里。从城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弄坝体，距离约10公里。

精通于城市的规划和建造能力。

先有水利建设，再建城市居住。

城建之初，已经统一规划、设计了城外有机组成部分。筑坝构成的水库，能够衔接周边天然水域，加上古城里的人工河道、表里城河，共同构成了一个杂乱而完善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将水利史的源头上推到距今5 000年左右。

比“大禹治水”，还早1 000年。

水利工程发达完备，令人惊叹。

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

需要上万人修建数年，王朝式的政权才能做到。

水系发达，犹如一座水城。城内，水网长度超过30公里。交通干道。

共发现八处水城门、一处陆地城门。

陆城门，夯土夯筑而成，三个夯土墩将陆路分为四个通道。

河岸边缘用木桩、竹编、木板进行加固。

岸上，玉石加工、漆木器与骨角牙器制作的手工作坊区。

“藏礼于城”，“湿地营城”。社会分化、劳动分工、城乡分野、大型工程管理组织能力、神王合一的社会结构、区域性的统一信仰，早期国家在城市文明方面所创造的规划特征。

上承庙底沟时代，下启龙山时代。

文明摇篮。人类最早的城市。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的乌尔古城，城市面积不到0.6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85个足球场的大小。良渚古城，发掘出总面积6.13平方公里左右，将近860个足球场大小。

超过乌尔古城的十倍。

距今5 000年左右的宫殿面积，约30万平方米，整个乌尔古城的一半大。

与著名的埃及胡夫金字塔相比。胡夫金字塔公元前2580年左右建造，占地近5.3万平方米、体积260万立方米左右。良渚古城宫殿区30万平方米、基座土堆厚达10米左右，总体积大概为300万立方米。

工程量至少不亚于晚几百年的胡夫金字塔。

水利系统，由11条堤坝组成。

最长的11公里。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就达到260万立方米。

类比。好莱坞电影《金刚》里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总体积也不超过80万立方米。

相当于，在古埃及人堆了大概相当于三个帝国大厦的石块，给法老当陵墓之前的几百年，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挖掘了相当于六七个帝国大厦的土方，去改善住宅条件、兴修水利。

难能可贵。根据DNA检测，古代良渚人的基因，与现代上海人的基因相差无几。

五千多年过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是当年那些人的后代。

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水利工程里楔形文字，从部落到国家形态。

“巫政之国”。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神权、军权并重的国家形态。与沙漠中的苏美尔文明、大河两岸的埃及文明、海洋特色的爱琴文明、热带丛林中的玛雅文明、大山深处的印加文明不同，以犁耕技术、水运网络、统一宗教、玉器媒介为四大支柱，在水乡泽国中形成的大一统文明。

除了修水坝，也创造了灿烂的玉文化。

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顶峰。

良渚文化中，玉琮是神圣的象征。

通体高8.9厘米、器重约6.5公斤，一个大西瓜的重量，形体宽阔、硕大，圆度极为规整，器表光洁如镜。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称为“玉琮王”。

“权贵圈”通行的权力名片。

接近良渚历史年代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埃及的孟菲斯金字塔、以色列的阿卡、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泰国的班清、阿曼的巴特·库特姆、印度的巴瓦加德和叙利亚的阿勒颇。

都在1500年后，即迄今3800年，仍然比良渚文化“年轻”。

长江文明把中华文明历史推到了5000年以上。

良渚文明的身影，一直隐藏在几千年的华夏记忆中。

甚至，最大的秘密，如白天的太阳，一直展示在我们面前。

古埃及人修金字塔时，中国人建造了良渚古城与外围的水利系统。

长江流域以良渚、三星堆和金沙城为代表，城邦集群与氏族联盟的遗址与文史，将叙利亚、埃及和以色列等地的，被“西方至上”者编造出来的“九千年文明”之类的左支右绌的残篇断简、按想象拼凑与伪造出来的遗址和文字等，强力推到无处藏身的旷野。

曾经高度繁荣的文明，遭遇一场重大自然灾害，突然消失。

遗址的断层上面考古，发现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

距今6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暖，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丘陵外，全部沦入汪洋之中。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蔓延。

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

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发达的文化设施被摧毁。

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

良渚人或迁移，或死亡，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被海侵摧毁。

洪水突降。当山洪暴发，江河水涨，洪水泛滥，陆地被淹，黄河、长江的下游，长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逃奔外地。

良渚文明遗址周边约20至100公里范围内，由东至西呈半包围

圈，分布着软玉、石英玉、透辉石、钙榴石、萤石等宝玉石矿脉，按玉石品种分类，有和田玉（广义）、闪石玉、蛇纹玉、玛瑙、玉髓、水晶、蛋白石和石榴石等品种，符合良渚玉器品种多样的特点。

良渚玉石加工基地。

5 000年前，余杭、德清接界的下渚湖一带。

毁灭性打击。在天目山中的玉矿开采出的玉料，通过纵横交错的苕溪水系，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加工地，加工成精美玉器后，在良渚王城与周边部落交易换成食物、财富，良渚成为当时最富足发达的交易中心，初具国家雏形。一切都在4 500年前的防风王时代，因气候突变、海平面上升而中断，地处低洼地带的良渚文明与防风文化，都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

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明，毁于一旦。

举族迁徙。特大洪水灾难延续若干年，良渚先民被迫远走他乡。

北上，争夺生存空间，爆发与黄帝、蚩尤的冲突。

南下，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相继分两路，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游迁徙。一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与石家河文化“交融”；一路，走中原路线，过河南，辗转入川……

全球性的“干冷事件”。

4 500年前，整个中国气候，甚至世界气候，世界多地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遭受到持续约200年的干冷气候的严重影响，导致了埃及、希腊、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崩溃，人类的迁徙。

气候变迁。东西南北相距遥远的不同古文化，几乎同时陷入衰落。

只有气候能够影响广阔的范围内的、人类、文化。

因祸得福。“干冷”对杭嘉湖平原是灾难，对成

「内循环作用圈」。距今5 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文化深入岭南和珠江流域；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向北，传播到内蒙古，西上抵达黄河上游，又经甘南进入岷江上游、成都平原。江河文化「双联体」，相互融合、重组。

都平原却是好事。干旱的发生，让沼泽渐渐消失，在5 000多年前宝墩的先民，继后的三星堆、金沙村先民，正是在这样的区域逐渐兴起。

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衰亡。

遥相呼应。宝墩文化，同时突然衰落。

几百年后，在大约距今3 700年前，石家河文化也走向衰落。

沿着“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成都平原在“呼喊”。

诗与远方。

不能直接抵达，只能徒步相告。

靠着站站相传的方式，良渚文化将礼器、信念慢慢传入……

东南地区。一股，因环境变化而西迁的良渚—石家河“联军”；一股，南下二里头，夏朝灭亡时的夏桀南迁。两股势力逐渐融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被敞开心怀的三星堆人“消化”。

接踵而来。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头像”，善学的三星堆人又提起刻刀，端详着巫师、首领，雕刻成本地人的模样。青铜技术传入，制成铜“人头像”。人铜“立人像”出现。

青铜“立人像”的原始形态，还与安徽“凌家滩文化”的玉“立人像”，甚至，与辽宁“红山文化”的玉“立人像”，有文化渊源关系，表现的都是正在作法的神巫形象。

西北地区。距今4 000年左右，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传入。

黄帝部族居住的居邑。一种上端有叉刃、下端呈长方形的玉器，被称为“牙璋”。仿造出来后，又根据对鱼、鸟图腾的崇拜，在器身上加入游荡的鱼儿、飞翔的透鸟等纹饰。

文化关系密切。距今3 700至3 600年前后，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带来兽面纹铜牌饰，在生产过程中，三星堆人大做“减法”，将图案逐渐简单到只留下长方形的外貌。

“二里头文化”包含政治发明、文明遗存。辐射能力强、影响大，具有王朝的气象。除了在夏后氏“故地”三星堆外，在岭南地区的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发现制作非常精致的大型牙璋。

距今3 600至3 200年左右，“商文化”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玉器，又大量输入。三星堆人对铜尊、铜卣、玉戈、玉矛略加改造，成为大量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了三星堆最大限度的繁荣。

应接不暇。东亚、南亚地区传来的海贝、象牙和神树造型，与三

界、阴阳门观念等，促进了三星堆青铜神树、神坛的塑造与天门理念的产生。

距今3 600至3 100年前，西亚与埃及也不甘落后。

尼罗河彼岸的法老面具、金杖，在影响到希腊迈锡尼文化后，也间接传播到。成都平原纯纯的黄金，满满的奢华，尽管有些昂贵，三星堆人还是制造出一个个薄薄的金面具，罩在青铜人头像的脸面上。

文化交流，有来有往。

成都平原出产的丝绸，也出现在3 000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中。

姿态万千的玉器韞椌，藏着朦胧的信仰。以玉为傲的良渚遗民，最早将玉锥、玉泡、玉珠，从二里头“驮”到了三星堆，精美的青色玉琮，被当作“传家宝”，代代流传，再传到金沙。

十节玉琮，揭示了长江流域两大文明中心跨越千年的“缘分”。

同宗同源，气质非凡。高22厘米，通体呈淡淡的青绿色，上面有些暗黑的花斑，整体透明晶莹；为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贯穿一孔；制作十分规整，整器内外抛光，九条细小的横槽，将其分为十节；整个器表形成了40个凸面，每个凸面拐角，各有一个变形的“神徽”。得名“十节玉琮”。圆形的开口、方形琮身之间，称为“射”部，代表着“上天和大地之间”。

21世纪初经考古人之手，重见天日。

三星堆都城始建于约公元前2000年，正是良渚文化深受海侵之害后期。

史前中国各地区在宇宙观、祭祀礼仪、统治策略等方面形成“共识”。

与“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密切相关。

“内循环作用圈”。距今5 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文化深入岭南和珠江流域；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向北，传播到内蒙古，西上抵达黄河上游，又经甘南进入岷江上游、成都平原。

江河文化“双联体”，相互融合、重组。

青铜器时期，吴越地区既有湖北钟祥的荆楚文化，也有孙武等贤能之士带来的黄河文化。两种文化，相互碰撞。



壹

貳

參

肆

伍

神秘的三星堆不断给我们惊喜。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与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祭祀坑相隔35年。

三星堆开启了第二次大规模成体系发掘。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再惊天下”。

地地道道的“大国工匠出品”。

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高度担当”。时隔35年，三星堆发掘再次震惊世人，“中国制造”持续登上热搜。多件器物具有中原文化内涵与地区特有的创意器形，再一次证明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边。6个相似的器物坑，四大两小，朝向一致，都是东北—西南走向，更多学者坚持认为是“祭祀坑”。器物掩埋时间差异明显，不同坑的器物明显埋藏于不同时期的土层。

古蜀国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

怪异的祭祀现象。有点像交接仪式一样，新王登基或新的一个王朝诞生，会把前一个王朝的东西，从宗庙里面或是主庙里面请出，埋进坑里，然后，自己再造一套，继续放进宗庙里面。

逻辑关系。以此类推，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三星堆目前出土的文物，多用于宗教、祭祀活动。

一号坑，祖先崇拜，以青铜人像等器物为代表；二号坑，太阳崇拜，以太阳形器为代表，两个“祭祀坑”，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社会王权和神权并存，在后来的金沙文化中得以延续。

在四号坑取数10份碳14的标本样品，测定发现距今公元前1199年到公元前1017年之间。

在2021年，年代相加后数字是3 220，由于公元没有0年，再减1年，也就是距今3 219年。

不是举办祭祀活动的第一现场，属于第二现场。

出炉的器具，也越来越出圈。既有青铜尊、青铜罍、巨青铜面具这样的“大家伙”，也有硬币大小的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象牙微雕等精致细微的“小宝物”。

黄金、象牙、玉、铜、丝绸等珍贵材料，应有尽有。

“大国工匠”的文创，令人惊叹，让人感慨。

造型奇特、大气恢弘。

出土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与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青铜尊、罍与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的出土器物一致，具有文化的共同属性。既昭示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

发现3 000多年前祭祀用的丝绸。

在祭祀坑的灰烬层里，发现大量丝绸痕迹。

在青铜器的周边上，发现丝绸包裹的痕迹。

起源，不是制衣服，而是事鬼神。

一种形而上的功能。在精神层面，印证古蜀时期，丝绸有沟通天地人神的独特用途；在物质层面，也反映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中国5000年的历史里面，丝绸扮演角色不同。最高层面，祭祀用祭服，沟通天地人神；伴随逝者往生的尸服；现实社会的日常穿着。

蚕，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

一种非常娇弱的生物，为保证天地之路的通畅，使人们敬重的蚕蛾能循环轮回，古蜀先民们开始建立蚕室来进行精心的饲养，养蚕也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展开。

丝绸、蚕、桑树，体现天人合一的理念。

丝绸织品表达。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生产已达到相当发达的

水平。

遗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着上衣下裳，服饰上有起伏纹饰。

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桑树，青铜兵器有蚕纹，一些青铜壶上更有采桑图。

为南方丝绸之路提供考古学实证。《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西周时，古蜀国已向周王朝进贡蚕桑制品，富庶和强大超越想象。

大型祭祀礼仪中，象牙祭祀盛极一时。

象牙往往会被“古成都人”用于祭祀河水，与《周礼·秋官》所提“壶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午贯象齿而沈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有关。沿河而居、繁衍生息的民族，河道的泛滥与否关于民族的生存。

集中发现象牙超100根，还有象牙制品，有的饰品表面，还刻有精美的云雷纹。象牙源自亚洲象群。夏商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黄河流域尚有象群活跃，更何况地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

再次佐证《山海经》中的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其兽多犀、象。”

1986年发掘的二号祭祀坑，出土象牙已被证实属于亚洲象。

殷墟妇好墓中，也出土多达7000枚的海贝，不乏来自阿曼湾的海贝。

山东苏埠屯商代晚期墓葬中，同样发现3990多枚海贝。

有三种可能性：三星堆祭祀坑中的海贝，直接与印度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并传播到中原的殷商王朝；三星堆文明和殷商王朝，各自都有海贝来源通道；三星堆的海贝来自殷商王朝。

黄金面具绝美。

金器崇拜，一脉相承。金沙遗址博物馆保存的商周大金面具，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面具虽只有半张，已足够令人惊喜。但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还有宽大的耳朵，与三星堆所出土的黄金面罩、金沙大金面具的风格，十分相似。

半张脸都有280克，完整的重量超过500克。

经检测，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左右。与此前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金器的黄金含量相似。宽度约23厘米，高

度约28厘米，比完整的金沙大金面具还大。

厚度非常厚，不需任何支撑，就可独自立起。如果能发现完整的黄金面具，不仅是国内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还是国内所发现的最重的金器。携带的许多神秘信息，等待揭开。

大量的金器都与宗教祭祀相关，象征某种特权，昭示特殊身份，与在国内同一时期其他遗址中主要以玉器、青铜器作为祭祀品相比，非常特殊，都体现了“古成都人”对金器的崇拜。

铜人顶尊罕见。尚未完全出土的铜人顶尊，肩部四周装饰了4条飞龙，从尊的口部游动而下，栩栩如生。再往下，便可见铜人双手做拱手状，头部和尊的底座连接在一起。

“古成都人”的浪漫和艺术创造力。

“男尊女卑”。神灵崇拜已经深入骨髓，忌讳女子前来拜神。

众多青铜像中，一件小巧的女性青铜造像十分特殊，只有15.6厘米。人像整体呈跪姿，双手扶举着头顶上高大的尊。体态上，女子丰乳纤腰、手臂圆润，胸部较宽，女性特征突出，上身无衣，下仅穿一条刚到大腿的超短裙，裙腰上还有一处扎结的蝴蝶结。一副宽眼高鼻的刚硬形象，与青铜男性像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女性特征突出，很难分辨。

除蝴蝶结外，再无装饰，甚至没有流行的耳孔——女子应该都不佩戴装饰品。

还在两个祭祀坑中找到57件青铜人头像。

人头像一般高40到50厘米，最小的仅10余厘米，造型比较一致：鼻子高大，嘴咧到耳根，眼睛呈斜三角注视下方，神态庄重。头部却各有特色，有圆头，有平顶；有的戴着回纹头冠，有的戴着两角向上翘起的头盔，还有的像是将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等。底部都被浇铸呈V字形状，显然为了方便插入，可能是配合木制或泥塑身躯，也可能是直接插在土

「双循环」。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经济，延续明显，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金沙、三星堆和盘龙城遗址，分居长江上、中游与下游，各自区域内典型的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文化因素的相似性，说明金沙、三星堆和盘龙城，通过长江航道联系紧密。

纷繁故事、耀眼遗珍，记录人类族群、民族国家的过往，也照亮未知明天、前途漫漫。珍贵的国宝唤起人们的热情，「古成都人」过去的辉煌「证物」，诉说着传承千年的文化根脉。

台、祭坛上使用。

一个已经产生阶级分化的神权社会。

古蜀王一如那尊“青铜大立人”一样，不仅拥有超群拔俗的地位，还在祭祀中负责祈福、祷告，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其他贵族只能在一旁跪着禀告，还有些奴隶只能打下手。

“青铜大立人”本身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服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似乎是具有通天异秉的“祭司”“蜀王”。

人和天相互沟通的祭祀器物。无论是三星堆早期出土的落着九只鸟的青铜神树，还是造型独特的青铜神像，包括玉器与象牙上的雕花纹饰，都显示出明显的神话色彩。

受中原文化影响。人面像，又称“魅头”。《周礼·夏官》中，就有“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以索室驱疫”的记载，祭祀时戴或使用面具，进行通灵祈祷是一种中原传统。

戈形玉器，祭祀中重要的道具。

“古成都人”沟通天帝的中介物。

青铜器被打碎、用火烧，文献里记载的“燎祭”和“瘞埋”。“古成都人”认为祭祀祖先，需把奉献的祭品焚烧，神明才能享用到，只有把祭品打碎埋到地里，才能诚心诚意献给祖先。

飘到天空中的烟，便可以被天神闻到，埋入地下的祭品，可以被地下的神摸到。时至今日，成都平原城乡在祭奠去世之人时，还会使用焚烧的方法，传承时年的“燎祭”。

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带来的证据，再次指向“燎祭”。

文物在被掩埋前，经过击打、焚烧。

焚烧，没有在坑里进行。器物有规律地摆放在祭祀坑中，有序掩埋。下面，小件；中间，青铜容器和

面具，上面，象牙，不像倒垃圾，一种主观的“故意”行为——祭祀。

不像一般的祭祀。祭祀，属于经常性的活动，不会埋太多东西，宰一头羊、一头猪，已是很大型的祭祀活动。8个坑颇为不同，珍贵的黄金器物、象牙、玉器，都被全部埋进去，数量庞大。

耗费整个族群、国家掌握的青铜资源，难以令人信服。

以后还有青铜材质的器物，从事“国家级”的祭祀活动？

如果6个或8个坑属于同一时期，应是变革、迁都、动乱等重大事件的“遗物”。

期待考古发掘能带来更多有机质的物品，还原三星堆艺术形象全貌的重要一步。造像中有非常重要的木雕艺术传统，但木头本身容易朽烂。人头像，原本应安装在木制的身体上。

“纵目面具”，最初是个构件、安放在高耸的建筑上。

发掘一、二号坑的一大遗憾，可能是未能及时识别、保存有机质的文物遗存。目前进行的发掘工作，大大丰富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资料，增加了以前没有的种类，比如木器和纺织品。

古蜀国崇拜火，也崇拜太阳。

国家大事祭祀，古蜀国物产丰饶，“不差钱”。

“三金”，祭司的“标配”。

祭司，人与神对话的翻译，能听到神的话，并把神说的事翻译给人听，也能将人的话翻译给神听，地位仅次于国王。祭司左手拿根金手杖。右手拿黄金“太阳轮”，脸上带着金面具。

黄金“太阳轮”，古蜀国最高级别的祭祀用品，由太阳、四只火鸟组成。鸟最接近太阳，太阳与人之间的联络员，火飞到空中聚集一起化成的神灵。四只火鸟代表东南西北四方天空。

神杖全被黄金包裹，熠熠生辉，上面还刻有鸟、鱼、人三组图案。鸟，天空；鱼，地下；人，人间。祭司上通天，下通地，中间通人间。在古蜀国，国王负责管理，祭司负责沟通。

黄金属于神，由祭司佩戴；青铜属于国王。黄金太阳轮，代表黑夜中沉睡的太阳，统治人们的精神；青铜太阳轮，代表白天照耀大地的太阳，统治人们的肉身。

青铜太阳轮以“五星”为基本设计格局，铸造得霸气十足。

大坑挖好，散发着泥土的味道。

四周整齐地排放着各种青铜器，都是先王生前用来祭祀祖先，

如今要回到太阳里去见祖先，臣民们就托把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带给先祖。前来的臣民，会从怀里掏出各种各样的玉器，有的随身携带，有的从家里特意带来，把美玉先抛进坑底，为先祖们带去一份心意。先是贵族们往坑底奉上美玉，次是平民往坑里抛洒贝币。没有美玉，只有奉上一些钱贝托先王带给先祖。

待众人抛完玉器和钱贝，祭祀活动第一轮开始。

类似的祭祀坑，前后8个以上。

8个祭祀坑，坑口大小不等，祭品多少不一。

三星堆的祭祀文化，令人神往的美女。

一幅“奢侈”场景。

大量砸碎的祭器、丝绸燃烧。

商朝的祭祀文化，像一个面目凶猛让人恐怖的战士。

“双循环”。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经济，延续明显，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

武汉盘龙城，地处江汉平原和长江中游沿岸。

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区域性中心。

吸收了良渚文化的商文化，传播到盘龙城后继续扩散、传播，分东、西、南三条线路进行，影响整个长江流域。向东，顺长江而下，进入长江下游、鄱阳湖地区、赣江流域；向西，逆江而上，经过三峡，进入成都平原；向南，可越过长江，进入湘江、澧水、沅水和洞庭湖流域。

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也因长江河道的打通，更加频繁。

金沙、三星堆和盘龙城遗址，分居长江上、中游与下游，各自区域内典型的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文化因素的相似性，说明金沙、三星堆和盘龙城，通过长江航道联系紧密。

大冶的铜矿运至盘龙城冶炼，并通过长江、汉江发往全国各地。三星堆青铜器所用铜矿，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渊源明显，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殷商与三星堆、金沙文明的交流，在考古学和文献记载中有着确凿的证据。

相互呼应。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相对独立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商文明，共同佐证中国古代文明的

多样性。

文明的纽带突破空间距离，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三星堆还在发掘，未完待续的考古现场。

成功探索与实践，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

只是测定4号坑的器物，还有5号、6号、7号、8号坑……

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值得细细研究，期待更多发现。考古发现对复原古蜀国当时整个神庙的礼仪空间、宗教体系、社会结构、哲学思想与宇宙观，都能提供新的支撑。

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变成已知。

纷繁故事、耀眼遗珍，记录人类族群、民族国家的过往，也照亮未知明天、前途漫漫。珍贵的国宝唤起人们的热情，“古成都人”过去的辉煌“证物”，诉说着传承千年的文化根脉。

期待文字的出现。

能否进一步证明掩埋坑与曾经的神庙礼制相关，能否复原神庙内部场景；能否有目前三个纵目神像之外的纵目神像出现，去论证整个三星堆文明体系中的人神关系；能否出现与目前1、2号神树体量相当的第三棵大型神树，是否与《山海经》中的东有扶桑、西有若木、中央有建木的神话传说密不可分；是否有更多礼仪性兵器出现。

一代代人书写历史，一件件文物承载文明。



壹

貳

參

肆

伍

良渚文化衰落背后，中国史前的“大变局”。

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立的文化区。

“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以长江下游为节点，孕育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以水路交通为主，自长江上下沿线，上至岷江中游，下延东部沿海，面向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的广袤天地。

殊途同归。不同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下，具有不同源头的文化会以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走向文化发展的高级层面，背后既有全球性气候变迁的影响，也是文化积累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化区块链。

联结成在地理、文化上有密切、内在联系的文化共同体。

宝墩遗址的筑城方式与良渚古城、石家河古城相似。

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在诞生大禹“江原文化”、孕育“夏文化”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既吸收中原殷商文化因素，又吸收来自西亚的古老文明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复合型文化体系。

青铜器、玉器的制作技术与中原等地相似。

与商王朝中后期几乎同期。

金沙遗址的玉器、铜器原料，都产于四川，主要是川西阿坝、川西南攀西一带，如汶川、彭州、石棉等。《山海经》记载：“岷山，江水（岷江）出焉……其上多金玉。”

玉器的原材料大多来自汶川的龙溪玉。

湔江河谷的玉，重要补充。

或有少许滇地、荆楚一带的玉石。

《华阳国志》记载：“（绵道）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

湔水，如今的白水河、湔江、青白江、鸭子河。

《汶川县志二十一·宝石玉石》记载：“龙溪乡产绿玉和白玉。”

精打细算。金沙遗址没有发现大型青铜器，可能是在三星堆被洪水淹没、雷击燃烧后，“古成都人”觉得大型青铜器不吉利、不灵验，没必要再“劳民伤财”，在金沙遗址就只有小型挂件。

鱼凫王时期，黄金远不如青铜贵重。

黄金类器物在三星堆文物里的比重不大，直到开明王朝，金器的比重才逐渐提升。

倒不是黄金贵重值钱，而是黄金采集相对容易。

一脉相传。开拓、改变，青铜器物映射出彼此守望相助，对天神、自然的敬畏，对先祖、先知的缅怀，对自由、坦途的向往，体现出不离不弃、相扶相依、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特质。

没有百战问鼎开太平的豪情万丈，没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金戈铁马，也没有千里不留行的刀光剑影，只是默默耕耘，用虔诚、智慧、血汗，甚至生命，创造着属于成都平原的惊人奇迹。

顶礼膜拜。各民族的祭祀，历史文化。

大千世界，祭礼繁形。

民族的不同，形成各具风格的祭祀文化。

神灵，祭祀的对象。人类的童年时代，对于自然物、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恐惧，既哺育人类成长，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感激与畏惧的心理，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三星堆建有最大的宗教场所，祭祀平台。

青铜铸立人像，“东方巨人”。

大立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重180千克，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

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典型的三星堆人的面部特征；头戴高冠，冠上刻有莲花状兽面纹、回字纹；身穿窄袖与半臂式三层衣服，里面的长衣下摆类似于西方的燕尾服，世界上最早的一件“燕尾服”。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以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制作精美，在夏商周考古史上迄今罕见，堪称中国古

一堆神人。青铜立人、面具、太阳形器具。「偶像崇拜」与「太阳崇拜」。深深信仰，古蜀人对「太阳神鸟」毋庸置疑。四季十二个月，金沙太阳神鸟，比三星堆太阳轮盘更精准。

代最早的“龙袍”。

来自3 000多年前的“网红”。

赤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铜像两手，一高一低，呈握东西状。

双手握着木质船桨，划船的姿势。

神情、手势不同于巫师，鱼凫的神像。

捕鱼、划船造型的神像，古蜀文化的“密码箱”。

蕴藏古蜀信息，饰物、饰纹都是古蜀文字，有些类似甲骨文或东巴文。衣服下边三角形，类似甲骨文“王”字。帽冠正中圆圈，“日”字；双层椭圆形，“月”字。底座上，有“牛”“蛇”“鱼”等字；在腰部，有“目”“水”“回”“舟”“波”等字。

还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不仅体型庞大，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奇异感。

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显得神秘、亲切。

想象与夸张。带着一种严肃、狞厉、神秘、具象的美。三星堆出土的“纵目”蜀王，与蚕丛王是同一个人，除了能治水、养蚕外，最大本事还有能手握毒蛇，能捕杀大象、野兽。

三星堆金杖，长达142厘米，重达700多克，雕刻有精美、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还压有一只箭状物。杖上还刻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

“鸟惊鱼骇”。鱼凫的权杖，代表权威。

“鱼凫”本身就是捕鱼的水鸟。

青铜“神树”，铸于“神山之巅”。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底座呈穹窿形，圆形底盘上由三叉支架，构拟出山形，树座上绘有精美的云气纹，寓意“神山”。卓然挺拔，直接天宇。树

上挂有许多铃与各种果实。树侧有一条逶迤而下的长龙，身似绳索相辮。神鸟，能上天入水，也是捕鱼鸟。

水陆空一体，表示捕鱼之王。

青铜太阳轮盘，宗教法器，表示敬天敬地。

按照神的意志行动，相当于船只方向盘。

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造型艺术，铸造充满了神奇想象力的青铜神树。

祈求上天风飘雨顺，民众安康。

古蜀国的国徽或标志。

古代历法标记。三星堆太阳轮盘、金沙遗址太阳神鸟。

农业文明的象征。

世界上有9个国家国旗有太阳，日本、哈萨克斯坦、北马其顿、阿根廷、孟加拉国等。

推算季节气候变化，安排农业种植。

至少在商代以前，成都平原就是农业发达之地。

青铜太阳轮盘，文物瑰宝的重中之重，距今已有3 000多年，被解释为“古成都人”崇拜太阳。轮盘大圆圈内的五条线，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在“天圆地方”中，也表示五星汇聚，与天象气候有关。圆内正五角，具有五次对称性，满足数学上黄金分割率0.618斐波那契级数特性，分形(fractal)自相似结构如准晶体，与热闹的“黎曼猜想”质数定理密切相关。

根据青铜太阳轮盘，可以推算季节变化、大致天气，有助于农业生产。

“五星连珠”“五星聚会”。

青铜太阳轮盘的五条线，表示五颗行星在同一时期，出现于东方天空。

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地织锦护臂，中日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现在收藏于新疆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五星聚会的理想周期为516.33年。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归纳总结出来的占辞术语。

“东方”，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指黄河中下游的

京畿地区与中原。研究“五星聚会”，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那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一堆神人。青铜立人、面具、太阳形器具。

“偶像崇拜”与“太阳崇拜”。

深深信仰，古蜀人对“太阳神鸟”毋庸置疑。

四季十二个月，金沙太阳神鸟，比三星堆太阳轮盘更精准。

《山海经》中，记载了“金乌负日”的传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日出日落，因一只黑色的三足乌鸦，负载着太阳活动的缘故，“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乌”，代表鸟，古人的精神信仰，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对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鸟，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敬仰。

“有葛国，黍食，使四鸟”。

《淮南子》中，也有“古成都人”崇奉四只神鸟的记载。

《大荒南经》里，“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也表明“古成都人”对鸟、太阳的崇敬。青铜鸟、青铜神树等文物，印证“古成都人”的“崇鸟崇日”习俗。

四季轮回。太阳神鸟图案上，“四”只鸟、“十二”道象牙状光芒，与时间概念有关。“四”，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十二”，一年十二个月，一天之中的十二个时辰。

“古成都人”早已掌握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

“太阳神鸟”又被赋予新的色彩含义，增添许多科学智慧。

“古成都人”运用天文历法十分熟练。已经掌握岁、时、月的概念，形成的规律、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阴阳历。

《海内经》载明：“噫鸣生岁有十二。”

《大荒西经》记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噫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山海经》说明了日月星辰与十二生岁的关系。

在祈祷天神庇佑的同时，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采用观象授时之法，来预测农事。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

开太阳和鸟。

“天”，代表太阳，农业活动，“靠天吃饭”，农人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信仰太阳；判断季节，大多依靠候鸟，鸟在农人心中的非常重要，陆游诗中写到“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

无论是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还是三星堆遗址的太阳轮盘，都证明“古成都人”使用的历法相当先进。只是，古蜀文明与良渚文明一样，都被洪水、瘟疫打入茫茫地下，数千年后才重见太阳。

3 500年前，古蜀的“五行”。

水火土木石（古蜀），非金木水火土（后世）。

“五行轮”，古蜀先贤经过上千年，对日月星空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后，总结出的最原始的古朴天文认知，意义非凡。与后来成都平原制定节气时令，乃至古蜀传统建筑，关系极大。

古蜀文化的结晶和载体。

成都的传统建筑，有4 000年以上的发展史。新石器时期，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认知的引导下，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巧妙利用自然，形成一套完整的以木结构为主体、独具特色，充满东方智慧和创造力的建筑理念。

三星堆、金沙与殷墟、盘龙城等，使用同一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的材料。

特殊铅在殷墟三期后，开始大幅度减少，甚至，殷墟四期已经完全不用。

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却突然崛起，成为这种矿料的规模化使用者。

特殊铅矿在西南地区容易理解，偏偏发现、证明铅矿在河南的南阳盆地。

三星堆青铜器，含磷技术独特。技术含金量相当高。

更为神奇，青铜神树底座的中心，为增加青铜

华夏文化里的每个文化圈都超越地理限制，相互又重叠。夏朝发明牙璋，这种中原文明产物却在三星堆出现，还传到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成都平原成为华夏文化向更广阔地域辐射的纽带、加油站。

器的强度,还含有少量的钙元素。

三星堆北面的月亮湾、青关山、李家院子、马屁股、仓包包等发现城墙、宫殿的区域与发现玉石的区域。金沙遗址还出土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加工作坊应在附近。

金沙遗址含高放射性成因的铅铜器,与三星堆铜器材料,应出自同一矿区。

众多丰富的象牙器、玉器、金器等文物,都是中国各地文明中相对欠缺。

神秘拼图的谜底。

太阳神鸟金饰,代表阳性;蛙形金箔,代表阴性。

8个类似青蛙的金箔。三星堆遗址发现过一件石蟾蜍,蛙形金箔说明中原地区的月亮传说,流传到了成都平原。金沙的蟾蜍、青蛙造型,象征着金沙人。对月亮的崇拜。

太阳神鸟金箔,21世纪的现代手工艺都无法复制,厚度仅0.02厘米,所有金饰藏品中最薄的一件,金饰的含金量高达94.2%,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成都、杭州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华夏文化里的每个文化圈都超越地理限制,相互又重叠。夏朝发明牙璋,这种中原文明产物却在三星堆出现,还传到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成都平原成为华夏文化向更广阔地域辐射的纽带、加油站。

不同文化圈绝不仅是文化相互交往、渗透,还形成一个道德体系。文化权力,不是通过霸道地对边缘领土的控制来实现,而是通过道德权威、声誉的累积,来获得边缘地区对“中心”的钦慕、尊重。

成都平原的铜牌饰与新疆哈密牌饰,形制、镂孔、穿孔方式密不可分,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的起源地在河西走廊,岷江流域、白龙江流域,沟通成都平原与河西走廊的两条通道。

中国西部巨大的文化传播带。黄金制品传播的“草原之路”,贯穿北中国非农耕的草原文化带,与万里长城的修造路线、分割农耕、游牧两种生活方式大致吻合。

“长城·藏羌彝”传播带。将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西北,与河西

走廊划一条联线，这条线与上述“草原之路”形成一个巨大的半月形，恰好将中原地区包在中间。

“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将金沙古城所在的成都城北，与杭州城北的良渚古城、广州市区的文德路划一条联线，也是一个巨大的半月形，也恰将杭嘉湖平原、珠江三角洲包括在内。

成都，正位于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中心点。

也是“汤继强线”“T型经济带”的原点。

以成都为原点，一个“T”字，将中国西部的重要城市集合到一起。

向北西安，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和桥头堡，“T”型经济带北延线节点。

向南昆明，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T”型经济带连接东盟十国的节点。

向东重庆，连接长江经济带，以重庆为突破口，沿江而下至武汉、杭州，联合成都、宜宾、泸州等，延伸“T”型经济带至贵州、湖南、江西等中部地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版图上的“新大陆”。

若将黄金生产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史，作为一种产生于西亚的文化传播现象，由河西走廊延伸向东，围绕中原地区分成南北两道形成“中国弧”的新月形，就堪称中国境内的黄金之路。

放置在世界版图中，还有时代更早的中国以西的那一段。

来自中亚的传统“地理身体”语言，内与外之间有界限模糊，跨越区域边界的经济、文化和权力的流动、渗透，与中心点、原点的成都，共同组成中国内外“双循环”的天下体系。

两者合起来，就是一条横贯欧亚非三大洲的黄金之路。

北上南下的内外“双循环”线路。

日月同辉。文明大同，不同地区的文化必会在某个点交会。

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物质、精神双向财富。

成都与杭州，“文明肇于长江”，被以良渚文化、宝墩文化、盘龙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明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史前城邦集群”证明。“华夏文明西来”的推断，顷刻瓦解。



壹

貳

參

肆

伍

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形制风格与良渚的玉琮无二。

“随风潜入夜”。玉琮、玉璧，并非单纯的珠宝，而是中华礼制的滥觞。这套礼制虽然后来不幸残缺，但一直传承到了陶寺、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甚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以后。

三星堆出土的陶盃等器形，源于黄河流域。

“斯芬克斯”之谜的“神徽”与三星堆骑虎人像。

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交集融合，留下的历史痕迹。

玉璧、玉琮作为礼器，在周代文献中已有记载。《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说用璧祭天用琮祭地。古老的天地神话，在良渚王城表现充分。

祭礼巫师、沟通天地的重要法器。

良渚文化出土的“十二节玉琮”，关于天地自然崇拜的礼器，内圆外方的形制暗合。“天圆地方”的神话观，12节和天文历法上的12个月暗合，关联的是古人对天地日月的时间记录。

“太阳神鸟”的图案，体现了“古成都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生生不息、万物运动规律的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堪比现代剪纸作品，线条流畅简练，又极具动态之美，完美的构图，展现了“古成都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与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

1986年对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掘，出土神树估略有6至8件。2021年4月，3号神树的修复已经启动并初具成效。35年前出土时的70多截青铜残件，经文物修复专家预拼接，已经重新勃勃“生长”，初露神树神秘美丽的风采。完全修复完成后，与三星堆镇馆之宝——1号青铜神树一起，共同展示三星堆人神树崇拜的宗教信仰与杰出的艺术创造力。

预拼接的3号神树，初露芳颜。

青铜树座上，神树主干两两缠绕、向天际蔓延生长；神树枝分两层，枝蔓上犹有密集的挂孔，显示曾经挂有饰件；树顶上，神秘的人首鸟身像展开双翅、尾翎高高竖起……

整件神树看去仅有1米左右，但与1号、2号神树截然不同的优美造型，仍然令见多识广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赞叹不已。初步判断，刻画的应是《山海经》里的扶桑树。

《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汉代文学家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记载：“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

站立在神树顶端的人首鸟身像，古代民间神话中的木神“句芒”(gōu máng)。

神话传说中，“句芒”正是人首鸟身，太阳升起的地方、神树扶桑都归他管。

1号神树体量巨大，放置固定场所，小的青铜神树，可灵活移动放置。

在不同的祭祀场使用。

在《山海经》中，成都被记载为“母国”：西王母国。

在《蜀都赋》里，左思的蜀都是“全域成都”，北到华容、南至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大片地区。《华阳国志》也描述，古蜀不是“国”，而是“世为侯伯”的夏朝、周朝王室贵族地区。

“蜀”字通假“属”字。

“蜀都”就是“属都”，属地之都。

“属”字中有“禹”，造字本义跟禹有关，意为大禹治水拯救天下，天下为大禹所属。母国和属地的关系，“宗属关系”，母国和属国，共同称为“海”朝。

“海内”，指朝代的疆域，中原大部分在“海外”。

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一方面，铜器制造技术与小麦、黄牛、绵羊「打包」，被中原地区接受，东传、南下，到成都平原；一方面，粟（黍）的「西传」，是种植技术的传播。

《山海经》中，有炎帝、黄帝、大禹，而没有夏商。

“海”字里有“母”字，造字本义跟“母”有关。“海”字，最早不指海洋，是因存在一个“母国”，以“母国”为核心的属地范围，才称作“海”。这，就是《山海经》中的“海朝”。

“海内”一词，也就来自这里。

古蜀国，夏朝部落联盟所在地。

“海内”按方位，分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有些地方，时而在“海内经”里，时而在“海外经”里，说明“海朝”的疆域在不断变化。夏商是由古蜀国的“海内”，分离出去。

炎帝、黄帝、大禹，都属“海内”的昆仑虚。

夏启，独自在“海外”的中原称帝。

汉藏语系，汉语言最早发源于巴蜀。

四川彝族、云南东巴人，都还保留远古文字。

羌族一直说汉语，藏族在汉藏语系基础上，引用梵文形成藏文。

先有语言，再有图文，最后形成系统文字。

大邑、崇州、旌阳、什邡，都是最早的城邦。

川西很多地名、水名，都是远古最早语言的发音。

成都平原的地名、水名，用字独一无二：崇州、邛崃、什邡、郫都、大邑、岷山、汶川、旌阳、鱼鳧、雒城、绵虎、涪江、沱江、洛水、湔水、樊道、乐（洛）山。

古蜀反复和殷商发生战争。

周人联合巴蜀、西南各族推翻殷商，再分封诸侯，统治教化各国。

统治关系，周和中原。

兄弟关系，周和成都平原。

秦也借巴蜀之师，统一六国。周秦时期，才开始自称“华夏”。秦巴以北，谓之“华阴”，秦巴以南，谓

之“华阳”。《华阳国志》记载着整个西南地区。周秦巴蜀，最早的华夏人。

《周礼》《说文解字》记载，玉琮用来祭祀地神。

良渚的玉器，具有明确的等次划分，尊贵身份的载体。一些人可以用，另一些人只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玉器。玉器具有社会属性，能够反映信仰和制度设计。国家社会的文明形态。

象征王权。良渚文化有玉杖，三星堆有金杖。

一条清晰的时空传承线索。

良渚文化的玉琮内圆外方、中有圆孔的形制，“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一种将原始宗教和数字理性结合的思维方式，发展到《周易》《道德经》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时而为的世界观，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辩证思维，后世被归纳为“天人合一”思想。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文化、三星堆文化，再到清代天坛、社稷坛，一直到现代的中华世纪坛，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科学，追求外在的真理。

宗教，追求内在的逻辑。

奠定了中国统一的神话文化的基础。

独特的神权思想、对玉琮的重视与崇敬，也影响到“古成都人”。

“国之重器”。神物玉琮，“沟通天地”。

改朝换代。在商末周初，开明王从三星堆迁都至金沙城，玉琮在成都城北羊子山祭坛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中使用，后埋藏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内。直到3 000多年后，世人才目睹到令人炫目的美丽。

“千年古董”。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玉琮的大量出土，反映出良渚文化与宗教思想对古蜀国礼制系统的影响、渗透。古蜀国在将良渚玉琮奉为珍宝之时，还以虔诚的心态，利用娴熟的制玉技术，选取本地上佳整玉，细心打造出了“高仿”良渚式玉琮。古蜀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吸收、包容、融合中发展，走向了繁荣。

良渚文明对玉的喜爱和尊崇，深刻地影响了华夏。

时至今日，温润如玉也是对有德之人的尊崇的称谓。

在两大传播带的优美“中国弧”内，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还存在着几条“文化沟通线”，至少与6种早期文化发生过碰撞、交融：

通过汉中,与关陇古代文明交流;通过岷山羌藏地区,与山地游牧文化有交通;通过东面的巴濮地区,与长江中游相沟通;通过西南方向的横断山区河谷交通线,与冰雪文化相勾联;通过南面的樊道,与“西南夷”交流……

人口地理学的“胡焕庸线”、经济地理学的“农牧交错带”,民族考古学的“童恩正线”,都昭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交流,造就史上的长城地带。

长城不是绝对的“界线”,被历史起伏推动,形成广阔的带状过渡区,大致沿“胡焕庸线”区域分布,处于由半湿润气候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气候区,与“汤继强线”相连、重叠。

以青藏高原为观测点位,把祁连山脉、贺兰山脉、阴山山脉、大兴安岭,与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的横断山脉,视为屏障,环绕着黄河、长江中下游肥沃区域的双臂。

“文化梯递”,突破三级地理障碍。

民族和文化融合发展,成都平原地位重要。

至少在商周以前,南北丝绸之路间的青铜文化,把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北方的内蒙古、河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的甘青、新疆地区,连为一体,通过“Y”字形“藏羌彝走廊”沟通交流。以南西伯利亚为主的欧亚草原的异域文化,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沿着“西北走廊”,源源不断“南下”;通过“藏羌彝走廊”上的成都平原,再“南下”,上“南岭走廊”。

成都,正位南北两大走廊链接的中心“节点”。

强力纽带。仍是汤继强“T型经济带”的原点。

跨三大“地理阶梯”的文化交流,九州内外的“双循环”。按照《禹贡》的解释,大禹九州的巡行路线,以龙门口为起点,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顺序转大圈,最后又回到龙门口。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促使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跨越式发展。

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一方面,铜器制造技术与小麦、黄牛、绵羊“打包”,被中原地区接受,东传、南下,到成都平原;一方面,粟(黍)的“西传”,是种植技术的传播。

“藏羌彝走廊”的媒介作用重要。

中国与“高地亚洲”——欧亚草原的交流,通过北方与西北方的多条不同路径实现,直接的联系发生在北部边界。“西北走廊”上的

华夏先民，充当了欧亚两个地区“中间人”的角色。

青铜时代的传统核心区域，以洛阳盆地为中心。

文化和社会旋起旋落，到半月形地带下端的成都平原。

“文创”出来的宝墩→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中心。

成都成为一个与中原，甚至西方，更加不同的异质性的文明中心。古蜀文明与欧亚草原崇尚黄金的游牧文化的关系密切，反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的世俗文化的关系，更疏远一些。

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同质化的开始。

欧洲、亚洲，东方、西方异质化的起步。

随着夏商周三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形成，半月带文化与文明的衰落，“中国弧”的功能从东西双方贸易的媒介，转变为依附于中原或东亚腹地、西北面对广袤欧亚草原的“保护膜”，如同带有瓣膜的细胞壁，产生阻隔东西方自由交流的影响。东西双方只是透过“中国弧”进行“接触”，并非“交流和融合”，中原仅仅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因素与技术。

中原透过半月带“保护膜”，向西方主要输出丝绸、粟。

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接纳性。

始终秉持一种整体性、连续性。

“外循环”的一大特点，能接受，才能发展。

大凡传入的新技术，都被“中国特色”。

中国只接受可以被本土化的文化，本能地拒绝难于转变的文化。青铜，原本作为一种武器在欧亚间传播。进入中原地带，与本地的祭祀传统融合，变成有礼仪功能的炊具、酒器。

农作物同样被“选择”“转化”。

小麦种植技术，东传中失去原有的品种丰富性，经历“中国特色”的融合，原有的冬季生长特征，被创新成多季节生长，增加了季节多样性。在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种植有多种小麦。公元前2000年前后，只有面包小麦一种传入中国。盛行西亚、欧洲的“一粒小麦”“艾玛硬粒小麦”和“斯佩尔特小麦”等，都被东方的饮食传统拒绝。

禁止西传。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发明、策略，都被视为“秘密武器”。

在两大传播带的优美「中国弧」内，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还存在着几条「文化沟通线」，至少与多种早期文化发生过碰撞、交融。

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完备的圭表测量技术、制定夏至影长标准的秘诀、天下观、礼乐制度观念、青铜礼器制度观念、玉礼器制度观念等，进一步加深了欧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的开放，影响深远。

二里头的牙璋、三星堆玉戈，远播越南等地。

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将东亚大陆低地，视为安全腹地，将欧亚草原高地的居民视为“西戎”，将古印欧人视为“鬼方”。使得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停留在浅表的金属、作物、家畜三类技术层面。华夏先民将青铜、牛羊、小麦，主要引入“祀与戎”领域，这加深了青铜时代东西双方的异质化程度，进而使先秦时期的中原、成都平原，成为坚挺的东亚文明核心。

早在史前时代，成都平原就与缅、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产生了文化交流。印度地区所发现石斧、有段石铤，沿陆路“蜀身毒道”，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沿海路进入盘福加。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甘孜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马来亚与马来族的素梦、招魂巫术，与中国南方的楚风亦多相似，竹王的神话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

向西，“蜀身毒道”。

向南，经“犍道”与“南岭走廊”贯通。

商周以前，成都南下早已存在的“灵关古道”，经邛崃的“临邛道”，名山、荥经的“青衣道”，汉源、越西的“牦牛道”，连西昌“建昌道”，渡金沙江，进入云南，至大理……

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安南道相往还。从成都经夜郎（夜郎道），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相互往返联系。

在藏羌彝走廊南面的成都平原，以三星堆文化

为重心的古蜀文明的历史性传播、推动，吸引力和凝聚力，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相继产生青铜文化；酋邦组织形成，推动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的演进，文化从分散的后进状态，逐步走向文明，初步形成在古蜀文明影响、制约下，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状态，对秦汉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国文化大家庭，作用重大。

夏代、商代是一个大方国，或是很多邦国的混合体。

商末周初，“亚春秋”时期。

邦国林立。国际化古城。

开放、创新的多文化的结合体。

“古成都人”宗教信仰的中心。

规划思想，“法天象地”。都城的南部城区，神的空间；北部城区，人的空间；中间的河流，分割和连接的要素。北部，世俗空间；南部，神圣空间；中间，河流是连接的纽带。

世俗空间，人的世界，最下面的地面空间；神圣空间，神的世界，天上空间；两者之间的河流，象征水和云气，天上空间、地面空间的连接地带。天、地、水，古人最看重的三种元素。

城市规划，有天、地、水的象征。

“法天象地”的城市营建，在古蜀国一直延续。金沙遗址北面，世俗区域；南面，一个祭祀场所，又延续、发展到开明王建成都城，从成都城延续、发展到统一后秦国建大城、少城。

“共饮长江水”。北宋词人李之仪，曾在《卜算子》一词中写道：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在新石器时代，相距万里，长江上游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与长江下游诗化“江南”的太湖流域，却遥相呼应，各守长江一端的区域。

异曲同工。同样具有考古学文化的鲜明个性、区域特征。



壹

貳

叁

肆

伍

成都和杭州都是著名的休闲之都。

同处“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上。

同在长江经济带上。

5 000年中华文明史上，成都、杭州多次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一个被称为“天府”，一个被称为“天堂”。

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直线距离1 580公里。

两座看似遥远，却有着“神秘链接”的城市。

筑土为城，种植水稻，普遍使用石犁、石镰。

生活模式。良渚人一条高地、一条河。一条三四十米宽堆筑而成的高地，上面住人，临河而居，类似于江南水乡，非常像现在的乌镇。同时期的宝墩人，在被两条河流夹着的高地位置上，沿台地边缘，筑起墙垣来防洪，既能避免水患，取水、渔猎也方便，非常像现在的街子。

“天堂”的良渚，手工业成就天下，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水平很高。以玉琮为代表的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巅峰。

无独有偶。在长江流域上游的“天府”，继与良渚文明同期的宝墩文明后，诞生了辉煌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同样种植水稻，使用包括玉琮在内的精美玉器，却在青铜、金器的制造工艺上，另辟蹊径，登峰造极。

金沙太阳神鸟，甚至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历史巧合。帝舜时代，一场洪水肆虐中国，中华文明的人

文始祖大禹、岷江上游的古羌部族联盟、岷江中游的蜀族部落，从成都西北面的龙门山脉走出，迈出成都平原，北上南下，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了如指掌，治理滔天洪水，疏浚河流，解民倒悬。

“禹封泰山，禅会稽”。大禹把蜀地先进的文化基因、思想理念、生产经验等带到中原，将不同地域、不同部落的人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

“蜀夏同源”。大禹带领“北漂大军”治水，尽管有资料甚至考据表明，踪迹遍布西亚、南亚、中亚、北亚，许多地方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但大禹及其部族主要仍在长江、黄河流域活动。大禹更是夏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

《庄子》记载“禹之时十年九潦”，《管子》记载“禹五年水”，《荀子》记载“禹十年水”，都不是空穴来风。既有“史实素地”的成分，又有后世文人不断叠加上去的神话、传说因素。

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海贝，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成为原始居民喜爱的一种装饰品。由于大小适中、携带方便、易于计数等特点，就逐渐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

臣下若能获得商王赏赐的贝币，荣耀极大。

古蜀王的“小金库”。三星堆那些被烧焦，或者摩擦过的大量海贝，用作交换的货币，来自古蜀周边地域的云南、广西等地，还有尼泊尔、印度等国家。

成都平原核心地带，今双流、崇州、都江堰、温江、大邑、新津一带，动植物极为丰富，盛产水稻、水果、亚洲象、大熊猫、野猪等生物，有些动物被雷击而死，有的被猎人捕杀。

三星堆、金沙遗址，都有大量象牙、野猪獠牙等。

能捕杀大象、野猪者是英雄，受人尊重。

集中发现的象牙超100根，来源无论怎样，都应是统治者财富、权威的象征。

大量来自緬、印的象牙，“蜀身毒道”长途贸易的实物见证。

通过“古蜀道”，传播吸收的中原商文化中的青铜礼器；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采借而来的近东文化中的青铜雕像、权杖等文化形式；三星堆文化的一些文明要素，也通过长江水路，传播到鄂西，通过“古金牛道”，传播到关中，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滇、黔，以至

缅、印；通过“西北走廊”，进入欧亚草原，从鄂尔浑河谷，到伏尔加河谷。

科学知识的积累创新，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交流。

兼备华夏与内亚华夏双重传统文化的因素。

通过交流，从北方的“高地亚洲”到南亚印度、泰国，移入的文化因素。丰富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技术、伟大的艺术共同融进，作为创造性产物的各种物质形式、表现形态，多姿多彩。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黄金、青铜器、玉石原料，主要从龙门山、湔江河谷、阿坝州采集。

所用金、铜、锡、玉石、陶土，来自龙门山、阿坝，安宁河谷、攀西大裂谷。

技术人员大多来自“北漂大军”后裔的“夏氏遗族”。

古蜀原始宗教体系完善，政教合一。

人像采用了巫术、巫师的艺术夸张。参考了西亚、南亚、中亚等的脸型。

三星堆金属面具，各种巫师形象、祖先神像。

交通不便，青铜器面具只能在本地制造。

大鼻子、长耳朵、突眼睛的青铜人面像，蚕丛神像，艺术夸张手法，千里眼、顺风耳、大鼻子、额穿孔、后脑勺有洞，表示对天地的敏感、警惕、探寻和敬畏，与天神（雷电）的沟通。

额孔是“天眼”，敬畏自然。

神像不是低眉睡状，就是惊讶向天。

“川剧变脸”的源头、始祖。

青铜站立人身上各种纹饰，部分巴蜀文字，表示大地、水波、鱼鸟、太阳、行人、王者等意义。金杖的纹饰双鱼、双鸟、双人头和箭头，巴蜀文字，说捕鱼鸟、捕鱼人。权力象征。

四川扬子地块西缘，中国重要的铁铜等黑色、有色、稀土与贵金属成矿带，以独特的构造演化过程、丰富的矿产资源分布为特征。龙门山地区，一直是国内地质研究的热点地区。

阿坝紧邻成都平原，已探明矿种60种，矿产地318处。其中，已探明黄金储量116吨，约占四川的49%以上；有马脑壳金矿、草地金矿、东北寨金矿、新康猫金矿、漳腊砂金矿等大型矿床。

汶川、茂县等矿产资源丰富。

阿坝县褐煤储量达20亿吨。

古蜀王的「小金库」。三星堆那些被烧焦，或者摩擦过的大量海贝，用作交换的货币，来自古蜀周边地域的云南、广西等地，还有尼泊尔、印度等国家。

金属矿、煤炭在一起，才具备冶炼条件，烧煤才有高温。

青铜，铜与锡、铅等的合金，铜锡合金称为锡青铜，铜铅合金称为铅青铜。青铜初色为金黄色，埋地底氧化后生出一层青绿色的铜锈，称为“青铜”。古代青铜，锡和铜的比例为3比7。

青铜器必需的铜料、锡料，部分通过川江、金沙江“金道锡行”，分别从长江中游、云南地区引进。长江中下游的铜矿，经过传统的冶炼技术制成铜锭，装船通过长江的天然水道溯江而上，穿过三峡，再沿涪江、沱江、岷江等河流，源源不断地送往蜀地，然后再制作成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贸易已不是偶然现象，逐步发展到获取王权需要的一切奢侈品。

中原地区获得铜锡，主要靠地方纳贡、战争缴获、民间非法贸易、赠送、进献等途径。

《禹贡》曾记载，九州各地区上贡特产给大禹，扬州（今东南大部）、荆州（今长江中游）进奉的供品，都有“金三品”。《周礼·考工记》盛赞，“吴越之金（铜）锡，此材之美者也”。

最初使用天然铜，后才使用冶炼铜。

龙门山断裂带（阿坝）、攀西大裂谷，都有大量天然铜，没有铅锌。

铜矿石分为氧化铜、硫化铜。冶炼氧化铜矿石，用木材制成木炭，在炼炉内用木炭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就可直接还原出金属铜。炼出生铜后，制成一定规格的铜锭，再运往各地铸造。

云南个旧，世界闻名的“锡都”。

广西、广东、江西等省，也都产锡。

锡具有很好的杀菌、净化、保鲜效用。

锡器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公元前3700年。

凉山岔河锡矿颇为有名，最古老的锡矿床之一。

三星堆的金属器物，本地采购原料、制造，广汉是制造中心。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手工制造技术，世界最高水平。

中国“大国工匠”的发源地。

“中心”聚集。成都是古代制造中心、文创中心、宗教中心和时尚之都。

“古成都人”来自岷江上游河谷、山区，在山区行走时用杖助力，杖是必备器具。

《海外北经》中，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海内经》里，都广之野“灵寿实华”，做杖的好材料灵寿木。《汉书》记载：“赐太师灵寿杖。”

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

至今四川剑门的藤杖，仍驰名中外。

杜宇（鱼凫）是兴盛者、主建者，主要处于铜器、青铜器时代。

动态的城市发展过程。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与古蜀文明交融的过程，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反映。三星堆出土的骑虎铜人像、金沙出土的玉琮与线刻人像。

玉琮，宗教信仰和权力的最高象征。中华大地的多个古文明中都有出土，远到西北的甘肃齐家文化，南至广东的石峡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都有型制相同的玉琮。

彰显良渚先民的宇宙观念、精神信仰。

无声地诉说着长江流域先民的爱、恐惧与信仰。

家国情怀的源头。江原文化中的密码，仅存于四川。

大禹，四川向中华民族捧出的万世祭奉的伟人。

会诸侯于会稽，封禅于会稽，归葬于会稽。

绍兴（会稽）是我国北纬30度线唯一穿过市中心的城市。

成都附近走出的大禹，被人们葬在杭州附近的绍兴。

生于成都西北，葬于杭州东南。

两座古老的城市，天然地架起一座人文的桥梁。

成都、杭州均以丝绸纺织闻名于天下。在汉代，成都便已设锦官，统筹管理蜀锦织造，故有“锦官城”的别称。环绕成都的那条半天然、半人工的母亲河，也被人们称为“锦江”。

蜀锦畅销。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新疆的汉代蜀锦，因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蜚声海内外。巧合的是，这件极具考据、文化价值的文物，近年由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成功复制。

杭州丝绸历史，可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顶峰是明清两代的杭州织造局。官办丝绸几乎成为皇室的专供品，民间丝织业也呈现出“机户万计”的盛况。

两城之人都爱喝茶，市井中茶馆林立。

两城附近也都产好茶，蒙山茶均为历代帝王祭天贡品，“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耳熟能详。西湖龙井，名扬天下，在宋元明清四代，更是成为宫廷专享的“御茶”。

自古文人多入蜀，几乎所有文化巨星都曾在成都居住过。

无独有偶，杭州也是文化巨星向往之地。

无巧不成书。写杭州的苏轼，成都附近的眉山人，眼中的杭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写成都的陆游，杭州附近的绍兴人，笔下“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杜甫、白居易都是河南人。

从京城长安出发，一个向西，一个向东，分别来到成都、杭州。杜甫写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白居易写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在杭州，苏轼说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在成都，张籍却感慨，“游人爱向谁家宿”？

成都，诸葛亮立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杭州，岳飞却高呼“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岳王庙前慷慨激昂的人，到了武侯祠，也免不了黯然神伤。

精忠报国和鞠躬尽瘁，竟然异曲同工。

当人们感叹成都的薛涛时，可能也会想起杭州的苏小小。

不期而遇。相距三千里，两城却总能在历史长河中，“神秘链接”。

“感觉”相同。坐在成都茶馆里喝喝茶，与漫步在西子湖边吹吹风。

成都平原的文化变迁、文明演进过程，如同一幕大戏。

营盘山、宝墩、三星堆、金沙等主角，依次登台亮相；而河南二里头、湖北石家河、安徽凌家滩、辽宁红山文化，甚至域外文化，也纷纷入场，深刻影响了戏的情节与走向。

文化的多源、融合。

内外“双循环”，滋养古蜀文化的发展与辉煌。

同一时期。称雄爱琴海和近东地区的国家和强权，青铜时代

不期而遇。相距三千里，两城却总能在历史长河中，「神秘链接」。「感觉」相同。坐在成都茶馆里啜喝茶，与漫步在西子湖边吹吹风。成都平原的文化变迁、文明演进过程，如同一幕大戏。

晚期的黄金岁月里就已存在的国家，纷纷衰落消亡，有的立即消失，有的留存不超过百年。

与西罗马帝国覆亡一样，地中海东部诸帝国的终结，多次入侵、多重原因的结果。血与火中怒放之花，以色列人从迦南文明毁灭的灰烬之中，在那块被喻称为“流淌着奶与蜜之地”崛起。

除中原的商文明之外，成都平原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成都处于文明发展第一方阵。

一脉相承。从原始社会的解体、文明的孕育、诞生、发展、走向辉煌、到开始衰落，都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演进，这就是宝墩、三星堆、金沙遗址。整体文明发达程度，虽然并没达到中原一带的高度，但三个遗址延续足足有4 500年之长。加上天府文化的源头的营盘山遗址，古蜀文明的历史渊源推进至5 500年以前。

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重建中国古史的突破口。

“神秘面纱”，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三星堆遗址划定的面积就12平方公里，秦始皇陵才8平方公里。目前发掘的面积，只占总面积12平方公里的2%左右，“九牛一毛”，区区“一毛”，不可能去还原整个三星堆文明的“九牛”。

秦始皇陵里青铜鹤和一车六马是工艺精湛的巅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工艺精湛，能称得上是它们的鼻祖，高度竟然是3.96米，这还是顶部缺失的高度。青铜鹤还不到一米。

还有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约等于三星堆文化最后一期的金沙遗址文化。

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第一层花瓣，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第二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处于花心的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水是生命，长江是生命的全部。

背着逶迤的山峦，从中国第一级“地理阶梯”的唐古拉山脉，到第三级“地理阶梯”的崇明岛，从海拔近5 500米的沱沱河，到海拔仅仅8米的黄浦江，直达东海之滨，一个根脉，一个号角，与黄河的怒涛，见证岁月的沧桑，把华夏大地的千年梦想铺开，雕刻东方明珠的灿烂。

成都和杭州，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圣地。

以文明的交流，超越文明的隔阂。

以文明的互鉴，超越文明的冲突。

以文明的共存，超越文明的优越。

长江文化造就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

既能说明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独特性，也能解释中华文明的根本来源和根基。

中国的古老文明，同样起源于长江流域。

中华大地的古文明同出一脉，为“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提供最完整、最重要的考古学物证。文化演进，不是一条线的单向进行，而是从“月明星稀”到“满天星斗”。



壹

貳

參

肆

伍

巴适、安逸、和美。

尽管与商朝频频发生战争，“古成都人”的生活却未受影响。

平时劳作，战时出征。

古蜀国没有专业军队，但是每一位男人，都是军人。

春秋时的战争，一般只发生在两国的边境地区。

战争不过是实现霸主地位的一个途径而已。

贵族之间的战争，以礼规范，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不可肆意而为，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决斗相似。将领多为贵族出身，鲜有平民为将。齐晋的“鞍(今济南长清)之战”中将领郤克，出自晋国世卿家族。到了战国时期，将领的出身，不再受到限制，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白起，在秦王起用平民为将的过程中崛起。

春秋之时，士兵地位最低也是士，仍是贵族。

平民和奴隶，至多用于携带粮草，保证供给。

与古希腊城邦时期，战争情况颇像。古希腊的民主，贵族民主，真正参与到政治权力中是贵族，享受权益也是贵族，也是战争时重要主力。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等，都曾亲自参与战争。

鲜有大规模伤亡。

即便攻入一国之内，也不会对民众产生重大的影响。失败的一方，除了在作战中死去的士兵，活下来的士兵，会受到非常优渥的待遇，主帅被俘虏，胜方也会给予应有的地位、待遇。

天地君亲师，士为天地立心。

荀子提到：“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有抱负的人，不可以不胸怀宽广；意志坚定，因为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路途又很遥远。把实现“仁”的理想看作自己的使命，不也很重大吗？直到死才停止，这不也是很遥远吗？

侠客遍地，武士横行。

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社会主体审美，以高大健硕为美。

非主流审美。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描庄姜之美，《诗经》首说“硕人其硕”；写鲁庄公之美，必言“猗嗟昌兮”。

美男的“标配”：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配置雄性荷尔蒙。

《齐风》赞美猎人，“美且鬣，美且偲”，卷发多须。同样，《陈风》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大国，争雄竞长；男人，强悍好战。

《诗集传》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继老子之后、比庄子要早的道家首位大师，杨朱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建立人人为自己，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的“一毛不拔”，在于“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最早的人权宣言。

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不干。

灿烂时代，中国侠文化。

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

古蜀国富裕，却祭祀繁盛，受大禹「五服」影响，民风「尚五」，「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荆人鼈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连王权的「转换」，也被赋予传奇、浪漫的色彩。

演绎男人们，轻生重义、生死相许的壮烈与决绝。

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行侠仗义，不为名利，“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座位安排的小事上，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以礼治国。数百年的西周礼制，臻于完善，各诸侯国都奉行。

一场战争，既要互派使节，约定时间、地点；战争之时，还要等双方摆好阵势；一方败逃，追击的一方，不得肆意杀人，被俘虏者，会受到敌国的优待……蕴含贵族精神。

“两个文明”。东方，奠基于周，以“天道+士+民本+和而不同”为核心、道统制约君权的华夏文明；西方，奠基于雅典，以“私有制+士+选举执政者+理性逻辑”的欧美文明。

文明程度与国土面积无关。雅典文明程度远过阿拉伯、罗马帝国，“小邦周”远过“大邑商”。文明程度与军力无关，周人不与戎狄拼武力，文明远过戎狄；雅典武力不如斯巴达，文明程度远超后者。

周人实施“把国土让给戎狄，争取民心、以仁政凝聚天下”的国策时，就建立文明。周武王灭商，任命商朝的贵族为史官，监督执政者，以“士”阐述天道，以天道指导执政者。

“太史令”。记载史事，编写史书。

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的官职。

从夏朝开始，朝廷就有记录帝王言行、国家大事的史官，优良的传统一直保持下去，经商周至秦汉，虽然品级高低，官职名称有一些变化，职位一直存在。

两河流域与埃及，世界上最早走进文明的地区。创造人类早期的辉煌，发明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办教育，兴文化，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志。

古印度虽然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

典，有宗教，还是没有史志。

在古代，只有古希腊、中国不但创造历史，而且创造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志。只是，古希腊的史志主要是当代史，古希腊人没有形成数代史家连续按时叙史的传统。

古希腊人以数学来审美，开理性与科学的先河；中国人很早便观察到自然的规律，并将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依据。这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奠定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石。

贵族落幕。到了战国，阶级更替，演变为不可控制的征伐战争，目的在于灭亡他国，得到土地和资源。各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大规模作战时有发生，血腥杀戮。

兼并，战国与春秋的最大区别。

平民阶层的崛起，开始成为军队的主力。

淘汰规范贵族的礼仪，大多施行军功爵制，唯有战场上杀人的军功，才能让人晋升，地位提高。战争常常发生屠城灭国的原因。

“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40万降卒，惨烈之极。

古蜀国富裕，却祭祀繁盛，受大禹“五服”影响，民风“尚五”，“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荆人鼈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连王权的“转换”，也被赋予传奇、浪漫的色彩。

历史转变。古蜀国再次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

“外循环”。位于秦岭南的“蜀”，与秦岭北的“周”联系紧密。

周朝“艺术治国”。周人的生活，从战争、外交，到治国、治家，“不学诗、无以言”。没有音乐，不是诗人，就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诗是唱的。可以只唱曲，可以只说词。

周朝建国前，先建“黄埔军校”，称为“辟雍”。

“周公吐哺”，广揽教师、学生。

军校学生，既是将来灭商的战士，也是统一全国后的地方官。

以“小邦周”，图谋“天邑商”。“辟雍”，该研究什么战术？敌人人数太多；一切计谋与算计，都不管用，因为激怒敌人得不偿失。研究出礼、乐、射、御、书、数“六大战术”，武力仅两个：射、御。

战车、弓箭，唯一能够弥补人数的缺陷。

另外的四大战术，几乎都是“人文艺术”类。

文明的力量。诗：文字表达能力，口才、宣传能力、感染力；自我修养、让人敬佩与崇拜的工具；乐：音乐，表达善意的能力，提升个

人形象、传播周朝的先进生活方式的工具；礼：秩序形象，文明的军队，给人以震慑。

以德服人。战争，就是表现先进、文明，使敌人羡慕，而主动投靠。

“武王伐商、前歌后舞”，周人首先展示生活方式的优越。

战场宣誓，强调的是“六步七步乃止齐”，军容整齐、彬彬有礼，不杀受伤者、不追逃跑者，对战败者给以出路、送给机会。以具体事实，体现自己的战争文明。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姜子牙的“虎贲三百”，表演极其娴熟的御射技巧。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声势浩大。在周文化的感召下，居然“前徒倒戈”，加入到周军。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决胜战的成功，使周人更加重视才艺的“软实力”。

周武王亲率精锐，出兵东征。

杜宇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史称“六师”。

《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騶彭彭。”古蜀军队，“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战斗力极强，推翻殷纣王的重要力量。文明形态有别于华夏族，被后人称为“蜀族”。

继“汶川之会”后，“川军”再次北上。

对中原先进文明的向往、吸纳，贯穿着古蜀文明的始终。

3 000年前，人类历史进入“轴心时代”。

世界两大文明顶峰的周朝与雅典，同时形成。

两个文明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以德配天”。西周实施“以德治国”模式。

东周，有“徙木立信、令出法随”的“依法治国”，有别于西周的“依天理天道立法”的“依法治国”；古希腊，有“斯巴达依法治国”，有别于雅典的“依理性逻辑立法+依法治国”。

混血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价值共同体。一个用国家包装的文明。

中原族体文化，包括周围族体文化，连续不断、汇聚、融合、分解、组合。

不料，“天时”狙击了“外循环”。

天不助蜀。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

“灾变气候”。公元前800年左右，成都平原发生大面积持续性干旱，间以突发性暴雨和洪水灾害。

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古蜀国人口锐减大半。

遭遇一场“亘古未有”的山崩“雍江”之患。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

洪患严重。《蜀王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

唐代诗人岑参写的诗《石犀》，记录了他耳闻的古蜀洪灾：“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

中国黑色幽默的鼻祖。明明江水都泛滥，还有心思开玩笑，说“古成都人”差点变成鱼。真是鱼倒好，但是人不行，在洪水中只能像被打昏的鱼一样，在水里东碰西荡，一命归天。

三峡一带的鳖灵部落，为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

鳖灵，灵鳖，灵龟的化身。

龟，极识水性的动物。在中国吉祥文化地位重要，龙生九子中有它，女娲补天断鳖足以立天有它，与龙、凤、麟合称为四灵，美好的象征。

长江下游沿岸有句民谚：鳖蛋生得高，江水定滔滔。鳖一般在江边的沙地里产蛋，最佳位置，高出江水线不远处，既不会被水淹，小鳖破壳后，可以立即回到江水中，找东西吃。

长江之水涨落无序，鳖总能找到产蛋的最佳位置。

有预测洪水涨落的能力，民间才有谚语。

“若尧之洪水”，遭遇特大洪水。

鳖灵治水。杜宇也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根除水患，觉得鳖灵人才难得，便委任为相，治理洪水。鳖灵受望帝的委任，带领民众治理洪水。巴文化、荆楚文化正式进入成都平原。

继「汶川之会」后，「川军」再次北上。对中原先进文明的向往，吸纳，贯穿着古蜀文明的始终。6000年前，人类历史进入「轴心时代」。世界两大文明顶峰的周朝与雅典，同时形成。

洪灾惨烈。“壅江”“滞水”，致“蜀水不流”。

鳖灵因长期与水打交道，熟悉水性，擅长治水。

文献中的鳖灵来源，也与水密切相关，充满神异色彩。

《蜀王本纪》等文献，称“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复活”。

看似荒诞，暗示史实：“鳖灵犯罪当死，乃伪称投水而潜走投蜀。故楚人求其尸不得，而谓在蜀复生。”从湖北经重庆辗转进入成都平原后，因拥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得到杜宇王朝的重用。

如同杜宇一般，“新一代蓉漂”。

《蜀王本纪》记载，鳖灵开凿“玉山”，《风俗通义》《本蜀论》说，“凿巫山”，《华阳国志》记载，“决玉垒山”。“巫”“玉”二字，因形近而讹，以“玉”为是。

许慎《说文》：“决”，下流也。

“玉山”，即“玉垒山”，为岷水发源地的茶坪山。

位于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处。

鳖灵“决玉垒山”，打通了“宝瓶口”分洪，自高向低，从岷江“决”出一条河，入沱江水系，“排除阻塞物，疏通水道”，再打通巫山，水流就从岷江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解除。

“汶川之会”前后，大禹曾为沟通岷、沱水系，开凿过人工引水河道，时逾千年，已严重淤塞，或已湮没。鳖灵再次整治、修缮，“民得安处”，顺理成章。

鳖灵治水，影响甚大的活动有两次。

除了“决玉垒山”，还有“开金堂江”。

“开金堂江”与三星堆城的毁弃关系密切。

“二龙戏珠”原型。成都平原，旧为内海，被玉垒山、邛崃山与龙泉山环抱，西北高、东南低，一个由龙门山脉、龙泉山脉包围而成的倾斜冲积平原。岷江、沱江与所有分支，都由西北流向东南，龙泉山脉像堤坝一样，拦在河流面前，滔滔江水只能从西南面的新津河谷、东南面的华阳河谷与东北面的金堂峡三个口流出。

新津河谷宽度很大，成都平原的主泄洪口，华阳河谷宽度也不小。

惟有东部，沱江干流在穿越龙泉山处的金堂峡，完全可能被阻塞。

易涨易落。龙门山脉常常出现山洪泛滥，推移质多，不仅导致岷

江、白鹿河下游经常出现河水泛滥，沿河居民粮食绝收，而且一旦壅塞，无法排泄，就会导致“蜀水不流、蜀地涸水”。

岷江流域的灌口封堵，内泽一片汪洋。

巨大的“堰塞湖”，“悬浮”在成都平原的脑后顶。

大禹治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治理的仅仅是岷江。

影响成都平原，还有湔江，汇聚龙门山西端各水系。

上游地处龙门山脉南面的腹心地域，地势像一个狭长的口袋型河谷，西高东低，呈西北走向，幽深的河谷顺山势，向着远处的川西北高原的岷山心脏，默默地延伸。

河谷中部，有一来自东边的重要支流白鹿河强势汇入，古称雁江。

森林覆盖稠密，降水量非常丰沛，远方皑皑的雪山，永远流淌不尽的源头。历史上，湔江的径流量很大，为古蜀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水源。

下游，三星堆的鸭子河、马牧河。

河床淤积严重、河岸低。



壹

貳

參

肆

伍

金堂峡，成都平原最低之地。

金堂县城赵镇下游6.5公里处。

海拔高度400米以下。

平时，“古成都人”重装木筏，从下游的“都广之野”，通过“天彭门”，直接抵达湔江上游河谷的“瞿上”。但是，湔江河床十分陡峭复杂，一遇雨季，河水满床，就泛滥成灾。

出口受堵，不仅金堂、德阳、广汉、什邡、彭州都成泽国，还会殃及新都、成都、简阳等地。沱江上游涨水，不像岷江有新津、彭山等出口可泻。只要金堂瓶颈壅塞，洪水就难消退。

没有宽松出口，金堂峡总是“愁眉紧锁”。

治理湔江，开凿金堂峡，被提升为“国家工程”。

沱江水流切割龙泉山脉，形成全长约12公里的峡谷。峡口部分窄如瓶颈，最狭窄处仅有40米宽。峡谷蜿蜒曲折呈S形，河道狭窄，峡谷岩岸壁立，河床巨石如麻。

沱江主源的绵远河、石亭江、湔江，与岷江水系的青白江、毗河的水量都不小。

形成涝灾。汹涌的江水，被严重阻滞、宣泄不畅。

每遇上游暴雨，五江并流、洪水滔天，从平原上冲下来大量的泥沙、各种杂物不断涌来；如再遭遇地震，地震次生灾害，峡谷岩岸滑坡、崩塌，阻断江流，整个峡口可能完全被堵死。

金堂距广汉20公里左右，如遭遇暴雨洪水，特别是地震洪水，峡口一旦被堵，致“蜀水不流”，江水回淹，广汉在劫

难逃。洪水穿破城堤，完全可能淹没三星堆，毁灭古城。

定国安邦的“一号工程”。

鳖灵拓峡不全是神斧劈山，疏浚淤塞的河道。

劈山开路浩大工程，不是短短几年就可完成。

沱江小三峡的东岸。

海拔998米的龙宝山，龙泉山脉在金堂境内的第二高峰。

神奇之地。与西岸的云顶石城，遥遥相对。

坐东朝西。视野开阔，选址中段“窑洞石屋”，拓峡“总指挥部”。清晨，太阳一出，东方的阳光直射，直接观察沱江江面，龙宝山地势高，视线开阔，能将江峡尽收眼底。

处于金堂峡的中段，上可观水城新貌，下可看淮州全景。

为观察江面情况方便，鳖灵摒弃风水理论，从实际出发。通风透气、光线好，冬暖夏凉，生活环境干燥，长期工作，山顶风大，建修特殊的“窑洞石屋”，比凿石窟更符合实际需要。

金堂峡口偏窄，又连续有几个弯道。

特大地质灾害后，一些上游冲下来的枯木、大树，挡在峡口，枯木浮物越累越高，完全堵住金堂峡，致使河水无法排泄，导致成都平原东北角一带形成汪洋，水患成灾。

鳖灵带人疏浚，杂物最终随波而去。

成都平原又沃野千里。

“吃一堑，长一智”，建一个沱江水文观测站，派人随时观测江面的情况，以便尽早发现淤塞，排除险情。秦灭蜀后，历代执政者，要避免水淹成都平原的重蹈覆辙，也会在龙宝山设立水文观测站。代代相传，直到清朝时期，水文观测站依旧在发挥重要作用。

“永安寨”，水文观测站的后勤基地、家属区。

遗留建筑，纪念鳖灵的圣地。

鳖灵治水的足迹，南到青衣江流域的乐山，北抵嘉陵江流域的阆中。

《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卷，在“阆中”条目下，均记载阆中城东十里灵山有鳖灵庙。典籍虽晚，反映的古蜀国治沱江却很早。

开明时期，船棺葬在巴蜀地区颇为流行。

鳖灵族群的特殊丧葬习俗。

生前以船为家，死后回归船上，反映族群文化习俗和治水的密

切关系。

旷日持久。开明王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得到考古材料的印证。

成都市中区指挥街遗址。出土的一排呈东西走向的6根木桩、竹木编拦沙框等遗迹遗物，与防治洪水有关，时代不晚于春秋前期。

方池街遗址。发现的砌筑卵石建筑，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处防洪排泄的水利工程。由东、西、中三条大而有规律的卵石石埂组成，形状呈工字形。用竹笼装满卵石砌成，为一倒“人”字形滚水、支水、水埂。数条呈规律分布的卵石埂，具有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的功能。成都平原水利技术的重要创举，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筑提供范本、经验。

来自江汉平原，具有丰富治水经验的鳖灵，成为“蓉漂英雄”。

“禅让”鳖灵，“委以政事”。

以宽厚和充满灵性的气度，杜宇把王位“禅让”给鳖灵。

前七世纪中期，鳖灵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是为“丛帝”。

传位12代，统治古蜀国350年。

“蜀得陆处”。鳖灵治水后，成都平原水稻、粟等粮食的种植规模、产量，较前很大提高。已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丰产区。不仅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还大力开展经济林木的栽培、种植。

梅，蔷薇科落叶果树，核果，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各省。

食梅的历史悠久，早在春秋之际，梅已经驯化成功。

桃，蔷薇科落叶果树，西南山区也是野生桃的分布区，栽培历史同样悠久。薄皮甜瓜，起源于非洲，中国是次级起源中心。《诗经》记载，先秦时期已经栽培甜瓜。

一幅生动的采桑图。一群身穿长裙，梳着长辫的妇女在园中，繁忙地采摘桑叶，有的攀爬在树上采、有的树下头顶竹篮或手挽篮筐运，还有一人，在一旁歌舞助兴，桑园场面异常热闹。

到开明王朝时期，蚕桑业巨大发展。

《汉书》描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华阳国志》记载：“桑、漆、麻、之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

五谷丰余，多余的粮食就被做成各种米酒（醴）、烧酒。

在“古蜀国母”朱利酿“务农酒”前，柏灌部落在“故地”就已酿酒，随同大禹“北漂”，夏帝杜康（少康）“初作秫酒”，就是根据柏灌的

“斟灌氏”酿酒原始方法，提炼、精化而成。

“斟灌”，“斟”的本义“往樽中倒酒”，即斟酒。

“斟”的左边“甚”，金文字形上下结构。上“甘”下“匕”，“甘”指“美味”，“匕”看去像“用来舀酒的酒勺”，“甚”，造字本义“享受美酒佳味”；“斗”，限制酒量的“剩酒工具”。享受美酒的前提，“恰到好处”。

“古成都人”早已发现，酒虽是好物，饮多伤身，加计量词“斗”以限制。“斟”的真正含义，引申出“斟酌、衡量”等字义。“灌”，指用来盛水或酒的长嘴陶器，大口盛入，取时从长嘴倒出，引申出“浇灌、灌溉”等字意。

两个字都离不开酒，“斟灌”两字连用，与古蜀先人在成都平原的祭祀活动有关，祭祀神灵时，有一项重要的仪式，即“斟酒灌地以敬鬼神”，现在仍被沿用。“斟灌”的由来。

成都平原的酒文化再度繁荣。

家畜动物不仅用来食肉，还具有某种宗教礼仪功能，“古成都人”用完整的公鸡埋入填土中，用来举行祭祀活动。新都战国木椁墓，出土的铜鼎内，也盛有鸡、羊、猪骨骸。

农具，变化不大。

青铜工具，在农具上应用不多，与全国青铜农具少见的情形吻合。

与自然环境优越有关。成都平原是山前冲积扇平原，土质肥沃，对耕作工具的倚重不高，石、木质农具，即可满足，在没有金属农具深耕下，农业生产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对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富庶闻名。雄踞西南的泱泱大国。

治水患。勤付出，修堤坝，筑河道。

兴水利。拓平原，保良田，观四象。

勤耕植，促商贸，开商道，扩坊市等措施渐收

一脉相承。古蜀文化中的「十二桥文化」，距「营盘山文化」2500年，距「汶川之会」大禹「北漂」治水1700年，距「古成都人」创造的「宝墩文化」1600年，距「三星堆文化」400年。

曾经的美丽家园……

寻访、重走「藏羌彝走廊」上的「松茂古道」「灵关古道」「古金牛道」——
 深藏着「成都人」的「生命密码」、天府文化的「原始基因」，就像寻找一
 个失落已久的文明，寻找一份属于「古成都人」的荣光，寻访成都先民梦中

成效。

经济文化建设，成都平原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斗转星移。公元前500年左右，开明五世在“瞿上”北翼，新津“宝墩”、双流牧马山“九倒拐”向北、广汉三星堆向南，山水环抱的平原地带建都，大兴土木，扩建城池，是为“金沙”。

建城的“古成都人”诞生。

腾空出世。自我创新能力，一个宏伟壮丽的建筑群。从蚕丛到柏灌、鱼凫，直到望帝、丛帝，古蜀国在史书、考古、文物与现实的勾勒下清晰地显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文明季候。

废墟中崛起，“国家能力”强大。

较强的自我复制、自我修正能力。

作为政治实体，不仅在社会治理、经济文化、思想理念、技术发明等诸多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经济居于同时代的领先地位，驯服、教化周边出现过的强力实体，经受住一系列不幸的地震与苦难水患的重压。即便遭受“灭顶之灾”，作为政治实体风雨飘摇，作为文化实体，却仍能走出从未有过的困境，仍以坚定的决心，百折不挠追寻着希望，仍渴望着美好生活的未来。

文明的发展，的确不是线性。

2 000年的时光，让曾经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古人，早已没有同族意识。

2 000年前的“古成都人”，不过从一种草搭棚子，换成一种木搭屋子。

2 000年后的“古成都人”，却是从“三星堆文明”的巅峰，跨上“十二桥文化”的高台。

重建的“公园城市”金沙城，也将正宗的古蜀文化传承，寄拥给中国。

个中原由。古蜀文化超越性的维度，比周围的文化高很多。

本原文化，包含“江原文化”的古蜀文化。

本原文化的两个标志：觉悟“绝对”与觉悟“普遍”。

既是一种文化信心，也是一种命运安排。

强大“基因”。冥冥之中，或许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给“成都人”的定数。

本原文化，既是一种幸运 也是一种命运。

城市精神气度勃发的内在潜因。

城市想象力、生命力旺盛的绝佳象征。

江原文化，由大禹父子开启。

“导江治河”。改“堵”为“疏”，“疏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在都江堰的位置，将岷江分为岷江、沱江两条河流，通过沱江，将岷江上游多余来水导入长江。

创造岷江上游治水使用的杓槎。

还留下“以德治人”的传统。

龙门山，因大禹“凿龙门，铸九鼎，治水患”得名，主峰九顶山，也称九鼎山。

得出“水可立国”的真理。在《史记》中，司马迁高度评价大禹，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禹为人聪明过人，又能吃苦耐劳；不违背道德，仁慈可亲，言而有信；声音合于音律，举止符合法度，一举一动，严守规矩；注重严谨，百官的楷模。

治水英雄。德才兼备的圣明帝王，《吴越春秋》记载：“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上天也为大禹对百姓的感情而感动，让群鸟在大禹死后回来帮民众耕耘。

古羌的生理基因、古蜀的文化基因，在大禹身上叠加，得到完美体现。

在治水与立国中，体现出的以爱民、礼贤、律己、创新的大禹精神，成了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巨大无形资产、生生不息的强大文化基因，自己也成为世代中华儿女无限敬仰的伟大圣王。

古羌史，华夏民族的共同记忆。如今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还保存着苍凉的羌笛、婆娑的羌红、精美的羌绣、神秘的祭祀、神奇的羌碉……被誉为中华民族演化史上的“活化石”。

一脉相承。古蜀文化中的“十二桥文化”，距“营盘山文化”2 500年，距“汶川之会”大禹“北漂”治水1 700年，距“古成都

人”创造的“宝墩文化”1600年，距“三星堆文化”400年。

蜀字，另一种“造型”，如一个眼目巨大的立人。

眼目，代表日，但不是真日，是日晕。

日晕，气象现象。金沙出土的头戴太阳帽的立人，太阳帽实为日冕。

日冕，天文现象。金沙立人表现的是，在日食过程中祭祀太阳神的一种形象，与蜀字的造型十分相似。“蜀”字本身的造型，就是太阳神或是对太阳神的祭祀形象。

祖神蚕丛形象，应为太阳神。

金沙立人像和三星堆立人，确实像蜀王祭祀太阳神的形象。

公元前347年，等洪水消退后，擦干眼泪，开明九世重新聚集洪灾中幸存的“古成都人”，将从西边的“金沙城”，迁移到西北边浅丘龙岗状台地的“武担山”一带，建起王城。

模仿前贤的用意，称在“副都金沙”上再生的都府为成都。

为避水患，取周王迁岐之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成都”二字，蜀语的读音是“蜀都”。

“成都”，“成”者，毕也、终也，最后的都邑。

永久定都于此，不再播迁。

蚕丛、柏灌和鱼凫开创的古蜀国，遵循中国建城鼻祖、“基建狂魔”的奠基者鲧的建城理念，传承正宗的“江原文化”，“疏”“堵”结合，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文化形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经历杜宇、鳖灵两代蜀王的开疆拓土、安民治水、不断迁徙、寻找，至开明九世始将国都定迁成都，结束先民2000多年寻找最佳居住地的漫漫旅程。

城市文化的发源，高雅和创新的城市精神。

见证三次迁移。古蜀“三都”的新都、广都、成都，为开明蜀国的都城所在，互为犄角，成相互依托扶助之势。广都最老，新都虽然挂“新”，却在成都之前，三星堆与金沙城之间的节点，串联起两个文明，形成文化走廊，成都城发展通道上的“中转站”。

成都、新都之名，沿袭至今。

“郫邑”与成都、临邛一并兴建，作为成都的副邑设立。

一条道路，一条古代人群迁徙的天然通道，能让金戈耀日、文脉

长流，才有深度；能让君王扬鞭，也能让百姓散步，才有宽度。寻访、重走“藏羌彝走廊”上的“松茂古道”“灵关古道”“古金牛道”——深藏着“成都人”的“生命密码”、天府文化的“原始基因”，就像寻找一个失落已久的文明，寻找一份属于“古成都人”的荣光，寻访成都先民梦中曾经的美丽家园……

像一支飘荡的曲谱，默默奏出悲凉而雄壮的史诗。

沿「西北走廊」南下

「天府之国」的历史底蕴

美女配英雄的「成都精彩」

周朝分野中西文化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



巴蜀城市传记大典系列

《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

《大蜀道（上、下）》

统筹 中共成都市青羊区委宣传部

支持 成都时代职工文学创作院

上架建议：城市传记

ISBN 978-7-5504-5101-8



9 787550 451018 >

定价：168.00元(上、下)



书内精彩片段配有音频